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英] 斯蒂文·朗西曼 著
Steven Runciman

马千 译

APG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CAMBRIDGE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英] 斯蒂文·朗西曼 著
Steven Runciman

马千 译

APU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英）朗西曼著；马千译 .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7
书名原文：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ISBN 978-7-80769-683-4

Ⅰ. ①1… Ⅱ. ①朗… ②马… Ⅲ. ①拜占庭帝国－中世纪史 Ⅳ. ① 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6819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8764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ISBN-13: 9780521398329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著　　者 | [英] 斯蒂文 · 朗西曼
译　　者 | 马　千

出 版 人 | 田海明　周殿富
总 策 划 | 武　学
策划编辑 | 张晓辉
责任编辑 | 武　学
执行编辑 | 郭伟娜
装帧设计 | 末　氓
责任印制 | 刘　银　訾　敬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陶源源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95mm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5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683-4

定　　价 | 58.00 元

序　言

我与马千同志素昧平生，至今也未能谋面。但我们神交已久，通过网络探讨眼前这本书有很长时间了，因此他多次来信希望我能为新书的面世写个序言，我欣然同意。之所以打破了我只为自己的学生出书写序言的惯例，原因还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阅读过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 1903-2000）的多本作品，其中包括这本书，作为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初学者，当时便深有感悟。

最深的感悟是作品具有的浪漫情调，远非学院派著作可比，不仅读起来平实无华朗朗上口，毫无学究气，而且内容易懂贯通性强，凸显学养之厚重。他的作品在国际拜占庭学界浩繁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不是独树一帜的话，那也称得上是特立独行。我不知道翻译者马千同志是如何看中了这样一本好书，因为据我所知，他并非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专门研究者，但是他独具慧眼挑选了朗西曼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花了几年的时间和精力认真翻译全书，使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位知音。可以想象，马千同志作为拜占庭史的爱好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扫除大量专业术语的障碍，而且其用功之勤令人赞叹佩服。作为我国拜占庭学界的一名老兵，我在祝贺他为我国拜占庭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同时，从内心深处感到一定要向他学习，为推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工作。

斯蒂文·朗西曼作品的独特性透射出这位英国拜占庭学者的传奇人生。这位长寿学者出身世家，父母都是工党议会成员，祖父是富有的船商。他自幼聪颖

过人，记忆力超群，5 岁即能背诵荷马史诗和拉丁古诗，其天赋的语言才能日后更是表露无遗，据说他不仅可以讲拉丁、希腊等欧洲所有语言，而且可以读懂土耳其、叙利亚、阿拉伯、波斯、希伯来、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古语。当年他拜英国拜占庭研究学院派奠基人 J. B. 伯里（J. B. Bury, 1861–1927）为师时，就是以多种语言能力进入师门，成为伯里唯一的研究生弟子。在大师熏陶下，他在名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刻苦读书，默默成长为顶尖的拜占庭学家。他秉承名师伯里的衣钵，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接受了祖父的巨额遗产，放弃了三一学院优厚的待遇，辞职周游世界。在战争期间，他于 1942–1945 年任教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担任拜占庭艺术和历史教授，同时尽情考察游历东地中海古迹名胜。这位老派学者阅历丰富，生活自由潇洒，在外人看来无拘无束多少有些古怪，他曾为我国末代皇帝溥仪弹奏钢琴，为埃及福亚德国王讲解塔罗牌，还在伊斯坦布尔的佩拉酒店遭到德军流弹袭击受伤，在拉斯维加斯投币老虎机上两次中彩，这些经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他长寿而多产，其 20 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国际拜占庭学界牢不可破的地位，他活动在学院派体制外也并不影响其国际声誉，笔者于 1984 年在希腊留学期间有幸聆听他的演讲，并主动讨教，其诙谐幽默的回答闪烁着英国绅士的智慧，至今犹历历在目。相信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够联想到这位睿智的作者，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陈志强[①]

① 陈志强，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继著名学者罗念生之后，第二位“希腊最高文学艺术奖勋章”获得者。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是陈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他以中文、英文和希腊文撰写论文和学术文章近百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考古》等国内外历史专业刊物上，撰写和出版了《拜占廷学研究》《盛世余晖——拜占廷文明探秘》《拜占廷文明》《中文史书中关于罗马希腊世界的资料》《君士坦丁堡陷落记》《4–15 世纪中国和拜占廷关系史研究》等著作。

译 序

1453 年 5 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除此之外，在长达 7 周的战役中，双方不论民族、信仰，均表现出惊人的英雄气节与坚韧，荡气回肠，令人动容。故而，数百年来它受到西方历史学家的持续关注。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题材，国内相关资料却凤毛麟角，几乎成为一项空白。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 1965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在大量西方同类专著中，该书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篇幅适中，已成为此领域备受推崇的权威著作之一。相信对国内读者而言，此书的译介会对探究那段历史大有裨益。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Sir James Cochran Stevenson Runciman CH, 通常称为 Steven Runciman, 1903-2000），英国知名历史学家。他出身名门。父亲为第一代多克斯福德子爵沃尔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 1st Viscount Runciman of Doxford），同时也是英国自由党重要政治家、国会议员。斯蒂文是家中次子，天资聪慧，自幼好学，据说 5 岁便已通识拉丁语、古希腊语，随即先后就读于伊顿公学（期间与大文豪乔治·奥威尔成为同学及挚友）、剑桥三一学院。他在剑

桥期间师从爱尔兰裔拜占庭史专家 J. B. 伯里，并成为后者毕生最得意的弟子。朗西曼在语言方面极具天赋，除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还精通俄语、保加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格鲁吉亚语。据说其导师 J. B. 伯里原本已经半退隐，无意再收录这名弟子，当朗西曼毛遂自荐说通晓俄语后，便特意“刁难”，将厚厚一沓保加利亚语文献交予编辑翻译，不料朗西曼居然牛刀小试，游刃有余，令伯里刮目相看。三十年代末，朗西曼继承了祖父的大笔遗产，开始了其游学生涯。1942 年至 1945 年，他作为拜占庭艺术史教授任职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期间对十字军史开始产生浓厚兴趣，经过近十年酝酿，在 1951-1954 年陆续出版了三卷本《十字军史》，一举奠定了其学术地位，至今依然是十字军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朗西曼先生著述颇丰，除十字军历史题材外，其余多与中世纪拜占庭及其周边国度（如西西里、叙利亚）有关。1965 年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他又一杰作，经久不衰，迄今已重印 18 次之多。1983 年，因朗西曼在学术领域的卓越贡献，他荣获英国名誉勋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1917 年由英王乔治五世设立，用以表彰在科学、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士，全球名额仅 65 名，获得者可在姓名后冠以 CH 字样）。

朗西曼先生语言造诣之深，书籍涉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本书引用了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的大量文献，构筑了一道完整、多角度的历史全景。与此同时，作者行文雍容流畅，娓娓道来，隐约透露出一股贵族之风，令人不忍释卷。然而本书毕竟出版于 1965 年，虽多次再版重印，但并未做重大修订，部分资料难免有陈旧之虞，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在译注中引用了部分 1965 年后的参考文献，作为补充。《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涉及的时空范围，国人相对生疏，专有名词和术语的翻译可谓最大难点。正如朗西曼先生在前言中所说，由于大量人名地名是由各非英语词汇转译，他并不能保证无懈可击——有时作者信手拈来，其拼写便与现代通行的方式存在微妙差异。译者在力所能及范围，对各专有名词进行了考证，并按照国内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译名及《世界地名大

词典》《世界人名大词典》的规范予以翻译，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时在括号中附上原文拼写，方便读者查询。极个别未有规范汉语译名的人名地名，则保留原文形式。朗西曼原书主要面向西方读者，一些本应耳熟能详的历史背景，国内读者或许倍感陌生，对此译者尽量在译注中予以介绍，并附上参考文献。对于翻译考证过程中发现的个别原书错误，也在译注中一并指出（如君士坦丁堡城墙内外城台的名称错误、奥古斯塔广场的拼写错误等）。为与原注相区别：原注用①②③于页下排序，译注用 [1][2][3] 于书后统一排序。原书的参考书目中大部分文献为国内罕见，译者在译注中有意补充了一部分中文参考书籍，作为弥补。

朗西曼先生虽是英国学者，但在著作中对东方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并无歧见，对其成就也多加颂扬。不过毕竟是深受古希腊罗马人文传统熏陶，对于拜占庭帝国的覆灭，对于其臣民亡国后的遭遇，作者也难免痛彻心扉，这一情绪在本书第十一章《战败者的命运》中有所流露，虽不宜苛责，但亦请读者细心甄别。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出版之际，译者要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拜占庭史专家陈志强教授。陈教授《拜占廷帝国史》《拜占廷学研究》等著作一直是译者必备参考书籍，当译者在翻译中遇到疑难通过电邮冒昧求教时，陈志强教授虽与我素昧平生，却耐心点拨，热情鼓励，使译者有信心将译稿付与出版。本书的翻译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在此一并感谢家人对我长期的理解与包容。

译者不自量力翻译史籍名著，译文、注释难免有谬误、欠妥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马千

前　言

昔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然而今天的人们认为历史的长河中很难寻找出上述绝对的界限。在陷落发生前很长时间，意大利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兴起了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在1453年之后很久，中世纪的思想依然在北欧盛行着。1453年以前开端的地理大发现已经深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但尚需数十年其影响才能在欧洲充分显现。拜占庭的灭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与上述变化息息相关，但其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当下立现。拜占庭的知识在文艺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1453年前半个多世纪，便有相当一部分拜占庭学者来到意大利谋求更好的发展，在这以后，同样有学者从异教徒的土地，甚至威尼斯治下的前拜占庭岛屿远赴欧洲“淘金”。奥斯曼实力的增长确实引发了意大利诸多商业城市的担忧，不过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没有立即终止东地中海贸易，受到显著影响的只有意大利至黑海的商业航线。对威尼斯而言，奥斯曼占据埃及的打击要剧烈得多，而对热那亚而言，其在意大利商业霸权的动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失去拜占庭商业区的损失。

即使从政治意义上看，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当时奥斯曼人已经抵达多瑙河岸并威胁中欧，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拜占庭首都难逃一劫——后者领土几乎萎缩至仅限衰败不堪的君士坦丁堡一隅，自然难以与占据了大半

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抗衡，何况土耳其还拥有那个时代欧洲最强劲的战争机器。诚然，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对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刺激颇深。不过，那时的西欧诸国并无如此远见卓识，可以预料到奥斯曼的征服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并未因此显著改变其“东方政策”，甚至，他们是否具有一贯的“东方政策”都大为可疑。只有教皇或许表现出真正的不安与痛心，并开始策划反击，不过很快，更加迫在眉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

看上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不值得大书特书，不过对两类人而言，它还是至关重要的。于土耳其人来说，攻占该城不仅为他们带来了一座新都，还保证了帝国欧洲部分的安全。君士坦丁堡扼欧亚交界要道，且位于奥斯曼领土中心，若始终掌握在拜占庭异教徒手中，不免令奥斯曼人如鲠在喉。单独是希腊人固然不值得畏惧，但从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现一支基督教十字大军的可能，无疑会成为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直到今天，经历了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土耳其人依然领有该城，他们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对希腊人而言，这一事件甚至更加令人刻骨铭心。这是希腊人一段历史的终结。灿烂的拜占庭在世界文明舞台闪烁了千年之久，1453 年它虽已衰败，但尚能苟延残喘。虽然帝都的人口不断减少，但君士坦丁堡仍拥有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古罗马希腊学者。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罗马皇帝，令每一个希腊人自豪地感到，自己依然是一个伟大东正教国家的一员。此时的皇帝或许对臣民的实际意义甚微，但他依然地位尊贵且是上帝统治的象征。然而，随着皇帝与他的城市一同殉难，异教徒的统治开始，希腊人不得不为其生存而苦苦挣扎。所幸希腊文明并未消亡，这无疑源自其文明的内在活力与希腊人的勇气。

对我而言，君士坦丁堡陷落中的希腊人是一群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我的很多前辈对此也深有同感。例如吉本（Edward Gibbon）虽对拜占庭抱有偏见，但也赞许其末日中体现的气魄。而在埃德温·皮尔斯爵士（Sir Edwin Pears）六十年前出版的专著中，对希腊人的同情与赞誉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某些现代的研究令他的著作显得略微过时，但因其扎实的考据与渊博学识，此书在

今日仍颇值一读——我本人也深受其影响。当然，在这之后还有相当的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成果。尤其在 19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500 周年之际，涌现了大量论文与著作。不过，除去 1914 年古斯塔夫·施伦贝格尔（Gustave Schlumberger）的专著与皮尔斯的作品，整整半个世纪，西方再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长篇专著出版。

在试图填补此项空白的尝试中，我借鉴了大量近代学者（不论在世或过世的）的相关著作，我将在注释中一一表达谢意。健在的希腊学者中，我尤其要提到扎基西诺斯（Zakythinos）教授与佐拉斯（Zoras）教授。在奥斯曼历史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巴宾格尔（Franz Babinger）教授，虽然其名作《“征服者”穆罕默德与他的时代》并未详细注明参考书目。关于土耳其早期历史方面，维特克（Wittek）教授的专著对我帮助甚多。土耳其青年学者我则首推伊纳尔哲克（İnalcîk, Inalcîk）[①] 教授，而吉尔神父（Father Gill）关于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著作也具有相当价值。

我在附录中简要谈及了本书所用主要参考资料。其中一部分是比较罕见的。基督徒方面的文献，由德蒂尔（Dethier）教授在八十年前统一收录于《匈牙利历史文献》（*Monumenta Hungariae Historica*）中的两卷（二十一、二十二两卷之第一部、第二部）。它们虽然成功付梓，但并未公开出版，且包含不少错误。至于穆斯林方面的资料，由于普通读者阅读上的困难，更加令人难以亲近。我希望我能为读者们提供其中的精华部分。

若没有伦敦图书馆，本书将永远无法完成；我也要对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全体职员的耐心帮助表示感谢。此外我不能不提到帕帕斯塔夫洛（S. J. Papastavrou）先生为本书进行的校对工作，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理事与职员们的宽容与友善。

---

① 本书人名、地名，译者举出原语源或异形拼法时，同时列出：前者为译者所附原文，后者为英文版拼写。——编者注

关于本书译名的说明：

我个人无法确保所有源自希腊语、土耳其语的译名均无懈可击。对希腊专有名词我尽量使用我个人认为常见、自然的形式。对土耳其专有名词我一般采用音译，除非是现代土耳其语词汇，后者我则使用现代土耳其语拼写。我将"征服者"苏丹的土耳其名称作 Mehemet，而非 Mahomet 或 Mohammed。我希望我的土耳其朋友能原谅我在书中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词而非"伊斯坦布尔"（İstanbul, Istanbul）——因为倘若那样做，未免有失之迂腐的嫌疑。[2]

斯蒂文 · 朗西曼

伦敦 1964 年

目　录

插图目录

第一章　帝国迟暮

1400 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 Palaiologos（Palaeologus）］。后者已经游历了意大利，并曾于巴黎短暂驻留。期间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将卢浮宫妆点一新，以款待这远道的贵宾，连索邦神学院（Sorbonne）[3]的教授们也因能与如此博学多识的帝王会晤交流而感到欢欣不已。

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所倾倒，他们洁白如玉的长袍也令人们印象深刻。然而，尽管皇帝身份高贵，颇得好感，英法两国王公贵族们却只能令其败兴而归——皇帝此行专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异教徒而来，然而他的梦想落空了。亨利国王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亚当（Adam of Usk）[4] 回忆道：我细细忖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这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①

---

① Adam of Usk, *Chronicon* (ed. Thompson), p. 57; *Chronique du Réligieux de Saint-Denis* (ed. Bellaguet), p. 756. 关于曼努埃尔此行的最佳记载见于：Vasiliev, ‘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ern Europe’(in Russian), *Journal of the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N.S., xxxix, pp. 41-78, 260-304. 亦可参见：Andreeva, ‘Zur Reise Manuels II Palaiologos nach West-Europa’,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Leipzig,* 1892—(in progress)（以下简称 *B.Z.*）, xxxiv, pp. 37-47. Halečki, ‘Rome et Byzance en temps du grand Schisme d’Occident’, *Collectio Theologica*, xviii, pp. 514 ff., 此书曾提及曼努埃尔于 1402 年拜会了教皇卜尼法斯九世（Boniface IX），但此说不足采信，不过曼努埃尔确于 1404 年向教宗派出了使节。Adam of Usk, *op. cit.* pp. 96-7.

确实，古罗马帝国早已今不如昔。虽然曼努埃尔是奥古斯都及君士坦丁光荣的继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可以在罗马世界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然逝去。对西欧人而言，他们仅仅是希腊人或拜占庭的君主，已经无法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们等量齐观。直到 11 世纪拜占庭依然是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是基督教世界抵御穆斯林冲击的中流砥柱。拜占庭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他们的角色，直到 11 世纪中叶东方的土耳其人兴起。与此同时，西方的诺曼人也开始尝试入侵拜占庭。拜占庭帝国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以帝国意大利领土的失陷为代价，诺曼人终于被击退了；然而对土耳其人，帝国则永久性地失去了帝国的粮仓与兵源地——安纳托利亚（Anatolia）。[5] 此后帝国一直面临两线作战之虞，而十字军运动的兴起令局面更加复杂。虽然作为基督徒，拜占庭人对十字军抱有好感，然而他们长期的政治经验证明应当对异教徒保持一定宽容并允许其存在。十字军倡导的圣战在拜占庭看来反而是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

当然，拜占庭人也希望通过十字军获得好处。然而，这一切需要以实力作为基础。拜占庭继续以强权面目出现，不过其国力已经开始不断下降了。在那个充满战争冲突的年代，安纳托利亚的丧失，迫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愈发依赖外国盟军与雇佣军，而后者是需要以商业特权或金钱作为代价的。这一切不幸又发生在帝国经济衰退的年代。整个 12 世纪，帝国看上去似乎依然是富裕和强大的，市场港口商贾如云，皇帝依然受到尊敬。但是，拜占庭既不支持穆斯林对抗十字军，也同样对十字军缺乏热情，这就埋下了忧患的种子。同时，11 世纪，宗教分歧也加剧了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矛盾。[6] 至 12 世纪，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已经明显地处于分裂状态了。

真正的危机是十字军带来的。1204 年，在军队领袖野心的蛊惑下，出于威尼斯人的嫉妒与贪婪，出于天主教会对东正教会的敌意，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反戈一击，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废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这一事件终结了东罗马帝国的强国地位，虽然其并未彻底灭亡。大约半世纪后，流亡至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势力（即尼西亚帝国）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击败了拉丁帝国。似乎拜占庭帝国又迎来了伟大的复兴。然而，米哈伊尔八世的政权（即帕列奥列格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强盛。它还依稀保留了一些过去的威名，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新罗马”，是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皇帝，至少在东方人看来，依然是罗马人的皇帝。实际上，拜占庭已经沦为了一个普通王国，甚至在希腊人世界中亦不是唯一的统治者。在它的东面，有事实上独立的特拉比宗王国（由拜占庭科穆宁皇室后裔在1204年建立），后者拥有丰富的银矿和与大不里士（Tabriz）的传统商路。在色雷斯地区，出现了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同样由前拜占庭皇室后裔建立），它一度与尼西亚帝国展开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激烈竞争，甚至曾经兵戎相见，不过最终也走向衰败。在巴尔干，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成为另外两大势力。而在希腊本土与周边岛屿上，意大利人的殖民地与法兰克人的贵族领地星罗密布。为了驱逐威尼斯人的势力（其为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后黑手，遭到拜占庭人的普遍厌恶），拜占庭政府引入热那亚人，后者则要求贸易特权，首都北部的加拉塔（Galata，或称佩拉 Pera）商业区随即为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商人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拜占庭商业命脉，[①] 令帝国的财政进一步雪上加霜。而帝国四周可谓险象环生：在意大利有前拉丁帝国的复辟势力，巴尔干的斯拉夫王族们则觊觎着皇帝的头衔。东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这某种程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国。不过在伟大的酋长奥斯曼的率领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为了帝国的劲敌。因为西部的军事威胁，拜占庭不得不将多数财力人力投入其中，以致忽略了东部的防御，这为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提供了良机。[②]

4

14世纪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一度有并吞拜占庭帝国的趋势。而雇佣军卡特兰军团的叛乱（Catalan Company，即

---

① 现代通常称作“加拉塔”，与另一名称“佩拉”（pera）均可使用，不过“佩拉”更为官方正式。

② 关于当时一般的情况可以参见：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 Hussey), pp. 425 ff.

“加泰罗尼亚军团”）令诸行省一片狼藉。帝国长期陷入内战之中，各王室成员争权夺利，内斗不止。例如约翰五世在其五十年的皇帝生涯中（1341–1391），先后三次被废黜，一次被他的岳父，一次被他的儿子，另一次是他的孙子。[①]祸不单行的还有瘟疫。1347 年伴随内战爆发的黑死病，夺去了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奥斯曼土耳其则利用拜占庭与巴尔干诸国的混乱大肆扩张，至 14 世纪末，其势力已经抵达多瑙河畔（Danube），拜占庭已经沦为土耳其领土环绕下的孤岛。此时的拜占庭，实际控制地区只限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的几座城镇，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镇，几座小岛，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帝国第二大城市）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那里是由皇族统治的摩里亚君主国，它在从法兰克人手中收复失地方面取得了小小成功。在这些拜占庭势力范围中，还间布着一些拉丁帝国遗留的封建领地，佛罗伦萨公爵依然统治着雅典而维罗纳王子们占据着爱琴海诸岛。其余的拜占庭原领土则早已被土耳其人夺取。[②]

出人意料的是，虽然此时期拜占庭国力衰弱，然而文化艺术领域却颇为多产。帕列奥列格王朝也可算一个重视学术与艺术的朝代。例如君士坦丁堡科拉教堂（Church of Holy Savior in Chora）保存的 14 世纪初期壁画与马赛克镶嵌画，就足以令同时期意大利艺术相形见绌。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还拥有大量同等水准的画作。[③]当然，艺术创作会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帝国的财政已是江河日下，大不如昔了。1347 年约翰六世的加冕礼上，其皇冠的宝石居然

---

① Ostrogorsky, *op. cit.* pp. 476-84.

② Nicephorus Gregoras, Romaïke Historia,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1828-1897.（以下简称：*C.S.H.B.*）, ii, pp. 797-8; Johannes Cantacuzenus, *Historiae*, *C.S.H.B.*, iii, pp. 49-53; Bartholomaeus della Pugliola, *Historia Miscella*［Muratori,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Milan, 1723-1751.（以下简称：Muratori, *R.I.Ss.*）, xviii, p. 409］, 该书声称君士坦丁堡丧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Chronicon Estense (Muratori, *R.I.Ss.*, xv), 此书则推断人口仅存昔日九分之一。读者欲了解 15 世纪拜占庭的疆域情况，可参见：Bakalopulos, ‘Les limites de l'Empire byzantin’, *B.Z.*, lv, 2, pp. 56-65.

③ 帕列奥列格王朝艺术可以查看：Beckwith, *The Art of Constantinople*, pp. 134 ff.

是用玻璃代替。① 至 14 世纪末期，经济拮据对文化艺术的负面影响开始彰显。在这期间只有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斯（Mistra）地区和阿索斯山（即希腊圣山 Mount Athos）附近涌现出新建的教堂，其内部装饰也较过去节俭。当然学术领域相对较少受到财政因素的干扰。君士坦丁堡大学在 13 世纪末被帝国贤臣赛奥多利·梅托切特（Theodore Metochites）[7] 重建②，在他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14 世纪初拜占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神学家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哲学家德米图斯·西多内斯（Demetrius Cydones）与阿金迪纳斯（Akyndinus）——都曾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深造并受赛奥多利的影响。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8] 被认为是他的继承者，虽然部分精英对其篡位行为颇有微词。 6 这一时期的拜占庭知识界，学术气息浓厚，人才辈出，论争自由，并且很好地继承了两千年以来的希腊学术传统。他们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讨论语义学与逻辑学，自然，也会涉及神学话题。但东正教传统对哲学往往心存顾虑。虽然优秀的神父一般也愿意接受哲学教育，并且运用柏拉图式的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但他们的神学是隐晦而非直接[9] 的 。既然上帝的存在已超出了人类认知范围，哲学对于解决宗教问题也就显得力有不逮了。然而，到了 14 世纪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分裂。部分学者受西方罗马教会的影响，开始攻击东正教及其神学理念（尤其是其中神秘主义的部分）；另一部分学者则极力维护东正教传统，昔日的朋友成为了论争中的敌手。“改革派”往往带有一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色彩，而“保守派”（代表为帕拉马斯）则显得更加因循守旧，后者在僧侣与普通民众中获得了大量支持者。不过“保守派”中也包括诸如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因此，“保

① Gregoras, *op. cit.* ii, pp. 788-9.

② 关于他和他时代的知识分子生活参见：Beck, *Theodoros Metochites*, *passim.*

守派”占据上风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蒙昧主义的胜利。[①]

这番论争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这关系到是否与西方罗马教会及天主教国家联合。而东西方教会长期的分裂及交恶，最终使保守派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上风。不过，还是有很多具有远见的拜占庭政治家看出，脱离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援助，拜占庭注定无法长期生存。如果西方援助是以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共融为前提的，那么这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米哈伊尔八世为了对抗西方复辟拉丁帝国的计划，不惜于里昂大公会议上代表人民同意与罗马教会共融，但此举遭到了国内民众的普遍憎恨。面对民意汹汹，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不得不推翻了父亲的决策。如今，土耳其人已在磨刀霍霍。与西方教会的共融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得到西方雇佣军，更重要的是要联合基督教国家，共同对抗东方的异教徒，而东正教世界是无力提供强大援助的。多瑙河流域及高加索地区诸王公实力有限且自身不保，俄国人自身问题成堆，鞭长莫及。不过，西方天主教国家真的会援助已经分裂的东方教会吗？他们是否会把土耳其人的入侵当作对拜占庭的“天谴”而袖手旁观？带着这些疑问，约翰五世皇帝于 1369 年启程前往教廷进行外交活动，并向教皇表示归顺之意。然而他谨慎地未将其臣民卷入其中，虽然他内心也幻想拜占庭人与他一道走向教会和解之路，然而在当时这是没有基础，注定会失败的。[②]

米哈伊尔八世与约翰五世是政治家，而非神学家。对他们而言，与西方联合，政治上的裨益高于一切。然而对神学家来说，情况就很棘手了。早在基督教历史早期，东西方教会在礼拜方式、神学理念等方面就存在分歧。其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关于圣灵如何产生以及对“和子说”（拉丁语“ Filioque”，相当于英语“and from the Son”）的态度，这也是 1054 年双方革除对方教籍的神学原因之

---

① 参见：Meyendorff,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Grigoire Palamas*, also Beck, ‘Human ismus und Palamismus’,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Études Byzantines, *Rapports*, iii .

② Halečki, *Un Empereur de Byzance à Rome*, esp. p. 205; Charanis, ‘The strife among the Palaeologi and the Ottoman Turks’, *Byzantion*, xvi, i, pp. 287-293.

一。[10] 此外两大教会还存在许多较小的分歧。西方教会不承认东方教会新近通过的关于“上帝既是实体的，也是精神的”（Essence-Energies distinction）这一教义 。而东正教会同样对罗马教会关于“炼狱”的说法不敢苟同。圣餐仪式上所用面饼是否应当发酵成为双方争议的又一个焦点。对东方教会而言，西方教会采用无酵饼的做法似乎是师从犹太人，并且罔顾了发酵饼对圣灵的象征。与之类似，西方教会在圣餐中拒绝使用“求降圣灵文”（Epiclesis）也被认为是大不敬的，东正教会相信，缺乏这一道程序，将令面饼与葡萄酒的神圣性功亏一篑。对于普通信众如何兼领圣体圣血（Communion under both kinds）及在俗司铎（Secular priests）能否结婚，两大教派同样争执不休。不过，双方最大的分歧集中在教会管辖权限方面。罗马教宗是否在基督教会中享有居先权或至高地位？按照拜占庭传统，所有主教一律平等。无人（甚至包括圣彼得之传人，尽管其见解是受到尊重的）能够强迫他人接受教义。唯有大公会议（Oecumenical Council）有权对教义进行诠释。罗马人对基督教教义的增添 [11] 令东正教徒大为震惊，不仅因为神学方面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此举单方面地篡改了由大公会议通过的神圣教义。基于传统，东正教徒无法接受罗马的管理与训诫，它理应由五大宗主教 [12]（Pentarchy of Patriarchs）共同行使，尽管罗马教宗地位崇高，他也无权僭越其余主教。拜占庭人笃信其传统与教规，不过，为了教会的和谐运转，他们也能在枝节问题上求同存异，这为与西方的和解提供了某种弹性。反倒是罗马天主教会，基于其天性，轻易不愿做出妥协。①

8

拜占庭的学者们分裂了。相当一部分由于忠于自己的教派而无法认同与罗马联合。然而不少学者（尤其是哲学家），愿意接受罗马教廷的权威以使自己的才华得到发挥。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文明的和谐统一对他们而言是同等重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游历意大利，并目睹了当地的活力与生机。他们也发现了，

① 关于东西方教会神学上的分歧，参见：Runciman, ‘The Schism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xliv, 4, pp. 337-50.

如果作为朋友身份到来的话，他们会受到意大利人何等的敬重。大约在 1340 年，德米图斯 · 西多内斯将托马斯 · 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亦称为阿奎诺的托马斯）的著作翻译为希腊语。阿奎那的学说吸引了大批拜占庭学者，使后者意识

9 到意大利的学术早已非吴下阿蒙。他们渴望与意大利的学术交流，而这一愿望也并未落空。越来越多的拜占庭学者在西方获得了职位与尊敬。融合拜占庭与意大利文化的想法，变得越发具有吸引力。考虑到罗马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当下意大利的繁荣，拜占庭人的某种妥协也未必是难以接受的吧？[①]

然而，“联合派”的拥趸只限于部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僧侣阶层大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较少受到与意大利学术交流的影响，而是醉心于自己的信仰与传统。拉丁帝国当年的严酷统治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僧侣们在民众当中宣传联合的种种恶果，甚至声称此举将遭致天谴。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试图与之对抗都是艰难的，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神学家赞同僧侣们的观点，一部分政治人物也对西方的援助心存顾虑。

上述激烈的论争发生在一个大衰退的年代。尽管拥有优秀的学者，君士坦丁堡已然沦为了一座垂死的城市。12 世纪时，首都及近郊人口多达百万之巨，而今只剩下不足 10 万。[②] 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首都郊区大半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而金角湾的佩拉大区由热那亚人所控制。昔日君士坦丁堡附近市镇、修道院星罗密布，如今只剩下零落的一些村庄环绕在破败的教堂四周。拜占庭首

10 都在极盛时期，城内各区分布着大量花园与公园，而今不仅一些居民区已经消失，花园也被菜地、果园所取代。14 世纪中期到访的著名穆斯林旅行家伊本 · 巴图塔（Ibn Battuta）计算出城墙内共有 13 块小型居民区；西班牙旅行家克拉维约（Gonzalez de Clavijo）也曾对这座宏伟巨城的破败惊诧不已。稍后造访的贝

---

① 关于西多内斯及其影响参见：Beck, *Kirche und theologische Literatur im Byzantinischen Reich*, pp. 732-6.

② Schneider, ‘Die Bevölkerung Konstantinopels im XV Jahrhundert’,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ien in Göttingen*’, Phil.-Hist. Klasse, 1949, pp. 233-44.

特朗东（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13]同样对城市的空旷惊骇莫名。佩德罗·塔法（Pedro Tafur，Pero Tafur）[14]于1437年谈到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凋零程度——很多居民区完全是一副乡村的景象，春天城市里盛开着大量野玫瑰，入夜后，夜莺在树林里欢唱。

不仅平民区残破不堪，甚至连君士坦丁堡东南的旧皇宫也已经无法居住。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尔温二世在山穷水尽之际，不仅将自己的太子交给威尼斯债主作为“抵押”，更将拜占庭皇宫的屋顶拆除出售以套现。此君亡命天涯后，光复拜占庭的米哈伊尔八世及其继承者再也没有财力将皇宫修缮一新。只有屈指可数的教堂还保留着昔日荣光，例如“新教堂”[15]及灯塔区的圣母教堂。[16]昔日的大竞技场（Hippodrome of Constantinople）也仅剩断壁残垣，贵族子弟已将它当做马球场。旁边的“主教宫”（Patriarchal Palace）名义上仍然是教长驻地，不过君士坦丁大牧首也不再“冒险”居住在这摇摇欲坠的殿宇中了。城区多数教堂也已经年久失修，只有伟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Holy Wisdom）还保留着往日的荣光，因为其开销由政府专项资金提供。

君士坦丁堡的主干道——梅塞大道（Mese，“中央大街”之意），自查瑞休斯门（Gate of Charisius, the Charisian Gate，今天土耳其人称为阿德里安堡门）起始，最后抵达旧皇宫。这是首都最繁华的大街，商店住宅鳞次栉比，途经最重要的建筑为全市第二大教堂圣使徒（Holy Apostles）教堂。不过后者也已经残破不堪了。另一片繁华区位于金角湾沿岸，尤其是布雷契耐区（Blachernae），皇帝的新行宫就位于此处一座小山下。威尼斯也在这一带港口拥有自己的社区，不仅为威尼斯人提供便利，也聚集了来自安科纳、佛罗伦萨、拉古萨（Ragusa）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商人，附近甚至还有犹太社区。这里货栈码头密集，帝国也允许土耳其人在此开设巴扎（市集）。不过以上各区用城墙或栅栏划分开来，彼此相对独立。城市每年还要接待远方的朝圣者，他们多半来自俄罗斯，由此一批旅馆应运而生。此外城市也保留了足够的医院甚至孤儿院，为市民们提供基本的福利。不过除去这些繁华地带，君士坦丁堡市区大部分地方已经是空旷和

11

凋敝的了。①

此时帝国第二大城市为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它仍然是巴尔干重要的港口，与君士坦丁堡相较，它甚至更加繁荣，其一年一度的集市吸引了各地的大批商人。甚至相对狭小的城市规模也成了它的优势，这让它与空空荡荡的首都相比，显得不至于那么寒酸和破败。不过该城在14–15世纪同样命运多舛。12 它一度被当地起义的平民攻占并统治了8年之久，[17]在他们被镇压前，大批城市宫殿、市场、建筑遭到了洗劫与破坏。随后塞萨洛尼基又遭土耳其人攻占。虽然希腊人一度将其收复，然而它再也难回到当年的繁荣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值得一提的城市还有摩里亚（Morea）专制君主国[18]首都米斯特拉斯（Mistras, Mistra），不过这所谓的"首都"不过是一座宫殿，一座城堡，外加几座教堂、修道院和学校，比一座村庄规模大不了多少。②

1391年，曼努埃尔二世得到了拜占庭帝国这份凋零的遗产。皇帝本人可谓生世多艰：他的青少年时代几乎都在战争与家族内斗中度过，营救因欠债被威尼斯人扣押的父皇约翰五世也一度成为他的任务。作为皇子，曼努埃尔二世长期在土耳其苏丹的宫廷充当人质，甚至违心地指挥一支拜占庭军团为苏丹攻打希腊人的城市阿拉谢希尔（Alaşehir, Philadelphia）[19]。在这段令人心酸的时光里，学术成为了他最大的安慰。曼努埃尔二世饱读经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为土耳其友人撰写的比较基督教伊斯兰教异同的小册子便是一个例证。他是个有才能的君主，曾经主动将皇位让与其侄约翰七世，这一慷慨之举很大程度上弥合了王室内部的纷争。[20]他曾经尽力修缮帝国的修道院并提高其待遇标准，

① Ibn Battuta, *Voyages*, ed. Defremery & Sanguinetti, ii, pp. 431-2; Gonzales de Clavijo, *Diary*, trans. Le Strange, pp. 88-90; 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 *Voyage d'Outremer*, ed. Schéfer, p. 153; Pero Tafur, *Travels*, trans. Letts, pp. 142-6. 金纳迪乌斯本人虽是君士坦丁堡市民，但也直言城市已经穷困潦倒，多数地区不宜居住：*CEuvres Complètes de Gennade Scholarios*, ed. Petit and others, i, p. 287, and iv, p. 405.

② Tafrali, *Thessalonique au quatorzième Siècle*, pp. 273-88; Zakythinos, *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 ii, pp. 169-72.

他给予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力所能及的最大经费。皇帝清晰地看出西方援助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外交努力。1396 年教皇再次召集了一支十字军（不过这支军队更多是为了援救匈牙利王国而非拜占庭，虽然均是以土耳其为敌），然而因为部队领导人的荒唐最后在多瑙河畔的尼科波利斯遭到失败（尼科波利斯的十字军是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援助东方的十字军）。曼努埃尔二世对法国的外交攻势获得了一定成果，1399 年法王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支由布锡考特（Jean Le Maingre, Marshal Boucicault）[21] 元帅统领的部队，不过这支军队仅千余人规模，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22] 然而，皇帝反对东西教会的再次共融，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宗教信念（为此他还特意撰写一篇论文向索邦神学院的教授们阐明己方观点），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深知这一方案难以在民间推行。他还告诫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约翰八世，既要与西方友好协商教会联合事宜，同时又要对内宣称该联合绝不会真正实施。当他于 1400 年左右前往西方国家斡旋时，恰逢天主教会大分裂时期 [23]（the Great Schism），因此拜占庭皇帝极力淡化其宗教身份而是以世俗统治者的身份寻求援助，以减少宗教纷争的干扰。但是，虽然皇帝的优雅风度获得了欧洲贵族的好评，实际的援助却屈指可数。1402 年曼努埃尔二世甚至不得不中断访问赶回君士坦丁堡，因为他得知土耳其苏丹“雷霆”巴耶济德一世正率军意图围攻拜占庭首都。幸运的是，早在皇帝赶到之前危机便已经解除了。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大汗在安卡拉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奥斯曼人，俘虏了巴耶济德一世（后者大约一年后于帖木儿营中去世），奥斯曼人群龙无首，陷入了近二十年的“大空位”时期，也给了拜占庭帝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拜占庭并未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土耳其王子们经过二十年争斗后，终于再次统一起来。1423 年恢复元气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又开始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不过由于王族内斗以及帝国内部叛乱的传闻，苏丹不得不放弃计划，提前收兵。①

13

① 很难找到关于曼努埃尔二世生平的可靠著作，直到此书出现：Berger de Xivrey, *Mémoire*

帖木儿的介入意外地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延后了半个世纪，不过曼努埃尔二世从中获得的进展并不多。他收复了色雷斯的几座市镇，并赢得了某个土耳其王子的友谊。虽然这是打击东方的土耳其人，收复基督教失地的大好时机，然而，欧洲的基督徒联合起来作战的时代看来已一去不复返了。一支联军的出现，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共识，然而这两者都是缺乏的。热那亚人只关心其商业利益，缺乏长远政策，而是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向帖木儿派出大使示好，一方面出动舰只将战败的土耳其将士从小亚细亚运回欧洲。威尼斯人将热那亚视作最大威胁，要求其东方各殖民地长官严守中立。教廷正处于大分裂时期，两位教皇互不相让，自然也谈不上领导基督徒了。西欧诸国依然对尼科波利斯的惨败心有余悸，加之事务缠身[24]，对干预东方事务也意兴阑珊。匈牙利国王认为心头大患已去，便将注意力都放在了角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的游戏中。——14君士坦丁堡看上去已经高枕无忧了，谁还会关心它呢？②

实际上，君士坦丁堡仍存在隐忧。不过，抛开这一点不谈，城中的学术生活依然活跃。除去皇帝本人，此时学界的领袖为约瑟夫·布里延涅斯（**Joseph Bryennius**）③。他培养了最后一批拜占庭优秀学者。此人学贯东西，帮助皇帝将西欧学术引入到了君士坦丁堡大学课程。尽管有诸多历史恩怨，他与拜占庭学界对来自西方的学生依然敞开大门。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曾写道，在他的青年时代，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均以在君士坦丁堡受过教育为荣耀。不过约瑟夫和曼努埃尔一样，无法放弃拜占庭传统，去转而接受天主教神学，故而对教会共融持消极态度。④

---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gue, published in 1851. 参见：Ostrogorsky, *op. cit.* pp. 482-98. 关于布锡考特的远征，参见：Delaville Le Roulx, *La France en Orient au XIVe. siècle: Expéditions du Maréchal Boucicault.*

② Heyd,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1936 edition), ii, pp. 266-8, 含参考文献，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42 页（见本书边码——编者注）, n. 1.

③ 约瑟夫·布里延涅斯，牧首学院首席兼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

④ Fuchs, *Die höheren Schulen von Konstantinopel im Mittelalter*, pp. 73-4; Beck, *op. cit.* pp.

另一位知名学者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ius Gemistus Plethon）[25]，从君士坦丁堡移居至摩里亚君主国首都米斯特拉斯，他较约瑟夫略年轻，并得到了皇子（也是摩里亚专制君主）塞奥多利二世的庇护资助。在这里，他创办了一所柏拉图研究学会并出版了许多相关著作。他认为只有柏拉图的哲学，可以重新唤醒希腊世界。他提出了不少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主张，不过多数都失之空泛，难以施行。他的宗教观点是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学说与琐罗亚斯德主义的糅合。虽然表面上他也是个东正教徒，不过骨子里却有着古希腊异教气息，例如，他把神拼写作“宙斯”而非耶稣。生前他的这些异端思想得到了宽容，不过在他去世及拜占庭首都陷落后，他的手稿落入了其朋友，时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金纳迪乌斯（Gennadius）手中，后者对其学说既着迷又感到恐惧，最后不情愿地将他大部分著作付之一炬。②

15

卜列东的事例也说明了晚期东罗马帝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Hellene”一词从拜占庭帝国时期开始，渐渐专门用来指代希腊人，尤其强调其古希腊文化传统的成分。（与基督徒对应，是强调保留异教信仰的希腊人士）。虽然此时拜占庭已不复当年辉煌，不过在西方仍然拥有不少仰慕者，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文主义者甚至自称“希腊人”（HELLENES）。帝国的官方称号依旧是“罗马帝国”，不过在知识分子圈子中人们也不再称呼自己是“罗马人”（ROMAIOI）。这一风气是从塞萨洛尼基发端的，该地居民尤其以自己的古希腊文化传统自豪。14 世纪末，甚至皇帝曼努埃尔也通常被称作“希腊人的皇帝”而非“罗马人的皇帝”。数世纪前，任何一位西方大使若怀揣写给“希腊人皇帝”的国书来到君士坦丁堡都会被拒之门外，而今除了少数保守分子会略感不快以外，这一称谓已经约定俗成了——虽然这并非有意放弃了皇帝的普世权力，但的确彰显了帝国子民实为希腊后裔。西方的宫廷也渐渐接受了这一称呼。帝国最后的几十年中，君士坦丁

749-50; Pius II, *Opera Omnia*, p. 681.

② 卜列东生平参见：Masai, *Plethon et le Platonisme de Mistra.*

堡已经完全是一座希腊人的城市了。①

曼努埃尔二世 1423 年退休，并于两年后去世。他的挚友，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已经在 4 年前驾崩。新苏丹穆拉德二世登基时，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恢复元气，国力强盛。希腊人一度对这位君主寄予厚望，认为他虽是穆斯林，但为人宽厚、公正，能够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然而希望随着 1422 年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而落空了。虽然对拜占庭首都的进攻未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势头给希腊人造成了如此压力，以至于曼努埃尔的第三子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在绝望中将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卖给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威尼斯共和国也无力回天，这次交易甚至给了土耳其人借口，塞萨洛尼基还是在 1430 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之后数年，穆拉德二世的扩张似乎停止了，不过这短暂的和平能持续多久呢？②

16

曼努埃尔的长子，即约翰八世，确信只有求助西方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于是罔顾先帝的忠告，决心促成与罗马教会的共融，因为他明白，只有罗马教廷才具有足够权威，将一盘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诸国号召起来，援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此时，托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之福，教皇终于从教会分裂中解脱出来。[26] 约翰深知只有通过某种“普世大公会议”才有可能促使国民接受两大教会的再次统一，而此时，教皇也无法对这项动议断然拒绝（因为教皇本人就是得益于大公会议而上台的）。经过漫长谈判，宗座犹金四世（Eugenius IV）正式邀请拜占庭皇帝率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进行会商。虽然约翰最初计划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不过最终还是妥协了。1438 年拜占庭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费拉拉参加会议，1439 年会场移至佛罗伦萨 [27]。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这次会议的细节是冗长枯燥的。首先是关于“居先权”的认定。昔日基督

---

① Runciman, ‘Byzantine and Hellen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Τόμος Κωνσταντίνου Ἀρμενοπούλου*, pp. 27-31.

② Ostrogorsky, *op. cit.* pp. 497-8; Tafrali, *op. cit.* pp. 287-8.

教大公会议往往由罗马皇帝主持，那么今日的约翰八世是否应享有居先权？东正教大牧首与罗马教皇孰高孰低？为此就花去了大量时间。会议原则要求以历次大公会议认定的正典为基础讨论，表面上看与会主教们沐浴在圣灵的光芒下，群情激昂，然而热烈的气氛并不能弥补分歧。神父们时常互相批驳，甚至他们本身的论点也往往自相矛盾。语言上的障碍也是巨大的。某些拉丁语神学术语在希腊语中并无对应词汇，同时，东西教会对于《圣经》正典的认定也存在分歧[28]。平心而论，在辩论中拉丁人表现略胜一筹。天主教代表团团结一致，精通辩术，并得到了教皇的幕后支持。而东正教代表团则是一盘散沙，何况还有一些优秀的主教拒绝赴会。不过拜占庭皇帝也带来了几名得力的神学家，包括尼西亚大主教特拉布宗的贝萨里翁（Basilios Bessarion, Bessarion of Trebizond）[29]、以弗所大主教马克 · 尤金（Mark Eugenicus）和基辅大主教伊斯多尔（Isidore）。代表团中甚至还包括四位拜占庭知名的世俗哲学家，即乔治 · 斯库拉里斯（George Scholarius）[30]、乔治 · 阿米罗特斯（George Amiroutzes）与特拉布宗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与年迈的卜列东。东正教代表团本也被要求选出主要辩手参与讨论，然而他们对此实际是阳奉阴违的——并没有推出最强有力、最博学的人选。因为东正教会历来的传统是所有神父，甚至包括大牧首，在讨论神学问题时一律平等。于是东正教的代表们就纷纷各自为战了。而大牧首约瑟夫（为一保加利亚王子与希腊妇女的私生子）此时健康状况不佳，难以发挥作用。皇帝约翰八世本人则忙于在辩论出现尴尬或冷场时息事宁人。整个拜占庭代表团显得混乱不堪，并且多数神父都囊中羞涩，归家心切。

17

最后，东西教会的共融还是被强制通过了。乔治 · 斯库拉里斯、乔治 · 阿米罗特斯与特拉布宗的乔治三位学者因为对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 · 阿奎那的仰慕，而大力赞成联合。另一位知名学者卜列东虽然对天主教神学并无好感，故未在最终文件上签字——然而，他在佛罗伦萨受到了极佳款待，其在柏拉图方面的研究备受意大利人推崇，科西莫 · 德 · 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31]还特意为他设立了一所柏拉图研究院，因此，卜列东也就不好表示明确反对。大牧首

约瑟夫之所以同意签字，居然是因为翻译的缘故，误认为天主教的“和子说”与东正教教义并无本质区别——此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有尖刻的学者评论说牧首满嘴之乎者也但一无是处。贝萨里翁与伊斯多尔则是出于对意大利文化的喜爱，以及将意大利、希腊文化整合的愿望，而表示赞成。其余绝大多数主教也签字确认，当然一部分人是在皇帝的压力甚至威胁下才这么做的。唯一明确反对的只有以弗所的马克。最终人们看到的决议，虽然也采纳了某些东正教观点、习俗，不过大体上还是天主教式的，而对于教皇与大公会议的关系，并没有做详细地约定。①

签字易，实践难。当代表团返回新罗马时，遭遇了民众抗议的惊涛骇浪。一度备受尊敬的贝萨里翁，不得不离开拜占庭，前往意大利隐居，在那里他意外地遇见了代表团同仁基辅大主教伊斯多尔，后者也被俄罗斯民众放逐了。东正教大牧首则拒绝承认自己的签字有效。在他去世后，皇帝一度没有合适的牧首继任人选。第一个候选人很快就逝世了，第二个人选格里高利·玛玛斯（Gregory Mammas）虽然在 1445 年得到正式任命，却被多数神职人员抵制，不得不放弃职位前往罗马避难。而唯一没有签字的马克则众望所归，声名鹊起。当初赞成联合的“三乔治”，一位心灰意冷避居意大利，一位在马克死后成为了“拒统派”骨干，一位甚至另辟蹊径，尝试在东方的穆斯林中寻找盟友。皇帝本人也动摇了，虽然未曾彻底放弃与西方联合的理念，但在其母后海伦娜（Helena）的影响下，也不再强制推行。这一切都造成了拜占庭宗教、思想上的分崩离析。②

不过本次大公会议的作用也不尽是负面的。一支新的十字军被组建起来了（尽管有些不情愿）。犹金教皇在 1440 年发出倡议，4 年后，一支以匈牙利人为主的部队在多瑙河组建起来。然而，教皇特使切萨里尼主教（Cesarini）强迫

---

① 参见：Gill,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CEuvres Complètes de Gennade Scholarios*, iii, p. 142.

② Gill, *op. cit.* pp. 349 ff. 不过太后稍后似乎也减轻了自己反对的调门，参见：John Eugenicos, *letters*, in Lambros, *Παλαιολόγεια καὶ Πελοποννησιακά*, i, pp. 59, 125.

联军统帅，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雅提·亚诺什（匈牙利语为 Hunyadi János，英文一般拼写为 John Hunyadi）[32] 撕毁与苏丹订立的神圣条约（从而背负骂名），并进一步在战争方略上对他多加掣肘。苏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滨的瓦尔纳（Varna）[33] 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这群乌合之众。最后一次试图拯救拜占庭的十字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①

于很多西方历史学家而言，拜占庭人拒绝联合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自掘坟墓。然而，广大普通拜占庭人深受僧侣们的影响，以坚持信仰与传统为荣，以背叛为耻。这是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时代。对多数希腊人来说，尘世的生活不过是彼岸生活的前奏，为了世俗世界的安定而牺牲信仰，玷污灵魂，这是绝不可接受的。即便国家灭亡，那也是上帝对人间罪愆的惩罚，人们必须坦然以对。在博斯普鲁斯潮湿阴郁的气候下，似乎希腊人乐观的天性也被磨灭了。远在帝国鼎盛时期，先知们早已传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这种基督教的末世论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过去人们还坚信君士坦丁堡得到圣母玛利亚的保佑，不会沦入异教徒之手，如今这份信念也动摇了。与西方“异端”教会联合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既谈不上灵魂的拯救，也无力扭转世界毁灭的命运。②

20

信徒们的观点或许是偏执与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样对联合疑虑重重。他们中的很多人预期西方国家不能，或不愿，派出足够强大的部队与苏丹的精锐之师抗衡。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则担心贸然联合只会引发进一步的宗教分裂。当年十字军的背信弃义还历历在目，如今很多在异教徒统治下的希腊人，仅仅是依靠教会这条纽带与君士坦丁堡联系在一起，一旦

---

①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46 页，n. 1.

② 参见：Diehl, ‘De quelques croyances byzantines sur la fin de Constantinople’, *B.Z.*, xxx; Vasiliev, ‘Medieval Idea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Byzantion* xvi, 2, pp. 462–502. Gill, *op. cit.* p. 378，吉尔在书中认为金纳迪乌斯等人笃信世界末日将近，在我看来，上述论断似乎过于咬文嚼字了，实际上，他们的宿命思想相信敌基督的统治必将到来，此时的敌基督显然指的是土耳其苏丹。

试图与西方教会共融，他们能否赞同是颇为可疑的。在高加索、多瑙河流域、俄罗斯的东正教会也存在类似情况。东方的三大宗主教[34]也明确表示反对。既然大部分东正教徒仅仅听从大牧首的教诲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训令，又怎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以挽救帝国呢？俄罗斯人因为其世仇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信奉天主教，而对该教派尤其痛恨。1437 年的一份文件表明，当时属于东正教会大牧首领导的 67 位大主教中，仅有 8 位在拜占庭帝国有效统治区域内，另有 7 位处于摩利亚君主国范围。① 换言之，一旦东正教会宣布改弦易张，大牧首便有可能失去超过他四分之三的大主教。少数政治家甚至走得更远。客观地说，拜占庭已经积重难返。唯一保全东正教会并令希腊人民生活安乐的方法，或许就是接受土耳其人的奴役，其实，很多希腊人已经这么做了。只有这样，恐怕

21 还有一线机会，令东正教民族积攒力量，东山再起，日后便可摘下异教徒的枷锁。当然多数希腊人仍不愿向异教徒屈膝投降，但完全排除这一选项是否明智？在穆斯林治下完整的希腊恐怕依旧胜过附属西方支离破碎的希腊许多。因此，当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土耳其大军重重围困之际，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竟然声称：“苏丹的头巾胜过天主教的教冠。”（Better the Sultan's turban than the Cardinal's hat）——此番言论也就不那么显得骇人听闻了。②

贝萨里翁为代表的拜占庭学者，在其“流放地”意大利如鱼得水，备受尊敬，他们一方面尽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一方面也对相形之下，君士坦丁堡的偏执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依然憧憬着与西方国家的联合，相信意大利富有活力的文化能够给古老的拜占庭一针强心剂。事后观之，谁又能指责他们谬以千里呢？

约翰八世自意大利回国后又度过了郁郁寡欢的 9 年。他深爱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玛利亚，病逝于一场瘟疫。他没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罗奔尼撒

① ‘Terre hodierne Graecorum et dominia secularia et spiritualia ipsorum’, ed. Lambros, *Neos Hellenomnemon*, vii, pp. 360 ff.

② Ducas, *Historia Turco-Byzantina*, ed. Grecu, xxxvii, p. 329; Zoras, *Περί τήν ἅλωσιν τῆ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όλεως*, pp. 9-70.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71 页。

或色雷斯策划着反对他的阴谋。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员只有其母后海伦娜，但后者却与他政见不合。他尽可能地利用其机智与克制，维持帝国的稳定。他在财政上精打细算以便节省出资金，整修了首都的城墙，后者很快便要面临奥斯曼人的严峻考验。当他于 1448 年 10 月 31 日驾崩时，或许对皇帝而言这真算是一种解脱吧。[①]

---

① 约翰之死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51 页，城墙修复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91-92 页及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John is called John VII by van Millingen.) 部分整修城墙的资金是由塞尔维亚专制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George Brankovitch）提供的。

第二章　奥斯曼崛起

历史上强大的拜占庭往往离不开安纳托利亚。这块巨大的半岛，昔日也被称作小亚细亚，在罗马时代一度是世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瘟疫疾病的横行以及波斯、阿拉伯人于公元 7–8 世纪的入侵，这一地区因此大伤元气。不过到了 9 世纪，安纳托利亚恢复了安定。一条精心组织的防线隔绝了敌人的进犯。农业回复了生气，并在君士坦丁堡等城市中找到了市场。西部河谷地区到处是橄榄、果树与谷物，山区则牛羊成群，而在灌溉系统完善的地区，则是沃野千里的景象。皇帝的政策是抑制地产兼并，维护自由农的权益，小亚细亚的农民很多属于军区农兵，平时务农，战时从军。中央政府通过频繁的视察及给予地方长官优厚俸禄，维持着对这一地区的掌控。

小亚细亚的繁荣取决于一条稳定的前线。它的防务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边境守备被委任给若干边区“男爵”（baron）负责，而这支军队被称作“边防军”（akritai）[35]。他们主要的职责有二：击退外敌对边境的侵袭，主动袭扰敌人的土地。这群军人无法无天，喜欢自由行事，厌恶一切政府对他们的干预，拒绝交税，同时总是要求为其军功得到赏金。除去亚美尼亚人的土地，边境地区大多是人迹罕至的，这些战士为了生存往往敢于铤而走险。不论拜占庭与阿拉伯国家是战是和，边境冲突一直持续不断。这倒并非是边防军们穷兵黩武或者对敌方守军怀着刻骨仇恨——不如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穆斯林边防军宗教

上相对狂热，但这也并未阻止双方友好往来甚至互相通婚。两方都有不少“异端”信徒。拜占庭边防军士兵多数属于独立的亚美尼亚教会，乐于庇护所谓的异教徒；对面的穆斯林军官对此同样心有戚戚。①

然而平衡随着哈里发的式微与拜占庭的扩张而被打破了。10 世纪中期拜占庭在东方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收复了大片领土，兵锋一度抵达叙利亚。新的边境线不再是荒凉的山区，而是富饶的平原。新防线主要依靠驻扎在安条克等城市的正规军负责，传统的安纳托利亚边防军已经过时了。前边防军们转而利用帝国开疆扩土的时机，在东安纳托利亚收获了大量地产。这些男爵们虽然以农耕为生，不过依然桀骜不驯，甚至雇佣私人军队保卫自己的庄园（而这些军人往往是昔日的自由农）。这些新型的大地产贵族割据一方，在 11 世纪中期逐渐成为拜占庭政府心头之患。另一方面，拜占庭盲目扩张也存在隐忧，它吞并了亚美尼亚王国（这个古老的基督教国家过去一直作为拜占庭与东方异教徒国家之间的缓冲国），并用其贪得无厌的税吏及东正教会令亚美尼亚人心生愤懑[36]。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国东部的防御。②

很快，往日的一些帝国盟友就会成为东部的心腹之患。几个世纪以来，突厥人一直从突厥斯坦四处迁移，寻求新的牧场。早在公元 6 世纪，拜占庭便与之在中亚及俄罗斯大草原发生了接触。这一部突厥人称作可萨人（Khazars），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其中两位公主还曾与拜占庭王室通婚——更加野蛮的佩切涅格人（Petchenegs）与库曼人（Cumans）虽然偶尔也兵戎相见，不过多数情况下都是拜占庭的盟友，以及重要的雇佣兵源。而这些突厥佣兵很多都在帝国境内（尤其在安纳托利亚）永久定居下来，其中一部分甚至皈依了基督教。突厥人的另一部，即乌古斯人（Oghuz Turks），则自波斯向阿拉伯帝国境内迁徙，他们同样为阿拉伯哈里发充当佣兵，并皈依为穆斯林。随着哈里发势力的

24

① 关于边防军的生涯简明扼要的介绍，可参见：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p. 369-71.

② 参见：Laurent, *Byzance et les Turcs Seldjoucides*, pp. 27-44.

衰落，这些昔日的部将渐渐崛起。穆斯林突厥人于963年建立了伽色尼王朝（the Ghaznavids）[37]，当伟大的穆罕默德苏丹（Mahmud of Ghazni，Mahmud the Ghazvanid）在位时[38]，国力最为鼎盛，其疆域自西向东囊括了伊斯法罕（Isfahan）[39]、布哈拉（Bokhara，亦拼写为Bukhara）[40]、拉合尔（Lahore）[41]等名城。不过好景不长，穆罕默德去世后，霸权转入了统领乌古斯人的塞尔柱（Seljuk）家族手中。塞尔柱的后人们获得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突厥人的领导权。1055年，伟大的图格鲁尔贝伊（Tugrul Bey）迫使定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42]哈里发授予其正统伊斯兰保护者的身份（即迫使哈里发承认其为"苏丹"），其领土包括波斯、呼罗珊及若干附属国，塞尔柱王朝真正建立起来了。

巴格达的哈里发央求塞尔柱人的保护是为了防备以埃及为中心的法蒂玛王朝[43]，后者的势力已经扩张至叙利亚。法蒂玛王朝与拜占庭关系亲密，塞尔柱人深恐东罗马在其背后进攻，从而令塞尔柱苏丹国与阿拔斯王朝腹背受敌。的确，不少突厥王公早已移居至拜占庭境内，并作为边疆男爵为帝国效力，他们磨刀霍霍，只待时机一到便可对敌境发动袭扰。图格鲁尔贝伊的继任者，其侄子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决心一劳永逸地剪除西面拜占庭的后患。他首先攻占并劫掠了前亚美尼亚王国首都阿尼（Ani），并鼓动其边防军们主动出击。[44]拜占庭人虽然吞并了亚美尼亚，但是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守卫它。此时，军区已经解体，安纳托利亚边防军几乎荡然无存。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us Diogenes）决定御驾亲征以解除边境的危机。不过由于帝国财政大不如昔，军队的质量规模都降低了，其主力已沦为雇佣军，既有来自西方的欧洲人，也有来自东方的库曼突厥人（钦察人一支）。阿尔普·阿斯兰此时正在叙利亚与法蒂玛王朝交战，他将拜占庭的行动看做拜占庭－法蒂玛军事同盟的阴谋，于是立即回师去面对新的劲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即将改变世界历史的战役中，双方均认为自己是在保家卫国。①

25

① 参见：Houtsma, article 'Tughrilbeg',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v, pp. 828-9.

1071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著名的曼特齐克战役爆发了。罗曼努斯皇帝英勇有余，而智谋不足，其雇佣军的忠诚度也很不可靠。战役的结果是拜占庭军队惨败，[45] 皇帝本人做了苏丹的阶下囚。①

阿尔普·阿斯兰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拜占庭的威胁铲除后，他并不乘胜追击，而是见好就收，率主力回到了叙利亚。但他留下的边防军却有不同的打算。曼特齐克会战后，拜占庭的东方防线已经支离破碎，而君士坦丁堡此刻正忙于内斗，无力重整军备。即使残存的少数拜占庭边防军（多半为亚美尼亚人）也与首都中断了联系，他们不得不退守于一些孤立的要塞中。土耳其王公们加紧了对拜占庭的蚕食，既然遭到的抵抗如此轻微，他们索性永久占领了新征服的肥沃土地，并将突厥牧民移民至这里。② 26

穆斯林的边区领主常常被称作“加齐”（Ghazi）[46]，大致相当于西方的“骑士”。他们被授予某种贵族纹章，对君主宣誓效忠（通常是对哈里发），并且遵守 Futuwwa 规范 [47]。土耳其加齐们本质上是一群武夫，对于组建有效的行政机构兴趣全无。他们按照以往的方式统治新获得的领土，对当地居民几乎是无为而治，民众们也乐于与之合作以保证自身安全。而加齐们则主要依靠战争的战利品维持生活。在安纳托利亚边疆区，类似的生活方式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因此新的统治者甚少激起臣民的怨怼。诚然，突厥人的涌入也引发了一部分基督徒的逃难人潮，不过，该地区的人口早已鱼龙混杂，土耳其人的征服并未导致决定性的变化。然而，随着土耳其人入侵的深入，情形发生了改变。在一些地区，基督徒于敌军到来前便已望风而逃，留下了大片无人地区等待突厥移民来填补。一些保有人口的市镇，虽然极力试图维持以往的生活方式，却不得不向征服者屈服。入侵的后果是整个安纳托利亚的交通网陷入瘫痪，水利系统、农耕系统

---

① Laurent, *op. cit.* pp. 45-59; Cahen, ‘La Campagne de Mantzikert d’après les sources Mussulmanes’, *Byzantion*, ix, pp. 613-642.

② Laurent, *op, cit.* pp. 61-101; Cahen, ‘The Turkish Invasion: The Selchükids’, i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Setton, i, pp. 135-76.

残破不堪，以往的生活方式再也无法继续了。①

由于未遭到有组织抵抗，加齐勇士们在小亚细亚所向披靡，拜占庭的领土龟缩至沿海几个地区。直到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I Komnenos，Alexius Comnenus）统治时期[48]，帝国终于重整旗鼓，军队战斗力得到了回复，加之皇帝善于运用外交手腕在安纳托利亚的加齐中挑拨离间，[49]帝国终于大体恢复了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虽然塞尔柱统治者苏莱曼（Suleiman）及其子基利杰·阿斯兰（Kilij Arslan）为安纳托利亚乱局所警觉，也曾派将领试图维持秩序，但这些努力被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武力与诡计，以及第一次十字军的兵锋挫败。至12世纪初，拜占庭人大体占据了小亚细亚西部平原及北部、南部沿海地区。土耳其人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库曼达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以及帝国东部，暂时无力与拜占庭一较短长了。

27

12世纪末期拜占庭持续衰落，而第四次十字军的背信弃义给了它最沉重的打击，[50]塞尔柱人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开始大肆扩张。在13世纪上半叶，在昔日罗马、拜占庭核心地带最强盛的突厥人国家为罗姆苏丹国（Sultans of Rum），他们降服了各加齐王公，与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流亡政府（即尼西亚帝国）大体维持着良好关系，同时对东方诸国也无觊觎之心。罗姆苏丹国并不穷兵黩武，而是潜心于以首都科尼亚为中心，治理自己的领土。他们鼓励商业贸易，资助学术，修复交通网，在其管理下，都市生活又繁荣起来，因其统治温和而睿智，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地皈依为穆斯林，而这一过程是相当平和的。②

好景不长，塞尔柱人的盛世被蒙古人终结了。起初，一些躲避蒙古兵锋的土耳其部落进入小亚细亚，他们在塞尔柱人的西部边境定居下来，并加入了其

① Wittek,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p. 18-20; Köprülü, *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 pp. 101-7; Cahen, *op. cit.* pp. 138-9.

② Cahen, 'The Selchükid State of Rum', i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Setton, ii, pp. 675-90.

边防军。1243年，蒙古军队出现，旋即决定性地击败了罗姆苏丹国，后者再也未能恢复元气，沦为了蒙古人的附庸。不到一个世纪[51]，这一曾经显赫的王朝便从历史舞台销声匿迹。① 28

罗姆苏丹国的式微却给边区加齐们提供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在蒙古人的压迫下，越来越多的难民加入了他们，其中也不乏前帝国官员、酋长和僧侣，在生存压力与宗教狂热的驱使下，他们发起了对西方基督徒新一轮进攻。起初，尼西亚帝国还能应对自如，因为这一拜占庭流亡政权励精图治，成功恢复了军区和边防军。② 但帝国偶然地于1261年收复了君士坦丁堡——虽然这本身值得骄傲，却为防务带来了不利后果。帝国要守住西方的领土，就不得不一边与巴尔干诸国作战，一边防备拉丁帝国余孽卷土重来。于是，大批帝国军队调往西部，导致东部防御空虚，海防也有所荒废。同时，为了应付新的战事，税率也普遍提高了，而边防军则发现自己的待遇每况愈下。13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一些加齐成功的穿透了拜占庭帝国东部防线。大批受宗教狂热鼓动、渴望战利品的突厥人涌向小亚细亚西部。帝国的反击则时断时续，软弱无力。一部分敢于冒险的加齐，例如门特瑟（Menteshe）及艾丁（Aydin）的王公，甚至发动了水陆两栖攻击。拜占庭的海军同陆军一样虚弱，于是，不仅安纳托利亚西部大片陆地，甚至若干岛屿都被突厥人夺取了。至1300年，拜占庭亚洲部分领土已经萎缩至西部一隅及若干孤立的海港，小亚细亚几乎完全落入突厥人之手。 29

在这场变故中，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的门特瑟酋长国本来处于领导地位。然而，随着医院骑士团夺取了罗德岛并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该公国旋即一蹶不振。霸权随后转至临近的艾丁埃米尔手中，后者是小亚细亚各突厥诸侯中第一个入侵至拜占庭爱琴海附近欧洲领土的。不过艾丁的兴起也促成了威尼斯、塞浦路斯与医院骑士团的联合。艾丁的北部是萨拉克汗（Sarakhan）诸王公的势

---

① Cahen, 'The Mongols and the Near East', *ibid.* ii, pp. 690-2, 725-32.

② Wittek, *op. cit.* pp. 25-32, and *Das Fürstentum Menteschet*, pp. 1-14.

力，其首府位于前尼西亚帝国陪都马尼萨（Manisa），在特洛伊平原则有卡拉西（Karasi）酋长国，黑海之滨则是切列比（Chelebi）加齐的领地（首府在锡诺普）。位于内陆的若干小国中也有两个相对的强者，即卡拉曼（Karaman）酋长国与格米延（Germiyan）酋长国，两者皆以塞尔柱帝国继承人自居，并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统治。卡拉曼于1327年攻占了科尼亚（Konya），由于其领土远离前线，因此有余力降服周边割据的诸侯。而定都屈塔希亚（Kutahya）的格米延王公也不再满足于加齐的称号，极力建立对周边加齐们的霸权（后者很多曾经是格米延的将领）。两者的努力大体是成功的，不过爱琴海沿岸各酋长国与拜占庭帝国边防军们并未实际承认其宗主权。①

13世纪后半叶，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比提尼亚（Bithynian）[52]出现了。它的创始人埃尔托格鲁尔（Ertughrul）卒于1281年[53]，其继任者为著名的奥斯曼（Osman）——即奥斯曼帝国创始人。奥斯曼家族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一些在奥斯曼帝国兴盛之后流传下来的材料颇多附会阿谀之处，例如，有记载声称奥斯曼人的21世祖先为《圣经》中的先知挪亚，随后为了提高这份年表的可信度，其祖先又被增加至52世。一份世系表则列入了乌古斯土耳其人的同名祖先——乌古斯可汗，包括他的儿子阔克·阿尔普（Gök Alp）[54]及孙子恰伍德尔（Chavuldur, Chamundur）。而据此种传说，奥斯曼人被认为是乌古斯的第二十四代支系后裔。（也有一种说法，奥斯曼为乌古斯支系后裔。）不过，虽然至13世纪晚期奥斯曼人成功地将部分乌古斯族人（恰达尔部落，Chaudar tribe）纳入自己的统治阶层，但他们与后者从族源看相去甚远，甚至后者最初对土耳其人的领导尚怀有敌意。另外一种传说则认为奥斯曼家族的祖先为乌古斯可汗的长孙卡伊（Qayi）[55]，于是奥斯曼家族就上升为乌古斯主系后裔——不过此说晚至15世纪方开始出现，而当时的主流说法还是认同奥斯曼的祖先为阔克·阿尔普。

---

① Wittek, *op. cit.* pp. 34-7, and *Das Fürstentum Mentesche*, pp. 15-23; Lemerle, *L'Emirat d'Aydin, Byzance et l'Occdient*, pp. 1-39.

15 世纪的一些宫廷弄臣竟宣扬奥斯曼王族乃先知穆圣的后裔——奥斯曼王族都耻于编造此说，因为穆罕默德的后裔谱系几乎是众所皆知的。①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苏丹，为了同时取悦自己的土耳其与希腊臣民，于是便支持以下理论：他的家族为某个科穆宁王族后裔，其祖先移居至科尼亚后，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迎娶了一位塞尔柱公主。[56]

上述理论均难以得到确凿证据的支撑。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只能总结说：埃尔托格鲁尔并非部族首领，而是一位干练但出身不明的加齐指挥官，出于某种原因，他来到边区，依靠自身英勇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酋长国。而他主要的财富就是他所征服的土地。一块加齐领地的生存往往是建立在掠夺异教徒领土基础上的。然而在 13 世纪末期，大部分穆斯林加齐都已经扩张至小亚细亚的极限——拜占庭的势力消退了，而海洋阻隔了穆斯林进一步的扩 31 张。虽然一些野心勃勃的海盗，如艾丁与锡诺普（Sinope）的埃米尔，拥有舰队可以对爱琴海对岸展开袭扰，然而其海军实力毕竟也没有强悍到可以开展大规模跨海殖民的程度。在奥斯曼人的土地附近，只有北面黑海之滨的特拉布宗王国可算作一个异教徒王国。加齐领袖们渴望掠夺富庶的土地，回教僧侣与学者们想要逃离可怕的蒙古人，而普通农民同样期望土地以安居乐业，奥斯曼突然发现自己的小公国已经难以满足上述人等的需要了。

好在奥斯曼用他的才华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的具体措施，今天我们知之甚少。现存于布尔萨清真寺的一块奥尔汗（奥斯曼之子）遗留的石碑对其父评价甚高——它首次赋予了一位奥斯曼统治者“苏丹”的头衔。（石碑上对奥斯曼的称呼为：“苏丹之苏丹，加齐之加齐，天际之诸侯，世界之英雄。”）② 奥斯曼作为一个政治强人建立了其权威，同时期的埃米尔们往往忙于自相残杀，而他却懂得拉拢人心，赠与归顺他的人加齐头衔。

---

① Wittek, *op. cit.* pp. 4-15; Köprülü, *op. cit.* pp. 82-8.

② Wittek, *op. cit.*, pp. 14-15.

拜占庭不可能忽视这些威胁。帝国主动放弃大片领地，并将部队撤往欧洲看上去是很明智的，因为拜占庭占压倒优势的海军足以保护帝国欧洲部分免遭奥斯曼人的侵袭。拜占庭人一厢情愿地以为，如此奥斯曼人的势力便会得到抑制甚至分崩离析了。然而事态并未如预料般发展。起初，拜占庭对奥斯曼缺乏重视，在 13 世纪最后十年里忙于应付艾丁或马尼萨等酋长国的进攻。直到 1301 年，奥斯曼人于科尤尔希萨尔（koyunhisar，亦称 Baphaeum）击败了拜占庭人并开始向奥林匹亚山[57]以北移民，这才引起了拜占庭的警觉。拜占庭此时在小亚细亚领土仅剩西北一隅（大致相当于比提尼亚行省），奥斯曼人对这一地区的侵犯是无法容忍的（何况该省份正好位于首都对岸）。但是，拜占庭人的防御凌乱无章，缺乏成效。1305 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雇佣的加泰罗尼亚军团在洛伊克（Leuke）附近击败了奥斯曼人，但是该雇佣军很快掀起了叛乱并使帝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内战期间，奥斯曼军队时而为皇帝卖命，时而为加泰罗尼亚军团效力，并借机扩张自身势力，直达马拉马拉海。1308 年，奥斯曼人成功夺取了小亚细亚西部最后一座大城——以弗所（Ephesus），但转交与艾丁埃米尔，随后，又夺取了拜占庭在黑海沿岸从伊内博卢（ nebolu,Inebolu ）至珊伽里乌斯（Sangarius）的若干市镇。

加泰罗尼亚军团叛乱与拜占庭皇室内战接踵而至，很快，奥斯曼人面临的威胁解除了。于是奥斯曼人乘机攻城略地。他们的部队大部为骑兵，缺乏攻城设备，因此攻城的方式一般为驱逐市郊人口并长期围困直至城市投降。奥斯曼集中全力围攻拜占庭比提尼亚行省首府布尔萨（Bursa）。该城坐落在奥林匹亚山脚，地势险要，城墙坚固，虽然周边地区纷纷沦陷，但在缺乏拜占庭支援下依然坚持了近十年之久，最终弹尽粮绝，于 1326 年 4 月 6 日开城投降。不过此时的奥斯曼已经垂垂老矣，不久便撒手人寰（该年 11 月）。但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国家从一个小小的酋长国变为了安纳托利亚举世瞩目的强权势力。①

33

① Wittek, *op. cit.* pp. 37-43; Kramers, article 'Othman I',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ii, pp. 1005-7.

奥斯曼的长子奥尔汗（Orhan）成功继承了王位。按照昔日传统，他的兄弟阿拉丁（Alaed-Din）理应获得一块封地，然而后者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大度地放弃了这一权利。奥尔汗也从先父继承了一员干练的首相阿拉艾丁（Ala ed-Din）。[58] 此时很难说对于奥斯曼苏丹和首相而言，奥斯曼的崛起已经是命中注定。奥尔汗与父亲一样，作为加齐领袖，也热衷于夺取异教徒的领地。1329 年，经过长期围困，奥尔汗攻占了历史名城尼西亚（Nicaea）。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与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也曾经试图收复该城，然而战事陷入了僵局而部队渐生不满，同时帝国内部爆发了叛乱，这一计划不得不终止。接下来轮到了重要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它在得到海上补给的情形下坚持了 9 年，然而随着海上通路被奥斯曼人封锁，1337 年它也陷落了。以尼科米底亚为据点，奥斯曼人大肆扩张，疆域一直达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①

1341 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随即爆发了摄政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与新皇约翰五世之间的内战（史称“两约翰之战”），雪上加霜的是，塞尔维亚王国在国王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shan）的率领下，也频频侵边骚扰。长期以来，拜占庭雇佣各部落突厥士兵作为军队主力，虽然其有酷爱劫掠的陋习。相较而言，奥尔汗的军队是最为军纪严明，战力强悍的。当约翰五世雇佣马尼萨、艾丁等地土耳其人时，坎塔库震努斯则于 1344 年向奥尔汗求援。后者派去了 6000 名士兵，条件是要求迎娶坎塔库震努斯之女西奥多拉（Theodora）。坎塔库震努斯在内战第一阶段取胜并获帝位后，继续雇佣奥斯曼人以对抗塞尔维亚王国。[59] 这场内战的后果之一便是大量的土耳其人从此在色雷斯一带定居下来了。②

34

当坎塔库震努斯于 1355 年被迫下台时，[60] 奥尔汗获得了借口进一步入侵欧洲。1356 年其子苏莱曼帕夏率领大军横渡达达尼尔海峡，攻占了乔尔卢（Chorlu）

① Babinger, article ‘Orkhan’,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ii, pp. 999-1001.

② 关于这场拜占庭内战的情况，参见：Ostrogorsky, *op. cit.* pp. 444-75.

及季季莫蒂霍（Didymóteicho, Didymoticum），从而打开了通往阿德里安堡（今土耳其埃尔迪内）的门户。奥尔汗不仅攻城略地，还将大量土库曼游牧民移民至新征服的土地上，使色雷斯开始突厥化。当奥尔汗大约于1362年去世时，土耳其人俨然已成为整个西色雷斯的主宰。奥斯曼人在亚洲也颇有收获，不过其新领土多数是通过和平手段得到的。西北的萨拉克汗与卡拉西两个酋长国被吞并了，趁着格米延势力的衰退，奥斯曼人还成功地在埃斯基谢希尔（Eskishehir）与安卡拉建立了统治。他们在小亚细亚西部最后一个劲敌为艾丁酋长国，后者阻挡了他们获得西南出海口的通路。[①]

奥尔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在其维齐（vizier）的协助下，他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且保持了地方加齐的活力。他通过组建、管理阿克希（Akhis，即艺术家、学者、商人所属的行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通过拉拢、争取阿訇（ulema）阶层稳定了宗教事务。奥斯曼的基督教臣民也得到了相对公平的处置：如果某个基督教城镇负隅顽抗，城破之后市民将失去权利，其中的五分之一将变为穆斯林的奴隶，很多被送往亚洲做苦工，子女则被送进军队（如新军的成员大多为基督徒青少年）。如果基督徒主动归降，就能保留自己的信仰与生活习惯。甚至很多基督徒认为奥斯曼人的统治好过拜占庭皇帝，因为前者的税率要温和许多。虽然不少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以期获得政治权利，但是并没有官方强制要求改宗的政策。而阿訇们每到一地，便开设宗教学校，为苏丹培养了大量忠心耿耿的精英。[②]

与此同时，军队也得到了重组。过去，奥斯曼的军队几乎完全由游牧民的轻骑兵组成，现在它被设计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士兵获得一小块土地，平时耕种，缴纳赋税，而战时则承担军事义务。这块封地被称作“蒂玛”（timar）。更

---

① Babinger, *loc. cit.*; Köprülü, *op. cit.* pp. 125-6. 奥尔汗的逝世日期今天尚未有定论。Uzunçarsîlî 认为是1360年（*Osmanlî Tarihi*, i, p. 62），维特克认为是1362年（Wittek, *op. cit.* pp. 44, 54, 证据依托于：*Βραχέα Χρονικά*）。

② Wittek, *op. cit.* pp. 42-3, 50.

大一些的封地被称作“扎米特”（ziamet），其领主要负担更高的税率，战时要提供更好的装备与士兵。最大的一些领主被称作“帕夏”（pasha）或“桑贾克贝伊”（sanjakbey），甚至获得最高头衔贝依勒贝伊（beylerbey）[61]，他们则要相应承担最高的义务。除了这些自给自足的部队以外，还有另一支领取薪水的常备军——土耳其新军（Janissary），他们终生为苏丹服务，并构成了苏丹的禁卫军团，其成员一般在基督教奴隶或前基督徒中征集。[62] 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军队的主力为西帕希（sipahis，由上述蒂玛提供），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筹集装备、口粮，随时响应苏丹的征集。不过他们在战役中往往也能得到军饷，并且通常只参加短期战役。西帕希多为骑兵，相应地，步兵则被称作皮亚德（piyade）。其中的弓箭手一般称作阿赞布（Azabs），他们与巴希巴祖克（bashi-bazouks）类似，为临时召集的非正规军，主要为了劫掠和战利品而战。[63] 此外还有轻骑兵，被称作阿基比（akibi）。奥尔汗坚持为不同军种设计了不同的军服，并建立了完备的军事动员机制。因此，他能够在任何时间不引人注意地征集一支训练有素的大军。①

36

穆拉德一世（Murad I）继承了先父奥尔汗的军事机器。他的希腊裔母亲，土耳其人一般称作Nilüfer（意为“睡莲”），为一拜占庭边区男爵之女。他的兄长苏莱曼帕夏已经先于父亲过世，[64] 穆拉德则迅速地除掉了同父异母兄弟易卜拉欣，他的弟弟哈里尔不久后也因病去世，至此穆拉德王位的潜在威胁都被扫除了。在即位的最初几年，他致力于镇压帝国亚洲部分埃米尔的反叛，而拜占庭帝国则乘机收复了一些色雷斯的城镇（不过色雷斯农村的土库曼人是无法被驱逐一空的）。不过1365年穆拉德率军重返欧洲，不费吹灰之力便收复了失去的领土，并占领了阿德里安堡（埃尔迪内），后者成为了帝国新都。控制了阿德里安堡，就是扼住了拜占庭的咽喉。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彻底包围和孤立，

---

① Köprülü, *op. cit.* pp. 131-2; Pears, ‘The Ottoman Turks to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v, pp. 664-5.

它在亚洲的领土早已沦陷，唯一可行的通路仅剩海洋。[①]

此时欧洲对土耳其人的威胁方如梦初醒。威尼斯与热那亚，出于对其殖民地与商路的担忧，开始商讨组成联军对抗东方异教徒的可能性，不过他们的尝试却劳而无功。约翰五世则前往意大利，试图唤起西方诸国对土耳其人的警觉，并获得一批西方雇佣军——然而帝国此时的财力已不允许他这样做了。当他于1373年回国时，不得不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宗主权，并交纳年贡和为苏丹提供士兵，他的儿子曼努埃尔还需前往苏丹宫廷充当人质——拜占庭实质上已沦为奥斯曼的藩属。作为奥斯曼的仆人，约翰的表现是称职的。当他的长子安德罗尼库斯与苏丹的儿子塞吉（Sauji）密谋造反时，约翰与穆拉德站在了一起。37 前者很快被穆拉德的军队所镇压。而当安德罗尼库斯于1376年至1379年再次反叛并占领了首都时，质子曼努埃尔在苏丹的援助下击败了兄长，恢复了约翰五世的统治。不过作为代价，曼努埃尔不得不率领拜占庭军队配合土耳其人，攻占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阿拉谢希尔（名义上承认拜占庭宗主权的特拉布宗除外）。[②]

虽然此刻欧洲诸国已经对局势深感忧虑，并试图策划新一轮十字军，但在当时真正致力于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唯有在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不过他们首要的对手是隔海相望的艾丁酋长国，两者的交战徒令奥斯曼苏丹在巴尔干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土耳其在色雷斯就几乎畅通无阻了。大批土耳其游牧民拖家携口涌向这块土地。奥斯曼扩张的野心已经难以遏制。塞尔维亚虽然还是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力量，不过在1355年杜尚国王去世后，已经一分为二。保加利亚此时仍然未从1330年被塞尔维亚人于维尔巴兹德（Velbuzhd）击败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是塞尔维亚的所作所为一定程度上也使自己失去了利用保加利亚充当缓冲国的机会。保加利亚人明哲保身，甚少参与针对土耳其的战事，唯一

---

① Uzunçarsîlî, *op. cit.* i, pp. 61 ff.; Wittek, *op. cit.* pp. 44-5; Ostrogorsky, *op. cit.* pp. 478-9.

② Charanis, 'The strife among the Palaeologi and the Ottoman Turks', *Byzantion*, xvi, i, pp. 288-300.

例外是1371年他们为南塞尔维亚国王武卡欣（Vukashin）的军队派出了一支偏师，然而由于国王指挥的拙劣，联军在马里查（Maritsa）河畔的契门（Chirmen）遭到惨败（土耳其人从兵力上而言是远处于劣势的）。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使得穆拉德控制了保加利亚的大部与塞尔维亚、马其顿。保加利亚国王约翰·希什曼（John Shishman）不得不承认苏丹的宗主权，并将自己的女儿塔玛尔（Thamar）送往苏丹后宫。而此时统一的塞尔维亚的王公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Lazar Hrebeljanović, Lazar Hrebeljanovich）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国家沦为奥斯曼土耳其的藩属的事实。①

穆拉德的余生大部分致力于巩固他在欧洲的征服。他组织了大量突厥移民进入欧洲，虽然这些殖民活动不如在小亚细亚甚至色雷斯来得顺利，但是很快，土耳其的蒂玛便密布于希腊、斯拉夫、瓦拉几（Vlachs）的村落，而贝伊、帕夏们掌控了广大乡村。到1386年，穆拉德的领土已西至阿尔巴尼亚附近的莫纳斯特尔（Monastir），北至尼什（Nish）[65]。1387年，历经四年围攻后，苏丹拿下了希腊名城塞萨洛尼基。穆拉德对该城颇为宽宏，除任命总督外并未干涉当地民众的生活。②

38

1381年穆拉德一世在降服了格米延（Germiyan）酋长国后，便开始计划远征卡拉曼。他命令欧洲各仆从国家派出军队助战。高傲的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视之为奇耻大辱，中断了对苏丹称臣纳贡。一支土耳其大军迅速出动，夺取了尼什，迫使塞尔维亚人再次臣服。不过拉扎尔表面上虽表示恭顺，暗地却组织巴尔干各国成立联军反抗土耳其。1387年在托普利特萨（Toplitsa）河畔，塞尔维亚军队取得了对奥斯曼土耳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胜。苏丹迅速做出了反击。通过向保加利亚急行军，他降服了当地两位主要的王公（特尔诺沃的

---

① Köprülü, *op. cit.* pp. 129-130: Jireček, *Geschichte der Serben*, ii, pp. 87 ff.

② Tafrali, *Thessalonique au quatorzieme Siècle,* pp. 283-5; Charanis, *op. cit.* p. 301; Jireček, *op. cit.* ii, pp. 99 ff.; Ostrogorsky, *op cit.* p. 485; Babinger, *Beiträge zur Frühgeschichte der Turkenherrschaft in Rumelien*, pp. 65 ff.

约翰及维丁的约翰），随即进入南塞尔维亚，获取了科斯坦丁王公康斯坦丁的支持，接着他继续北进，与拉扎尔的主力在科索沃平原（亦称“黑鸟平原”）相遇。[66]

1389年6月15日清晨，一名塞尔维亚逃兵声称拥有重要情报，获得了面见苏丹的机会。在苏丹的帐篷中，他乘其不备，用一把匕首刺中了穆拉德心脏。[67]苏丹当即身亡，而他也迅速地被卫兵杀死。这次暗杀颇有传奇色彩，不过却是徒劳无功的。苏丹的两位王子正在营中。长子巴耶济德（Bayezit，绰号“雷霆”）迅速掌握了大局，他隐瞒了苏丹的死讯，全力进行战役。[68]土耳其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相形之下，塞尔维亚联军更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旦战况不利，便有四分五裂之虞。黄昏时分，土耳其人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69]拉扎尔国王被土耳其俘虏，作为报复，他在穆拉德遇刺的帐篷前被残忍地处决。此刻巴耶济德方宣布自己继任苏丹，他果断地派人勒死了自己的兄弟雅各布（Yakub）[70]，从而保证了王权的统一。①

穆拉德一世在其三十年的统治当中，利用先父遗留下的政权与军队，将一个加齐酋长国变为了东南欧首屈一指的强权。他本人俨然便是这个新生国度的象征。穆拉德与父亲、祖父不同，他崇尚壮丽奢华与庄严礼仪，他将自己视作帝王而非酋长。[71]他性格严厉，甚至严酷，外加一点玩世不恭（或许这来自他的希腊祖先——穆拉德母亲具有希腊血统）。但另一方面，他为人慷慨、公正，极度推崇纪律。

他的继承人巴耶济德，也是具有希腊血统，不过据说他母亲并非显贵之女，而是个基督教奴隶，名叫Gülchichek（相当于“玫瑰花”之意）。他继承了父亲对华丽之风的爱慕，但其性格火暴，有些自我放纵，对他人不够宽容，对纪律要求也不那么严格。虽然因其行事如风一般迅速而得到了绰号“雷霆”（Yilderm），但他并算不上杰出的指挥官。他的统治继承了父亲开创的大好局面。

① Babinger, *op cit.* pp. i, 24; Jireček, *op. cit.* ii, pp. 119 ff. 科索沃战役的准确日期尚有争议，但6月15日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参见：Atiya, *The Crusade of Nicopolis*, p. 5, and Ostrogorsky, *op. cit.* p. 486, n. i, for references.

科索沃战役的胜利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整个巴尔干的主宰。看上去假以时日，巴耶济德必将征服剩余希腊、阿尔巴尼亚人的领土，统治整个半岛。拉扎尔之子斯蒂芬（Stephen）继承了塞尔维亚王位，但作为土耳其藩属，他已不再称国王而是称“专制君主”（Despot），并且，将自己的妹妹玛利亚（Maria）嫁给了苏丹。特尔诺沃（Tirnovo）的保加利亚王国在139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一年后，苏丹的军队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将当地王公变为了藩属。1396年，巴耶济德进一步计划征服君士坦丁堡，不过当他抵达城外时，惊闻已有一支十字军起来反抗他。这支联军受教皇号召，由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40 率领，包含匈牙利、英格兰、法兰西、苏格兰、波兰、波希米亚、奥地利、意大利等多国士兵。正如其绰号“雷霆”，巴耶济德一世迅速回师，并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决定性地击败了十字军。西方人的愚蠢相当程度上帮助苏丹获得了胜利。[72] 这次大胜使苏丹吞并了保加利亚王国的残余部分（定都维丁），并使多瑙河畔的瓦拉几亚公国向他称臣。在多瑙河前线树立了权威后，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城外，不过并没有立即再度发起围攻。这部分是因为他听到传言：有一支强大的意大利舰队准备前来援助拜占庭首都。① 于是，他开始尝试挑唆拜占庭共治皇帝约翰七世反对其叔叔曼努埃尔二世，他的尝试失败了，与拜占庭内乱的传统相较，约翰七世少见地与曼努埃尔交情甚笃。西方的援军确实到了，不过仅仅是布锡考特手下的一支偏师而已。他们守卫君士坦丁堡达一年之久，然而在战场上并无建树。②

目睹西方的所谓支援如此孱弱，巴耶济德立即开始着手策划下一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他在拜占庭首都海峡对岸的亚洲修建了阿那多卢要塞（Anadolu Hisar，意为小亚细亚堡），并以此作为军事基地。1402年，巴耶济德向拜占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皇帝开城投降。此时，曼努埃尔二世正在西方乞援，留守

① 关于整个尼科堡战役细节参见：Atiya, *op. cit.* 亦可参见：Inalcîk, article ‘Bayazīd I’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i, pp. 117–9.

②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12页。

的约翰七世勇敢地对使者回应道："告诉你家主人，我军固然孱弱，然而笃信真神，上帝会给予我们克敌力量。苏丹欲战欲和，悉听尊便。"①

约翰对上帝的虔诚，随着东方传来的消息，变得更加牢固了。帖木儿（Timur）1336年出生于西察合台汗国渴石（Kesh）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贵族家庭，不过他亦含有成吉思汗女系后裔血统。[73] 至14世纪末，他已经建立了一个东与中国接壤，南抵孟加拉湾，西至地中海的庞大帝国。无论谈及攻城略地还是冷酷无情，他都堪与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媲美。不过他相对缺乏令自己的土地长治久安的才能——一旦他去世，帝国便迅速分裂崩溃了。然而当他在世时，帖木儿依然是一个可怕、凶狠的对手。虽然他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并不算一个传统的加齐勇士。因为他并非为了信仰而战，而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强盛——他伟大的胜利多半来自与穆斯林的征战。帖木儿一向对奥斯曼土耳其怀有仇恨，部分是因为突厥人之间的嫉妒，部分是担心奥斯曼的强大会威胁到他的西方行省。早在1386年他就已经入侵安纳托利亚东部，并击败了尔金迦（Erzinjan）埃米尔的军队。随后他班师回国，不过威胁说随时还会回来。8年后巴耶济德通过联姻获得了格米延酋长国大片土地，他也亲自来到尔金迦视察其帝国东部防线。一年后，帖木儿再次出现在小亚细亚东部，攻陷了锡瓦斯（Sivas）并大肆烧杀，死难者中就包括巴耶济德的一个儿子，他是作为总督被派来治理该地的。对巴耶济德而言幸运的是，随后鞑靼人并未继续西进，而是挥师向东，一路劫掠了阿勒颇、大马士革与巴格达。然而，苏丹的麻烦并未结束。当巴耶济德率领帝国主力包围君士坦丁堡时，帖木儿向他派来了一名特使，严词要求苏丹停止军事行动并归还以往窃取的拜占庭领土——苏丹的回应是狠狠地侮辱了来使。随后巴耶济德中止了围攻，带领部队回到安纳托利亚，而此时帖木儿的兵锋已再次抵达锡瓦斯。

最后的决战于1402年6月25日在安卡拉爆发。巴耶济德的傲慢自负使他

① Ducas, *op. cit.* xv, p. 89.

的军队处于不利境地，加之他的部队鱼龙混杂，很多士兵未经过良好训练并对苏丹的吝啬颇有微词——当帖木儿的大军（其中还包括来自印度的战象）发动猛攻时，奥斯曼的军队崩溃了。苏丹与其第二子穆萨（Musa）均被帖木儿俘虏。唯一屹立不倒的苏丹军团反倒是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的部队，他成功地救出了巴耶济德的长子苏莱曼以及他的一名兄弟。而苏丹第四子穆斯塔法在战役中失踪。帖木儿乘胜进入安纳托利亚西部，攻城略地（其中就包括土耳其前首都布尔萨，当地苏丹的后宫也被帖木儿尽收囊中），而土耳其残存部队则不得不龟缩于阿那多卢要塞以避其锋芒。一路上巴耶济德被关押在一台轿子中与帖木儿同行，后来民间以讹传讹，声称巴耶济德一直被囚禁在一只黄金牢笼中——事实上，土耳其苏丹受到了帖木儿的礼遇，他的死因很可能为自尽（1403 年 3 月）。随后帖木儿释放了穆萨，并允许他将父亲尸体送回布尔萨的皇室墓地。1403 年晚些时候，帖木儿离开了安纳托利亚，返回其帝国首都撒马尔罕。他于 1405 年病逝于远征中国途中，享年 72[74] 岁。①

42

此时此刻，如果欧洲诸国尽释前嫌，一致对外，或许可一劳永逸地根除土耳其之患。不过，虽然土耳其王朝覆灭了，[75] 但土耳其问题依然存在。历史学家固然可以指责西方基督徒失去了打击土耳其的天赐良机，不过，他们忽略了下述事实：土耳其人早已移民巴尔干多年，根深蒂固，要压制其势力已殊为不易，更遑论将其连根拔起了。雪上加霜的是，帖木儿的胜利反而迫使大量土耳其人，甚至整支部落，前往欧洲避难——热那亚人通过舰只将土耳其人送过海峡，并借此大赚了一笔。至 1410 年，根据历史学家达卡斯（Ducas）的记载，在欧洲的土耳其人，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小亚细亚。何况巴耶济德还留下了一支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足以守卫欧洲前线。诚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安卡拉颜面扫地，其军力大为削弱，但毕竟没有到彻底覆灭的程度。②

43

① 关于帖木儿生平，可参见：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pp. 486 ff.

② Ducas, *op. cit.* xxiii, pp. 177-9.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13 页。

曼努埃尔二世尽可能地抓住这一时机，通过外交手腕来保卫帝国。巴耶济德的几名儿子开始了一场王位争夺战。长子苏莱曼在欧洲自立为苏丹（定都阿德里安堡），不过其地位并不稳固。为了争取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他将塞萨洛尼基及数个色雷斯城镇归还于曼努埃尔二世，甚至许诺一旦平息内战，便将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数个城镇也一并归还。[76] 他将自己的幼弟卡西姆送往君士坦丁堡为人质，作为回报，他迎娶了曼努埃尔的侄女（也是摩里亚专制君主国国王赛奥多利一世之私生女）。1405 年，他击败并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伊萨（Isa）。然而苏莱曼是一个神经质的统治者，且终日酗酒，常常神志恍惚，他的部下对其丧失了信心，纷纷转投巴耶济德另一名儿子穆萨门下。[77]1409 年，由于众叛亲离，苏莱曼被穆萨彻底击败，并在逃往君士坦丁堡途中被杀。穆萨于是自立为苏丹，并残酷地报复了当初支持苏莱曼的塞尔维亚人。他再次攻陷了塞萨洛尼基，俘虏了为基督徒守城的苏莱曼之子奥尔汗，并刺瞎其双目。虽然海战受挫，但他依然召集了一支陆军，开始围困拜占庭首都（1411–1412）。不过此时穆罕默德已经平定了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的领土，开始向穆萨的势力范围进军。在拜占庭、塞尔维亚乃至若干对穆萨残暴不满的加齐的共同支持下，1413 年，穆罕默德打败并杀死了穆萨，成为了新一任苏丹。①

穆罕默德·切莱比，绰号“绅士”，向世人证明了他不仅擅长打天下，同样善于治天下。他将穆萨夺取的塞萨洛尼基与其他城镇归还了曼努埃尔，并在一生中都维持了与拜占庭的良好关系。1416 年与 1419 年，他被迫卷入了两场与威尼斯、匈牙利的非决定性战事，同时还镇压了所谓从安卡拉战役中幸存的兄弟穆斯塔法 [78] 掀起的叛乱。不过他毕生主要的兴趣还是在帝国边境修筑要塞，巩固国内统治与美化城市。留存至今的布尔萨“绿清真寺”[79] 可算他仁慈统治的见证。穆罕默德于 1421 年 11 月因中风逝世。②

44

---

① 参见：Jorga,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 pp. 325 ff. 也可参见：Kramers, article ‘Muhammad I’,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ii, pp. 657–8.

② Ducas, *op. cit.* xix-xxii, pp. 129-69.

穆罕默德的长子穆拉德（后为穆拉德二世）此时正担任帝国安纳托利亚总督，得知父亲死讯后，秘不发丧，星夜赶回了阿德里安堡，顺利接管了帝国权力。与他父亲一样，穆拉德本质上也是名和平主义者。据说他深受苏菲派托钵僧（dervish）影响，甚至向往着早日隐退以便过上隐修生活。[①] 不过穆拉德亦是一名励精图治的君主，时事逼迫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与管理者。此刻觊觎王位者穆斯塔法依然势大，穆拉德怀疑他暗中得到了拜占庭支持，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曼努埃尔做出澄清，并强调他愿意延续自其父辈以来形成的土耳其－拜占庭同盟。曼努埃尔原本倾向于同意，不过此时他已经老迈，政权主要操持在其子约翰八世手中，后者与元老院均认为保持土耳其内乱于己有利。于是约翰要求穆拉德将两位兄弟送来充当质子，苏丹表示断然拒绝，为消除后患，穆拉德二世在1422年重新发动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然而，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对缺乏重型攻城设备的土耳其人来说，依然是难以逾越的。约翰八世对政局的预测也不乏合理之处——叛乱果然在安纳托利亚爆发了，叛军名义上处于穆拉德弟弟穆斯塔法（年仅13岁）的领导之下，然而幕后的指挥者实为格米延与卡拉曼的埃米尔。[80] 穆拉德不得不放弃了围攻，代之以纵军蹂躏整个伯罗奔尼撒。[②]

虽然穆拉德也渴望和平，然而时局常常令他难以如愿。1428年，他率军击退了一支越过多瑙河的匈牙利、波兰联军。1430年他入侵了伊庇鲁斯的约阿尼纳（塞尔维亚人称Janina）。同年他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塞萨洛尼基，后者一　45

---

① Ducas, *op. cit.* xxxiii, p. 285; 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 *Voyage d'Outremer*, pp. 181-2,"他们告诉我他厌恶战争，看上去着所言非虚。" Laonicus Chalcocondylas, *De Rebus Turcicis*, *C.S.H.B.*, pp. 351-2, 书中说穆拉德在瓦尔纳战役的危机中起誓加入了这一教派，但缺乏其他证据支撑；不过从穆拉德对新军士兵的处置上看，他的确对贝克塔什派（Bektashis）抱有同情。参见：本书英文版第47页，n. 3。

② Ducas, *op. cit.* xxviii, pp. 229-37; Chalcocondylas, pp. 231-5; George Phrantzes, *Chronicon, C.S.H.B.*, pp. 116-17; Jorga, *op. cit.* i., pp. 378 ff. A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siege, with miraculous details added, is given by John Cananus, published in the *C.H.S.B.* volume of Phrantzes, pp. 457-479.

度掌握该城7年之久。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的继承人乔治·布兰科维奇（George Brankovich）于1427年上台后，便一再向苏丹表达作为封臣的忠心，而苏丹则要求他退出了与匈牙利的联盟。（为了结盟乔治甚至割让了贝尔格莱德）随即穆拉德命令乔治将女儿玛拉（Mara）送往自己后宫，塞尔维亚人表现出的迟疑令愤怒的苏丹派出了部队征讨——塞尔维亚已经不再被奥斯曼人信任了。1440年穆拉德的军队摧毁了塞尔维亚人在多瑙河畔的要塞斯梅代雷沃（Smederevo），后者本是在苏丹的允许下兴建的。旋即苏丹的军队围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首都的城防过于坚固，以至于土耳其人不得不无功而返。①

贝尔格莱德的解围鼓舞了苏丹的敌人。犹金教皇在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后组建了新一支十字军。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对此十分热衷，而塞尔维亚君主也表示愿意施加援手。阿尔巴尼亚领袖乔治·卡斯特里奥特（George Castriota），绰号“斯坎德培”[81]，也旋即对苏丹宣战；亚洲的卡拉曼埃米尔则被说服同时发起攻击。②当穆拉德忙于平定卡拉曼的叛乱时，匈牙利军队及其盟军，在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雅提的率领下，越过多瑙河，将土耳其人逐出了塞尔维亚。穆拉德急忙回师欧洲，向多瑙河进军。但他并不愿冒险轻启战端，而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对此也心有戚戚。此刻匈牙利部队得到了教皇从西方召集的援军的支持（由教皇特使朱利安主教指挥），但拉迪斯拉斯对这些援军并不满足。1444年6月，他与穆拉德在塞格德（Szeged）[82]举行会晤，随后，苏丹以古兰经，国王以福音书互相起誓，允诺实现为期十年的停战协定，期间他们以多瑙河为边界。匈雅提对停战协定并不认同，故未参与其中。

46 穆拉德以为，终于可卸下重担，开始他向往已久的隐修生活了。然而，正

① Ducas, *op. cit.* xxix-xxxi, pp. 245-270; Chalcocondylas, pp. 236-248; Jorga, *op. cit.* i, pp. 236 ff.; Jireček, *op. cit.* pp. 174 ff. A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capture of Thessalonica, followed by a Monodia, was written by John Anagnostes, published in the *C.H.S.B.* volume of Phrantzes, pp. 483-534.

② 关于斯坎德培生平参见：Radonić, *Djuradj Kastriot Skenderbeg i Albanija u XV veku*, 以及 Gegaj, *L' Albanie et L' Invasion Turque au XVe Siècle*.

当他撤回部队并表达出退位意愿之时，前方传来了匈牙利军队越过多瑙河，进抵保加利亚的消息。教皇特使朱利安主教认为，与异教徒所定的盟约是不需要遵守的，而眼下正是击溃土耳其人的天赐良机。如此明目张胆的背信弃义令东正教徒与土耳其人均感到震惊。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明确表示拒绝为匈牙利人提供帮助。乔治·布兰科维奇也撤回了本国军队并阻止斯坎德培提供援助。匈雅提不情愿地加入了部队，但教皇特使对他关于战略的真知灼见置若罔闻。穆拉德此刻本已回到安纳托利亚安排隐退事宜，得知情况有变，立即回师讨伐。1444 年 11 月 11 日，穆拉德在瓦尔纳击败了兵力三倍于他的基督教联军。拉迪斯拉斯与朱利安主教双双阵亡，唯有匈雅提及其部队全身而退。这场胜利奠定了苏丹对多瑙河流域的控制权。①

不久之后，穆拉德将王位正式传予年仅 12 岁的儿子穆罕默德，退休至马尼萨。然而或许命中注定，穆拉德二世必将无缘清闲，他的大臣与军队对新任苏丹产生了不满。穆罕默德被认为早熟、固执且傲慢无礼，而此时偏偏欧洲前线又出现了难题——斯坎德培在阿尔巴尼亚一再挫败土耳其的进犯。公众的呼声与政治形势迫使穆拉德不得不再度出山。[83]1446 年，穆拉德再次派遣军队蹂躏了伯罗奔尼撒半岛。1448 年，匈牙利摄政匈雅提·亚诺什率领一支由匈牙利、瓦拉几亚、波希米亚、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恢复了对土耳其的攻势，他甚至与斯坎德培约定会师于科索沃平原。然而在阿尔巴尼亚人到来之前，一支土耳其大军旋风般地出现，并摧毁了他的军队。在波希米亚与日耳曼军队的拼死护卫下，匈雅提勉强逃离了战场。与瓦尔纳的失利接踵而至的这场惨败，导致了匈牙利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军力不振。虽然匈牙利的军旗依然在贝尔格莱德飘 47

---

①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und seine Zeit*, pp. 19-33. 美中不足的是这本重要史料的价值因其缺乏出处而大打折扣，关于瓦尔纳战役的信息，参见：Halečki, *The Crusade of Varna*, 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争议的陈述。参见：Pall, 'Autour de la Croisade de Varna', *Bulletin Historique de L'Academie Roumaine*, xxii, pp. 144 ff., and Babinger, 'Von Amurath zu Amurath. Vor- und Nachspiel der Schlacht bei Varna', *Oritens*, iii, pp. 229 ff.

扬，但是它再也无力跨过多瑙河对土耳其采取行动了。当君士坦丁堡的危机爆发时，匈雅提·亚诺什爱莫能助，无计可施。在整个巴尔干，此时唯有阿尔巴尼亚山区的斯坎德培尚能与土耳其一较短长。①

穆拉德二世在安纳托利亚同样取得了成功。之后的几年里，苏丹吞并了艾丁与格米延酋长国，并成功地震慑了卡拉曼。其他自治的王公，例如锡诺普、安塔利亚（Attalia）[84] 也纷纷承认奥斯曼的宗主权。而特拉布宗皇帝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妹夫一样虚弱，不得不表示对苏丹的恭顺。②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繁荣昌盛，秩序井然。帝国军队的核心为土耳其新军（The Janissaries）。穆拉德完善了德米舍梅制度（Devşirme）[85]（即所谓“血供”），从而定期地从帝国基督教臣民中招募男孩，经过严格的伊斯兰化训练，部分特别优秀的可以进入宫廷或充当工匠，不过大部分都成为了未来的新军战士。作为苏丹的禁卫部队，新军拥有自己独立的军营，并被禁止结婚，从而终生为苏丹效力。③ 尽管有这种令人反感的“血供”制度，尽管偶尔也存在强制基督徒改宗的情况，尽管人们对税收本能地抵触，穆拉德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还是受到了欢迎，因为他们发现这位统治者大体上还是公正与谨慎的。苏丹有很多基督教挚友，据说还尤其受到他美丽的塞尔维亚妻子的影响。确实，在他的有序与宽容的统治下，很多希腊裔臣民发现其生活要远比处于基督教国家统治下轻松、幸福。④

穆拉德二世于 1451 年 1 月 13 日在阿德里安堡逝世，为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

①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51-5.

②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42-3.

③ Mortmann, article ‘Dewshirme', and Huart, article ‘Janissaries’ in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 pp. 952-3, and ii, pp. 572-4. 关于新军创立时与贝克塔什派的关联，参见：Birge, *The Bektashi Order of Dervishes*, pp. 45-8. Bartholomaeus de Jano, *Epistola de Crudelitate Turcarum*, Migne, *Patrologia Graeco-Latina*, Paris, 1859-1866.（以下简称：*M.P.G.*），clviii, coll. 1065-6, 书中宣称穆拉德于 1438 年重组了新军。

④ Ducas, *op. cit.* xxxiii, p. 285;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75; Phrantzes, *op. cit.* pp. 92, 211.

第三章　皇帝与苏丹

约翰八世为曼努埃尔二世与王后海伦娜（一马其顿塞尔维亚王公之女）六个儿子中的长子，其后按年龄长幼依次是塞奥多利（Theodore）、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君士坦丁（Constantine）、德米图斯（Demetrius）与托马斯（Thomas）。塞奥多利与安德罗尼库斯均先于约翰去世。安德罗尼库斯自幼体弱多病，对政局无足轻重，他唯一谈得上留名史册的举动是在1423年将塞萨洛尼基售予威尼斯人，随后他退居至君士坦丁堡一所修道院内，直到1428年3月逝世。① 塞奥多利则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他继承了父亲的学术品味，并且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然而，他同时也是喜怒无常与神经质的，时而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时而又渴望归隐，远离俗世喧嚣。1407年，他继承了叔叔塞奥多利一世的摩里亚君主国专制君主头衔[86]，当时他不过是个孩子。其父亲（曼努埃尔二世）极力利用这一机会重振摩里亚，并在科林斯地峡修筑了防御工事，然而后者还是于1423年被土耳其人摧毁了。② 如果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与嫉妒，塞奥多利二世尚可称作一名出色的统治者。1421年，他迎娶了意大利名门闺秀克里奥佩·玛拉特斯塔（Cleope Malatesta，其父为意大利佩萨罗伯爵，其堂兄

---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121-2, 134.

② Zakythinos, *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 i, pp. 165-74.



图一　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来自 1455 年一份手稿：*Voyage d'Outremer of 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



图二　约翰八世皇帝



图三　年轻时代的穆罕默德二世苏丹

为教皇马丁五世）。考虑到丈夫阴晴不定的性格，她的生活并不容易。她改宗了东正教，这一度引发了教皇的愤怒，马丁五世指责塞奥多利施加了压力，不过有证据显示，她的皈依似乎是发自肺腑的。夫妻俩在米斯特拉斯建立了一个简朴但富有文化气息的王庭（不过当1433年克里奥佩去世后，摩里亚的文化繁荣有所衰落）。摩里亚的知识精英中就包括著名学者卜列东，塞奥多利夫妇对其有知遇之恩，也由此换来了他毕生的忠诚。作为约翰八世的弟弟，塞奥多利认为自己是帝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尤其是到了1443年，当约翰八世死后无嗣已经很明显时，他将摩里亚的首都迁徙至色雷斯的赛里姆比亚（Selymbria），该城据拜占庭首都仅四十英里之遥，倘若帝位空缺，塞奥多利可随时接手。然而命运弄人，塞奥多利于1448年夏天感染瘟疫，一病不起，在约翰去世前三月便撒手人寰。[①]他唯一的后裔，女儿海伦娜，已于十年前嫁给了塞浦路斯君主约翰二世。[②]

49

年龄较小的两位王子，德米图斯与托马斯就比较乏善可陈了。德米图斯野心勃勃，狂妄自大，在兄长约翰同意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决议后，便以希腊正教捍卫者自居，与约翰关系紧张。他的妻子是一名保加利亚王族后裔（艾森王朝后裔，曾创建保加利亚第二王国），然而夫妻关系并不和睦。德米图斯与土耳其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于1442年率领土耳其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意图推翻哥哥的统治。幸运的是，约翰八世得到了兄弟君士坦丁的及时援助，将德米图斯击败。后者获得了特赦，并定居在首都中，当塞奥多利去世后，德米图斯甚至得以继承了他在赛里姆比亚的封地。[③]

托马斯相较要稳重许多，不过他个性懦弱。1430年他被送往摩里亚以辅佐

---

① Zakythinos, *op. cit.* i, pp. 165-225, 299-302, and ii, pp. 322-34. 弗朗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塞奥多利的大部分史料，然而他对后者抱有偏见，因为塞奥多利对他敬仰的君士坦丁怀有二心。

② 关于海伦娜王后的生平，参见：Hill, *History of Cyprus*, iii, pp. 527–544.

③ 关于德米图斯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期间扮演的角色，参见：Gill, *op. cit.* pp. 108–9, 252, 262 ff. 关于他的婚姻，参见：Phrantzes, pp. 193–4. 这之前他还有过一段婚姻，前妻佐伊于他访问意大利时去世，参见：*Ibid.* pp. 161, 191–2.

其兄弟。在那里他迎娶了一末代阿哈伊亚（Achaea）法兰克诸侯之女凯瑟琳·扎卡里亚（Cahterine Zaccaria），并因此继承了一块采邑。与德米图斯的离经叛道不同，他一直保持了对兄长的忠诚。①

君士坦丁是几兄弟中最具才能的一位。他出生于1404年，青年时代即获得了赛里姆比亚及附近若干色雷斯城镇作为封地。1427年他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协助约翰八世征服当地最后的法兰克王公。[87] 考虑到此时摩里亚君主塞奥多利表示有意隐退从事修道生涯，他的出现可谓雪中送炭，安稳了人心。虽然后来塞奥多利改变了初衷，但君士坦丁于1428年3月通过伊庇鲁斯君主卡罗·托科（Carlo Tocco）侄女的联姻，他获得了伊庇鲁斯在伯罗奔尼撒的大片土地。当他不幸的妻子在两年后去世时（未留下子嗣），他依然保留了这块封地，并以此作为他统一整个半岛的基地。君士坦丁与摩里亚君主塞奥多利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当约翰八世前往意大利游说东西联合时，他指定君士坦丁留守君士坦丁堡监国，这无疑表明皇帝有意将帝位传予后者[88]——此举进一步加深了塞奥多利的不满。不过当君士坦丁以自己在色雷斯的若干封地交换来摩里亚专制君主国的继承权后，两兄弟终于尽释前嫌。[89] 与此同时，托马斯也在克拉琴察（Clarenza）一带获得了自己的封地。在几位皇子的共同努力下，至1433年，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除了四座依然被威尼斯人掌控的城市阿尔戈斯（Argos）、纳夫普利亚（Nauplia）、克罗顿（Croton）、莫顿（Modon）外，全部被拜占庭征服。此时，君士坦丁的目标转移至安提卡（Attica）与维奥蒂亚（Boeotia）。1444年，受匈牙利摄政匈雅提·亚诺什在塞尔维亚的胜利的鼓舞，君士坦丁自科林斯向北进军，他的干将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则穿过帕特雷（Patras），进入福基斯（Phocis）。很快，品都斯山脉范围内的希腊均已经被君士坦丁占领，唯一例外是雅典大公国，其大公内里奥二世（Nerio Ⅱ）匆忙向土耳其人乞求援助。对拜占庭人而言不幸的是，土耳其援军很快就到来了。当君士坦丁忙于扫荡维奥蒂亚

50

---

① 关于托马斯的早年经历，参见：Zakythinos，*op. cit.* i, esp. pp. 241. ff.

时，苏丹穆拉德二世已经于瓦尔纳击败了欧洲十字军。1446年，土耳其大军进入希腊，君士坦丁率领部队退入赫卡米林要塞（Hexamilion），坚守不出。然而穆拉德拥有重炮，经过两周持续炮轰土耳其人终于攻破了城墙——君士坦丁与托马斯侥幸突围逃脱。他们倚重的军队，尤其是阿尔巴尼亚雇佣军，被证明是极不可靠和缺乏勇气的。奥斯曼人摧毁了科林斯地峡的防御工事，接着向佩特雷与克拉琴察进军，沿途烧杀劫掠。在得到摩里亚君主国臣服的保证及年贡后，苏丹方才率军回国。①

51

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对摩里亚及其人口的破坏是巨大的。君士坦丁无力再次发动类似的军事冒险，于是他转而寻求外国的帮助。1441年他再婚了，新娘凯瑟琳为莱斯博斯岛（Lesbos）[90]领主多利诺之女，[91]不过仅仅一年后，凯瑟琳便撒手人寰，并未留下子女。为了获得盟友及通过嫁妆扩展疆土，君士坦丁继续物色妻子：他一度向塔兰托领主之妹伊萨贝拉求婚，他在那不勒斯的大使则推荐一名葡萄牙公主，而威尼斯大使倾向于威尼斯执政官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公爵之女。——然而，没有一位贵族名媛向往君士坦丁那摇摇欲坠的王冠，也没有一个西方强国对拜占庭伸出援手。与此同时，君士坦丁的能臣、好友，乔治·弗朗茨（George Phrantzes）受命前往特拉布宗王国，希望能促成一桩婚事。此时特拉布宗虽然衰落，然而托国内银矿及商路之福，财政尚算宽裕，能够支付一笔不菲的嫁妆，何况特拉布宗公主素来以美貌闻名，例如，约翰八世的皇后（同样来自特拉布宗王室）当年便被誉为绝世佳人。然而乔治的任务也失败了。② 君士坦丁成功地安排将自己的侄女海伦娜（托马斯之女）下嫁塞尔维亚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之子，然而虽然结为亲家，乔治也不愿与摩里亚君主国订

---

① Zakythinos, *op. cit.* i, pp. 204-40.

② Phrantzes, *op. cit.* p. 203 and pp. 324-5，此处他认为君士坦丁向威尼斯执政官之女求婚失败损害了拜占庭与威尼斯关系，但此说缺乏任何威尼斯方面资料的佐证。另请参见：Lambros, '*'Ο Κωνσταντῖνος Παλαιολόγος ὡς σύζυγος*', *Neos Hellettomnemon*, iv, pp. 433-6.

立合约以免触怒土耳其人。①

当约翰八世驾崩，君士坦丁正在米斯特拉斯，所幸托马斯恰好处于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他及时地于1448年11月13日抵达首都（约在约翰去世两周后），此时德米图斯已然宣称自己对皇位的继承权，并从其赛里姆比亚封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德米图斯自忖能够获得反对教会联合的大众支持，[92]然而，按照帝国惯例，皇位空缺时太后有权做出安排。此时的太后海伦娜利用其权威坚称帝位应属于她幸存儿子中的长者——君士坦丁，而民众选择与太后站在一起。德米图斯希望落空了，当托马斯出现时，他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加入了支持君士坦丁的队伍。乔治·弗朗茨因其幼子去世正在首都，此刻被太后选作特使前往土耳其通报新帝即位的消息，苏丹穆拉德优雅地给予了批准。[93]两位帝国高级官员，阿莱克修斯（Alexius Lascaris Philanthropenus）与曼努埃尔（Manuel Palaeologus Iagrus），携带王冠前往米斯特拉斯，君士坦丁顺利地于1449年1月6日在其封地由当地大主教加冕登基。②这是帝国千年历史中（除去尼西亚流亡政府时期不计），新帝首次在君士坦丁堡以外登基，也是首次，新帝未得到大牧首加冕。虽然此时帝位已经没有觊觎者，不过依然有人质疑加冕仪式不够正统。然而非常时期自然需要非常之举，拜占庭人希望政局能够平稳过渡，而在君士坦丁堡加冕必然费时费力，何况当时的大牧首格里高利三世（即Gregory Mammas）声名狼藉，遭到国内修士联合抵制。③

52

新皇帝君士坦丁与随扈乘坐加泰罗尼亚帆船于当年3月12日抵达君士坦丁堡。即位后他慷慨地将摩里亚君主国领土授予两位弟弟德米图斯与托马斯。德米图斯获得了摩里亚东南部及米斯特拉斯，托马斯则领有西北部，包括克拉琴

① Phrantzes, *op. cit.* p. 202;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42; Krekic, *Dubrovnik (Raguse) et le Levant au Moyen Age, Regestes* no. iiio, p. 349.

② Phrantzes, *op. cit.* pp. 204-6;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73-4.

③ Ducas, *op. cit.* xxxiv, p. 293，达卡斯声称君士坦丁虽然顺利即位，但从未正式加冕。参见：Voyatzidis, ‘*Τὸ ζήτημα τῆς στέψεως Κωνσταντίνου τοῦ Παλαιολόγου*’, *Λαογραφία*, viii, pp. 449–56.

53 察与佩特雷。[94] 在一个太后与帝国全体高级官员出席的仪式上，德米图斯与托马斯宣誓要忠于皇帝并善待彼此，然而事后证明他们的诺言不过是一纸空文。①

此时君士坦丁已经45岁了，关于他的相貌，我们所知不多。大体上他身材高挑，继承了家族端正的五官与黝黑的皮肤。他似乎对于学术、艺术与技术领域没有特定爱好，虽然他也尊重大学者格弥斯托士·卜列东（此时定居于米斯特拉斯），并在离任前确定了其子对父亲财产的继承权。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与管理者，除此以外，君士坦丁为人正直清廉，从未做过有辱斯文之事。在处理与其桀骜不驯的兄弟的关系时，他也表现得慷慨仁慈。在帝国臣民眼中，他也是一位亲民宽厚的君主，深受爱戴。因此，当他作为皇帝进入君士坦丁堡时，得到了首都市民发自肺腑的拥护。②

这座命运多舛的城市，的确太需要皇帝的亲和力了。东西教会联合的提议依然遭到民间的普遍怨恨，而君士坦丁发现自己由于兄长在大公会议的妥协被束缚了手脚。不过最初他并未作出激进的变革，这可能是受其母后的影响，当后者在1450年3月23日去世时，不啻皇帝的一大损失。君士坦丁用人并无门户之见，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批能臣干吏：大公（Megas doux, Megadux）[95]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属于反对联合派（虽然不是那么顽固的）；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作为皇帝挚友，同时也是联合派拥趸，获得Stratopedarches[96]这一崇高头衔；梅托切特（Metochites）担任Megas Logothete[97]，他与担任Protostrator[98]的德米图斯·坎塔库震努斯（Demetrius Cantacuzenus）一道，大致可算作“中间派”，既不完全赞成东西联合，不过一旦皇帝做出决定，也愿意无条件服从。③ 皇帝的心腹，也是他的秘书，为乔治·弗朗茨，大体也持这种态

---

① Phrantzes, *loc. cit.*; Chalcocondylas, *loc. cit.*

② 所有同时代的文献（不论是拉丁语、希腊语还是斯拉夫语）提及君士坦丁皇帝都充满敬意。不过没有那个时代关于他的可靠画像流传于世。参见：Lambros, ‘*Αἱ εἰκόνες Κωνσταντίνου τοῦ Παλαιολόγου*’, *Neos Hellenomnemon*, iii, pp. 229–42 and iv, pp. 238–40.

③ 关于君士坦丁大臣们的情况参见：Phrantzes, pp. 229 ff. 不过需要注意弗朗茨对卢卡斯·诺塔拉斯历来怀有成见。

度。至于当时的大牧首格里高利，发觉自己不受皇帝宠爱，于 1451 年 8 月挂印而去，前往罗马并终老于此。① 54

君士坦丁仍在寻找般配的妻子，或许是受母后建议，或许是为了安抚民众反拉丁情绪，他决心在东正教国家寻觅新娘。忠心耿耿的乔治·弗朗茨再次担起重任，前往特拉布宗与格鲁吉亚王庭。他原本相中了格鲁吉亚公主，未料该国国王乔治声称按照惯例，他们不仅不会给予新娘嫁妆，反而需要君士坦丁送上彩礼。弗朗茨本以为婚事注定作罢，谁知峰回路转，格鲁吉亚国王又改变了主意，他表示各国风俗不同，如昔日不列颠便盛行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制，最终国王同意尊重拜占庭人的习惯，并许诺给予丰厚嫁妆，甚至愿意收养弗朗茨的女儿为义女。

此时，弗朗茨听闻了土耳其苏丹穆拉德驾崩的消息，当他前去特拉布宗时，进一步得知苏丹的寡妇，塞尔维亚公主玛拉，已经被礼送回国——弗朗茨顿时产生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立即写信建议君士坦丁迎娶玛拉，后者不仅年轻，而且家底殷实，更重要的是，她在苏丹宫廷多年，德高望重，甚至赢得了继子，也就是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敬意。[99] 至于玛拉的寡妇身份，弗朗茨认为也有先例，约翰五世就曾经迎娶土库曼贵族的未亡人为妻。君士坦丁对此深感兴趣，不过依然犹疑不决，他的顾问们缺乏共识，而他主要的顾问，母亲海伦娜与约 55 翰·坎塔库震努斯此时均已过世。不过玛拉本人的态度打消了这一切，她曾经起誓，一旦能够离开苏丹的后宫，便终生不再改嫁。君士坦丁无奈地选择了格鲁吉亚公主。一支使团被派往格鲁吉亚，以便商讨婚礼事宜。不过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耽误了行程，这场婚礼再也没有机会举行了。②[100]

特拉布宗皇帝本以为弗朗茨会为苏丹的死讯欢欣鼓舞，不过后者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在弗朗茨眼中，穆拉德苏丹在其执政后期致力于维护和平与帝国的

---

① Phrantzes, *op. cit.* p. 217. 参见：Gill, *op. cit.* p. 376, n. 3.

② Phrantzes, *op. cit.* pp. 206 ff.

稳固，无心发动新的扩张；而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据说对基督教国家抱有很深敌意，并会致力于摧毁临近的基督教王国，拜占庭与特拉布宗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弗朗茨的担心是合理的。不久，拜占庭皇帝也接到来自土耳其宫廷的线报——战事恐怕迫在眉睫了。①

年仅19岁的新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年3月30日生于阿德里安堡。他的童年颇为不幸，其生母胡玛哈顿（Hüma Hatun, Huma Hatun）出身低贱，是一名土耳其奴隶（不过后世传说她具有法兰克贵族血统），其父穆拉德并不喜爱穆罕默德，而是偏爱他出身更高贵的同父异母兄弟。他在阿德里安堡与母亲及虔诚强势的乳母戴伊哈顿（Daye Hatun）共同度过了平淡的几年。然而造化弄人，他的长兄艾哈迈德1437年在阿马西亚（Amasia）突然去世，二哥阿拉艾丁6年后惨遭暗杀，穆罕默德11岁时突然成为了帝位继承人（除去苏丹本人及其远房堂兄奥尔汗，穆罕默德是仅存的奥斯曼王子，而奥尔汗此时正流亡君士坦丁堡）。穆拉德急忙将儿子招至宫廷，并为其缺乏教育而深感震惊。著名的库尔德裔教授艾哈迈德·库拉尼（Ahmet Kurani）被指定为王子的老师，其工作可谓卓有成效。日后穆罕默德在科学、哲学领域颇有造诣，并且广泛涉猎了土耳其、希腊文学作品。除了母语以外，他还熟练掌握了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波斯语甚至希伯来语。苏丹不禁对儿子刮目相看，并且开始传授他管理帝国政府的技艺。②

56

当穆罕默德12岁时，穆拉德二世与匈牙利签订了停战和约，既然天下太平，他决定从此隐退，[101] 并将国家大权交给太子。此时的安纳托利亚暗流涌动，时有叛乱发生，当“退休”的苏丹忙于镇压当地动乱时，[102] 十字军进犯瓦尔纳的情报传来了，大维齐哈里尔（Halil）帕夏希望老苏丹速回欧洲主持大局。哈里尔作为穆拉德二世的故交深得信任，被苏丹安排作为穆罕默德二世的监护人

---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11-3.

②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1-12, 22-3.

与导师，然而师徒二人关系并不和睦，因此哈里尔也向穆拉德一并汇报了新苏丹的种种乖谬之举。例如，穆拉德退往安纳托利亚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与一名波斯异教托钵僧过从甚密，后者招致了大维齐（作为正统穆斯林）的强烈憎恶。穆罕默德最终被迫将托钵僧交予法赫丁（Fahreddin）大教长（the Chief Mufti）裁决，教长判处波斯人火刑并亲自监刑（据说，到场观看火刑的教长是如此激动，以至于不慎烧着了胡子）。①

虽然如此，在帝国于瓦尔纳战胜十字军后，穆拉德二世不改初衷，执意退位，穆罕默德在哈里尔辅佐下正式登基。然而此举的效果是悲剧性的。在阿尔巴尼亚与希腊前线，依然有战事爆发。苏丹的监护人们拒绝其不切实际的进攻君士坦丁堡计划，从而引发了苏丹的愤怒。穆罕默德二世的自负与傲慢激起了宫廷与民众共同的反感。不过军队的不满尤其强烈。为了防止激起叛乱，哈里尔邀请穆拉德重返阿德里安堡主持大局。1446 年秋，穆拉德二世悄然返回帝国首都，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穆罕默德二世黯然退位，并被送往当年父亲退休之地——小亚细亚的马尼萨。②

57

或许穆拉德二世也曾考虑过更换继承人，因为他的妻子（桑达尔酋长国易卜拉欣贝伊之女）新近为他生育一子。③ 不过看来穆罕默德并未彻底失去父亲的眷顾，经历了两年的流放生涯后，他再次被召入苏丹的军队，与父皇共同参加了著名的科索沃战役。此前一年，他在马尼萨与一名阿尔巴尼亚女奴古博哈尔（Gülbehar，阿卜杜拉之女，可能是一名由基督徒改宗的穆斯林）生下一子，即将来的巴耶济德二世。④ 穆拉德并不赞成这一段姻缘。1450 年，他强迫儿子迎娶了土库曼王公、马拉蒂亚（Malatia，一般拼写为 Malatya）[103] 领主苏莱曼

---

①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34-7.

② *Ibid.* pp. 45-7.

③ 关于这位妃子的命运（她名叫 Hadije），参见：Alderson, *The Structure of the Ottoman Dynasty*, p. 94 and tables XXV, XXVI and LIV. Ducas, *op. cit.* xxxiii, p. 287, 达卡斯在记载中称她为锡诺普领主斯本地亚尔之女。

④ Babinger, *op, cit.* p. 53.

（Suleiman Zulkadroghlu）之女希特哈顿（Sitt Hatun）。虽然婚礼隆重壮丽，然而此女毕生从未得到穆罕默德宠爱，在阿德里安堡的冷宫中度过了余生。①

在穆拉德统治的末期，父子关系似乎有所改善。穆罕默德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苏丹的宫廷，并数次陪伴父亲出征。但他也常常回到自己的流放地马尼萨。他的生母于1450年8月去世，穆罕默德在布尔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耐人寻味的是她的墓碑上几乎没有提及丈夫穆拉德二世。当穆拉德在1451年2月于首都驾崩（死于中风）时，穆罕默德不幸地又一次身处马尼萨。②

不过此时已无人能质疑穆罕默德的王位继承权了。哈里尔帕夏秘密派遣特使前往马尼萨通报了这一噩耗，年轻的王子立刻启程奔赴首都阿德里安堡。在安然横渡达达尼尔海峡后，他认为自己继承皇位木已成舟，还特意在加里波利半岛停留两天，以便让首都的人们准备欢迎仪式。当他于2月18日抵达阿德里安堡时，自大维齐以下全体官员亲自出城郊迎。穆罕默德二世于苏丹皇宫安排了首次觐见，由于昔日的历史恩怨，紧张气氛笼罩着大厅。直到苏丹命令首席宦官赛哈布·艾丁（Shehab ed-Din）安排诸大臣循旧例入座，大家方如释重负。大维齐得到了留任，第二维齐[104]伊萨克（Ishak）帕夏荣升安纳托利亚总督。[105]萨鲁贾帕夏（Saruja）、扎加诺斯帕夏（Zaganos）虽然历来与穆罕默德有隙，但仍然与赛哈布一道，被任命为“助理维齐”（assistant vizier）。随后，穆罕默德父亲的未亡人——易卜拉欣贝伊之女（与前苏丹诞有一子，为穆罕默德幼弟），在哀悼完毕后也前来觐见苏丹并表示祝贺。而穆罕默德一面亲切接待这位寡妇，一面命令手下前往后宫，将他的幼弟在浴缸中溺死。[106]去除心头之患后，穆罕默德二世还命令其继母改嫁于伊萨克帕夏，并随夫迁往小亚细亚。至于另一位继母，塞尔维亚公主玛拉（即前文中弗朗茨为君士坦丁物色的新娘候选人）则

58

①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60 ff. 准确日期可参见：Inalcîk, ‘Mehmed the Conqueror (1432-1481) and his time’, *Speculum* xxxv, p. 411.

②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62-4.

受到苏丹的善待，被礼送回国。[①]

在树立统治权威，整理后宫之后，新苏丹开始筹划自己的治国方略。世人仅仅以为他不过是个早年经历坎坷、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然而穆罕默德早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他相貌英俊，身材健硕，弯眉下是一双可洞悉人心的鹰目，而其鹰钩鼻则诉说着主人的坚毅。除非酒酣之时（穆罕默德继承了家族嗜酒的传统），苏丹一贯是威严甚至冷漠的。然而对于他敬仰的有识之士，他亦能表现得亲切仁慈甚至热情诚恳，并且他习惯了有艺术家陪伴左右。他生性多疑，童年的经历教育他不可轻信于人。对其下属来说，揣摩上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并不奢求万众景仰，也不追求青史留名。然而他的才智、精力与果断同样为他博得了世人的敬重。了解他的人不会冒险去改变他胸有成竹的计划，在这些计划中，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便是征服君士坦丁堡。[②]

59

① Ducas, *op. cit.* xxxiii, pp. 281-3, 287-9. 提供了一个生动有说服力记述。Ashikpashazade (Derwish Ahmed, genannt ‘Aşik-Paşa-Sohn’), *Denkwürdigkeiten und Zeitläufte des Hauses Osman*, ed. and trans. Kreutel, pp. 195-7.

② 法国国家图书馆纪念币展柜中收藏的这枚纪念章刻画了青年时代的穆罕默德，它很可能是在稍晚于1453年后铸造的。大英博物馆中詹蒂利·贝利尼所作纪念币以及巴黎的科斯坦佐·德·费拉拉的作品完成于1480和1481年，那时穆罕默德已垂垂老矣。

第四章　西援之殇

特拉布宗皇帝并非唯一一个对穆拉德二世之死如释重负的人，西方各国普遍也流露出类似的乐观情绪。大使们根据来自苏丹宫廷的线报，对穆罕默德二世早年的失败大加渲染，以至于人们以为这位“无能”的新苏丹，不会成为西方基督教诸国的重大威胁。穆罕默德二世爽快地承认先皇与西方国家签署的条约，这更加深了人们的错觉。1451 年夏末，当新苏丹即位的消息传至欧洲，前往阿德里安堡的欧洲使团络绎不绝。9 月 10 日，苏丹款待了威尼斯代表团并续订了穆拉德五年前与之签署的和约。10 天后，他又与匈牙利摄政匈雅提的代表签署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停战协定。拉古萨大使因为主动提出增加年贡至 500 金币，尤其获得了苏丹青睐。罗德岛骑士团以及莱斯博斯岛、希俄斯岛领主也纷纷派员满载礼物，前来朝贺，他们也都得到了善意的回馈。塞尔维亚君主不仅得到了自己的女儿，[107] 还被特许收回了若干斯特鲁马河流域的市镇。第一个抵达阿德里安堡的拜占庭使团原最为忧虑，不过他们也得到了苏丹的安抚并感到宽慰。苏丹不仅以古兰经起誓，务必会尊重拜占庭之领土完整，甚至还慷慨地许诺为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奥尔汗王子支付一笔高达 3000 阿克切（Akçe）[108] 的年金，经费来自原本属于奥尔汗位于斯特鲁马河谷的若干希腊市镇，以使后者维持体面的生活。甚至阿索斯山（Mount Athos）修道团 [109]（自穆拉德二世后

承认土耳其宗主权）也认为可与土耳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①

新任苏丹看上去深受老臣哈里尔帕夏和平主义观念的影响。拜占庭外交官们小心地维护着与大维齐的友谊，并且收到了回报。但是，精明的观察家也意识到苏丹的温和姿态并非发自内心。他这么做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为了在发起伟大战役时能够后方稳固。同时，大维齐哈里尔的影响力也远没有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大。穆罕默德二世从未真正原谅哈里尔在1446年的所作所为。[110] 哈里尔的盟友伊萨克帕夏已经被调往安纳托利亚，而副首相扎加诺斯帕夏素来与哈里尔不睦，何况他还是宦官赛哈布的挚友，后者与新任苏丹私交甚笃，并完全支持苏丹的扩张政策。②

然而土耳其宫廷的暗流涌动并不为西方国家所知晓，他们反而被威尼斯、布达佩斯传来消息所麻痹。经历了尼科波利斯与瓦尔纳的惨败，没有西方国家愿意再与土耳其兵戎相见。他们宁可相信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何况西方诸国受国内局势拖累，也缺乏出兵干预的准备。在中欧，哈布斯堡王朝的弗里德里希三世此刻忙于筹备即将在罗马举行的加冕礼（为了获得神圣罗马皇帝头衔，他甚至放弃了德国教会的特权），甚至觊觎着波希米亚与匈牙利的王冠——这必然导致匈牙利摄政匈雅提的仇恨。[111] 法王查理七世则忙于重建百年战争后满目疮痍的国土，同时还要防备国内心怀叵测的诸侯——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后者的国土与财力都甚于他自己。菲利普倒是自付具有十字军精神，然而当年父亲约翰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战败被俘，身陷囹圄，尚殷鉴不远，何况倘若他率部亲征，还要提防自己的公国被法王偷袭。英格兰同样受到百年战争的拖累，此时的国王虽然道德高尚，精神状况却不稳定，[112] 也就无心派出军队参与冒险。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苏格兰国王同样难以指望，而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王国正忙于对付境内的异教徒，也无暇他顾。唯一表现出对东方事务兴趣的西方君主

62

① Ducas, *op. cit.* xxxiii, pp. 289-291;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75-6; Thiriet, *Regestes des Délibe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iii, no. 2862, pp. 167-8;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69-70; Hasluck, *Athos and its Monasteries*, p. 50.

② 参见：Inalcîk, *Fatih Devri üzerinde Tetikler ve Vesikalar*, pp. 110-11.

是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他在 1443 年还继承了那不勒斯王位。此人的确醉心于发动对东方异教徒的远征，然而，他要求以获得拜占庭皇帝头衔作为酬劳，这一漫天要价的行为自然得不到拜占庭支持，于是西方的援助就更加渺茫了。①

甚至教皇国也认为新苏丹不足为虑。而一些希腊难民团体开始四处游说，希望西方国家在穆罕默德二世成熟之前采取行动。其中最著名的说客为一意大利人托伦蒂诺的弗朗西斯科·菲莱福（Francesco Filelfo of Tolentino, 为希腊学者约翰·克里索拉斯的女婿），他曾向法王查理递交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求援信，力陈组织新一轮十字军的好处，并断言此时土耳其人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然而他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②1447 年继位的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且心向学术，任内重大功绩之一便是创办了梵蒂冈图书馆。不过由于他深受流亡意大利的希腊学者贝萨里翁影响，对拜占庭心怀同情。然而即使教皇百般呼吁，也只是应者寥寥；何况拜占庭人对宗座并无好感，甚至连前任皇帝在大公会议签署的联合协议，都拒绝予以实施。③

63

君士坦丁皇帝对他面临的困境了然于胸。1451 年夏天，他派遣安德罗尼库斯·拜尼奥斯·莱昂塔里斯（Andronicus Bryennius Leontaris）前往威尼斯为帝国招募克里特弓箭手，随后安德罗尼库斯来到罗马代表皇帝向教皇传达亲善之意，同时还呈交了拜占庭感恩聚会团体（Synaxis）[113] 的一封信函。信中宣称上一届大公会议由于大牧首被蒙蔽，应该是无效的。他们呼吁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新一届大公会议，保证东正教主教列席，并缩减天主教会与会人数。很多"拒统派"知名人士在信件上署名，不过拜占庭神学家、哲学家乔治·斯库拉里斯·金纳迪乌斯（Gennadius Scholarius, Georgios Kourtesios Scholarios, George Scholarius Gennadius）是个例外，后者认定这番呼吁必然劳而无功——事情也

① 关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概况，参见：Gill, *op. cit.* pp. 382-3.

② 弗朗西斯科的信函收录于：*Jorga, Notes et Extra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Croisades*, iv.

③ Gill, *op. cit.* p. 187.

果真如此。教皇既不准备推翻上届大公会议内容，也不准备谅解这些东正教异见者。尤其不幸的是，当拜占庭使者来到时，恰逢前牧首格里高利·玛玛斯辞职后驻留于罗马城内避难，他的添油加醋更坚定了教皇决不妥协的信念。尼古拉斯五世没有答复教士们的呼吁，在给拜占庭皇帝的回信中却要求后者利用权威，采取断然行动促成教会共融。教皇进一步指出，前任大牧首必须官复原职，拒不执行这项决定的希腊人应该送往罗马接受天主教的“再教育”。信中甚至有下列著名的句子：“如果君士坦丁堡的贵族与民众接受了联合的决议，您会发现整个罗马天主教会将倾力支持您与帝国；然而如果你和你的人民拒绝接受，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拯救你们及我们的荣誉。”[1]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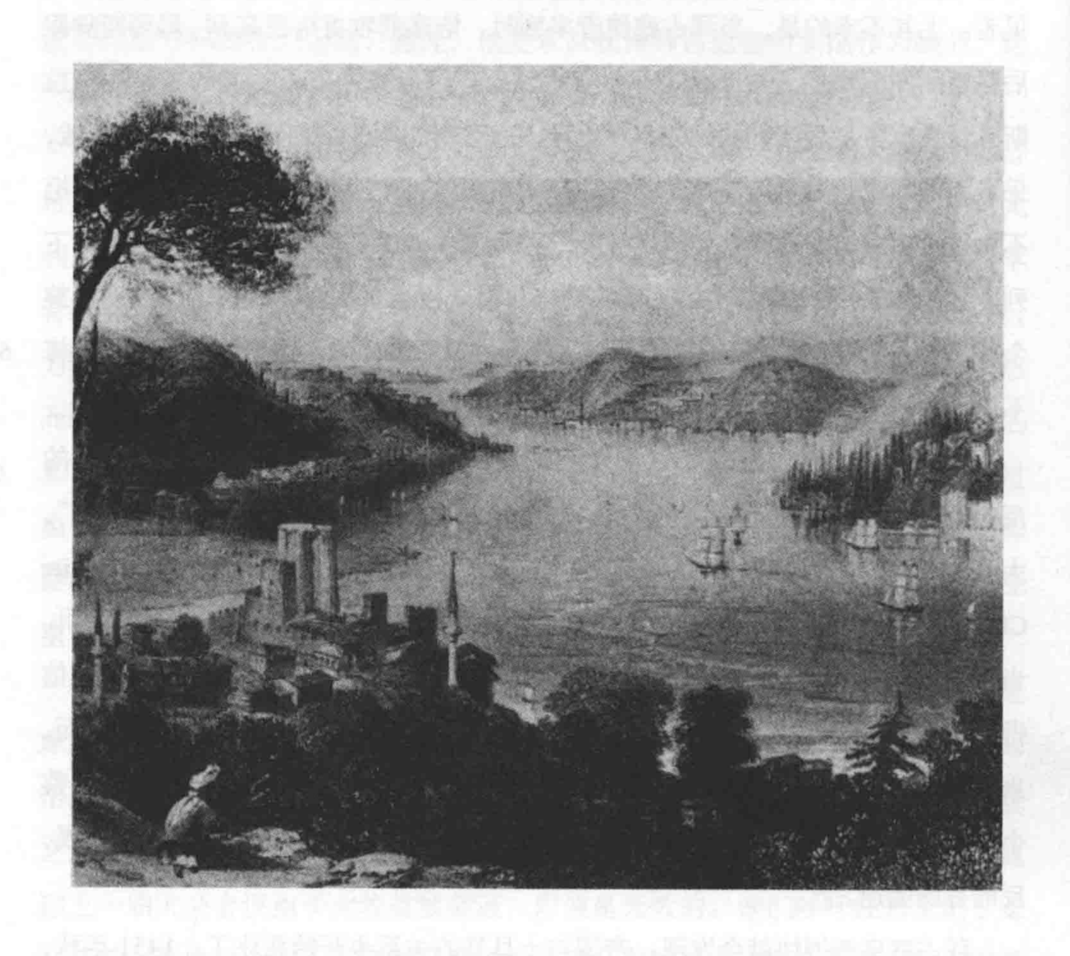
这样的最后通牒对皇帝而言于事无补，相反，它更坚定了金纳迪乌斯的反对。数月后，君士坦丁·普拉特里斯（Constantine Platris, 绰号“英国人”，大概由于他是一名英国罗拉德教派难民之子）作为布拉格胡斯教会（Hussite Church）特使来到君士坦丁堡，并在狂热的人群中发表了一番关于信念的演讲。当他回国时，拜占庭人交给他一封信件，信中严厉抨击了教皇的自负——此信得到了大量感恩聚会成员的支持，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金纳迪乌斯。然而，当苏丹懦弱无能的传言渐渐烟消云散时，拜占庭人的乐观情绪也随之消退，整个首都笼罩在一片肃杀痛苦的氛围中，而此时东西方教会的关系不仅未见进展，反而有所倒退。[2]

拜占庭皇帝很快就会发现，帝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了。1451 年秋，卡拉曼埃米尔易卜拉欣贝伊同西方人一样，认为新任苏丹软弱可欺，于是联合艾丁、格米延、门特瑟等酋长国掀起了叛乱。当易卜拉欣入侵土耳其领土时，

---

① Gill, *op. cit.* pp. 377-380.

② 关于普拉特里斯此行任务详尽可靠的记录参见：Paulová, ‘L’ Empire byzantin et les Tcheques avant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Byzantinoslavica*, xiv, pp. 158-225, esp. 203-224. 记录这一插曲的同时代西方作家是普斯库鲁斯，他当时正居住于君士坦丁堡：Pusculus, *Constantinopoleos*, in Ellissen, *Analekten der mittel- 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 pp. 36-7.



图四 博斯普鲁斯海峡。左侧建筑为小亚细亚堡，右侧为鲁梅里要塞。

图五　威尼斯画家詹蒂利·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为穆罕默德二世所作肖像画。



若干小公国纷纷揭竿而起，宣告独立。当地的土耳其贝伊伊萨（Isa）倦政而且无能，安纳托利亚总督伊萨克帕夏只得匆忙向苏丹求救。穆罕默德二世率军迅速进入小亚细亚，扭转了局面，粉碎了叛乱。当伊萨克帕夏的军队占领门特瑟公国时，易卜拉欣贝伊也屈服了。然而苏丹凯旋归朝时，土耳其新军却险些爆发兵变——士兵们表示不满，并要求提高待遇。穆罕默德部分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安抚了军队，同时将新军领袖降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随后改组了新军，补充了一部分皇家驯狗人、养鹰人进入军团，从而提高了军队的忠诚度。①

65

显然是受到苏丹遭遇困境的鼓舞，君士坦丁派遣使节面见苏丹，提醒后者支付早先允诺的给予土耳其王子奥尔汗的年金，言外之意，也是提醒后者记住在君士坦丁堡尚有一位土耳其王位的潜在继承人。当使者抵达苏丹位于布尔萨的驻地并说明来意后，大维齐哈里尔既尴尬，又愤怒。他此时已深谙主公的脾性，明白面对如此挑衅苏丹会作何感想。不仅他致力维护的和平政策会因此受到冲击，甚至他本人的官位都可能摇摇欲坠。然而苏丹仅仅是冷淡地回复使者，一切等他回到阿德里安堡再议。② 但是，这一无礼事件很可能促使穆罕默德下定决心，收回不侵犯拜占庭帝国的诺言。苏丹原计划按照奥斯曼人的传统路线，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班师回朝，不过在得知此处游弋着一支意大利舰队后，为稳妥起见，他改为经小亚细亚堡[114]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返回阿德里安堡。这样一来，大军必然会穿越拜占庭国境，穆罕默德二世不屑于征得拜占庭皇帝的首肯，相反，利用此次行军的机会，他借机侦查了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形，并发现小亚细亚堡对岸某处地势险要，适宜构筑要塞——这一发现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一旦回到阿德里安堡，穆罕默德二世立即下令驱逐了斯特鲁马河下游各城镇的希腊居民，并征收其全部财产。随后在1451年冬，他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

① Ducas, *op. cit.* xxxiv, pp. 291-3;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76-9.

② Ducas, *op. cit.* xxxiv, pp. 293-5.

上千能工巧匠及大量民夫，计划第二年开春即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海岸线一侧阿索马顿（Asomaton，在今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外贝贝克一带）附近修筑堡垒。整个冬天，苏丹派出的监工们都在检查地势，并发动民夫们拆除周围的教堂、修道院，以便利用它们的建筑材料构建新的要塞。① 66

上述举措自然引发了君士坦丁堡的惊恐。苏丹企图围攻拜占庭首都的计划已是昭然若揭了。君士坦丁皇帝急忙派遣特使指责这一违约行为，并强调即使在巴耶济德统治时期，修筑小亚细亚堡也提前征得了拜占庭曼努埃尔皇帝同意。然而，使者被拒绝觐见，无功而返。1452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新要塞正式动工。作为反击，君士坦丁十一世囚禁了首都所有土耳其人，但在发现此举毫无效果后，又不得不将其尽数释放。他随后派出使者满载礼物，希望至少能够让苏丹同意，在修建堡垒时尽量不要迫害周边的希腊居民，但苏丹对此置若罔闻。作为最后的外交努力，拜占庭人又一次派出特使，同意土耳其修建要塞，但希望获得保证，要塞完成后不会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苏丹的回应是将使节投入狱中，稍后更处以极刑。很明显，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了。②

这座被称作鲁梅里（Rumeli Hisar）的要塞于 1452 年 8 月建成，不过它的土耳其语别名更能说明其功用——Boghaz-kesen，意为“割喉之刃”。苏丹率部前往该地，驻跸三日，对工程质量感到满足。随后他发布诏令，要求所有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必须在土耳其要塞前停靠并接受检查，[115] 一旦违抗命令，则会遭到击沉。为了贯彻这一命令，苏丹在要塞安放了三门重炮（其中最大的一门至今尚在），炮口直指海峡最窄处。苏丹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11 月初，两艘威尼斯商船从黑海途经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因拒绝检查而遭到了炮击，不过它们幸运地逃脱了。两周后又一商船希望效仿它们的先例，不过却没有如此好 67

---

① Ducas, *op. cit.* xxxiv, pp. 295-7;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80-1; Critobulus (Kritovoulos), *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 trans. Briggs, pp. 15-20.

② Ducas, *op. cit.* xxxiv, pp. 301-3;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80-1; Critobulus, *op. cit.* pp. 20-2; Phrantzes, *op. cit.* pp. 233-4. 参见：Inalcîk, *op. cit.* pp. 121-2.

运，船只被岸炮击沉，船长及船员被土耳其人俘虏并带到苏丹位于季季莫蒂霍的行宫。苏丹下令将船员枭首，船长安东尼奥·里佐（Antonio Rizzo）更是被判穿刺刑并置于路边示众。①

威尼斯人的悲剧击碎了西方对苏丹的幻想。此时威尼斯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共和国在君士坦丁堡拥有租界，并刚与皇帝签署了贸易协定（1450 年），在拜占庭境内享有贸易特权；另一方面威尼斯同样与土耳其拥有大量商业往来，甚至部分威尼斯人认为，土耳其对拜占庭的征服有利于威尼斯拓展在黎凡特的业务。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所谓唇亡齿寒，一旦苏丹完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下一步必然会觊觎威尼斯在希腊与爱琴海的领地。同年 8 月，经过一场激烈辩论，威尼斯议会以 74:7 的绝对多数，同意对拜占庭施加援手。不过威尼斯能做什么呢？它此时正陷于伦巴第的战事，它与教皇的关系也谈不上和睦（主要原因是教皇一直拖欠 1444 年发动十字军时雇佣威尼斯舰队的费用）——与宿敌热那亚人同仇敌忾就更不可能了。在那不勒斯，威尼斯大使被告知可以指望阿方索国王的援助，然而该国王的态度实际是含混不清的。保卫共和国各殖民地的任务已经令海军疲于奔命，如若与土耳其全面开战必然迫使威尼斯将部分商船改装为战舰——这又意味着经济上的额外损失。考虑到本国水手死于非命，为了维护国家颜面，威尼斯不得不与土耳其终止友好关系。不过在黎凡特的威尼斯指挥官也得到了模棱两可的指示：既要保卫当地基督徒的安全，却又不能主动冒犯土耳其人。同时，拜占庭皇帝也被特许，可以在克里特岛[116]招募佣兵。②

热那亚的处境与威尼斯类似，其反应甚至更加焦虑无措。热那亚此时在欧洲已经自顾不暇，政府虽然发布了几封号召对抗土耳其人的文稿，不过自身却

68

① Ducas, *op. cit.* xxxv, p. 309; Nicolo Barbaro, *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nstantinopoli*, ed. Cornet, pp. 1-5.

② Thiriet, *Regestes,* iii, nos. 2881, 2896, 2897, pp. 173, 177-8; Heyd,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ii, pp. 302-5; Thiriet,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Age*, pp. 380-1.

毫无动作，仅有一些民间志愿者做出了一些努力。热那亚尤其担心它的佩拉（Pera）[117]殖民地和黑海沿岸殖民地。佩拉大区长官被告知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取悦土耳其人，甚至要争取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依然与土耳其共存共荣。相似的指令也被传至希俄斯岛的“马赫那”（Mahona，亦可拼写为 Maona）[118]当局。各殖民地都被要求决不可挑衅土耳其人。①

拉古萨同威尼斯一样在拜占庭拥有商业特权，但他们亦与土耳其人保持着贸易关系。除非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西方联盟，否则他们也不会以自身弱小的舰队独自与苏丹对抗。②

虽然对拜占庭颇有不满，不过当教皇得知土耳其人的野心时依然大为震惊。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 1452 年 3 月前往罗马加冕之际，宗座极力向他游说，希望他向苏丹发出一份严厉的最后通牒。通牒的确发出了，不过空话连篇，毫无效力——众所周知，腓特烈三世既无实力，也无愿望，去与强大的土耳其帝国一较长短。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相对卷入更深，他对希腊这块土地深感兴趣，何况君士坦丁堡的加泰罗尼亚商人也是他的臣民。他许下了很多诺言，甚至一度派出了一支 10 艘船的舰队前往爱琴海声援拜占庭（不过舰队的费用大部分由教皇给付）。然而几个月后当他联合威尼斯向米兰大公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宣战时，由于忌惮热那亚的反应，他召回了这支舰队。教皇（以及背后的拜占庭学者贝萨里翁）仍然在徒劳地寻求援助，但他与拜占庭皇帝的特使一次次空手而归。当苏丹的要塞竣工后，君士坦丁改变了态度，写信通知教皇完全赞成教会联合——教皇受此鼓舞，更是竭尽所能地设法援助拜占庭了。③

69

① Jorga, *Notes et Extraits*, ii, pp. 271-3; Heyd, *op. cit.* n, pp. 285-6; Argenti, *Occupation of Chios by the Genoese*, i, pp. 201-2.

② Krekić, *Dubrovnik (Raguse) et le Levant*, pp. 59-62.

③ Gill, *op. cit.* pp. 378-9; Marinescu, ‘Le Pape Nicolas V et son attitude envers l'Empire Byzantin’, *Bulletin de l'Institut Archéoligique Bulgare*, x, pp. 333-4, and ‘Notes sur quelques

伊斯多尔 [119]，前基辅大主教，被教皇启用（他此时已成为天主教会主教），作为特使，于 1452 年 5 月前往君士坦丁堡。他带着教皇的资金与嘱托，在中途招募了 200 名弓箭手，随后在米提林尼（Mitylene），希俄斯的莱昂纳德（Leonard of Chios）总主教（热那亚后裔）加入了他的队伍。10 月 26 日，伊斯多尔一行到达君士坦丁堡，他随扈的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至少说明了一旦同意联合，教皇给予的援助并非空头支票。这一姿态立即取得了成效。不仅皇帝与宫廷对伊斯多尔的到来表达了热烈欢迎，甚至广大民众也因此掀起了狂热。君士坦丁抓住了这一形势，分别指定一个贵族会议与公民会议去推行教会联合。公民会议，由于反对者拒绝列席，顺利地批准了协定。不过在贵族会议，议案遭到了一些阻力，贵族们倾向于通过一个折中方案：在礼拜仪式中承认教皇的威名，但暂缓普遍推行宗教融合。——这一方案被皇帝（部分是受到教皇特使的压力）否决了。卢卡斯·诺塔拉斯在谈判中尽心竭力，手腕圆滑，但却受到了众人冷遇。以金纳迪乌斯为首的拒统派人士认为诺塔拉斯背弃了信仰，而伊斯多尔与拉丁人则怀疑其忠诚。双方对诺特拉斯的看法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迄今为止，大公一方面强调，为了整个基督教的团结共融，东正教神学家们应当求同存异；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一旦危机解除，与天主教联合的条件还可以再度商讨。现在的局面令金纳迪乌斯痛心疾首，在教皇特使抵达前，他特意做了一番激昂的演说，号召人们不要为了一点点援助而放弃自己世代相传的信仰。不过当虎视眈眈的西欧雇佣兵到来时，这些反对派们退缩了。金纳迪乌斯于是退居神圣救主教堂内，并在大门上贴出告示，再次劝诫众人不要犯下违背信仰的愚行。虽然诺塔拉斯也曾去信奉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但他不为所动。在金纳迪乌斯影响下，街头的反拉丁人暴动时有发生。而随着时间推移，希望中的大批西欧援军并未

70

---

ambassadeurs byzantins en Occident à la veille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Annuaire de l' Institut de Philologie et d' Histoire Orientales et Slaves*, x, pp. 419-428. Guilland, 'Les appels de Constantin XI Paléologue à Rome et à Venise pour sauver Constantinople', *Byzantinoslavica*, xiv, pp. 226-244.

到来，拒统派的力量又开始东山再起了。

伊斯多尔主教，这个希腊人后裔，在斗争的漩涡中表现得既宽容又睿智，以至于皇帝的心腹弗朗茨一度建议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以弥补格里高利辞职后的空缺。然而君士坦丁知道，伊斯多尔绝不会从命。此时，莱昂纳德总主教也对局势感到不满，出于天主教徒对东正教徒的优越感，他建议皇帝逮捕一批反对派领袖并从重法办。这一计谋除了造就一批殉道者并激化矛盾外，不会有任何裨益。君士坦丁十一世于11月15日在皇宫召见了反对派主要成员，倾听他们的见解，与会者起草并签署了一份文件，详细叙述了他们反对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决议的因由。他们再次重申了与天主教在关于圣灵理论上的分歧，但是也表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另外举行一次公正的、有更多东正教神父参与的大公会议。他们认为，障碍都是由于天主教会的敌视所造成的，反对派甚至同意召回离任的前牧首格里高利，如果在宗教观点上此人“痛改前非”的话。金纳迪乌斯是否列席会议今天已经不得而知，签字的15人（8名主教，7名修道院长）中没有他的名字。反对派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盲目的联合可能会导致东正教会内部的分裂。然而对西方人来说，既然其他东正教会并未给予君士坦丁堡实质性援助，他们理应享有居先地位。

71

几天后发生了威尼斯商船被土耳其鲁梅里要塞岸炮击沉的事件。首都因此掀起了新一轮恐慌，对西方援助的渴求超乎以往，联合派再次占据了上风。金纳迪乌斯担心，人们的恐惧如燎原之火扩散开来，于是发放传单，大声疾呼，切不可为了虚无的援助而玷污自身信仰。他的观点也获得了一批支持者。

1452年12月12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庆祝东西方教会共融的神圣弥撒，皇帝与宫廷要员均到场参加。教皇与大牧首（当时缺位）在祷告中首次被并列提及，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决议也被公开宣读。伊斯多尔报告说教堂座无虚席，仅有金纳迪乌斯等8位神父拒绝到场——这可算一个不小的胜利。但据伊斯多尔其他同行的报告，形势就没那么乐观了：多数希腊民众对联合仅仅是容忍而毫无热情；在官方宣布只有认同联合的教士才可进入索菲亚大教堂后，

很多希腊人就不再去该教堂祷告了。莱昂纳德总主教甚至认为，就连皇帝本人，似乎对此次联合也是漠不关心的，并且推行不力，而卢卡斯·诺塔拉斯，则是联合公开的敌人。如果诺塔拉斯真的说过关于头饰的那番著名言论，那恐怕也是受以莱昂纳德为代表的拉丁人顽固不化的刺激，后者完全不懂得妥协的艺术。

72 随着共融仪式的完成，这里再也看不到公开的反对意见了。金纳迪乌斯在隐居中缄默无言。多数民众不情愿地接受了既定事实，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只去“正统”的教堂祷告。甚至联合派的很多人士也认为这不过是面临危机的权宜之计。西方派来的舰队与士兵事实上促成了此次联合。希腊人渴望其自身对信仰的“背叛”能够得到西方援助的补偿——他们做到了西方要求的一切，然而很快他们会发现，西方人爽约了。[①]

---

① Gill, *op. cit.* pp. 382-7. 带有完整参考文献。但亦可参见：Paulová, *op. cit.* pp. 192-203, 书中对金纳迪乌斯的心态有更深刻的剖析。我看来，吉尔认为君士坦丁堡民众皆深信唯有与西方教会共融才能获得援助的观点有些失之武断。民众对西方援兵感到欢欣鼓舞令金纳迪乌斯心生警惕，他的应对便是大力宣扬西援背后蕴含的教会联合目的，而这仅靠善意或经济因素是无法实现的（虽然诺塔拉斯似乎对此深信不疑）。吉尔恰当地指出了诺塔拉斯稳健的影响力——后者在达卡斯（其资料主要源于热那亚，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193 页）和西方作家（尤其是希俄斯的莱昂纳德与普斯库鲁斯）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普斯库鲁斯甚至称他为焚琴煮鹤之人、鱼贩之孙，并古怪地指责他作为一个简朴的人却拥有声名狼藉的奢华宫殿。关于这次谈判的主要原始材料为：*CEuvres Complètes de Gennade Scholarios*, iii, pp. 165-93; Ducas, xxxvi, pp. 315-9; Phrantzes, p. 325; Leonard of Chios, *Hi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e Urbis Captae, M.P.G.*, clix, coll. 929-930; Isidore of Russia, letter to the Pope, Jorga, *Notes et Extraits*, ii, pp. 522-4; Pusculus, *op. cit.* pp. 21, 23.

第五章　准备围攻

73

整个 1452 年年末，穆罕默德二世都在酝酿他的征服计划，甚至他的近臣对详情都不得而知。苏丹是否准备利用新建的鲁梅里要塞围困君士坦丁堡，直至后者投降？然而他还在筹备于阿德里安堡建造一座新皇宫（位于马里查河一小岛上），此举似乎又暗示苏丹并不急于发起攻势。大维齐哈里尔也希望如此。如大家猜测的那样（不论他是否收取了拜占庭人的贿赂），哈里尔被认为是亲拜占庭派，并且反对军事行动。这场围攻注定代价不菲，而且一旦失败，必将严重削弱奥斯曼人的声望。此时的君士坦丁堡，政治上虚弱无力，不过商业方面尚算繁荣。[120] 哈里尔在穆拉德旧臣中不乏支持者，然而一些重要的将领却强烈反对他的政策，例如扎加诺斯帕夏与图拉罕帕夏（Turahan），他们幕后的支持者包括大宦官赛哈布——上述几位哈里尔的政敌都得到了苏丹的宠幸。①

那年冬天，为了筹划未来的战役，穆罕默德二世于阿德里安堡度过了多个不眠之夜。有传言声称他有时会在午夜微服私访，而所有认出他身份的人均被其随从格杀勿论。某日凌晨，苏丹紧急召唤大维齐觐见。老首相心惊胆战，深恐会被苏丹就地免职，为了讨好主人，还特意送上了满盘的金币。穆罕默德二

74

世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老师？”[121] 哈里尔嗫嚅道按照惯例，臣仆面见主公，

---

①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58 页，n. i.

切不可空手而来，这是给苏丹的礼物。年轻的苏丹将哈里尔的礼物放到一旁：“我不需要你的礼物。我想得到的只有一物，那就是君士坦丁堡！”这次摊牌无疑表达了苏丹征服拜占庭的决心，哈里尔帕夏虽然感到沮丧和无奈，但也不得不表示屈服。①

数日后，大约在1453年1月，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全体重臣参加的御前会议。在重温了帝国先辈们的文治武功后，苏丹宣布，除非拥有君士坦丁堡，否则土耳其帝国将永无宁日。拜占庭帝国虽然虚弱，然而却善于谋划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阴谋，而且，恰恰由于其虚弱，不能排除皇帝将首都交给更强有力西方盟友之可能。君士坦丁堡并非牢不可破，早先多次围攻失败更多是外因作用。然而，当前围城的时机到了。这座城市因为宗教纷争，已然陷入分裂。意大利人生性狡诈多变，作为拜占庭盟友并不可靠。与此同时，土耳其已经拥有一支海军可以控制制海权。[122] 穆罕默德最后表示，如果不能拥有君士坦丁堡，他对帝国的统治也会感到意兴阑珊。

苏丹的讲话起了作用。即使原本反对开战的大臣面对此情此景，也不敢表达自己的异议。于是与会人员一致地投下了赞成票。②

一旦就发动进攻达成共识，穆罕默德二世迅速命令帝国欧洲部分总督代伊·卡拉德贾贝伊（Dayi Karadja）召集军队，袭击拜占庭位于色雷斯的市镇。黑海沿岸的几座城市，例如梅瑟姆布里亚（Mesembria）[123]、安契拉斯（Anchialus）及比祖斯（Byzus），迅速投降，从而免遭了一场浩劫。而一些马拉马拉海滨城市，例如赛里姆比亚和佩林苏斯（Perinthus）[124] 却决心抵抗到底。——它们遭土耳其大军攻占、洗劫，并被拆除了城墙。③而早在上一年10月，

75

① Ducas, *op. cit.* xxxv, pp. 311-13.

② Critobulus, *op. cit.* pp. 23-33, 他长篇记载了苏丹的这次演讲，稍简短的版本参见：Taci Bey zade Cafer Celebi, *Mahrusa-i Istanbul Fetihnamesi*, ed, 1331 A.H., pp. 6-8. Inalcîk, *op. cit.* pp. 125-6.

③ Ducas, *op. cit.* xxxvii, p. 321. Pusculus, *op. cit.* p. 49. 该书错误地声称梅瑟姆布里亚也是对苏丹奋力抵抗的城池之一。

苏丹已经派遣图拉罕帕夏及其子率领军队进驻科林斯地峡，此时也开始袭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庭领土，使君士坦丁的两位兄弟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增援首都。①

在苏丹的讲话中着重提及了土耳其的制海权。早先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多拘泥于陆路，于是拜占庭依然可以从海上得到补给、增援；土耳其人并非航海民族，直到最近，还不得不依赖基督徒的舰只运送自己的军队。穆罕默德决心改变这一切。至 1453 年 3 月，一支庞大的船队已经在加里波利整装待发了。其中一部分属于老旧的船只，经过维修改装（甚至防漏处理）再次加入帝国海军；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爱琴海沿岸新造的舰只。这些新舰中有一些三桡战船（trireme），和古代三桡战船相比进行了改良，吃水较浅，拥有两只桅杆以便使用风帆。这里也有二桡战船（bireme），体积更加小巧，只有一根桅杆。大型战船可统称为 galley，广义上可包括各种大型船只，不过严格意义上应该指单层大型划桨战舰；而更小型的船只则被称作 fustae（帆桨两用船，大致相当于旧时划桨大艇“long boat”）。运输船（通常为平底船）则被称作 parandaria。②

关于苏丹舰队规模，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拜占庭方面的历史学家往往夸大其词，而根据当时旅居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水手的说法，土耳其舰队大概包括 6 艘三桡战船，10 艘二桡战船，15 艘单层大型划桨战舰，75 艘大艇（fustae）以及 20 艘运输船，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单桅帆船及快艇（主要用于联络）。舰队司令为保加利亚裔改宗者苏莱曼·巴尔托古鲁（Suleiman Baltoghlu）[125]。水手与桨手一部分为囚犯或奴隶，不过多数为雇佣兵 [126]。苏丹对舰队的重视看上去甚至超过了陆军，因为他亲自一一任命了舰队各指挥官。③

76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34-6;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81-2.

② 关于这个时代战舰的情况，参见：Yule, *Travel of Marco Polo*, ed, Cordier, i, pp. 31-41; Pea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pp.232-5; Sottas, *L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de Venise*, pp. 52-102.

③ Barbaro, *op. cit.* pp. 21-2, 此书给出的土耳其舰队数据为 12 艘大帆船，70–80 艘长船；Jacobo Tetaldi, *Informations*, Martene and Durand, *Thesaurus Novus Anecdotorum*, i,

3 月末，苏丹的海军起锚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拉马拉海，这引发了基督徒的恐慌。直到此时，他们才第一次领略了土耳其海军的强大。②

当土耳其舰队在马拉马拉海巡弋，帝国陆军也于色雷斯集结完毕。与海军一样，陆军也已整装待发，且装备精良。整个冬天，帝国的工匠们都在高效地生产盔甲、标枪、弓箭等各种武器，而工程师们则忙于督造各种攻城器械。军事动员迅速而又充分。每个行省的部队都被征集起来，甚至包括赋闲的封地采邑士兵。大量非正规军也加入了土耳其军队。只有图拉罕帕夏入侵伯罗奔尼撒的部队与边防军、行省守备部队被留了下来。这支大军的规模是惊人的。希腊人声称苏丹动员了 30-40 万人，甚至相对清醒的威尼斯人也断定土耳其兵力达 15 万之众。不过根据更可靠一些的土耳其资料，这支部队大概包括 8 万正规军，2 万杂牌军（主要是巴希巴祖克），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非战斗人员。其中最重要的部队是土耳其新军，自二十年前穆拉德将其重建以后，大致维持在 12000 人规模，不过此刻新军刚进行改组，其中一小部分成员为穆罕默德加入的一些工匠、公职人员、驯狗师和养鹰人。每一名新军士兵均从基督教家庭征召，不过自孩童时期参军后，很快便改宗伊斯兰教，他们将新军视为自己的家庭，将苏丹视为自己的最高统帅和父亲。部分新军或许尚记得自己出身，偶尔也会对基督徒心存怜悯；不过他们在宗教上却是极端虔诚和狂热的，纪律也十分严明。昔日新军在穆罕默德面前似乎有些桀骜不驯，不过现在他们对于参加一场对异

77

coll. 1820-1，给出的数据为 16-18 艘大帆船，60－80 艘长船；leonard of Chios, col. 930，给出的数据为三桅战船 6 艘，二桅战船 10 艘，总计战舰 250 艘；Phrantzes, *op. cit.* p. 237，30 艘大型战舰，330 艘小型战舰（但他在 239 至 240 页又声称土耳其舰队共 480 艘舰只）；Ducas, *op. cit.* xxxviii, p. 333，总计约 300 艘；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84，30 艘三桅战船及 200 艘小型战舰；Critobulus, *op. cit.* pp. 37-8，声称土耳其舰队规模为 350 艘，并且强调了苏丹对海军的浓厚兴趣。

② Critobulus, *op. cit.* p.38.

教徒的圣战却充满了热忱。[1]

这支军队固然令人瞩目，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装备的某种战争机器——穆罕默德敢于在 1453 年春进攻君士坦丁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炮兵部队取得了很大进展。一百年前日耳曼修道士施瓦茨（Schwartz）就已发明火炮。火炮对于攻城战的潜在作用很快得到了重视，不过日耳曼人于 1321 年对北意大利城市奇维达莱（Cividale）的围攻及英格兰人对加来（Calais）的进攻，火炮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那时的火炮缺乏威力，难以对坚固城防造成足够破坏。于是接下来的百年中，火炮就主要用于野战驱散对方军队以及打击轻型城防工事了。1377 年，威尼斯人曾经尝试在海战中使用火炮以对抗热那亚。[2] 不过那时的战舰无法安装重型火炮，较轻型火炮对舰只的杀伤力则稍显不够（往往仅能击伤，而不能击沉）。穆罕默德则因为其宠幸的医生，意大利犹太人加埃塔的雅各博（Jacobo of Gaeta）的影响，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并相信炮兵的重要性。在他统治之初，便命令过帝国兵工厂研制重型火炮。[3]

1452 年夏，一位名叫乌尔班（Urban）的匈牙利工程师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并提议为皇帝研制火炮。然而，拜占庭皇帝既无法负担其理想的薪水，也无法为他的研究提供充分原材料。于是乌尔班决定前往土耳其碰碰运气。他立即得到了苏丹接见，并接受了详细询问。在宣称他的大炮足以击毁巴比伦城墙后，

78

① 关于土耳其军制，参见：Pears, *op. cit.* pp. 222-231;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91-2. 关于君士坦丁堡战役中土耳其军队规模，不同西方文献给出了不同版本：Ducas, *op. cit.* xxxviii, p. 333, 记载土耳其军队总数超过 40 万人；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83，40 万人；Critobulus, *op. cit.* p. 38, 不包括随军非战斗人员为 30 万人；Phrantzes, *op. cit.* p. 240, 262000 人；Leonard of Chios, col. 927, 30 万人（其中新军 15000 人）；Tetldi, col. 1820, 20 万人（包括 6 万随军非战斗人员）；Barbaro, *op. cit.* p. 18, 16 万人。土耳其方面的文献多认为参战军队规模在 8 万左右，参见：Khairullah Effendi, *Tarikh*, pp. 61-3. Mordtmann, *Belagerung und Eroberung Konstantinopels*, p. 39. 巴宾格尔在其著作中尤其指出，当时条件下土耳其无法一次将超过 8 万人的军队投入战场。

② Oman,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ii, pp. 205. ff.

③ Babinger, *op. cit.* p. 88.

乌尔班正式被苏丹聘用，并得到了4倍于个人预期的薪水和一切技术援助。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制造了一门重炮，该炮被苏丹置于鲁梅里要塞，并在击沉威尼斯敢于突破封锁的船只一事上建立了功勋。苏丹进而要求乌尔班建造一尊两倍大尺寸的巨炮。1453年1月，这座庞然大物终于完成，其长度达到了惊人的26英尺8英寸[127]。大炮分为前后两部分，后部负责装药，前部负责装弹。据说所用炮弹重达1200磅。[128]大炮完工后，出动了700人及30头牛进行运输。他们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将大炮运至苏丹宫廷之外以便测试。阿德里安堡市民提前得到了通知：会有巨响发生，切勿惊慌。当导火线点燃，巨炮首次发射，其轰鸣甚至在100斯塔迪昂（stadion, stadia）[129]外清晰可闻，炮弹则飞越了1英里，最后没入6英尺深泥地。苏丹龙颜大悦。200名工兵被派去平整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以及加固桥梁。在行军途中，土耳其则出动了60头公牛拉动炮车，两侧还有200人护卫。与此同时，在乌尔班指导下兵工厂也制造了其他一批火炮，不过就尺寸和威力来说均远不如这一尊青铜巨兽。①

79 自三月份起，苏丹的军队开始兵分几路，从色雷斯向博斯普鲁斯开拔。供养这一支大军颇为不易，不过整个行军安排得井井有条。部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涨。每个穆斯林士兵都深信，一旦第一个进入君士坦丁堡，必将得到先知眷顾，死后获得升入天堂的待遇。曾经有宗教预言写道："他们终将占领伊斯坦布尔，完成这一功绩的王公与将士将享有无上荣光。"另一段被当时教士修改过的预言则表示："你可曾听说过一座城市，两面环海，一面与陆地接壤？终有一日，7万以撒（Isaac）的子孙会征服它。"至于苏丹本人，其宗教热情是毋庸置疑的。他曾多次声称，自己就是那位预言中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王子。②苏丹于3月23

① Ducas, *op. cit.* xxxv, pp. 305-7; Phrantzes, *op. cit.* pp. 236-8;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85; Critobulus, *op. cit.* pp. 43-6; Barbaro, *op. cit.* p. 21; leonard of Chios, col. 927. Babinger, *op. cit.* pp. 86, 88.

② Mordtmann, article 'Constantinopl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 p. 867;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 pp. 397-8.

日离开阿德里安堡，4 月 5 日他与最后一支分遣队抵达拜占庭首都城外。[①]

君士坦丁堡此时的气氛自然与土耳其方面大相径庭。目睹了马拉马拉海的强大奥斯曼舰队与缓缓向城墙开进的乌尔班大炮，城中居民不寒而栗。几次轻微地震与暴雨，也被市民们附会为上帝给予的恶兆。拜占庭人不禁想起那古老的预言——帝国终将毁灭，而敌基督（Anti-Christ）亦将出现。[②]不过，纵然感到绝望，拜占庭军民倒也不乏最后的勇气。即使那些一度反对教会联合，甚至认为投靠土耳其对希腊教会并无坏处的拒统派人士，在此危难之际，也全身心地投入到城市防御中来了。在皇帝的鼓舞下，利用一个冬季，城中居民无论妇孺老幼，协心齐力维修、加固了城墙，并清理了护城河。全城所有战斗人员都被集中并分配到最急需的地区。为了应对危机，政府、教会、修道院甚至个人，纷纷捐资，最后募得了一笔可观的金钱。其中似乎意大利人提供的份额还多过希腊人。不过，拜占庭此时需要大笔资金募集人力、购买军备和粮食，因此该项经费依然显得捉襟见肘，况且在土耳其封锁下即便有钱也未必能买到这一切。[③]

80

拜占庭皇帝已经竭尽全力。1452 年秋，使节们被派往意大利寻求援助。然而其反馈是令人失望的。[④]面对拜占庭新任驻威尼斯大使，共和国议会于 11 月 16 日作出的答复是：我们对东方的危机深表忧虑，如果教皇国和其他国家愿意出兵干预，那么威尼斯也同意合作。此时威尼斯尚未收到其商船被击沉的噩耗，不过即使稍后得到了这一消息（包括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租界传来的情报），威尼

---

① Ducas, *op. cit.* xxxvii, p. 327; Barbaro, *op. cit.* p. 18; Zorzo Dolfin, *Assedio i Presa de Constantinopoli*, ed. Thomas, pp. 12-13; Phrantzes, *op. cit.* p. 237, 他给出土耳其全军抵达的时期为四月二日；leonard of Chios, col. 927, 给出的日期为四月九日。

② Critobulus, *op. cit.* p. 35.

③ Critobulus, *op. cit.* pp. 34-5; leonard of Chios, col. 934. 莱昂纳德指责希腊人危急关头试图转移财产，不过这一指控并无确凿证据。

④ Marinescu, 'Notes sur quelques ambassades', pp. 426-7.

斯人也没有下定决心采取断然行动。[①]拜占庭使节也前往了热那亚，得到的明确援助仅仅是1艘战舰，不过热那亚人补充说愿意替拜占庭向法国及佛罗伦萨共和国祈求进一步帮助。阿拉贡的阿方索国王态度甚至更加含混，不过好在他批准了拜占庭人在西西里一带募集粮食的请求。围城开始时，使节们多在国外忙于自己的任务，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土。教皇尼古拉斯五世主观上愿意帮助拜占庭，然而在确认拜占庭实践与天主教会共融的诺言之前，他并不愿意全力以赴；何况离开了威尼斯的支持，教皇能做的也不多。雪上加霜的是，此时教皇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罗马1453年1月爆发的民众叛乱上，在平息这一事件前，他无暇过多顾及国外事务。[②]

教皇与威尼斯的外交信函也传来了不和谐的音符。威尼斯人对教皇拒不偿付1444年发动十字军时拖欠威尼斯的费用至今耿耿于怀，而教皇也对威尼斯人的"善意"心存疑虑。1453年2月19日，在收到东方传来的最新消息后，威尼斯议会终于投票决定派出增援——共两艘装载800名士兵的运输舰，护航的还有另外15艘战舰。5天后议会进一步公布法令，通过向从事东方贸易的商人征收额外税款，来偿付这次军事行动的费用。同一天，威尼斯向教皇国、神圣罗马帝国、那不勒斯王国、匈牙利王国发出外交信函，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援助君士坦丁堡，否则该城定将沦陷。至3月2日，威尼斯还在讨论这支增援舰队的组织事宜。议会决定，舰队由海军总司令雅科莫·罗瑞丹（Giacomo Loredan）总体负责，具体指挥权则交给阿尔维索·隆戈（Alviso Longo）。威尼斯议会作出尽快增援决定后，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然而该计划进展缓慢，迟迟未能就绪。4月初威尼斯终于得到了教皇答复，宗座表示愿意派遣五只战舰前去支援拜占庭。4月10日威尼斯回复教皇说，本国对教皇的决定感到欢欣鼓舞，不过提醒宗座注意上一次远征的欠款还未偿付。威尼斯根据最新情报，希望教皇注意，

81

① Thiriet, *Regestes*, iii, no. 2905, p. 130.

② Marinescu, *op. cit.* pp. 424-5, and 'Le Pope Nicolas V', pp. 336-7.

君士坦丁堡对于粮食的需求更甚于士兵，并且舰队出动的最佳日期本应在 3 月底之前，否则达达尼尔海峡开始刮起北风，这会大大增加舰队行驶的难度。[130] 威尼斯舰队启程的日期最终被定在 4 月 17 日，然而随后又遭遇了一系列拖延和变故，当舰队真正出发时，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围攻了整整两周。①

尼古拉斯教皇对威尼斯舰队的延宕深感不安。他自费购买了一批食物和士兵，用 3 艘热那亚船只将他们送往君士坦丁堡。启程的日期大约在 3 月末。②

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国家关注拜占庭的局势。为了吸引热那亚商人向君士坦丁堡输送粮食，皇帝慷慨地给予其免税特惠，然而应者寥寥，因为此时的热那亚奉行严格中立政策。人们一度对匈牙利摄政匈雅提·亚诺什寄予厚望，既然土耳其撤走了多瑙河边境线上多数部队，现在应该是匈牙利发起进攻的绝佳时机——然而匈牙利人仍未从几年前对阵穆拉德时的惨败中恢复元气，何况匈雅提本人也处境尴尬。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五世（Ladislaus V, Ladislas V）1453 年 2 月 14 日正好成年，到了亲政的时候，因此与不愿放权的摄政关系恶化。同样，东正教诸国也无法给予援助。③ 俄罗斯大公距离遥远，鞭长莫及，且国内问题成堆，指望他相助是徒劳的。④ 何况俄罗斯人对于君士坦丁堡教会与天主教的联合也感到震惊和反对。摩尔多瓦两位王公，彼得三世与亚历山大二世，此时正忙于内争。瓦拉几亚大公弗拉迪斯拉夫二世（Vladislav Ⅱ）作为土耳其藩属，没有匈牙利支持自然也不会出兵相助。⑤ 塞尔维亚君主乔治对其宗主国是如此忠心，以至于派遣了一支军队加入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虽然这支军

82

---

① Thiriet, *Regestes,* nos. 2909-2912, 2917, 2919, pp. 182-4.

②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100 页。

③ Csuday, *Die Geschichten der Ungarn*, i, pp. 422-6. Phrantzes, *op. cit.* pp. 323-8. 书中声称匈牙利人向苏丹派出了大使，指出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将损害两国友好，不过匈雅提向皇帝要求赛里姆比亚或梅瑟姆布里亚作为援助谢礼，与之类似的是阿拉贡的阿方索，他心仪的是利姆诺斯岛。

④ Ostrogorsky, *op. cit.* p. 492.

⑤ Jorga, *Historie des Roumains*, iv, pp. 124 ff.

队内心深处对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兄弟怀有同情，然而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却无愧于自己的主人（即苏丹）。① 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依然是苏丹心头之患，但他素来与威尼斯人关系不睦，并且遭到了由土耳其人挑唆的国内叛乱的掣肘。如果教皇成功发起了一支十字大军，爱琴海诸岛主与罗德岛医院骑士团也乐于加入，反之他们则倾向于隔岸观火。摩里亚的拜占庭王子们则被图拉罕贝伊的军队牵制，格鲁吉亚、特拉布宗也是自顾不暇。安纳托利亚的诸多埃米尔尽管对土耳其素无好感，不过他们的叛乱刚刚被苏丹镇压下去，也没有能力再次起事。②

不过，虽然多国政府对拜占庭的危机无动于衷，这里仍然有挺身而出，为君士坦丁堡奋战到底的勇士。城中威尼斯租界对皇帝提供了全力地支持。在一次君士坦丁十一世、帝国重臣、教皇特使伊斯多尔参加的会议中，威尼斯大使[131]吉罗拉摩·米诺托（Girolamo Minotto）做出了如下表态：威尼斯将竭尽全力帮助守城，未经允许，也不会有 1 艘威尼斯船只离开君士坦丁堡。他同时保证威尼斯政府会派出援军，并亲自去信求援。两位威尼斯船长，加布里·特莱维森（Gabriele Trevisano）[132]与阿维索·狄多（Alviso Diedo）的舰只刚从黑海归来停泊在金角湾，也自告奋勇加入了拜占庭军队。同时，6 艘威尼斯船与 3 艘克里特船（克里特为威尼斯殖民地）在得到指挥官许可后，也改装为战舰参加了拜占庭舰队——正如特莱维森向皇帝进言所说，这是为了“上帝与基督徒的荣耀”。在这些留守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中也不乏名门之后（例如 Cornaro、Mocenigo、Contarini、Venier 等家族），其祖辈的伟绩早已载于史册，而关于君士坦丁堡围城战最真实可信的记载则是来源于威尼斯海军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Nicolo Barbaro）的日记。③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325-6. *Pamietniki Janczara Polaka Napisane*, ed. Galezowski, *Zbior Pisarzow Polskich*, v, pp. 123 ff.

② Miller, *The Latins in the Levant*, pp. 407 ff.

③ Barbaro, *op. cit.* pp. 14-18.

威尼斯人与拜占庭同舟共济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荣誉和自尊不允许在战争爆发时逃离战场。不过这里也有部分热那亚人，对本国政府的绥靖政策[133]深感耻辱，于是自发地招募军队，增援君士坦丁堡。其中著名的人士有毛里西奥·卡塔内奥（Maurizio Cattaneo）、格罗尼姆与莱昂纳多·迪·兰加斯科（Geronimo & Leonardo di Langasco，为两兄弟）、保罗（Paolo）、安东尼奥（Antonio）及特罗伊洛（Troilo），他们也并称博基阿尔多（Bocchiardo）[134]三兄弟。1453年1月29日，拜占庭人迎来了热那亚名将，年轻的杰奥瓦尼·朱斯提尼亚尼·隆哥（Giovanni Giustiniani Longo），此人出身高贵，[135]为君士坦丁堡带来了7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其中400名在热那亚本土招募，300名在希俄斯岛及罗德岛招募）。皇帝对他的到来倍感欣慰，并许诺一旦击败土耳其人，便赠予爱琴海上的利姆诺斯（lemnos）岛作为酬劳。朱斯提尼亚尼被认为在守城战上颇有心得，于是被任命为首都城防总指挥。朱斯提尼亚尼抓紧时间检查了整个君士坦丁堡城防系统，并着力加强了其薄弱部分。虽然威尼斯人素来与热那亚不合，不过在朱斯提尼亚尼人格魅力的感召下，他们也愿意尽释前嫌。在热那亚人的要求下，特莱维森组织人力重新开凿、疏通了护城河。许多佩拉的热那亚居民也自发前来相助，正如其总督（Podestà）记载的那样，人们担心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意味着佩拉殖民地的末日。①

84

还有部分战士来自更遥远的国度：加泰罗尼亚租界在其领事佩雷·朱里奥（Pèrè Julia）的动员下也组建了一支部队，甚至一些加泰罗尼亚水手也加入其

---

① Phrantzes, *op. cit.* p. 241; Ducas, *op. cit.* xxxviii, p. 331; Critobulus, *op. cit.* pp. 39-40; Barbaro, *op. cit.* pp. 13-15; leonard of Chios, col. 928; Dolfin, *op. cit.* p. 14; Tetaldi, col. 1821; Montaldo, *Constantinopolitanum Excidium; Slavic Chronicle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ed. Desimoni,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x, p. 334, ed. Jorga, 'Une source negligé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Bulletin Historique de l'Académie Roumaine*, xii, pp. 91-2 (Russian version), and p. 78 (Roumanian version); *Historia Politica Constantinopoleos*, *C.S.H.B.*, pp. 18-19，提供了朱斯提尼亚尼为这种情形，做一场出色演说的情况，参见本书英文版第196页：从佩拉来的志愿守城者。

中。[①] 卡斯蒂亚王国的志愿者中包括著名贵族唐·弗朗西斯科（Don Francisco），他宣称自己具有科穆宁王室血统，因此将拜占庭皇帝视作自己的表亲。[②] 在朱斯提尼亚尼的队伍里包括一名德意志工程师（一说为苏格兰人）约翰内斯·格兰特（Johannes Grant），他不远万里自日耳曼来到地中海东部（即“黎凡特”）加入了保卫拜占庭的队伍。[③] 而自幼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奥斯曼流亡王子奥尔汗，连同其整个家族，也表示愿意为守城尽一份绵薄之力。[④]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朱斯提尼亚尼或米诺托那般英勇，2 月 26 日夜，6 艘克里特船与 1 艘威尼斯船在彼得罗·达万佐（Pietro Davanzo）率领下乘着夜色匆匆逃离君士坦丁堡——船上共搭载 700 名意大利人。此举不仅有违威尼斯人的誓言，也严重削弱了守方实力。不过此后再也无人效仿它们的榜样。[⑤]

至开战前，不计小型舰只及热那亚佩拉殖民地舰队，君士坦丁堡联合舰队共拥有 26 艘舰只。其中，属于威尼斯的 5 艘，热那亚 5 艘，克里特 3 艘，安科纳、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各 1 艘，拜占庭舰只则有 10 艘。多数为大型风帆战舰而非桨划船。[⑥] 这支舰队的规模无法与土耳其相提并论，而陆上兵力可谓更加悬殊。[136]

85

1453 年 3 月下旬，当土耳其大军开始向色雷斯进发时，君士坦丁皇帝秘密安排其国务秘书弗朗茨详细调查全城可作战的男丁数量。调查结果显示，全城能参战的男性希腊居民只有 4983 人（包括修士），外国人则有 2000 左右。对此结果大感沮丧的皇帝严令弗朗茨不得走漏风声，不过其实意大利人对此也心知

---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52-3.

② Phrantzes, *op. cit.* p. 256. 弗朗西斯科自称为阿莱克修斯一世后裔，但我无法查证此说。

③ Phrantzes, *op. cit.* p. 244, 弗朗茨给出德国人的名字为 Johannes; Leonard of Chios, col. 928, 给出他的姓氏为 Grande; Dolfin, p. 14, 将他的姓氏拼写为 Grando。

④ Barbaro, *op. cit.* p. 19.

⑤ Barbaro, *op. cit.* pp. 13-14; Phrantzes, *op. cit.* p. 241, 弗朗茨声称早先已有部分希腊家庭为躲避战火逃离了君士坦丁堡。

⑥ Barbaro, *op. cit.* p. 20; Phrantzes, *op. cit.* p. 238; Dolfin, p. 20.

肚明。[1] 这座拥有 14 英里城墙的伟大城市，此刻用来对抗苏丹超过十万大军（其中 8 万正规军）的兵力，仅仅不足 7000 人。

---

① Phrantzes, *op. cit.* p. 241. Tetaldi, col. 1820，给出的数字为 6000-7000 人（有可能不包括最终参战的修士人数）。leonard of Chios, col. 933（与 Dolfin, p. 22 如出一辙）的数字是希腊人 6000，意大利人 3000（可能包含了佩拉的意大利人）。Tetaldi 指出全城共有 30000 人口（不清楚这个数字是否包括妇女）。按照正常比例，能够动员 5000 精壮男丁通常说明全城约有 40000-50000 人口。Critobulus, *op. cit.* p. 76，他声称战役中共有 4000 居民遇难，50000 居民被俘，不过他的数字有夸张之嫌。

第六章　围城开始

86　复活节对每个东正教徒而言都是个盛大的节日，然而面对1453年复活节（当年4月1日），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心中却难觅喜悦。冬去春来，4月初，市内果园花团锦簇，夜莺又开始在树丛欢唱，鹳鸟则在屋顶筑巢，候鸟的队列划过天际——然而色雷斯苏丹部队的行军却打破了这份祥和与平静。

数日以来，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都在祈祷，希望能够和平地完成圣周（Holy Week）[137]的宗教典礼，他们也确实如愿以偿。4月2日星期一，第一支敌军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守军果敢地发动了一次逆袭，给敌人造成了不少伤亡。不过随着土耳其人越聚越多，拜占庭军队不得不退回城市。君士坦丁下令紧闭城门，摧毁护城河上的吊桥，并在金角湾布下巨型铁链封锁港口。① 铁链一端固定于君士坦丁堡欧根尼乌斯（Eugenius）塔[138]，另一端则位于热那亚佩拉区的加拉塔海墙。这一防御工事还得到了布置于海湾的木质浮桶的辅助——后者由热那亚工程师巴托洛梅奥·索里戈（Bartolomeo Soligo）负责。②

87　4月5日星期四，在苏丹亲自率领下，土耳其全军抵达完毕。起初苏丹在距离城墙大约1.5英里[139]处扎营，第二天却又开拔前移，并进入了最终的攻击阵

---

① Critobulus, *op. cit.* p. 40. Callistus, *Monodia*, *M.P.G.*, clxi, col. 1124.

② Barbaro, *op. cit.* pp. 15-16; leonard of Chios, col. 930; Phrantzes, *op. cit.* p. 238; Ducas, xxxviii, p.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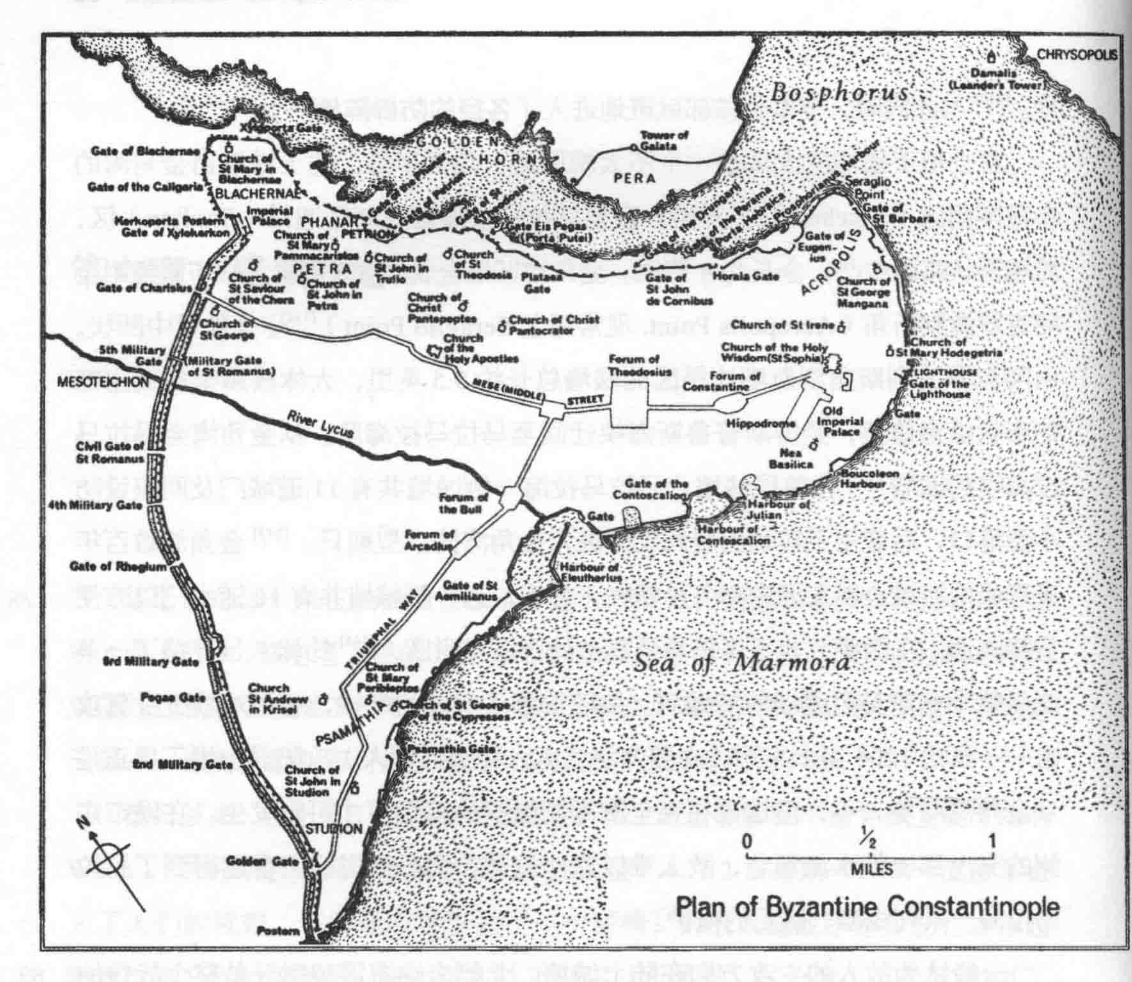
地。[140] 与此同时，守军也按部就班地进入了各自的防御阵地。①

君士坦丁堡城区大体是一个不太规则的三角形半岛。陆上城墙自金角湾的布雷契耐区（Blachernae）开始，直至马拉马拉海边的斯塔迪昂（Studion）区，城墙形状略微中凸，全长约 4 英里。金角湾城墙全长约 3.5 英里，从布雷契耐至阿克罗波利斯角（Acropolis Point, 现常用名 Seraglio Point）[141]，大体呈中凹状。由阿克罗波利斯角到斯塔迪昂区的城墙总长约 5.5 英里，大体按照半岛突出部的形状沿海修建，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迂回至马拉马拉海滨。从金角湾至马拉马拉海峡的城墙 [142] 为单层城墙。马拉马拉海一侧城墙共有 11 道城门及两座设防小型港口，后者用于容纳因逆风无法进入金角湾的小型舰只。[143] 金角湾数百年来形成的海滩上现在已密布各种货栈、仓库，这一侧城墙共有 16 道大门以方便货物流通。在西侧，为了保护易受攻击的布雷契耐区，[144] 约翰六世开凿了一条流经整个布雷契耐城墙的护城河。海墙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它相对较少受到攻击——虽然 1204 年十字军（主要为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正是从金角湾海墙入手，但这需在完全取得制海权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在城市东侧的突出部一带水流湍急，敌人难以靠岸登陆，何况这里的工事还得到了马拉马拉海一系列浅滩、礁石的掩护。

一般认为敌人的主攻方向在陆上城墙。北侧末端布雷契耐区是整个战线的突出部。这里本属城郊，直到 7 世纪方被一座单层城墙纳入市区。它在 9 世纪与 11 世纪得到了两次整修。曼努埃尔一世时期，由于在此修建了皇宫，皇帝大大加强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在城墙的低处一条约翰六世打造的护城河保卫着它，该河始于城外斜坡起点处，随城墙蜿蜒，在右折处与城墙主干交汇，直至金角湾。它共有两道城门，即卡里加利亚门（Caligaria）与布雷契耐门，另外在与赛奥多西城墙（Theodosian Walls）的结合部，还有一座常年关闭的偏门，名叫科克波塔（Kerkoporta）。从这里开始，直至马拉马拉海，矗立着三重的赛奥

89

① Barbaro, *op. cit.* pp. 1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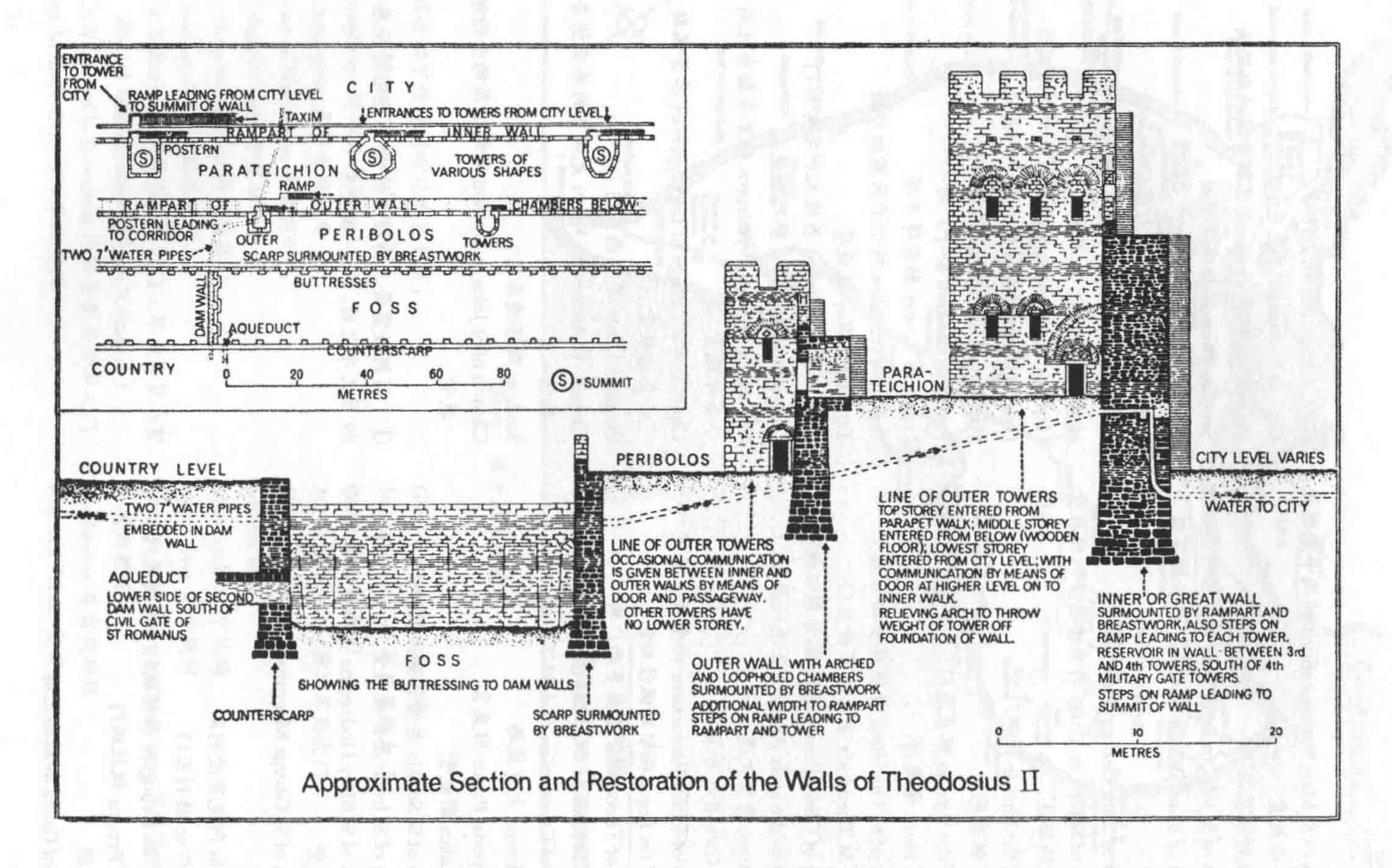


图六　君士坦丁堡地图

88　君士坦丁堡详图对应地名如下：
Sea of Marmora 马拉马拉海
Bosphorus 博斯普鲁斯
Chrysopolis 克利索波利斯
Gate of Blachernae 布雷契耐门
Caligarian Gate 卡里加利亚门
Kerkoporta postern 科克波塔门
Charisian Gate 查瑞休斯门
5th Military Gate 第五军用大门（军用圣罗马努斯之门 Military Gate of Saint Romanus）
Civil Gate of St Romanus 民用圣罗马努斯之门
4th Military Gate 第四军用大门
Gate of Rhegium 雷吉姆门
3th Military Gate 第三军用大门
Pegae Gate 佩格门
2th Military Gate 第二军用大门
Golden Gate 金门
postern 暗门
Mesoteichion 中城墙
Lycus river 莱卡斯河
Church of St Mary in Blachernae 布雷契耐的圣玛丽教堂
Blachernae 布雷契耐区
Imperial Palace 皇宫

Church of St Mary Pammacaristos 帕玛卡里思托斯圣母教堂
Petra 佩特拉区
Church of St John in Petra 佩特拉区圣约翰教堂
Church of Saint Saviour of Chora 科拉神圣救主教堂
Church of Saint George 圣乔治教堂
Church of St John in Trullo 特鲁略区圣约翰教堂
Phanar 帕那区
Gate of the Phanar 帕那门
Petrion 佩崔恩区
Gate of the Petrion 佩崔恩门
Golden Horn 金角湾
Church of St Theodosia 圣赛奥多西亚教堂
Gate of St Theodosia 圣赛奥多西亚门
Church of Christ Pantepoptes 基督见证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圣使徒教堂
Mese Street 梅塞大道
Plataea Gate 普拉蒂亚门
Church of Christ Pantocrator 神圣救主教堂
Gate of Eis Pegas 埃尔斯佩佳斯门
Forum of Theodosius 赛奥多西广场
Gate of St John de Cornibus 圣约翰门
Forum of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广场
Hippodrome 大竞技场
Old Imperial Palace 旧皇宫
Nea Basilica 新教堂
Church of St Sophia 圣索菲亚大教堂
Church of St Irene 圣伊琳教堂
Church of St Mary Hodegetria 圣玛丽 赫得戈利亚教堂
Church of St George Mangana 马格纳区圣乔治教堂
Acropolis 阿克罗波利斯
Horaia Gate 赫利亚门
Gate of the Drungarli 壮格瑞门（军团长门）
Gate of Perama 佩拉玛门
Pera 佩拉
Tower of Galata 加拉塔之塔
Gate of Eugenius 犹金门
Gate of St Barbara 圣芭芭拉门
Prosphorianus Harbour 普洛斯费瑞纳斯码头
Seraglio Point 瑟拉格里奥角
Lighthouse 灯塔
Gate of the Lighthouse 灯塔门
Boucoleon Harbour 布科里昂码头
Harbour of Julian 朱里安码头
Harbour of Contoscalion 康托斯卡利昂码头
Gate of Contoscalion 康托斯卡利昂门
Harbour of Eleutherius 义禄码头
Forum of the Bull 公牛广场
Leander's Tower 勒安得耳塔
Forum of Arcadius 阿尔卡狄奥斯广场
Triumphal Way 凯旋路
Gate of St Aemilianus 圣埃米利安努斯门
Gate of St Aemilianus 萨玛西亚区
Church of St Mary Peribleptos 佩里布勒布托斯圣母教堂
Church of St George of the Cypresses 赛普瑞斯圣乔治教堂
Psamathia Gate 萨玛西亚门
Church St Andrew in Krisei 克瑞希的圣安德鲁教堂
Studion 斯塔迪昂区
Church of St John in Studion 斯塔迪昂的圣约翰教堂

① 因拼版需要，将原书的 88 页地图排在原 89 页文字之后。——编者注



Approximate S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odosius II

90 图七 赛奥多西城墙。（注意原图中错误地标注了内外城台的名称，参见书后译注 [148]。——译注）

多西城墙，由安提莫斯（Anthemius）[145] 在赛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督造。墙外是宽达 60 英尺 [146] 的壕沟（护城河），如有必要可立即成为一片汪洋。护城河内侧还有一道带有雉堞的胸墙，在它与城墙之间保有一条宽达 40–50 英尺的平地，也被称作“外城台”。接下来是外墙，高度约 25 英尺，每隔 55 至 100 码建有方形城楼。[147] 外墙之后亦有一块 40-60 英尺宽的“内城台”。[148] 这之后是内城墙，高度约 40 英尺，其间修建有高达 60 英尺的方形或八角形城楼，它们正好位于外墙城楼的间隙，与之遥相呼应。[149] 城墙之间分布着若干城门，部分用于日常使用，部分则属于军事用途。在城墙最南端马拉马拉海一侧有一座小型偏门，而它的北面是著名的“金门”（the Golden Gate）。金门也被称作第一军用城门，过去常常是皇帝得胜回朝举行凯旋入城的首选通道。继续往北，接下来是第二军用城门，以及民用的佩格（Pēgē, Pegae）门 [150]，它现代的土耳其名为塞利维亚（Silivri 或 Silivria）门。随后是第三军用大门、雷吉姆（Rhegiums）门、第四军用大门。邻接的圣罗马努斯之门（Gate of St. Romanus）[151] 地势最高。随后在莱卡斯（Lycus）河谷一带，地势骤降 100 英尺，河流经排水管通过城墙。在它 200 码以北，坐落着位于河床之上的第五军用大门，它也被希腊人称作圣基里亚科（St. Kyriake）门。[152] 不过看上去有时候它也被称作军用圣罗马努斯之门，记载这次围攻的史家常常犯将其与民用圣罗马努斯之门混淆的错误。从此开始，地势再次升高并形成一个小丘，[153] 山顶矗立着查瑞休斯门（Gate of Charisius,the Charisian Gate），今天被土耳其人称作阿德里安堡门（Adrianople Gate）。[154] 莱卡斯河穿越的这一段城墙被称作“中城墙”（Mesoteichion），它是整个赛奥多西城墙最薄弱之处。[155] 查瑞休斯门有时也被称作 Polyandrion 门，沿着高地，城墙继续往北扩展，最后通过米瑞恩迪翁（Myriandrion，亦称 Xylokerkon）门与布雷契耐区连接。①

① 迄今关于君士坦丁堡城墙最完整最权威的著作，参见：Alexander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不过我完全认同皮尔斯的观点，即围攻资料中提及的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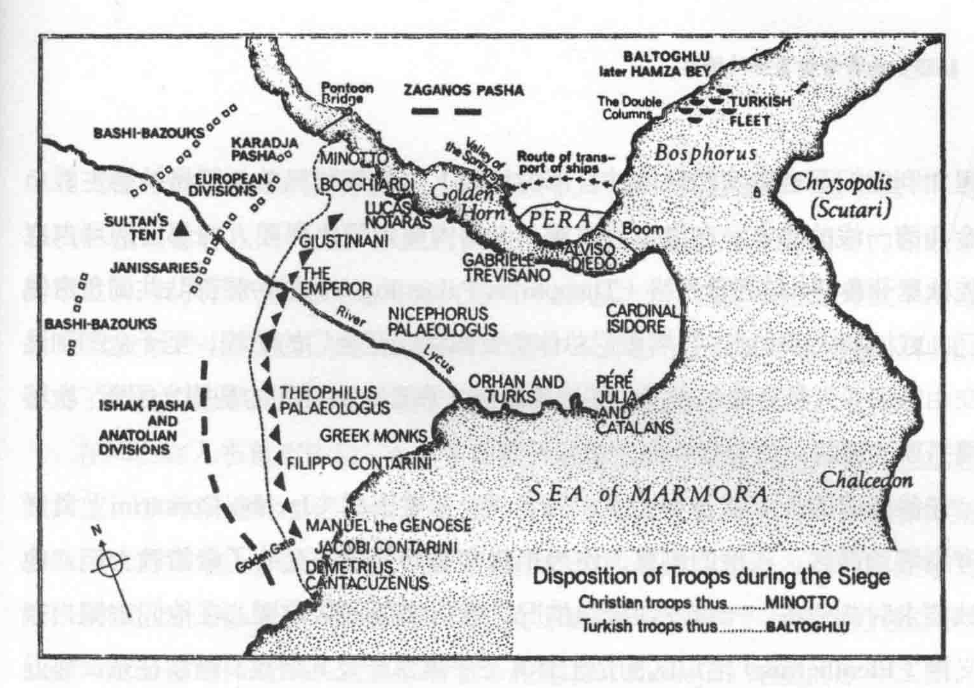
在1422年穆拉德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拜占庭将士集中兵力守卫外墙，并成功地击退了来敌。朱斯提尼亚尼与皇帝鉴于兵力捉襟见肘，认为这不失为守城良策。内墙虽然几乎无人可守，不过尚能利用其塔楼发射武器。1422年城墙受到的破坏在此后若干年中大部分得到了修复，朱斯提尼亚尼亲自监工，进一步确保了外墙固若金汤。莱昂纳德总主教历来以战略家自居，此时却开始大唱反调。他认为理应重点守卫内墙。同时，带着对希腊人的恶意，他补充说，内墙的修缮毫无进展，是因为建设资金被两名希腊人——亚加鲁斯（Jagarus）与利奥菲图斯修士（Neophytus）贪污的缘故。这是一项巨大的诽谤中伤：亚加鲁斯（其真名应为 Manuel Palaeologus Iagrus）是拜占庭皇族和受人敬仰的政治家，他为城墙的修复立下了汗马功劳。利奥菲图斯则是一名得道的神父，他亦是皇帝的好友，拒统派代表人物，此时已不问世事，隐居恰尔斯亚尼茨修道院（Charsianites monastery）中——他自然不可能破坏什么城墙修复任务。但是对莱昂纳德而言，偏见蒙住了他的眼睛，他认为拒统派神父自然是无恶不作的。[②]

92

4月5日，守军按照皇帝的分配已各就各位。君士坦丁率领希腊精兵亲自防守莱卡斯河流经的"中城墙"，朱斯提尼亚尼位于他的右翼，负责查瑞休斯门及米瑞恩迪翁。不过当形势表明"中城墙"为苏丹主攻方向后，朱斯提尼亚尼率领部队与皇帝合兵一处，查瑞休斯门交给了博基阿尔迪兄弟及其士兵守卫。威尼斯大使米诺托与手下负责守卫布雷契耐区的皇宫，之前他们还清理了墙外的护城河。他年龄稍长的同胞特奥多罗·卡里斯托（Teodoro Caristo），率部守卫

圣罗马努斯之门应该就是第五军用大门。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其古名 Pempton 自7世纪后便不再出现，围攻资料也不使用其另一名字基里亚科。它是莱卡斯河谷附近的唯一城门，而最激烈的战斗正发生于此处。显然，当时人们采用军用罗马努斯之门来称呼它，甚至同时期的作者笔下罗马努斯之门默认便指此门而非位于南部小丘的民用罗马努斯之门（今称托卡比门）。其次可参考：Pears,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pp. 429-435.

② Leonard of Chios, col. 936;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84. 关于1422年以来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历次维修，参见：Alexander Van Millingen, *op. cit.* pp.104-8, 126. Phrantzes, *op. cit.* p. 225. 弗朗茨在书中对利奥菲图斯的忠诚评价甚高。



图八　围城期间双方军队部署情况

Zaganos Pasha 扎加诺斯帕夏
Pontoon Bridge 浮桥
Baltoghlu 巴尔托古鲁，稍后为哈姆扎贝伊 Hamza Bey
Double Columns 双圆柱
Turkish Fleet 土耳其舰队
Bosphorus 博斯普鲁斯
Chrysopolis 克利索波利斯
Valley of the Springs 春天河谷
Route of the transport of ships 运送船只路线
Boom 海链
Golden Horn 金角湾
Pera 佩拉
Alviso Diedo 阿维索·狄多
Minotto 米诺托
Bocchiardo 博基阿尔多
Lucas Notaras 卢卡斯·诺塔拉斯
Giustiniani 朱斯提尼亚尼
the Emperor 皇帝
Nicephorus Palaeologus 尼科弗鲁斯·帕列奥列格
Gabriele Trevisano 加布里·特莱维森
Isidore 伊斯多尔主教
Péré Julia 佩雷·朱里奥
Orhan and Turks 奥尔汗与土耳其人
Lycus river 莱卡斯河
Theophilus Palaeologus 狄奥菲鲁斯·帕列奥列格
Greek Monks 希腊修道士
Filippo Contarini 菲利波·孔塔里尼
Manuel the Genoese 热那亚的曼努埃尔
Jacob Contarini 雅各博·孔塔里尼
Demetrius Cantacuzenus 德米图斯·坎塔库震努斯
Golden Gate 金门
Karadja Pasha 卡拉德贯帕夏
European Divisions 欧洲军团
Bashi-Bazouk 巴希巴祖克
Sultan's Tent 苏丹的营帐
Janissary 土耳其新军
Ishak Pasha 伊萨克帕夏
Anatolian Divisions 安纳托利亚军团
Sea of Marmora 马拉马拉海
Chalcedon 卡尔西顿

卡里加利亚门至赛奥多西城墙结合部的地段。兰加斯科兄弟与莱昂纳德主教负责金角湾一线的防守。在皇帝的左翼，卡塔内奥带领热那亚人与邻近的拜占庭皇族狄奥菲鲁斯·帕列奥列格（Theophilus Palaeologus）的希腊部队共同负责佩格门。威尼斯人菲利波·孔塔里尼总体负责佩格门至金门的防线，至于金门则具体交由热那亚人曼努埃尔守卫。在他的左侧，靠近大海驻扎的是德米图斯·坎塔库震努斯的部队。

93 守备海墙的人手就少得多了。雅各博·孔塔里尼（Jacobo Contarini）负责防守斯塔迪昂区，在他的侧翼，作为相对安全的地段，交给了希腊教士们，他们被要求时刻戒备，一旦发现紧急情况，就召唤后备队增援。在他们东侧，守卫义禄（Eleutherius）港口区的是土耳其王子奥尔汗及其亲兵。继续往东，邻近马拉马拉海海岸的大竞技场及旧皇宫，交给了佩雷·朱里奥领导的加泰罗尼亚人守卫。在他们北侧，负责守卫阿克罗波利斯角的是教皇特使伊斯多尔及 200 名士兵。金角湾海岸由加布里·特莱维森麾下的威尼斯、热那亚水兵负责，而临近海域则由他的同胞阿维索·狄多及其舰队把守。城中还保留了两支预备队。一支由拜占庭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率领，驻扎在佩特拉（Petra）区城墙之后，并 94 得到了机动火炮的支援。另一支由王族尼科弗鲁斯·帕列奥列格（Nicephorus Palaeologus）带领驻扎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高地。在金角湾的铁链附近共有 10 艘战舰严阵以待，5 艘属于热那亚，3 艘克里特，1 艘来自安科纳，1 艘属于希腊，它们的指挥权很可能交给了热那亚人索里戈（他负责布置了海上工事）——既然金角湾的海链一端固定于热那亚佩拉大区，那么安排一位与热那亚关系密切的人士负责此处防务就显得尤其必要。大体上，皇帝的排兵布阵体现出将城内希腊、威尼斯、热那亚等各国军队混合编制的倾向，此举可以令将士们同舟共济，避免因国籍、民族分别而造成的不睦。[①]

---

① Barbaro, *op. cit.* pp. 16-19; leonard of Chios, col. 934-5; Phrantzes, *op. cit.* pp. 252-6. 上述几种版本的文献对于拜占庭方面军队部署记载大致相同。而关于奥尔汗王子的部署

为了守城，士兵们充分装备了各种投枪、弓箭，甚至还有一些手铳[156]与投石机。城中也有几门火炮，不过它们的价值相当有限。首先是硝石的短缺（弹药不足），其次，人们发现如果将火炮置于城墙之上（这是攻击城外敌军所必需的），其发射产生的后坐力对城墙破坏严重。不过部分士兵（主要是意大利佣兵）装备了精良的铠甲，这一点远强于绝大多数土耳其对手。②

在拜占庭人布置完毕后，4 月 6 日晨，城墙上的守军发现土耳其人也已经各就其位。苏丹派遣扎加诺斯帕夏率领一支大军部署在金角湾北岸，毗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高地上，以便监视并威慑佩拉的热那亚人。为此人们特意在海角前端松软的土地上修筑了一条道路，以便扎加诺斯可迅速与土耳其主力建立联系。从金角湾至查瑞休斯门，这里部署着卡拉德贾（Karadja）帕夏的欧洲军团，他们配有一些重炮用以攻击单层的布雷契耐城墙，尤其是它与赛奥多西城墙脆弱的结合部。莱卡斯河以南直至马拉马拉海一线由伊萨克帕夏及安纳托利亚军团负责，不过由于苏丹对他不完全信任，故指派马哈茂德（Mahmud）帕夏为他的副将。后者出身拜占庭安盖利（Angeli）[157]王族，兼有希腊与斯拉夫血统，此时早已皈依伊斯兰教，并成为了苏丹的密友与顾问。[158]苏丹本人则率军于莱卡斯河一带列阵，正对君士坦丁堡"中城墙"。苏丹金红色的营帐位于城墙外约四分之一英里处，前方是他的土耳其新军及其余精锐部队。苏丹营中也拥有最好的大炮，包括重型的"乌尔班大炮"。[159]至于大量的非正规军（主要是 Bashi-bazouks），则零散地在主力后方布阵，随时准备提供增援。沿着整座城墙，土耳其人还开凿了一条堑壕，并修建土垒作为掩护，在工事上方他们建有木质栅栏，并预留了足够的间隙作为进出通道。③

95

位置，仅有巴尔巴罗有所提及。Pusculus, pp. 64-5, 以及 Dolfin, pp. 23-4, 其记载的布阵情况略有出入，不过他们的著作乃是凭借记忆完成于战役结束多年之后，可信度与之前三部文献不可相提并论。

② Pears, *op. cit.* pp. 250-2.

③ Critobulus, *op. cit.* pp. 41-2; Tetaldi, col, 1822. 土耳其文献方面缺乏关于奥斯曼军队部署的详

巴尔托古鲁（Baltoghlu）领导的土耳其海军舰队，其使命之一为封锁港湾，从而令城市无法得到海上补给——于是舰只日夜巡逻，并拦截一切企图靠岸的船只。不过他更重要的任务还是突破金角湾的铁链防线。巴尔托古鲁将指挥部设在博斯普鲁斯港口“双圆柱”（Double Columns）附近，其旧址今天已成为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 Bahçe Palace）[160]。围攻开始后10天，他还得到了10艘装备重炮，自安纳托利亚北部港口开来的战舰增援。②

一旦目睹土耳其人准备就绪，君士坦丁皇帝便建议特莱维森率领其麾下水手（约有千人之众）身着威尼斯传统服装前往君士坦丁堡城墙做一次特殊的“游行”，目的是向苏丹表明城内威尼斯人与拜占庭人齐心协力，共同御敌——威尼斯人爽快地应允了。③另一方面，穆罕默德二世按照伊斯兰传统律法的要求，在正式开战前派出了和平使节进行劝降，声称只要交出城市，可以保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如果负隅顽抗，则必将生灵涂炭。拜占庭人拒绝了苏丹的要求，他们既不相信土耳其人的诚意，也不愿意背弃自己的皇帝。④

96

劝降的手续一经结束，且炮兵布置就位，土耳其人就开始了猛烈炮击。至围攻第一日黄昏（1453年4月6日），查瑞休斯门一段城墙遭到了严重破坏，第二天在进一步持续的炮轰后，它几乎就要分崩离析了。不过每当入夜后，守军便迅速动员起来，大体修复了城墙。穆罕默德决定在积攒更多大炮前暂缓炮轰。不过他同时命令士兵们填充护城河，以便当炮兵在城墙上取得战果后步兵可立即发起突击。此外他还命令坑道兵选择适当地形挖掘地道破坏城防。与此同时，舰队司令巴尔托古鲁也奉命对金角湾的防御进行了试探进攻。首次攻击大约发

细记载，除了埃夫利亚·切列比（Evliya Chelebi）两个世纪后完成的一部充满想象、极不可靠的史书。

② Critobulus, *op. cit.* p. 42; Phrantzes, *op. cit.* p. 240; Barbaro, op. cit. p. 21. 在一份布恩德蒙特（Buondelmonte）作于1422年的君士坦丁堡城市地图上，“双圆柱”横跨位于塔克西姆与马奇卡之间的河流，大体坐落在今天多尔玛巴赫切宫西南处。

③ Barbaro, *op. cit.* pp. 19-20.

④ Critobulus, *op. cit.* pp. 40-1.

生于4月9日，不过被拜占庭人击退了。于是巴尔托古鲁也决定在黑海的分舰队到来前暂时按兵不动。①

在等待期间，苏丹统领部分精兵与火炮，攻击了孤悬君士坦丁堡城外的两座拜占庭小型要塞。一座位于瑟拉比亚（Therapia）[161]区，修建在博斯普鲁斯某一小山之上；另一座邻近马拉马拉海滨，位于斯图迪斯（Studius）村附近。瑟拉比亚区的城堡抵抗了两天，随后城墙被炮弹摧毁，大批守军被屠杀。最后被俘的约40名拜占庭人也被苏丹处以穿刺之刑。另一个规模较小的堡垒只坚持了数小时，残存的36名俘虏同样遭穿刺而死。这些刑罚是在城墙守军众目睽睽下进行的，苏丹希望以此杀一儆百。与此同时，苏丹也派遣巴尔托古鲁的舰队去占领马拉马拉海上的王子群岛。他们仅在主岛（Prinkipo）遭到了些许抵抗。在该岛一建于山顶的修道院，矗立着一座坚固高塔，它应该是修道士们用来防御海盗的（大约建于加泰罗尼亚军团叛乱时期）。大约30人凭此抵抗，拒绝投降。巴尔托古鲁首先尝试炮击，不过炮弹对这座石砌建筑伤害不大；于是他改为火攻。在高塔下点燃大堆加入了硫黄的柴木后，守军终于坚持不住——一部分被烧死，一部分被俘虏。俘虏们同样被处决了。巴尔托古鲁随后集中了群岛全体居民，并将他们贩卖为奴，作为对其抵抗的惩罚。②

97

4月11日，苏丹回到了他位于城墙之前的营帐，重型火炮按照他的喜好重新布置完毕。第二天，城外再次响起了隆隆炮声，这场单调的炮击至此几乎持续整整六周。不过这些大炮是很笨拙的。要维持它们在炮架上的稳定殊为不易，4月的雨水也经常令其滑落至淤泥中。最重型的火炮，如乌尔班大炮，由于装填缓慢，一天只能发射7次。当然这7发炮弹造成的破坏也相当可观。炮弹伴随着浓烟，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击碎了城墙，巨型砌石也难以阻挡。守军也曾尝试通过在城墙悬挂皮革及装填羊毛的袋子以期降低炮击的破坏，不过效果

① Barbaro, *op. cit.* pp. 18-20.

② Critobulus, *op. cit.* pp. 47-8.

只能说差强人意。不到一周的时间，位于莱卡斯河一带外城墙的多个地段已遭到几乎彻底的摧毁，同时护城河也基本被填满。至此，修复城墙的任务显得越发困难了。尽管如此，朱斯提尼亚尼与部下还是设法修建了一道栅栏。每当入夜，城中不论男女老幼，居民们携带木板、木桶及泥土等材料赶来，投入施工当中——栅栏主要以木料构成，其中点缀以装满泥土的木桶，后者实际上扮演了雉堞的角色。虽然这道栅栏本身是脆弱甚至摇摇欲坠的，不过还是多少为守卫者提供了一层防护。①

98

不过，海上防线的情势要令人欣慰许多。4 月 12 日，在得到黑海开来的援军后，巴尔托古鲁率军驶向金角湾的铁链。当他的舰只接近停泊在铁链附近的基督教船只后，弓箭手随即洒出一阵箭雨，舰炮也发出轰鸣，当双方进一步靠拢后，土耳其人便开始向敌军投掷燃木，并抛出铁索与梯子试图登船接战——但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对重型的基督教船只而言，炮弹的威力如同隔靴搔痒，并且它们得到了拜占庭海军司令诺塔拉斯的及时增援。拜占庭联军组织井井有条，一旦舰只起火便迅速被手持水桶的“消防队”扑灭；而基督徒从高耸的桅斗（crow’s nest, crows-nest）[162] 发射的箭矢、投枪比土耳其人的有效得多，他们的投石机也制造了巨大的破坏。受初战告捷的鼓舞并且自忖航海技术远优于土耳其人，基督教舰队甚至主动打开铁链发起了一次逆袭，目睹此景巴尔托古鲁不得不鸣金收兵，退回了“双圆柱”。②

这场失败令苏丹颜面尽失。思维敏捷的穆罕默德意识到要对抗高大的基督教舰只，必须调整火炮瞄准方式。于是他下令铸造厂改变火炮的设计。计算火炮的弹道是有难度的，不过很快工程师们交出了让苏丹满意的答卷。一门弹道

---

① Barbaro, *op. cit.* p. 21; Critobulus, *op. cit.* pp. 48-9; Phrantzes, *op. cit.* pp. 238-9; Ducas, *op. cit.* xxxviii, p. 339;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86-7.

② Barbaro, *op. cit.* pp. 21-2; Critobulus, *op. cit.* pp. 50-1. 书中注明了第一次对城墙攻击后此番遭遇战的日期。确切日期是由巴尔巴罗提供的。克里托布拉斯似乎将本次对海链的突击与 4 月 18 日巴尔托古鲁较小规模的袭击混淆了。

经过改良的大炮被放置于加拉塔湾（Galata Point），并开始轰击冲出铁链的敌军舰队。第一发炮弹未能命中，然而第二发准确击中了1艘帆船并令其沉没，造成了惨重伤亡。基督教船只不得不退回金角湾铁链之后，在那里它们尚能得到热那亚佩拉区的庇护。

不过陆战的局面还是令苏丹感到欣慰的。在计算过陆墙的损坏程度后，他自忖可以不待海上的突破便足以发起总攻。4月18日，日出两小时后，苏丹下令对“中城墙”展开突击。随着战鼓与铙钹的合奏，土耳其轻重步兵，包括精锐新军，发出山呼海啸，迎着晨光，越过护城河向栅栏扑去。他们用携带的火把点燃了栅栏，并用长矛上的镰钩清除了悬挂其上的木桶。其中一些人还携带了梯子试图爬上尚且完好的城墙。战局一片混乱。在土耳其发动总攻的狭窄地段，其兵力上的巨大优势被削弱了，而基督教士兵甲胄上的优势令他们与敌人作战时能够置生死于度外。负责指挥的朱斯提尼亚尼被证明无愧这份职务。无论意大利人，还是拜占庭人，均被他的骁勇无畏所激励，齐心协力与之并肩战斗。皇帝本人并不在此处。由于担心这是土耳其人发动的全线攻击，他马不停蹄，四处巡视战场防务，并激励大家的士气。 99

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土耳其人最终撤退了。根据威尼斯人巴尔巴罗（Barbaro）的日记记载，土耳其方面阵亡了约200人，而基督徒方面则无一死亡。[①]

奥斯曼人首次突击城墙受挫，及稍后传来海上的失利，给予了守城者新的信心。虽然炮击还在无情地持续，不过守军以高昂士气迅速加以了修复。如果外援及时赶到，这座城市似乎是还是能够转危为安的。

两天后，新的希望果然到来了。

① Barbaro, *op. cit.* p. 23; Critobulus, *op. cit.* pp. 49-50.

第七章　金角湾失守

一

100

四月的最初两周，君士坦丁堡附近一直刮着北风，教皇派出的 3 艘满载士兵与粮食的热那亚船只也因此滞留在希俄斯岛动弹不得。然而 4 月 15 日，风向突然转北，这支小型舰队抓住时机，立即扬帆驶向达达尼尔海峡。在海峡入口，它们意外地与 1 艘拜占庭皇帝早先派往西西里采购粮食的运输舰相遇［船长名为费拉塔勒拉斯（Phlatanelas）］，后者满载谷物加入了热那亚人的队列。由于土耳其人将全部海军力量置于君士坦丁堡一带用于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居然门户大开，毫无戒备。4 艘船借机迅速驶入了马拉马拉海。4 月 20 日星期五清晨，君士坦丁堡海墙的守军发现了它们，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将此消息飞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跃身上马，来到舰队司令巴尔托古鲁驻地（即“双圆柱”）坐镇指挥。后者被要求俘获或击沉这 4 艘舰只——万不可让它们抵达被围困的拜占庭首都。苏丹甚至威胁道：如果这次任务失败，就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

巴尔托古鲁立即着手准备。考虑到风向朝北，他放弃了使用纯风帆战舰的打算，[163] 改用剩余的全部划桨战船。苏丹也特意派遣的自己的精锐士兵登舰助战。土耳其的战船中，一些装备了火炮，另一些则装备了精良的护甲。大约两三个小时后，只见千桨并进，这支庞大的舰队出发，前去捕获它可怜的牺牲品。在战鼓与喇叭的奏鸣中，土耳其人怀着必胜的信心向基督教舰队靠近。这时，君士坦丁堡城中，没有守城任务的市民们，纷纷聚集到阿克罗波利斯角的斜坡

101

上或大竞技场的顶端，驻足观望，焦灼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苏丹与其随员则来到佩拉区附近的博斯普鲁斯海岸一带观战。

下午早些时候，当土耳其舰队追上基督教舰队时，后者已经驶过了君士坦丁堡东南角。巴尔托古鲁在其三桡旗舰上高声命令热那亚人降帆投降，而基督徒们置若罔闻，继续前行。于是土耳其舰队试图包围他们。此时的海面波涛汹涌，劲风大作。在这样的天气下，操作三桡或二桡战船显得尤其困难。何况基督教船只在吨位上占据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从甲板、船头、船尾、桅斗，基督教水手们居高临下向土耳其人倾泻着阵阵箭雨，或标枪投石；而土耳其人只能寄希望于发起接舷战或点燃敌船。[164] 在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基督教船只继续航行，并不断挫败土耳其人的阻挠。然而，当他们已经抵达阿克罗波利斯角附近时，突然，风停了，4 艘船的船帆无力地低垂着。雪上加霜的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南的一支海流撞到了海角，向北回流（这种情况在南风兴起的时候尤为明显）。在眼见君士坦丁堡城墙几乎触手可及之后，这支舰队无奈地向苏丹观战的海岸漂去。

此刻，对巴尔托古鲁而言，俘获敌舰似乎唾手可得。他注意到如果距离过近，基督徒的火力会给予他的舰只重大杀伤，因此他指挥船队围住敌舰，并保持一定距离，通过不断发射炮弹及火矛削弱对手，然后再尝试靠拢近战。他的努力失败了。他的轻型火炮缺乏足够威力，而火攻的成果也迅速地被经验丰富的基督教船员扑灭。于是他下令接舷。土耳其海军司令选择的对手是体积最大但武装相对薄弱的拜占庭舰只，他的旗舰以船头撞击敌舰尾部，同时其他土耳其舰只则蜂拥而至，抛出抓钩试图钩住锚链。与此同时，5 艘三桡战船对付 1 艘热那亚船只，30 艘大艇包围了另 1 艘，第 3 艘则要面对 40 艘满载士兵的运输舰。远观的人群难以描述混乱的战局。基督教船只训练有素——热那亚人身披重甲，面对火灾能迅速用水桶扑灭，迎接企图登船的敌人则有他们锋利的战斧。拜占庭的运输舰虽然并不适合作战，但也装备了一桶桶“希腊火”（Greek fire）[165]，在过去 800 年中，这一神兵利器一次次在海战中为帝国带来了胜利。

102

本次战斗中，希腊火也发挥了极佳作用。土耳其船只则受到划桨的拖累，各船的长桨时常纠缠在一起，同时被敌人居高临下的射击所重创。不过土耳其军舰却能前仆后继，死战不退。

拜占庭运输舰附近的战斗最为惨烈。巴尔托古鲁绝不会放弃这到手的猎物。他的部下一波波地涌向运输船企图登舰，却一次次被船长费拉塔勒拉斯及其船员所击退。但她[166]开始饱尝弹药短缺之苦。热那亚人虽然有些自顾不暇，但还是注意到了拜占庭人的困境。他们果断起锚向拜占庭舰只靠拢，并排为一列。于是在观战的人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座拥有四座塔楼的城堡，成为混乱的土耳其舰队所面临的铜墙铁壁。

整个下午，君士坦丁堡市民们焦灼地在城墙与塔楼上翘首企盼，而另一方观战的苏丹也同样坐立不安。他不断高声对士兵鼓励着、诅咒着，徒劳地对巴尔托古鲁下达着各种指示（后者佯装没有听见）；苏丹虽然重视海权，但对航海技术其实一无所知。心急如焚的穆罕默德甚至纵马跃入浅滩，仿佛要亲自投入战斗，直至其长袍被海水浸湿方有所觉察。

103

随着夜幕邻近，看上去基督教舰只似乎已独木难支。它们的船身伤痕累累，而土耳其的新生力量仍不断发起攻击。当太阳西沉时，突然，起风了，恰恰是基督徒急需的北风！原本松弛的船帆再次蓬鼓了起来，基督教船只遂从土耳其军舰中杀开一条血路，向金角湾海链前进。黑暗中巴尔托古鲁已无力再重整其舰队，虽然苏丹仍然咆哮着向他发布命令甚至诅咒，海军司令还是决定率军撤回“双圆柱”。此时拜占庭人打开了海链，在高昂的军号声鼓舞之下，特莱维森领导的 3 艘威尼斯战舰主动出击，其声势令土耳其人误以为金角湾内所有舰队都出动了，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的阵势。而激战中全身而退的 4 艘船只则在护卫下安全驶入了金角湾。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胜利。欣喜若狂的基督徒们宣称击毙了 10000-12000 名土耳其人，而己方无一损失（只是随后几天有两三人死于伤患）。不过客观地估计，土耳其方面阵亡略超过 100 人，受伤则超过 300；基督徒方面，阵亡 23 人，约半数船员挂彩。但无论如何，这些船只带来了急需的人手、武器和补给，并

且展示了基督徒高超的航海技艺。[①]

苏丹不禁龙颜大怒——虽然实际的损失并不大，但这份耻辱及对土耳其军士气的打击却是可观的。一位军中回教高僧阿克·施姆瑟丁（Sheikh Ak Shemseddin）写信批评苏丹判断失据，威信尽失，并严厉告诫他需惩处责任人，以免类似灾难在陆战中重演。[②]第二天穆罕默德传唤了巴尔托古鲁，当众斥责他为一名叛徒、懦夫和愚人，并下令将他斩首示众。倒霉的巴尔托古鲁此时眼部已然重伤（混战中被己方投石击中），幸亏得到了下属竭力陈情，证明他作战顽强英勇，这才保住了性命。但他被剥夺了舰队司令与加里波利总督的职务（后者由苏丹的大臣哈姆扎帕夏接任），并且全部财产被没收，转赠予新军将士。此人被杖责后得到了释放，在穷极潦倒、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余生。[③] 104

自首次突袭拜占庭海上防线失败起，苏丹就在忖量如何能控制金角湾。最近的惨败促使他立即行动起来。4 月 20 日海战正酣时，陆上的炮击也并未停歇。第二日的炮轰甚至更强于以往，以致莱卡斯河谷附近一座著名城楼（Bactatinian）轰然倒塌，同时其下方的外城墙也遭到了摧毁。看上去土耳其人又要发动一次总攻击了，守军不由得严阵以待；然而总攻的命令实际上并未发出。入夜后，破损的城墙再次得到了梁木与盛土木桶的修复。[④]

其实，这一天苏丹将时光花在了双圆柱。他的机智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海上困局的方案——很可能是其意大利顾问提醒他通过陆路也可以运送船只。威尼斯人在最近一次伦巴第战役（1438 年）中，曾经利用放置滑轮的平台将整支 105

---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47-250; Critobulus, *op. cit.* pp. 52-5; Ducas, *op. cit.* xxxviii, p.335;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89-390; Barbaro, *op. cit.* pp. 23-6; leonard of Chios, col. 930-1; Dolfin, *op. cit.* pp. 17-18; Pusculus, *op. cit.* pp. 68-9. 关于舰只数量，达卡斯认为共计 4 艘热那亚船与 1 艘拜占庭舰船，Chalcocondylas 则认为热那亚、拜占庭舰只各 1 艘，不过多数见证人认为应该是 3 艘热那亚船与 1 艘拜占庭战船。

② 关于这封信件及土耳其人的反应，参见：Inalcîk, 'Mehmed the Conqueror', *Speculum*, xxxv, pp. 411-2 and *Fateh Devri*, p. 217.

③ Barbaro, *op. cit.* p. 26; Critobulus, *op. cit.* p. 55; Ducas, *op. cit.* xxxviii. p. 336.

④ Barbaro, *op. cit.* p. 26; Phrantzes, *op. cit.* pp. 246-7; leonard of Chios, col. 931.

舰队经陆路由坡河（River Po）运至加尔达湖（Lake Garda）。不过当时的地形较为平坦，而如果要将船只从博斯普鲁斯运到金角湾，需要跨越海拔 200 英尺的小山，这将是一个挑战。不过足够人力、物力对苏丹而言并非难题。早在围攻之初，土耳其工程师便已经开凿了一条通路。它从托普哈内（Tophane）区穿过山谷直达今天的塔克西姆（Takrim）广场，然后向左顺势而下经过现今的英国大使馆进入金角湾［拜占庭人把这里称作“春天河谷”（Valley of the Springs），现在被命名为 Kasimpaşa］。于金角湾拜占庭水手或热那亚人看来，这不过是用于方便与双圆柱的海军基地联络，此时却派上了别的用场。土耳其人收集大量木料制造承载船只的带轮托架以及某种运输滑轨，金属滑轮也被铺放，成队的公牛亦准备完毕。同时一些大炮被布置于春天河谷。

4 月 21 日，上述工作大大加快了。当数千工匠与劳工忙于最后准备时，苏丹则下令佩拉居留区后的大炮持续射击，从而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并且炮击产生的浓烟对其秘密行动也是很好的掩护。甚至有一些炮弹故意地“误炸”了佩拉的城墙，佩拉居民匆忙避开这一片是非之地，自然也无暇窥探土耳其军队的动向了。

4 月 22 日星期天，当天际露出第一缕曙光时，这一支奇怪的舰队出发了。人们首先将圆木捆绑于海上的船只底部，随后由大队公牛拖拽这些滑轮将船只

106 牵拉上岸，在某些陡峭或困难的地段它们还得到了人力的辅助。桨手们则端坐于自己的位置，按照左右逡巡的长官给予的节奏，整齐地在空气中划动长桨，风帆也一如既往地升起，如同舰队正畅游于海上。舰队通过陆地时，只见战旗飘扬，鼓乐喧天，简直恰似一场狂欢。1 艘小船在前方开路，一旦它成功翻越第一处斜坡，后方大约 70 艘各型战舰也纷纷鱼贯而入。[①]

---

① Barbaro, *op. cit.* pp. 27-8; Phrantzes, *op. cit.* pp. 250-2; Critobulus, *op. cit.* pp. 55-6; leonard of Chios, col. 930（他指责是威尼斯人向苏丹进献了此计）; Tetaldi, col. 1820-1; Pusculus, *op. cit.* pp. 69-70; Dolfin, *op. cit.* p. 16; ‘The Polish Janissary’, chap, xxiv; Ashikpashazade, p. 198; Saad e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Gibb, pp. 20-1.

当天上午，金角湾的基督教水手及城墙哨兵终于发现了土耳其海军的异动，一艘艘敌方舰只从春天河谷一带滑入了金角湾。城中居民不免如五雷轰顶。君士坦丁十一世、威尼斯大使米诺托、朱斯提尼亚尼及全体威尼斯舰长在敌军最后一艘战舰就位前召开了紧急会商，其中只有朱斯提尼亚尼算是“门外汉”。[167]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一项建议是促使佩拉的热那亚人出兵攻击土耳其海军基地，在获得了他们迄今仍严守中立的舰队支持后，土耳其舰队是不堪一击的。不过要热那亚放弃中立是很困难的，而为此进行谈判无论如何也会浪费大量时间。另一个计划是派遣士兵到对岸登录，摧毁土耳其人位于春天河谷的岸炮，并烧毁其船只。然而城中缺乏足够兵力去从事这一军事冒险。最后，一位来自特拉布宗的船长乔柯摩·科科（Giacomo Coco）毛遂自荐，愿意发动一场夜袭去火攻敌舰。御前会议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商定不可将作战计划透露与热那亚人。秘密行动是必要的，威尼斯人则表态愿意提供船只作为支援。 107

科科的计划是以两艘大型运输舰为前锋，它们的侧舷以大捆的羊毛或棉花加固以抵御炮弹。两艘大型帆船居后作为护卫。隐藏其中的两艘桨划船则借机潜入土耳其舰队中军，发起火攻。令科科失望的是，进攻被推迟至24日夜，以便威尼斯人能做好准备。不幸的是热那亚人知道了这一消息，认为威尼斯人企图独占荣耀而暴跳如雷。[168]为了安抚他们，不得不同意让热那亚人参与其中——他们获准提供1艘战舰。然而后者并未做好准备，于是计划再次延期至28日。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春天河谷的土耳其人在此期间不断增加其火炮，而纸包不住火，一名位于佩拉为苏丹效力的热那亚人将这一秘密通报了主公。

4月28日星期六，拂晓前两小时，2艘运输舰（威尼斯、热那亚各1艘）

不同资料给出的越过金角湾的土耳其舰队规模有所差异，阿什克帕萨扎德认为共有70艘，而萨德·艾丁提供的数字要少许多。埃夫利亚·切列比宣称有50艘帆船及50条小船，《波兰新军》则表示只有30艘船。基督徒方面给出的资料数字从67艘至100艘不等。我比较认同皮尔斯的看法，即舰队是越过托普哈内区稍微陡峭但路径更短的山谷进入金角湾的，而非希瑟利（Şişli）区坡度略缓但路途遥远的山谷。

在得到改装加固后悄然驶离了佩拉的城墙，2 艘威尼斯帆船紧随其后。它们每艘还拥有四十名桨手，分别由特莱维森及其副手扎卡里亚·格瑞奥尼（Zaccaria Grioni）指挥。同时跟随的还有 3 艘小型划桨船，每艘拥有 72 名桨手，由科科坐镇指挥——此外还有一批小型火攻船。当他们出发时，佩拉的一座高塔升起了一团火焰，一度令水手怀疑这是否为给土耳其的暗号，然而当他们靠近土耳其舰队时，似乎敌人的确没有防备。4 艘大型舰只缓缓前进，而科科则失去了耐心。他知道自己的小船速度足以超越大舰，为了快速展开行动，为了获得荣誉，108 他命令自己的桨划船越过战线径直向土耳其舰队冲去。突然，土耳其岸炮发出轰鸣，他们被发现了。科科的旗舰在第一轮炮击中即被击中并迅速沉没。少数水手泅渡上岸，不过多数人（包括科科）则葬身海底。剩余的桨划船及火攻船得到了大型战舰的庇护，但与此同时土耳其岸炮仍在持续射击，在火光下它们的瞄准更加容易。两艘运输舰被多次命中，好在棉花与羊毛避免了致命的伤害，不过由于水手们忙于灭火，自顾不暇，以致多数小船纷纷被击沉。土耳其人尤其集中火力，猛攻特莱维森的帆船，后者被命中两发炮弹船舱进水，特莱维森不得不下令弃舰并登上小艇逃生。曙光初现，在这一胜利鼓舞下，土耳其舰队也开始主动出击，不过基督徒们尚能拯救自己。在经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剩余的基督教舰队退回了它们的下锚处。

大约 40 名落入土耳其手中的基督教水手在当天晚些时候被公开处决。作为报复，260 名土耳其囚犯也被押赴城墙，在奥斯曼人的眼中被枭首示众。

这场战役再次证明了基督徒在船只与航海技术上胜过土耳其的实力，但它并不能掩盖失败带来的损失。他们损失了 1 艘帆船、1 艘桨划船以及多达 90 名最优秀的水手，而土耳其的损失不过 1 艘。城中的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事实证明土耳其人已经很难被从金角湾驱逐了。他们未能完全掌控此处的制海权，109 毕竟基督教舰队实力犹存。但港口区已不再安全，同时漫长的海墙也不得不面对遭到攻击的可能。对希腊人而言，1204 年十字军从海墙一侧破城的悲剧尚记忆犹新，他们不免对前途心怀惴惴；而对皇帝与朱斯提尼亚尼而言，如何分配人

力守卫漫长战线也是一道难题。

在将半数舰队运入金角湾，并击败基督徒的逆袭之后，穆罕默德取得了一次辉煌胜利。虽然苏丹似乎仍然将主攻方向定于陆墙，但他现在已经具备同时封锁城市与威胁海墙的能力。此外，即使有救援舰队企图打破封锁，它们也会发现港湾不再是安全的了。新的局面还令苏丹对佩拉大区可以施展更大影响力。热那亚人的态度一直十分暧昧。热那亚政府给予佩拉殖民地自主决策权，不过似乎也建议后者奉行中立——他们的确这么做了。殖民地对基督徒的同情使它允许他们通行港湾，少数热那亚人甚至加入了朱斯提尼亚尼的军队；佩拉的商人保持与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向它输送可供分享的各种货物。当然，佩拉也与土耳其人贸易，但很多商人却以贸易为名在土耳其营地中窃取情报送交朱斯提尼亚尼。尤其损害其中立形象的是佩拉允许将海链一端系于它的城墙上，而虽然它的舰队没有公开参战，但热那亚水手常常与海链后的基督教舰只眉来眼去，并暗中相助。但是，要让热那亚人喜欢希腊人已殊为不易，让他们与威尼斯人把酒言欢更不啻天方夜谭。固然，一些像朱斯提尼亚尼或博基阿尔迪（Bocchiardi）兄弟这样的勇士或许会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争，但对多数佩拉人而言，既然自己并未立即受到威胁，那样的英雄行为便显得不可理喻。

110 希腊人与威尼斯人对热那亚不免心生芥蒂。虽然他们由衷钦佩朱斯提尼亚尼并愿意听从其调遣，虽然他们一如既往地赞美热那亚人中的英勇之士，但佩拉在他们眼中已沦为了叛徒的大本营。最近的战事说明，苏丹必然在该地藏有耳目。人们认为佩拉的某些热那亚人一定提前获知了苏丹从陆路运送军舰的计划，即使无法阻止，也应该向金角湾对岸通报消息——然而他们没有。莱昂纳德总主教作为一名热那亚人，也在著作中表达了对同胞行为的困窘之感。[①]

但是，如果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对佩拉人颇有怨言，苏丹对此也感同身受。

---

① Barbaro, *op. cit.* pp. 28-33; Phrantzes, *op. cit.* pp. 257-8; Critobulus, *op. cit.* pp. 56-7; leonard of Chios, col. 932-3; Tetaldi, col. 1821; Pusculus, *op. cit.* pp. 72-5; Ducas, *op. cit.* xxxviii. pp. 347-8. 克里托布拉斯的资料似乎来自土耳其方面，而达卡斯的资料倚重热

不过在围城期间他无法尝试占领佩拉，这一突袭必将分散他的兵力和攻城器械，并且他的敌对行动有可能导致热那亚舰队出兵黎凡特，从而导致土耳其丧失制海权。但是现今他的军舰遍布金角湾，热那亚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轻易地为君士坦丁堡提供货物或情报了。除非佩拉准备打破中立，否则它对拜占庭也爱莫能助。而苏丹的密探向他回报佩拉当局绝不会冒此风险，这使穆罕默德大为宽心。②

进入金角湾后，苏丹与驻守佩拉附近的扎加诺斯帕夏及博斯普鲁斯的海军总部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当时土耳其人在金角湾一带只有一条迂回的道路，虽然利用海岸的浅滩也有捷径，但交通依然不便。而现在既然土耳其舰队已经进入海湾，苏丹就可以修建桥梁横跨海峡，直抵城市的海墙。这是一座浮桥，由大约上百只纵向捆绑在一起的空酒桶连接而成，每对浮桶间略有空隙，上面铺设横梁及厚木板。此桥可供五名士兵并排而行，并可通过重型车辆。浮桥两侧辅以浮动平台，上面安放大炮。于是军队在大炮掩护下可以在佩拉区与君士坦丁堡陆墙之间通行无阻，同时大炮还可从新的角度轰击布雷契耐区。③

111

海链内的基督教舰队实力尚存，还可以阻止两支土耳其舰队会合或迎接任一增援船队；土耳其人在数天中也不急于盲目向它们发起进攻——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改变金角湾失守的事实。

那亚人，两者都宣称曾经有佩拉的热那亚人向苏丹通风报信。巴尔巴罗（作为一个威尼斯人）出于对热那亚的憎恶，甚至揣测是佩拉总督本人做出了这桩叛逆行为。莱昂纳德主教虽然是热那亚人，但也表示此事热那亚人难脱干系。

② 苏丹与佩拉的关系，还可参见：本书英文版 116 页。

③ Phrantzes, *op. cit.* p. 252; Critobulus, *op. cit.* p. 57; Barbaro, *op. cit.* pp. 43-4; leonard of Chios, col. 931; Ducas, *op. cit.* xxxviii. p. 349;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88; Kodja Effendi, MS. p. 170. 引自：Lebeau, *Histoire du Bos Empire* xxi, p. 265. 1953 年树立的一块标注该桥梁地点的铭牌应该有误，因为它显然不可能经过强大的布雷契耐防御工事俯瞰下的狭长海滩，并且被狄多的运河与土军主力分割开来，它更可能会避开城墙防御器械的射程［如本书（英文版）封面插图所示那样］。巴尔巴罗给出了关于它最详尽的记载（包括完工日期），他指出浮桥终止于“栅栏”下（显然为布雷契耐城墙）。

第八章　褪色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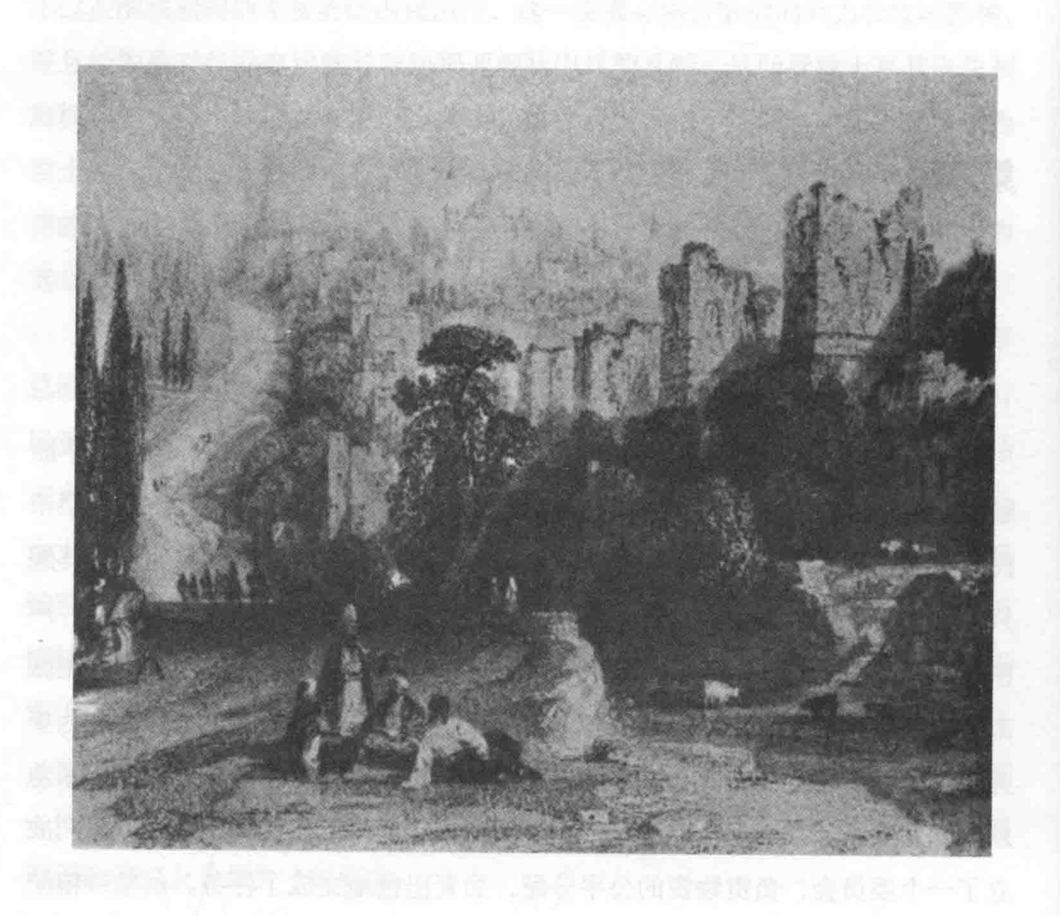
112

苏丹并没有因眼前胜利而对城市发起突击。他更愿意选择假以时日，不断骚扰和削弱敌人的防线。炮击连绵不绝，从未终止。每至入夜，君士坦丁堡市民则抓紧时间修复城墙。浮桥上新架设的大炮捶打着布雷契耐区，而土耳其舰只在金角湾已经来去自如，随时可攻击海墙。基督教舰队不得不如临大敌，严密戒备。从上一次短兵相接以来，一个星期过去了，守军无人阵亡。但这座城市面临着另一难题——供给短缺。本应坚守岗位的男丁不断要求返回城内为妻儿老小找寻食物。至 5 月 1 日，物资短缺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皇帝紧急从教堂及私人处征集了一笔资金，用于购买一切能找到的食物。他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物资的公平分配，后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虽然口粮配给并不多，但每个家庭都保证获得了一份，群众的怨言也平息了。但是，在这个季节，城中的菜园出产并不多，而渔船，即便在金角湾，也不能同往日一样，安然地作业了。至于城里的猪牛羊等家畜，原本就数量有限，此时更不敷消耗——谷物的储备同样如此。[169]除非迅速获得补给（援军都相对不那么紧迫了），否则城中军民将会因为饥馑而不得不投降。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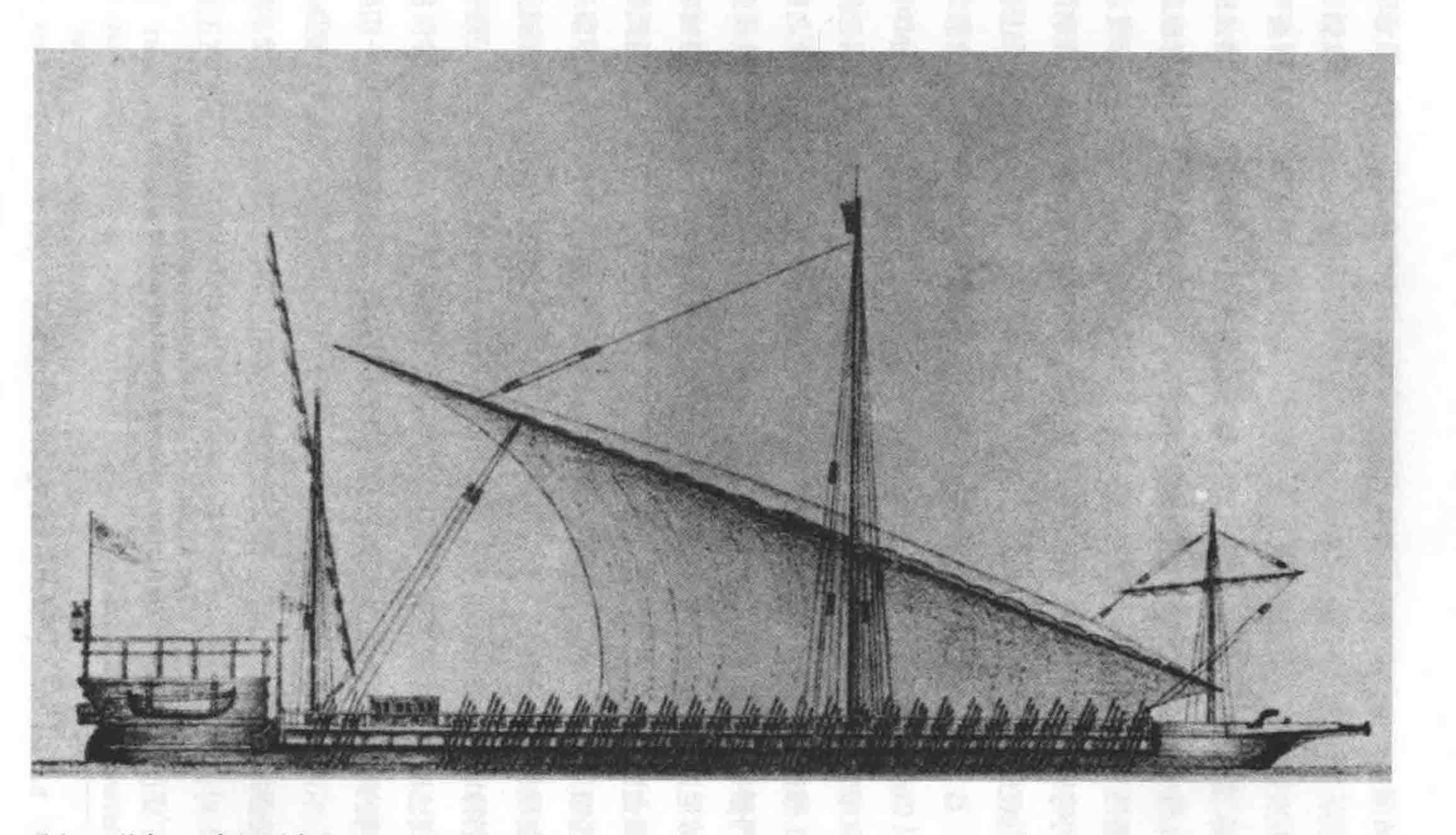
113

考虑到这一点，皇帝召集威尼斯领导人及本国贵族商议对策，并决定派出 1 艘快船，经达达尼尔海峡南下去寻找米诺托许诺过的威尼斯增援舰队。早在

① Phrantzes, *op. cit.* p. 256; Barbaro, *op. cit.* pp. 33-4; leonard of Chios, col. 935.



图九　三重的君士坦丁堡城墙



图十　1艘威尼斯商船。（来自：J. Scottas, *Les Messageries de Venise*, Paris, 1938.）

1 月 26 日，米诺托就向威尼斯政府申请援助，然而迄今仍无回音。君士坦丁堡对威尼斯方面的延宕一无所知——虽然威尼斯议会早在 2 月 19 日便收到了求援信，但直到两个月后增援舰队才正式起锚。皇帝将希望寄托于威尼斯海军司令雅科莫·罗瑞丹（Giacomo Loredan）之上，因为他听闻后者极为英勇。他并不知道 4 月 13 日威尼斯给予舰队司令阿尔维泽·隆戈的指示：舰队应全速前往特内多斯岛（Tenedos），中途只许在莫顿（Modon）停留一天以补充物资。在那里他将等待至 5 月 20 日，期间完成对土耳其舰队的侦查，随后可与罗瑞丹舰队及来自克里特岛的船只会师。此后舰队将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并强行抵达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人并不了解，罗瑞丹直到 5 月 7 日才接到命令。他需先去科孚岛（Corfu）与当地总督的船只会合，然后前往内格罗庞特（Negropont），与两艘克里特船只会合后，再驶向特内多斯岛。如果届时隆戈已经启程，后者需留下 1 艘舰只以知会罗瑞丹，并护送他穿过海峡。在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前，舰队被严禁挑衅土耳其人。随后他将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指挥之下，不过须向皇帝强调威尼斯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如果届时君士坦丁堡已与土耳其缔结城下之盟，那么他的舰队将转往摩里亚，利用自身实力迫使托马斯君主归还此前吞并的一些威尼斯村庄。5 月 8 日威尼斯议会又通过一项补充议案：如果罗瑞丹舰队中途发现君士坦丁堡仍在抵抗，他可先在内格罗庞特就地转入防御。随行的还有一名特使马切洛（Bartolomeo Marcello），此人这时的任务就是前往苏丹宫廷，向他表达威尼斯的善意，并解释威尼斯舰队前来仅仅为了护送商船并保护其在黎凡特的利益，同时极力促使苏丹与拜占庭停战，并力劝皇帝接受一切可行的条件。不过如果苏丹一意孤行，特使也不需强求，应立即返回威尼斯复命。

114

议会的方案十分谨小慎微，倘若拥有足够时间，或许能行之有效，然而威尼斯人对苏丹坚韧固执的个性及其战争机器的威力知之甚少。他们意识到了君士坦丁堡面临的威胁，却误以为拜占庭首都城防固若金汤。[①]

---

① Barbaro, *op. cit.* p. 35; Thiriet, *Regestes*, nos. 2919-2923, pp. 185-6.

而教皇此时心中悠然多于焦虑。直到6月5日，尘埃落定一周之后，教皇的代表拉古萨主教方才向威尼斯人提出雇佣5艘帆船与他前去解救君士坦丁堡。为此，他将支付14000达卡特（ducat）[170]，这笔款项足够船员四个月的薪水。然而主教被告知开价过低，因为他没有偿付部分武器的费用，于是他不得不返回罗马向教皇面陈此事。不过与此同时威尼斯的舰队倒的确做好了出航准备。①

由于对以上延宕一无所知及希望尽快与威尼斯舰队取得联系，拜占庭方面从金角湾舰队派出了1艘小型双桅帆船。船员共12人，均乔装为土耳其人模样，5月3日深夜他们悄然越过了金角湾海链。乘着北风，在土耳其伪装的掩护下，他们未受干扰地穿越马拉马拉海，进入了爱琴海域。② 115

在城市里，疲劳已经开始考验守卫者们的神经。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间长期的积怨，此时已爆发为公开的争吵。威尼斯人指责热那亚需为4月28日的灾难负责，[171]而热那亚方面则反唇相讥，声言罪魁祸首是科科的轻率冒进。热那亚人进一步指控说威尼斯人一有机会便准备登船逃亡。而后者指出，他们已将很多船只的舵与帆拆下并寄放在城市中——为何热那亚人不能效仿？[172]热那亚人则辩解说他们不愿削弱自己舰队实力，何况他们的妻儿多半还在金角湾对岸的佩拉居住。威尼斯人对热那亚人继续与苏丹保持往来感到耿耿于怀，而热那亚人辩解说这些外交谈判早已告知了皇帝并取得了他的谅解。以上种种控诉、争吵令君士坦丁皇帝如此失望，以至于他不得不召集双方领导人并祈求他们重归于好。"城墙外的战争已经足够，"他说，"愿上帝怜悯，不要在你们之间再起争端吧。"皇帝的告诫起到了某些效果。热那亚与威尼斯表面的合作宣告恢复，但内心的芥蒂却是难以消弭的。③

有迹象表明在此期间拜占庭皇帝并未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佩拉的热那亚人

---

① Thiriet, *Regestes*, no. 2927, pp. 186-7.

② Barbaro, *loc. cit.*; *Slavic Chronicle*, p. 114. (Russian version, p. 95, Roumanian version, p. 79), 书中称皇帝向摩里亚、各群岛及法兰克求援。

③ Phrantzes, *op. cit.* p. 258; leonard of Chios, col. 932-3.

似乎充当了中介的角色。然而苏丹的条件依然严苛：君士坦丁堡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而他会保证市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至于皇帝本人，则可以退至摩里亚继续他的统治。上述条件是难以接受的。城中军民不论政治观点如何，都将开城投降视为耻辱，并且苏丹的所谓仁慈也值得怀疑。当然，皇帝的智囊中也有

116 人建议他离开首都，因为在君士坦丁堡之外可以组织力量以备东山再起，而驻留其中无异于困守孤城。他在伯罗奔尼撒南部的兄弟及遍布巴尔干的同情者，无疑会以他的马首是瞻，甚至英勇的斯坎德培也可能助他一臂之力，更何况君士坦丁还有机会唤起西欧诸国的干预。但是皇帝平静而坚决地拒绝了上述动议。[173] 他担心一旦自己放弃了都城便会导致整个抵抗分崩离析，于是决定与城市共存亡。①

佩拉的热那亚人更加期待和平。5 月 5 日土耳其岸炮开始越过加拉塔轰击金角湾海链附近的基督教舰队。他们专门瞄准威尼斯的船只攻击，然而一发 200 磅的炮弹误中 1 艘满载丝绸的热那亚商船并将它击沉——船主是一名佩拉商人，当时其货船正停靠于佩拉的城墙附近。市政当局就此事迅速向苏丹提出抱怨，并重申热那亚严守中立对土耳其的重要。而奥斯曼人的回复则有些粗暴：炮兵无法准确辨别那艘船只有无敌意，是否为援助敌军的“海盗”——不过如果误击属实，一旦土耳其攻下君士坦丁堡，苏丹将过问此事并给予赔偿。②

5 月 1 日乌尔班大炮一度发生了故障，至 6 日才告修复，炮击旋即恢复了往日力度，而与此同时土耳其舰队也在磨刀霍霍。守军判断翌日很可能会发动一次总攻，并做好了相关准备。5 月 7 日，日出四小时后，预期中的攻击果然出现了——土耳其集中兵力突击中城墙。潮水一般的土耳其士兵携梯子及带倒钩的长矛，涌过被填平的护城河，接下来是一场持续三小时的苦斗，最终土耳其人

117 未能突破已经受损的城墙及栅栏。战斗中一位名叫朗加比（Rhangabe）的希腊

① 这一历史插曲仅见于《斯拉夫编年史》，不过应该是可信的。参见：*Slavic Chronicle*, p. 118 (Russian version, p. 95, Roumanian version, pp. 79-80).

② Phrantzes, *op. cit.* pp. 259-260; Barbaro, *op. cit.* pp. 35-6; Ducas, *op. cit.* xxxviii. p. 347.

人表现得尤其英勇，他手刃了苏丹的掌旗官埃米尔贝伊（Amir Bey），最后被敌人包围并阵亡。[①]

虽然是夜土耳其舰队并未发起进攻，但金角湾看上去已经不安全了，第二天，威尼斯人决定卸下其战船上的军事物资并储存于皇家兵工厂。5 月 9 日他们决定进一步分拆舰队，将部分船只从金角湾海链移至阿克罗波利斯海链附近的内奥里翁（Neorion）或普洛斯费瑞纳斯（Prosphorianus）码头，船员全体上岸，以协助防御城墙严重受损的布雷契耐区。部分水手对此颇有怨言，直到 13 日部署方告完毕——这批生力军的主要任务是修复受损的城墙。[②]

这次调动总算在千钧一发之际完成了。当天深夜土耳其人发动了又一次总攻，主攻方向恰恰在布雷契耐区与赛奥多西城墙结合部。他们再次被击败并不得不鸣金收兵，事实证明此处的城防依然坚固。[③]

5 月 14 日，在发现威尼斯舰队的调动后，由于不再担心受到攻击，苏丹将其原本部署于春天河谷的炮兵移至金角湾浮桥，并开始轰击布雷契耐位于斜坡上的一段城墙。然而炮击的效果差强人意，于是一两天后，他将这支部队并入了列阵于莱卡斯河谷的炮兵主力中——苏丹发现这里是最适合突破的地段。此后，虽然在其他战线炮击时断时续，不过在中城墙一带，随着火炮的增援，炮击变得夜以继日，永无休止。[④]

16 日及 17 日，土耳其舰队主力两度从双圆柱巡弋至海链处，摆出攻击态势，然而拜占庭人防守严密，土耳其舰队甚至未发一弹便悻然退回了港口。21 日土耳其方面又做了一次尝试。整个舰队鼓声震天，军乐鼎沸，其出现不啻提前给　118

---

① Barbaro, *op. cit.* pp. 36-7; *Slavic Chronicle*, pp. 118-9 (Russian version, pp.95-6, Roumanian version, pp. 80-1), 该书特意提到了那位希腊勇士的事迹。

② Barbaro, *op. cit.* pp.37-9.

③ Barbaro, *op. cit.* p. 39; *Slavic Chronicle*, pp. 119-20 (Russian version, pp. 96-7, Roumanian version, p. 81). 书中提到了一个夸张而不足采信的故事：皇帝得知土耳其军入城后在索菲亚教堂的门廊召开了会议并旋即亲自策马击退了敌军。

④ Barbaro, *op. cit.* pp. 39-40.

守军一份警报，又一次在海链附近来回游弋之后，他们静静地撤回了基地——这是土耳其海军试图突破海链的最后尝试。这很可能是因为土耳其海军士气低迷（它的水手中土耳其人仅占极少数，多数为希腊裔），并且苏丹与舰队司令都不愿冒再次失利的风险。①

与此同时，陆军在行动中开始考虑挖掘地道突破城墙。其实苏丹早在围攻首日便有此等设想，但他当时缺乏有经验的坑道兵。而现今扎加诺斯帕夏在其军中找到了几位士兵，他们曾在塞尔维亚的诺沃布罗多（Novo Brodo）[174]挖掘银矿——他们旋即被要求负责在查瑞休斯门附近挖掘一条地道，因为那里的土壤被认为适合作业。为了不引起守军注意，坑道兵们决定从较远处开挖，但试图穿过护城河的努力被认为与穿越城墙一样艰难，[175]该方案不得不最终放弃。于是他们转而挖掘单层的布雷契耐城墙，突破点定在卡里加利亚（Caligarian）门附近。5 月 16 日他们的作业被守军发现了。负责处理此类紧急事务的帝国海军司令卢卡斯·诺塔拉斯找来了工程师约翰内斯·格兰特，在他的要求下格兰特挖掘了一条针锋相对的地道，成功地连通了土耳其地道，并将坑道中的木质支架付之一炬——倒塌的地道令多名土耳其工兵当场殒命。这次失败令土耳其人偃旗息鼓数日，不过从 21 日起他们又恢复在多个地段挖掘，主攻方向依然在卡里加利亚门一带。在格兰特指导下，诺塔拉斯的希腊部队再次挖掘了反地道

119 （countermine）——守军时而用浓烟熏出敌军工兵，时而引用水塔的蓄水（原本设计为护城河供水）灌入坑道中，敌人被挫败了。②

苏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 18 日清晨，中城墙的守军眼前出现了一座骇人的木质巨型攻城塔。它想必是土耳其人乘着夜色布置的，其底部装有车轮，木质骨架外用牛皮、骆驼皮覆盖，内有阶梯，直达塔顶平台，而整个攻城塔与外墙城楼同高。塔顶密布攻城梯，一旦接近城墙便可派上用场；不过它的主要功

---

① Barbaro, *op. cit.* pp. 40-2, 44-5.

② Barbaro, *op. cit.* pp. 42-3; Phrantzes, *op. cit.* pp. 243-5; leonard of Chios, col. 936.

用还是掩护那些试图填挖护城河的工兵。早先攻城的经验告诉苏丹护城河是攻城的一大阻碍，必须修建一条坚固的道路穿越它。整个18日苏丹的士兵都忙于修建通过护城河的道路，攻城塔则在附近提供掩护。到天黑时，虽然遭到猛烈抵抗，这一工程还是基本完工了。部分护城河被石料、泥土、柴枝所填充，而攻城塔则被缓缓移动到新建的道路上以测试其强度。但入夜后部分守军潜出城外，在护城河边的填土里埋设炸药桶。当它们被点燃，旋即引发剧烈爆炸，令攻城塔也轰然倒塌，并杀死了其中的士兵。到第二天清晨，护城河又被部分清理出来而临近的城墙、栅栏也得到修复。其他的土耳其攻城塔命运也与之类似，部分被摧毁，剩余的也被撤出战场。[①]

以上胜利抑制了基督教士兵们士气的跌落。5月23日他们取得了最后一次鼓舞人心的胜利。那一天与之前数日类似，土耳其人依旧在尝试挖掘地道突破布雷契耐城墙；但这一次希腊人成功地包围并俘虏了大量敌方坑道兵，其中甚至包括一名高级军官。在被严刑拷打后，此人供认了所有土耳其地道的位置。格兰特据此得以在之后两天逐一摧毁了它们。最后被摧毁的一条地道狡猾地开凿于苏丹一座攻城塔之下，如果没有上述泄密本不会被发现。从此以后，土耳其人彻底放弃了通过坑道战攻城的努力。[②]

120

他们或许已经意识到，守军极度的疲劳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土耳其的围攻的帮手。虽然基督徒的低阵亡率引人注目，但伤者数量却十分可观，而且他们均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武器的补给，尤其是火药，已经日益短缺，食物匮乏也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就在5月23日，获得坑道战胜利的那天，基督徒的希望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当天下午1艘船只在土耳其舰艇追击下驶入了马拉马拉海，她成功地摆脱了追兵，乘着夜色驶入金角湾，守军为她打开了海链。起初人们以为她是增援舰队的先锋，后来才发觉竟是20天前派出搜寻威尼斯舰队

---

① Barbaro, *loc. cit.*; Phrantzes, *op. cit.* p. 245; Tetaldi, col. 1821; leonard of Chios, col. 936;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88-9.

② Barbaro, *op. cit.* pp. 46-7.

的那条双桅船。他们遍寻爱琴海上各个岛屿，不仅未见威尼斯舰队踪迹，甚至连一丝增援的传闻都没发现。当继续寻觅已经注定徒劳之后，船长征求各位水手意见，究竟该何去何从。一个船员表示：君士坦丁堡想必已落入敌手，贸然返回无异于羊入虎口，是不明智的。但是其他人并不赞同。他们声称，尽管此行生死未卜，但将消息回报皇帝是众人的职责所在。君士坦丁皇帝听到了这番话不禁泪光闪烁，并逐一向船员们表达了谢意。看来不会有基督教国家参与援助了。[176] 这座城市只能依靠自己，依靠基督、圣母与建城者圣君士坦丁的保佑了，皇帝说道。①

甚至这些信念也开始受到考验。越来越多的异兆出现，它们被解释为上帝将要抛弃君士坦丁堡。在这段日子里，每个人都想起了这样一则预言：帝国将亡于和最初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同名的皇帝之手，并且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另一则预言则声称，帝国在满月渐渐成形时是不会灭亡的，过去一周人们士气高昂，也是受它鼓舞。然而自 24 日满月后，月亮随即转缺，意味着危险也到来了。更糟糕的是，在满月的当天夜里居然出现了长达三个钟头的月全食。在受到月食的打击并听闻了并无援军的消息之后，第二天，人们手捧圣母像在君士坦丁堡街头上游行。除了必须在城墙上坚守岗位的士兵外，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当队伍缓慢、肃穆地行进时，圣像突然从摆放的铜质平台上滑落下来。人们慌忙赶去准备扶起画像，却发现它犹如铅一般沉重，需几人合力才将它搬回原处。[177] 当队伍继续前进时，突然下起了雷雨，夹杂着冰雹，几乎令人难以站立；大雨滂沱，道路变为了河泽，水势几可冲走孩童——游行不得不终止。第二天清晨，不祥之兆并未停歇，浓雾笼罩了整个城市，这种现象在以往的五月是从未有过的。人们认为这是神迹，是为了掩护耶稣与圣母离开首都的。入夜，当浓雾散去，一道奇怪的光线出现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土耳其人与君士坦丁堡市民都见证了这一奇景，并深感不安。苏丹的智囊向他解释说这一征兆

121

---

① Barbaro, *op. cit.* p. 47. 在本书英文版 33–34 页还有关于这次演讲的详细记载。

的表明真正的信仰终将降临索菲亚大教堂，[178] 并使穆罕默德宽心下来。而希腊人及其意大利盟友的理解就没有那么令人欣慰了。

越过城墙，人们还能看到土耳其营地后方的郊区散发出微光，而那一带本不应出现灯火。一些满怀希望的哨兵宣称这是前来救援的匈牙利摄政匈雅提部队的营火，然而事后并无援军到来。关于这些微光的来历也成为永远的谜。① 122

帝国大臣们又一次奉劝皇帝放弃首都，去更安全的地方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面对大臣的喋喋不休，皇帝身心俱疲，竟然一度昏厥过去。当他苏醒后，再次答复说，他绝不叛离自己的人民，他将与首都共存亡。②

五月即将过去，在花园及灌木丛中，玫瑰盛开了。然而月光是惨淡的，对拜占庭人而言，既然月亮是帝国的象征，末日即将到来的想法，沉重地压在他们心头。

---

① Barbaro, *op. cit.* p. 46, 他提到这次月食发生于 4 月 22 日，不过月食的准确时间应该是 4 月 24 日。想必巴尔巴罗修改了原始日记。其余的凶兆，参见：Phrantzes, *op. cit.* pp. 264-5; Pusculus, *op. cit.* p. 79; Critobulus, *op. cit.* pp. 58-9; by Barbaro again, p. 48, 还有高度夸张的斯拉夫编年史中的记载：*Slavic Chronicle*, p. 122.

② 此事仅见记载于：Slavic Chronicle, pp. 122-3. (Russian version, p. 98, Roumanian version, p. 82). 其中提到主教的出场，虽然杜撰了若干细节，但很可能大体是真实的。

第九章　拜占庭的末日

123　基督徒中感觉希望渺茫，但在土耳其阵营，同样存在着失败主义情绪。围攻已持续七周，土耳其大军及其高效的战争机器依旧进展甚微。守军固然疲惫不堪，人力物力短缺，城墙也固然损坏严重，但奥斯曼军队却没有一人能够逾越其防线。此外还存在西方干预的风险。穆罕默德的间谍提醒他已有一支威尼斯舰队出发，甚至有传闻声称他们已经抵达希俄斯岛。① 此外，匈牙利越过多瑙河的可能也不能不加以考虑。早在围攻初期，一位匈雅提的大使就抵达苏丹营帐，表示既然匈雅提已不再是匈牙利摄政 [179]，那么此前与土耳其签署的三年停战协定便自动失效。②除此以外，苏丹军队的士气也开始消沉了。他的水军则遭到了耻辱性的失败。他的部队迄今还未赢得一场胜利。而君士坦丁堡坚守得越久，苏丹的威望就会越发遭到削弱。

在宫廷中，老维齐哈里尔及其同党依然对整个进攻大唱反调。对此类意见，苏丹一概不予理睬。是否这样的做法过于武断了呢？或许部分为了安抚群臣，部分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按穆斯林传统，除非异教徒顽固抵抗到底，否则应该给予其投诚的机会），苏丹最后一次提出了和平建议，当然条件完全是站在奥

---

① Critobulus, *op. cit.* p. 60.

② Phrantzes, *op. cit.* pp. 263-4, 327; Ducas, *op. cit.* xxxviii. pp. 341-3. 该匈牙利大使曾经就操作火炮方面为苏丹出谋划策。

斯曼人的角度考虑的。在他的军营中有一位名叫伊斯梅尔（Ismail）的年轻贵族（此人父亲为一改宗的锡诺普王公），他被选作特使派往君士坦丁堡。伊斯梅尔在希腊人中颇有人缘，他极力使人们相信现在自救还为时不晚。在他的撮合下，希腊人派出了一名使节回访苏丹。此人姓名今天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并非名门之后，也未能身居要职。苏丹对待使节一贯有喜怒无常之嫌，也难怪希腊贵族不愿参与如此危险的使命。然而他受到了苏丹的礼遇，并将穆罕默德的建议带回城中。苏丹提出，如果希腊人交出城市，可以带走一切随身财物，保证其人身安全并可自由迁往他处；最低要求则是如果皇帝交纳一笔高达 10 万金币（gold bezant）的年金，撤围也可以考虑。当御前会议讨论这份动议时，有一两位大臣认为同意支付年金或许能为帝国赢得喘息的机会，但多数人知道，这笔天文数字远远超出了拜占庭的能力，一旦不能迅速筹款，照旧会给苏丹发动进攻的口实，况且此时他们也不愿让苏丹如此轻易地占有自己的城市。根据土耳其方面的资料，皇帝的回应是，他愿意交出自己拥有的一切，唯独君士坦丁堡除外，但它几乎是此时君士坦丁唯一的财产。而苏丹则驳斥说，希腊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剑下死亡，要么皈依伊斯兰教。[①]

124

这一徒劳的谈判很可能发生在 5 月 25 日，星期五。第二天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他的内部御前会议。大维齐哈里尔帕夏，以功勋元老自居，要求放弃围攻。他表示自己从未赞同这一行动，并且事实证明了他的明智。土耳其人不仅毫无进展，而且遭受了不少耻辱的挫折。西方的王公随时都有前来增援的可能。威尼斯已经派出了强大舰队。热那亚，虽然未必是心甘情愿，但也有可能采取类似行动。苏丹最好向皇帝提出可接受的条件，然后于灾难发生前体面地撤退。大维齐素来德高望重。他的很多听众，对之前土耳其舰队对抗基督徒的拙劣表现尚记忆犹新，一想到可能被强大的意大利海军击溃的前景，不禁战栗起来。

125

---

①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90-2, 记载了伊斯梅尔谈判的完整过程；Ducas, *op. cit.* xxxviii, pp. 345, 349; Saad ed-Din, p.20.

苏丹毕竟只是个 21 岁的年轻人，他是否因为年轻气盛、鲁莽冲动，而令自己的高贵血统蒙羞了呢?

第二个发言的是扎加诺斯帕夏。他素来与大维齐不睦，而且知道苏丹也深有同感。在发觉穆罕默德因哈里尔的讲话而龙颜不悦后，扎加诺斯表示，他并不赞同大维齐的疑惧。欧洲诸国现今是一盘散沙，难以团结起来对抗土耳其；即使威尼斯果真派出了舰队（况且这未必属实），其船只数量与兵员依旧远逊于土耳其大军。他谈到了对基督徒不利的神迹；他谈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后者同样年轻，并用更少的军队征服了半个世界。箭在弦上，岂有后退之理？许多年轻将领纷纷站起来支持扎加诺斯，尤其是巴希巴祖克部队指挥官，表现出极大热情。[180]苏丹不禁精神为之一振，这才是他所希望听到的话。他随即要求扎加诺斯走出营帐，到军队中去倾听士兵们的想法。扎加诺斯很快带来了令人激动的回答。每个人，他说，都坚持立即发动进攻。于是苏丹宣布，总攻将尽快发起。

从这一刻起，哈里尔想必已明白自己时日无多。他历来是基督徒友善的朋友，具备一名虔诚的旧派穆斯林的宽容，而与“离经叛道”、傲慢自负的扎加诺斯或穆罕默德大相径庭。他是否曾收取希腊人的贿赂至今已无从考证，不过既然他的政敌含沙射影地暗示，而苏丹也就乐于相信。①

126

城中的军民很快知晓了这一决策——苏丹营地的基督徒将会议详情绑在箭头射入了城墙。②

自周五到周六，针对陆墙的炮击达到了空前程度，但造成的破坏依然被迅速修复了。至周六晚，栅栏也已经完好如初。不过在这天夜里人们发现土耳其一方灯火通明，士兵们忙着用所能找到的各种材料扎实地填埋护城河，同时将大炮安置于新造的炮架上。在星期天土耳其人集中火力轰击中城墙。三发重磅炮弹击垮了一大段墙体。负责监督修复工程的朱斯提尼亚尼被一块弹片击中受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65-70; leonard of Chios, col. 937-8; Tetaldi, coll. 1821-2.

② Tetaldi. *loc. cit.*

了轻伤，在退至后方花费几小时包扎处理伤口后，他于日落前赶回了前线。①

5月27日，同一天，苏丹骑马检阅了整个军队并宣布即将发起总攻的消息。随行的传令官则不时停下来告知众人，按照伊斯兰传统，城破之后真主的战士可自由劫掠三日。苏丹以真主、穆圣、四千位先知、先父亡灵及自己后世子孙的名义起誓，君士坦丁堡的一切财富都将公正地分配给军队。这一番声明引发了阵阵欢呼。即使城墙以内的人们也能听见土耳其人狂喜地呐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181]。"②

是日夜，与前一天相同，土耳其营地灯火通明，宛如白昼，大群工人潮水般将各种填充物推入护城河并在上面楔入武器的底座。他们士气高涨，时而歌唱，时而高呼，横笛、竖笛、战鼓与鲁特琴为他们彻夜伴奏。火光如此明亮，以至于有一瞬间守军甚至误以为奥斯曼人的军营失火了，他们簇拥到城墙去观赏火灾，然而当他们明白事情真相后，不禁只得双膝跪地，开始祈祷起来。③

127

午夜时分，灯光熄灭，土耳其人的工作突然停顿下来，一切又重归岑寂。这是因为苏丹将周一定做休息日及赎罪日，以便士兵们在周二的总攻前得以休养生息。而苏丹本人则将这一天用于检阅全军，并对部队下达各种指示。他骑马在庞大卫队的簇拥下，穿过金角湾浮桥，进抵双圆柱，并召见了海军司令哈姆扎（Hamza）贝伊。哈姆扎被告知在第二天务必将整个舰队部署于金角湾及整个马拉马拉海。不论巨舰或小舟，他们将携带攻城梯，在任何可能的地段，尝试登陆并攻击城墙；如果事实证明此方案难以奏效，退而求其次，他们也要做出佯攻的姿态以便牵制海墙的守军兵力。接着苏丹回到停泊于金角湾佩拉主城门外的舰队附近，下达了同样指令，旋即召见了佩拉区长官，后者被要求严格禁止部下在次日援助拜占庭人，否则苏丹将严惩不贷。之后苏丹返回了自己的

---

① Barbaro, *op. cit.* pp. 48-9; *Slavic Chronicle*, p. 124 (Russian version, p. 100, Roumanian version, p. 84). 仅有斯拉夫方面的史料提及了朱斯提尼亚尼的本次负伤。

② Phrantzes, *op. cit.* p. 270；leonard of Chios, col. 938.

③ Barbaro, *op. cit.* pp. 48-9.

营帐，并于下午再次现身。穆罕默德骑马经过了整个陆墙战线，与指挥官交谈，并对营地周围的士兵们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① 当发觉一切都符合其心意之后，他召集重臣及将领参加了一次御前会议。

苏丹在会议上的讲话被历史学家克里托布拉斯（Critobulus）[182] 记录下来，后者与许多拜占庭知识分子一样，深得修昔底德（Thucydides）真传，喜欢假托历史人物之口发表他认为合理的谈话内容。不过虽然这份演讲有历史学家演绎的成分，但依旧可供我们一窥端倪。苏丹提醒与会者留意君士坦丁堡拥有的巨大财富，一旦攻陷该城，将为众人带来丰厚的战利品。苏丹也提到几个世纪以来，占领基督徒的这一首都，已成为伊斯兰信徒的神圣使命，而圣传也预示了它的最终成功。苏丹表示，这座城市并非牢不可破，其守军寡不敌众，且已经筋疲力尽，并饱受粮食、弹药短缺之苦——何况他们内部并不团结，意大利人不会愿意葬身于这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明天，苏丹宣布，我将派出一波又一波攻击梯队，直到守军因疲惫绝望而屈服投降，方才停歇。他督促自己的将领们展现勇气并保持纪律。随后他命令众人各自返回营帐，养精蓄锐，静待攻击的信号，但几位主要将领则留下来等待苏丹进一步指令。海军司令哈姆扎事先已经了解了自己的任务。扎加诺斯帕夏在分拨一部分人手支援海军进攻金角湾一带海墙后，被要求率领余部穿过浮桥参与对布雷契耐区的进攻。卡拉德贾帕夏列阵于他的右翼，直至查瑞休斯门。伊萨克与马哈茂德率领亚洲军团，将负责攻击从圣罗马努斯之门至马拉马拉海的漫长地段，攻击重点则位于第三军用大门附近。苏丹本人偕同哈里尔、萨鲁贾负责在莱卡斯河谷一带发起总攻。部署完毕后，苏丹用了晚膳，随即进入了梦乡。②

128

① Barbaro, *op. cit.* pp. 49-51; Critobulus, *op. cit.* p. 60; Ducas, *op. cit.* xxxix, pp. 351-3; leonard of Chios, col. 938; Dolfin, p. 20（单独提到了苏丹造访佩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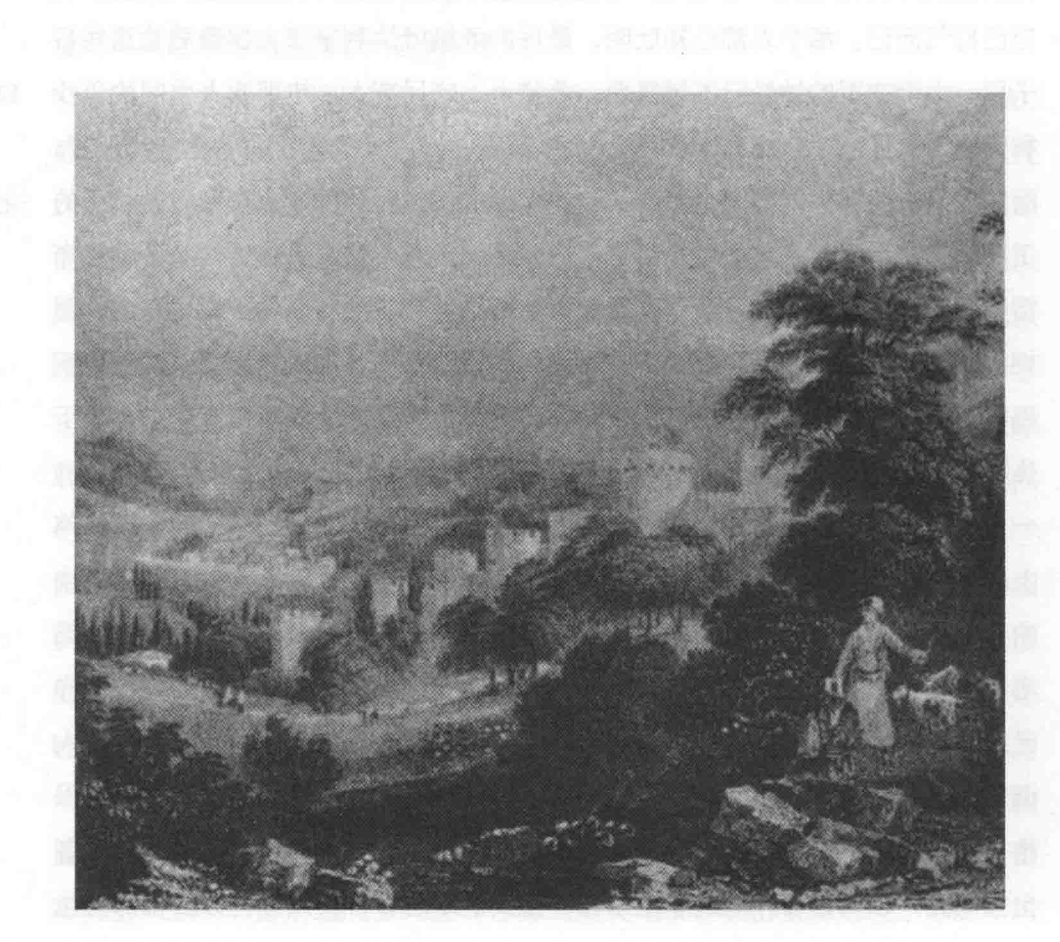
② Critobulus, *op. cit.* pp. 60-5，克里托布拉斯详细记录了苏丹的这次演讲，由于他和哈姆扎贝伊私交甚笃，而后者是与会者之一，因此他的记录大体是可信的。弗朗茨的著作给出了一个较简短的版本，参见：Phrantzes, *op. cit.* pp. 269-70.

整整一天，城墙外是一片异样的沉寂。甚至乌尔班巨炮也暂停发射。城中某些人宣称这是土耳其人即将撤退的迹象，不过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仅仅是给自己打气而已。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最后的危机就快到来了。在最后的这些日子里，由于守军的神经已不堪重负，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之间的争吵 129 和责难增加了。对希腊人与威尼斯人而言，佩拉的中立令他们难于信任热那亚。而威尼斯人的自大则同时令希腊人与热那亚人不悦。威尼斯人在己方居留区的工厂内生产了不少木质盾牌及护罩，当米诺托要求希腊工人将这些装备运往布雷契耐防区时，后者表示除非预付工资，否则他们恕难从命——威尼斯人宁愿相信这并非出于贪婪，而是希腊人对意大利人发号施令本能的厌恶，并且他们还需要金钱与时间为自己饥饿的妻儿寻觅食物。威尼斯人极少拖家带口，至于热那亚人，他们的妇女儿童多半生活在舒适的佩拉区。意大利人永远无法体会，一旦与自己的家眷共命运，会给希腊人带来多大的压力。有时，还会出现策略上的分歧。考虑到敌人总攻将近，朱斯提尼亚尼要求卢卡斯·诺塔拉斯将他手中的几门火炮调配到中城墙一带，这是守方急需的。但这项要求遭到了拒绝，诺塔拉斯不无理由地认为，港口区的城墙同样有遭到攻击的可能，而此处的防守已经够薄弱的了。两位贵绅为此甚至不惜恶语相向，直到疲惫的皇帝亲自介入调停。看上去朱斯提尼亚尼最后占据了上风。莱昂纳德主教素来对东正教会保抱有敌意，此时宣称正是由于希腊人嫉妒拉丁人在防守中的功绩，才导致后者士气低沉，心有旁骛。他选择性无视了在莱卡斯河谷希腊人曾与数目相仿的拉丁人奋力并肩作战，也刻意回避了（其实他自己也曾经承认）开战以来希腊人从来不缺乏热情和勇气的事实。[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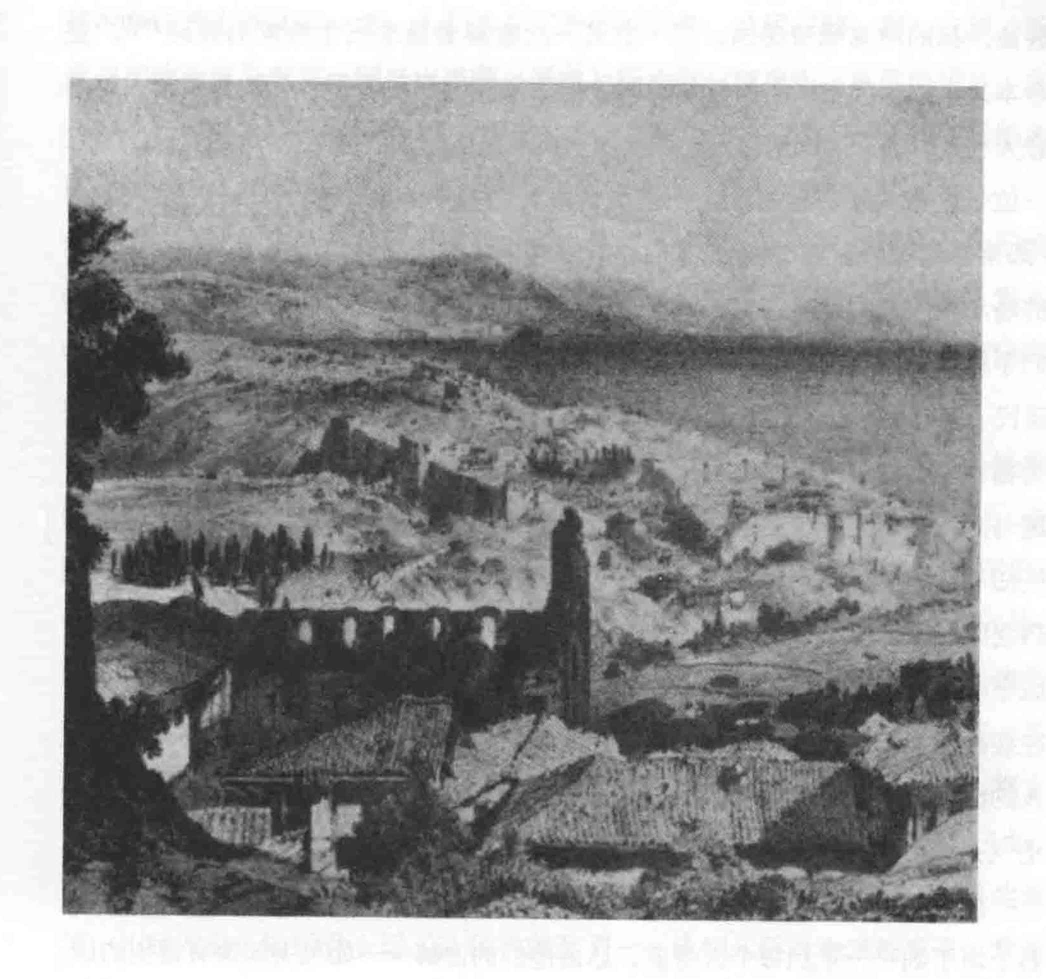
在星期一，深知危机即将到来之后，士兵与市民们终于尽释前嫌。当墙头的士兵忙于修复受损工事的同时，一支庞大的队伍被组织起来了。与土耳其营地一片肃静形成了鲜明对比，君士坦丁堡市内，教堂响起了钟声，信徒肩上扛 130

---

① Barbaro, *op. cit.* p. 50; Phrantzes, *op. cit.* pp. 262-3; leonard of Chios, col. 937.



图十一　君士坦丁堡城墙。该图展示了自查瑞休斯门向北延伸的一段城墙。皇帝在生命最后时刻就是从此处塔楼眺望土耳其军营。



图十二　特拉布宗城全景

着圣物走过大街小巷，他们还特意在受到严重破坏的城墙驻留片刻，以期得到天主的庇护。尾随的游行队伍中，不论是希腊人或意大利人，东正教徒或天主教徒，都同声高唱赞美诗，并一次又一次重复着恳求天主怜悯的祷词[183]。皇帝本人也加入其中。当游行结束时，他召集其显贵及将领，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意大利人，去参加御前会议，并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话被两位与会者记录下来，一位是皇帝的秘书弗朗茨，一位是米蒂利尼（Mytilene, Mytylene）[184]大主教（即莱昂纳德总主教）。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记载这段演讲，加入了一些文人含蓄的暗示和虔诚的格言警句，以使之得到某种润色。不过他们的记载依然能使我们了解这段讲话的主旨。君士坦丁告之他的听众，总攻即将开始。对于其希腊臣民，皇帝强调人们应该随时做好准备，为了自己的信仰、国家、家庭及君主而牺牲。现在是为这四者付诸行动的时刻了。他谈到了这座帝国首都昔日的荣耀与高贵传统。他谈到了异教苏丹背信弃义挑起了这场战事，妄图用自己的伪先知（指穆罕默德）取代真神基督。他督促人们牢记自己为古希腊罗马先贤英烈之后，需无愧于列祖列宗。对他本人而言，他已经做好准备，为自己的信仰、城市和人民献出生命。接着皇帝转向意大利人，感谢他们巨大的贡献并表达了在接踵而至的战斗中对他们的信任。他祈求人们，无论国籍族裔，不要畏惧敌人的惊人数量，也不要对敌人的战争机器（指土耳其重炮）心怀惴惴——保持士气，保持坚定！在上帝的眷顾下他们必将获得最后胜利。

131 在场的每一位与会者纷纷起身向皇帝表示他们将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君士坦丁则一一走到每个人身前，恳请他们的谅解——如果先前曾有冒犯的话。受皇帝感染，人们纷纷互相拥抱，就像壮士赴死前的表现一样。①

长日将尽。人们涌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已有整整五个月，由于认为受到拉丁人及叛教者玷污，虔诚的希腊人拒绝前往该教堂参加弥撒仪式，但在这个夜晚，这份痛苦结束了。除了守城将士，几乎没有市民能够拒绝在如此绝望形势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71-9; leonard of Chios, coll. 938-9.

下的宗教和解。那些认为与罗马联合为不赦之罪的教士，此刻也走上祭坛，与他们的联合派教友共同主持仪式。而枢机主教（天主教会）也与从不承认其权威的东正教主教共处一室。人们忘却了教派的纷争，共同告解，真心交流。教堂顶部的金色马赛克，镶嵌出基督、圣徒及历代拜占庭皇帝、皇后的图景，在千盏烛火下微微摇曳；在他们的注视下，教士们最后一次身着华服，伴随弥撒的韵律缓缓移动。此时，此地，君士坦丁堡教会实现了真正的联合。①

御前会议结束后，大臣与指挥官们也参加了这次联合礼拜。礼毕后他们旋即奔赴各自岗位，并抱有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朱斯提尼亚尼与其希腊、意大利战友越过内城墙，进入到外城墙及栅栏的预定位置，身后的内城墙大门随即奉命关闭，以防止他们擅自撤退。②

夜间稍晚时候，皇帝本人骑着他的阿拉伯牝马前往大教堂做了祷告，接着穿过夜幕笼罩的大街返回位于布雷契耐的皇宫，并召集家人相见。对他们，与在御前会议一样，君士坦丁也请求家族成员原谅自己的过失。和家人道别后，时间已近午夜，在忠心耿耿的弗朗茨陪伴下，皇帝再次上马，巡视整个陆墙，确定一切井然有序，内城门也已关闭。在他们返回布雷契耐区的中途，皇帝于卡里加利亚门附近下马，和弗朗茨共同登上布雷契耐城墙最外角一座城楼。在这里他们可在黑暗中眺望左侧的中城墙与右侧的金角湾。城楼下土耳其人将大炮移过护城河的声音清晰可闻。卫兵告诉他们，这一行动自日落时分即已开始。在这种距离上他们也能目睹奥斯曼军舰驶过金角湾的灯光。弗朗茨与主君共处了一小时左右，随后君士坦丁让秘书离开了——他们此后再也未能重逢。最后的战役开始了。③ 132

---

① Phrantzes, *op. cit.* p. 279. 克里托布拉斯、卡尔科孔狄利斯与斯拉夫编年史记载对城市的劫掠时均提到了这次彻夜弥撒。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147 页。

② Phrantzes, *op. cit.* p. 280; Andrea Cambini, *Libro della Origine de Turchi* (1529 edition), pp. 8-10.

③ Phrantzes, *op. cit.* p. 280; 皇帝的白足牝马出现在希腊的流行诗歌中。例如：*Ὁ Θάνατος Τοῦ Κωνσταντίνου Δράγαζη* in Legrand,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p. 74.

第十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

133　5月28日，星期一下午，天气晴朗。当太阳开始西下，阳光直刺守城者的双眸，令后者几乎盲目——利用这有利时机，土耳其军营开始了行动。数以千计的士兵完成了护城河的填充工作，另一些则开始移动大炮与其他攻城器械。日落后天空转而阴云密布，并下起了倾盆大雨，但这并没有妨碍土耳其人的工作。对面的基督徒面对此情此景，却只能束手无策。大约凌晨一点半，苏丹判断万事俱备，便下令发起总攻。[1]

整条战线的土耳其军杀声震天，在军号、战鼓、横笛的伴奏下，如潮水般发起了攻势。基督教守军以逸待劳，静静等候，不过当哨兵发出警告，毗邻外墙的教堂便敲响了大钟，全城教堂的大钟随后逐一响起，警钟长鸣，连三英里外索菲亚大教堂的信众也清晰可闻，知道了战役开始的消息。每一个可战斗的男子都回到了他的岗位；妇女，甚至包括修女，也加入他们，负责修补城防以及为士兵运送饮水。老人与儿童则走出房门，涌入教堂，祈求圣人与天使的庇护。一些人前往教区教堂，其他人去了金角湾附近的圣赛奥多西亚教堂（Church of Saint Theodosia）。周二恰好是她的斋日，整座教堂被从附近花园或排栽灌木采134　来的玫瑰妆点一新。看来她一定不会抛弃她的信徒。还有一些人回到了索菲亚

---

① Critobulus, *op. cit.* pp. 66-7.

教堂，因为有一则古老预言声称，即使有朝一日异教徒攻破城市进入神圣教堂，也会有天使显灵，手持宝剑，将敌人打回地狱。在黎明前的数小时里，会众们都在静静等待与祈祷。

对城墙上的守军而言，可就无暇祷告了。苏丹的计划十分小心谨慎。尽管他对士兵们发表了轻视敌人的讲话，但过往经验告诉他需要尊重对手。在这次攻击中，他计划在出动精锐之前，先消耗、削弱敌人。因此，苏丹首先派遣非正规军（即巴希巴祖克）上阵。这支部队有数万人之多，由不同国家、民族的冒险家构成，有土耳其人，但更多的来自基督教国家，如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甚至希腊人，为了苏丹允诺的报酬和战利品，他们不惜与基督徒兄弟为敌。他们大部分为自备武装，其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有弯刀、投石器、弓箭，甚至少量火绳枪[185]，不过为了这次进攻他们被分发了大量攻城梯。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首次突击往往气势汹汹，然而一旦受挫就有崩溃之虞。深知其秉性的穆罕默德于是在他们后方安排了一支装备皮鞭与锤矛的督战队，其任务是督促部队奋勇上前并严惩动摇的士兵。在督战队后则是苏丹自己的新军部队。如果有个别巴希巴祖克越过了督战队的阵线，也会被守株待兔的新军士兵用弯刀就地正法。

巴希巴祖克发起了全线攻击，不过重点依然在莱卡斯河谷一带。其他地段的城墙依然牢固，对这里的攻击主要目的是牵制守军，使其不能增援重点地区。战斗异常惨烈。巴希巴祖克面临的对手装备更精良，训练更有素，而且他们还受到自己庞大数量的拖累。攻守双方以自己的方式激战不休。守军的投石令巴希巴祖克一击之下便蒙受大量伤亡。虽然部分士兵知难而退，但大部分依然坚持进攻，利用其攻城梯攀爬城墙和栅栏，不过在墙头却只能被守军砍倒。朱斯提尼亚尼与其希腊、意大利部下得到了城中搜罗的各种火器的火力支援。经过约两小时苦战之后，穆罕默德召回了巴希巴祖克。他们被遏制并击退，但其削弱守军的目的已然达到了。

135

部分基督教士兵希望这不过使一次孤立的夜袭，目的为测试守军实力；他们都渴望获得喘息之机。但土耳其人不会给基督徒机会。在第二次攻击前，他们

几乎没有时间重整战线，重置栅栏前的木梁及盛土木桶。通过特有的军装与胸甲，人们判断出此次发动进攻的是伊萨克帕夏的安纳托利亚军团，他们如潮水般涌过罗马努斯门以外的小山，进入河谷，围绕着中城墙的栅栏。邻近的教堂，报警的钟声再次响起，不过很快就淹没在乌尔班大炮炮群的轰鸣之中。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安纳托利亚军团发起了冲锋。与巴希巴祖克这样的非正规军不同，安纳托利亚军团装备较好，纪律严明，作为虔诚穆斯林，都渴望获得第一个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光荣。在狂暴的军乐声中，他们冲向栅栏，踩着彼此肩膀搭起攻城梯，并试图向城头杀出一条血路。乌云遮月，火光昏暗，战场局面一时难于分辨。安纳托利亚军团与之前的巴希巴祖克一样，在狭小的战线反而受到其人数的拖累。守军飞石如雨，不断推倒攻城梯，并与敌军展开白刃战，安纳托利亚军团的纪律与坚韧仅仅徒劳地增加了其伤亡。拂晓前一小时，第二次攻击已显疲态，然而此时一发乌尔班重磅炮弹准确命中了栅栏，并将它击垮了相当长一段。空气中扬起了漫天尘土，火药形成了黑烟也阻碍了守军视线。一支约三百人的安纳托利亚部队乘机冲向新形成的这个缺口，并高呼城市已尽在自己手中了——但在皇帝君士坦丁的领导下，基督教士兵包围了他们并歼其大部，剩余的残兵不得不退回护城河。这次失利挫败了安纳托利亚军团，进攻被取消，他们也退回了自己的阵线。在胜利的欢呼中，守军又一次开始修复栅栏。

136

在其他地段，土耳其军也缺乏进展。在南部的陆墙一线，伊萨克持续施压以阻止守军驰援莱卡斯河谷，但是，由于其自身精锐被抽调，他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突袭。在马拉马拉海一带，哈姆扎贝伊的舰队甚至难以接近海岸，少数登陆的士兵也被此处防守的修道士或奥尔汗王子一部击退。至于金角湾的舰队，只是摆出佯攻姿态，并无发起攻击的意图。布雷契耐区一带的战斗比较激烈。在港口附近的低地，扎加诺斯率军度过浮桥发起了坚决的进攻，而高地的斜坡上，卡拉德贾的部队与之遥相呼应。不过米诺托及其威尼斯战友抵住了扎加诺斯的攻势，博基阿尔迪兄弟所部则负责抵御卡拉德贾的攻击。

137

据说，苏丹对安纳托利亚军团的失败暴怒不已。不过，这有可能是他有意

为之——就像之前的巴希巴祖克军团一样，用安纳托利亚部队去消耗守军，而非指望他们一蹴而就。苏丹已经为首个突破栅栏的士兵开出了高额悬赏，不过内心里还是更期望此项殊荣由自己的亲兵——加里沙尼军团（即新军）获得。将这支精锐投入战斗的时机到了。苏丹对此也深感焦虑，因为一旦新军也遭遇挫折，攻城便难以为继了。穆罕默德迅速下达了攻击令。在基督徒能够得到休整并精心修缮栅栏之前，一阵枪林弹雨洒向了他们，在这一番射击后，土耳其新军迈着整齐步伐，开始快速向城墙行军，与巴希巴祖克或安纳托利亚军团杂乱的冲锋不同，他们的阵列井然有序，并不受敌军箭矢的干扰。为他们助威的军乐声势如此巨大，以至于透过炮击的间隙，远在中城墙右侧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也清晰可闻。穆罕默德二世亲自来到护城河后督阵，并对眼前经过的亲兵们高声鼓励。加里沙尼军团发起了波状攻击，骁勇顽强的士兵们涌向栅栏，扯下悬挂其上的木桶，劈开加固的木梁，并在适当位置安放云梯，他们前仆后继，无所畏惧，攻击一批又一批地反复着。基督徒已经筋疲力尽了，在超过 4 小时的战斗中，他们的喘息时间寥寥无几，不过守军深知一旦后退将万劫不复，于是仍然拼死作战。在他们身后，教堂的钟声再度响起，市民们祈祷的低语缓缓升入天际。

栅栏附近的战斗已进入白刃战。在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加里沙尼军团几乎没有进展。基督徒们甚至认为对方的攻势已经开始减弱。只可惜命运弄人。在布雷契耐城墙与赛奥多西城墙交接的转角处，有一处城楼半遮蔽下的偏门，被称作科克波塔（Kerkoporta）。多年以前它便处于关闭状态，但老人们还记得它的存在。恰恰在围攻发起前，为了方便突击敌人侧翼，科克波塔门再度被开启。可是如今某些战斗归来的士兵却忘了关上身后的小门。一些土耳其人注意到了这条入口并借此冲进了城台，顺着楼梯向城墙顶端进发。门外的基督教士兵目睹此情此景，急忙回师夺回了科克波塔门以阻止更多敌军通过。混乱之中，大约 50 名土耳其军进入了城墙，如果不是一桩惨祸降临的话，他们本来是很可能会被在此围歼的。[186]

日出前片刻，一颗近距离射出的手铳子弹击中了朱斯提尼亚尼并穿透胸甲。

由于血流不止及巨大的创痛，他恳求部下们将他带离战场。一名部下奔向在附近作战的皇帝，并要求通往内城墙的小门钥匙。君士坦丁闻讯急忙赶到朱斯提尼亚尼身边，希望他不要放弃战斗。但后者的神经已然崩溃，他坚持撤退。门打开了，他的卫兵护送他穿过城市，来到码头，并登上了 1 艘热那亚船只。他的军队注意到主将的撤离。[187] 其中的一些人或许认为朱斯提尼亚尼只是退往内城墙防守，但更多人认定战役已经失败了。部分士兵恐惧地高喊土耳其人已经突破城墙了！在小门关闭前，热那亚人蜂拥般从此逃命，唯独留下皇帝与希腊士兵孤军奋战。

这一阵恐慌被护城河边的苏丹发现，他振臂高呼："这座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他命令新军再次发起冲锋，并召唤由一位名叫哈桑（Hasan）的大力士率领的连队投入战斗。哈桑在残破的栅栏中劈开一条血路，向着成为首个入城者的奖赏奔去，大约 30 名新军士兵紧随其后。然而哈桑本人被投石击中，倒地阵亡，大约 70 名同僚也一并战死。不过剩余的士兵守住了突破口，并且不断得到涌来的新军支援。希腊人坚持抵抗，但敌军的庞大数量迫使他们退往内墙。内墙前有一道沟渠，某些地方被挖掘得很深以便获得泥土加固城墙防御。于是很多撤退的希腊士兵受困于深沟之中，身后高耸的内城墙也显得遥不可及。已登上外城墙栅栏的土耳其军居高临下，开火射击，这不啻一场对希腊人的屠杀。很快，大量新军抵达内墙，未经抵抗，便攀爬而上。不久后，有人发现科克波塔上方城楼升起了土耳其国旗，土耳其全军发出阵阵欢呼："城市已经攻占了！"

139

当皇帝正在劝说朱斯提尼亚尼时，他被告知土耳其军突破了科克波塔门，他立即骑马赶赴那里。不过一切都太迟了。热那亚人中四处散布着恐慌，混乱之下，关上大门已无法实现。土耳其士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博基阿尔迪兄弟手下兵力不足，难以将其击退。君士坦丁翻身上马，飞奔回莱卡斯河谷一带中城墙的突破口，身边仅余三骑，分别是自称为皇帝表亲的西班牙人托莱多的唐·弗朗西斯科，他的亲堂兄弟狄奥菲鲁斯·帕列奥列格，以及忠心耿耿的侍卫约翰·达尔马塔（John Dalmata）。他们四人徒劳地期望能够重整希腊军队，但大屠杀已经难于遏制了。他们下马并一度坚守了朱斯提尼亚尼撤走的那道小门几分钟，但现在防御已分崩离析。大门处挤

满了忙于逃命的希腊士兵，越来越多的加里沙尼军团在其后紧追不舍。狄奥菲鲁斯高喊道：与其苟且偷生，毋宁以死殉国！随即他便消失在人潮之中。君士坦丁此刻深知，他的帝国已然覆灭，而他也不愿苟活于世。他扔掉自己的皇家纹章，与仍在左右的弗朗西斯科、达尔马塔一道，追随狄奥菲鲁斯而去。这是皇帝最后一次露面。① 140

城市已经失陷的呼喊在街头回荡着。从金角湾及其海岸，基督徒与土耳其人都看到了布雷契耐城楼上升起的土耳其国旗，而仅仅几分钟之前，拜占庭双头鹰与圣马可雄狮[188]还在这里飘扬。各处的抵抗依旧持续了一段时间。科克波塔门附近，博基阿尔迪兄弟率部坚持在城头战斗，但很快他们意识到已经无力回天，于是从敌军中杀出一条血路奔向金角湾。三兄弟中的帕罗被俘并被杀害了，不过安东尼奥与特洛伊罗成功登上一条热那亚小船，后者成功避开了土耳其舰只的注意，安全抵达佩拉区。在他们侧翼，布雷契耐皇宫一带，米诺托及其威尼斯部下被重重包围，许多人阵亡，而米诺托本人与他手下的显贵们则沦为了阶下之囚。②

---

① 我从不同资料来源中得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首先来自现场目击者，Phrantzes, *op. cit.* pp. 280-7; Barbaro, *op. cit.* pp. 51-7; leonard of Chios, coll. 940-1; Tetaldi, coll. 1822-3; Pusculus, *op. cit.* pp. 80-1; Montaldo, *op. cit.* pp. 335-8; Riccherio, *La Presa di Constantinopoli*, in Sansovino, *Dell'Historia Universale*, ii, pp. 64-6; 'The Polish Janissary', pp. 132-4; Critobulus, *op. cit.* pp. 67-71; Ducas, *op. cit.* xxxix, pp. 351-61，以上无疑从目击者中直接得来。土耳其资料仅有简短记载，由萨德·艾丁复述：Saad ed-Din, pp. 21-8。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354-5，提供了一简要记载并未增加新的内容。*The Slavic Chronicle*, pp. 124-5. 提供了对于战斗含混不清的记载。关于科克波塔门的位置，参见：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pp. 89-94. 关于朱斯提尼亚尼的伤情，资料中众说纷纭。弗朗茨认为他脚部受伤，而卡尔科孔狄利斯则认为是手部，莱昂纳德说他被弓箭射中了腋窝，克里托布拉斯却声称是被枪弹击穿了胸甲。很可能他某处身负重伤。巴尔巴罗出于对所有热那亚人的厌恶，对朱斯提尼亚尼的受伤只字未提，仅谈到了其擅离职守。对此所有资料来源倒并无异议。

② Phrantzes, *op. cit.* pp. 287-8; Barbaro, *op. cit.* pp.57-8. 弗朗茨认为帕罗与安东尼奥成功逃出生天，而未提及特洛伊罗，不过根据佩拉总督的信件 (ed. de Sacy, *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Roi*, xi, i, p. 77)，帕罗被俘并遭到了处决。看来是弗朗茨将帕罗与安东尼奥混淆了。

目睹声称城墙入口已被土耳其大军瞬间掌握的信号，金角湾的土耳其舰队急忙派员登陆海滩，进攻海墙。除赫利亚门（Horaia Gate）[189]以外，他们未遇激烈抵抗。而在这座城门，两艘克里特船只的海员凭借三座城楼殊死抵抗，拒绝投降。在其他地方，希腊人纷纷逃回家里以期保护自己的家人，而威尼斯人则奔向自己的船只。不久之前，一支土耳其部队刚刚通过了位于瓦伦斯水道桥一带的普拉蒂亚（Plataea）门，另一支则通过了赫利亚门。不论他们通过何处，都会派出分遣队，迅速打开更多大门以放入城外等待的友军。附近的渔民发现大势已去，便主动打开了佩崔恩门（Gate of Petrion），以换取土耳其人不侵犯他们家园的许诺。①

141　莱卡斯河谷以南的陆墙沿线，基督徒成功顶住了土耳其的攻击。但此时此刻，越来越多的敌军通过城防缺口涌入市内，四散开去，打开了所有城门。在城墙作战的士兵们发现自己陷入了重围。在企图逃生的过程中，很多人被杀死了，不过多数的指挥官，如威尼斯人菲利波·孔塔里尼及德米图斯·坎塔库震努斯，均被生俘。②

马拉马拉海中哈姆扎贝伊的舰队同样看到了信号，并派兵上岸进攻城墙。在斯塔迪昂区及萨玛西亚（Psamathia）区，为了避免住家与教堂遭到劫掠，守军望风而降，土耳其军因此未遇抵抗。③但在他们左翼，土耳其王子奥尔汗及其部属深谙倘若落入苏丹手中会有何下场，决心拼死一搏；④驻扎在旧皇宫的加泰罗尼亚部队也坚持到了最后时刻，直至全军覆没。⑤负责守卫阿克罗波利斯角的伊斯多尔枢机主教发现情势危急，需要离开岗位以自保了，于是他乔装打

① Saad ed-Din, p. 23. Ahmed Muktar Pasha,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p.228. 对于佩崔恩区的渔民参见：本书附录二，英文版第 203 页。

② Barbaro, *op. cit.* pp. 59, 61; Phrantzes, *op. cit.* p. 293.

③ 参见：本书附录二，英文版第 203 页。

④ Critobulus, *op. cit.* pp. 74-5; Ducas, *op. cit.* xxxix, p. 379;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98.

⑤ leonard of Chios, col. 943; Podestà of Pera, p. 77.

扮[190]，开始亡命之途。①

虽然苏丹依然控制着部分军队作为其卫队或宪兵，但多数将士已经陷入洗劫城市的狂热之中。水兵们由于担心被陆军抢占头功，显得尤为急不可耐。由于自忖在海链阻隔下基督教舰队已成瓮中之鳖，可留待空闲之时再来捕获，他们忙乱地弃船上岸了。他们的贪婪拯救了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当包括特拉维森在内的一些希腊、意大利海员被俘获之时，其他人却未受土耳其人阻止，成功与留在舰上的那些骨干船员会合，并做好了战斗准备。还有很多人在起锚前仓促地爬上了军舰，甚至泅渡而来［例如佛罗伦萨人铁达尔迪（Tetaldi）］。在目睹城市沦陷后，舰队司令阿维索·狄多乘一叶轻舟前往佩拉，询问热那亚当局意向——究竟是希望他们的同胞留在港湾继续战斗，还是打开海链放他们一条生路？他许诺无论做出何种决定，他的威尼斯籍船只必会唯马首是瞻。佩拉总督则建议说不妨派出一名特使面见苏丹，让他在任由基督教舰队离去与冒险和威尼斯、热那亚开战之间做出选择。但这项建议在当时无异于与虎谋皮，在此同时，根据巴尔巴罗（威尼斯军医）的日记记载，佩拉总督关上了城门，以致狄多无法和战友们会合。然而船上的热那亚水手们却在佩拉城墙外下锚，并声称希望与威尼斯人一道离去。在他们的坚持下，狄多获准乘坐他的单桅小船离开。他径直驶向金角湾海链，后者此时依然是关闭着的。两名狄多麾下的水手用斧头砍断了将海链一端系于加拉塔城楼的皮绳，于是海链顺势漂开了。[191]在向港湾的舰只发出跟随的信号后，狄多驾船驶过了这条缝隙。7 艘来自佩拉的热那亚船紧随其后，很快，大部分威尼斯战舰、4 至 5 艘拜占庭帆船以及 1 到 2 艘热那亚战船也加入进来。他们尽可能地多停留片刻，以便尽量搭救那些游向他们的难民，随后整个舰队通过海链，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等待了约一小时，期

142

① Riccherio, *op. cit.* p. 66; 'Rapporto del Superiore dei Franciscani', quoted in *Cronica de Bologna* (Muratori, *R.I.Ss.*, xviii, pp. 701-2);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99. 三封罗马寄给费拉拉枢机主教的信，提供自：Jorga, *Notes et Extraits*, ii, pp. 518-20, 给了这故事以细节。铁达尔迪在写他的报告时，认为枢机主教已经殒命：Tetaldi, col. 1823.

望能与逃出生天的其他舰只会合，但未能如愿。他们随即乘着强劲北风，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南下马拉马拉海，向着自由驶去。①

哈姆扎贝伊旗下大批水手此时已擅离职守，进城大肆劫掠，故而无力阻止狄多舰队的行动。他聚拢尚听号令的舰只，通过残破的海链，进入金角湾。在这里的港口，他俘获了剩余的基督教舰只——4至5艘拜占庭帆船，2至3艘热那亚帆船以及全部威尼斯非武装商船。它们中的大多数由于收留了过多难民而严重超载，故而无法出航。一些小船依旧企图溜向佩拉区，但在光天化日之下要躲避土耳其人实在是太难了。到中午时分，整个港湾区都已经被土耳其人掌控了。②

143

市区里还存在小股抵抗。金角湾入口处，克里特水手们以三座城楼为依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到下午早些时候，他们发觉自己已然完全孤立，终于不情愿地向土耳其指挥官投降了，条件是他们的生命与财产需得到保障。他们的两条船随即在城楼附近靠岸，土耳其人对其英勇也敬佩不已，没有施加任何阻挠，于是他们登舰启程，驶向克里特岛。③

苏丹得到胜利的消息已有数小时之久了。黎明时分，他的部下便突破了外墙栅栏，随后，当苍白的月亮尚在天际，穆罕默德便来到前线视察突破口。④不过他一直等到下午，在最初的屠杀与劫掠得到控制后，方才举行盛大的入城式。与此同时，他返回营帐，接见了惊恐的市民及佩拉总督个人派出的代表团。⑤苏丹也急于知晓拜占庭皇帝的下落。但这已成为一桩历史悬案。稍后在黎凡特的意大利殖民地流传的故事讲到，两名土耳其士兵自称杀死了君士坦丁

---

① Barbaro, *op. cit.* pp. 57-8; Podestà of Pera, p. 75; Ducas, *op. cit.* xxxix, pp. 371-3. 达卡斯声称仅有5艘热那亚船只逃脱。

② Barbaro, *op. cit.* pp. 58-9; Ducas, *op. cit.* xxxix, p. 373.

③ Phrantzes, *op. cit.* pp. 387-8.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148页。

④ 传统说法认为，土耳其旗帜之所以采用星月图案，一个重要原因是穆罕默德进城时恰逢弯月高挂天空。

⑤ Ducas, *loc. cit.* 参见：本书附录二，英文版第201页。佩拉总督本人对于派遣代表团一事语焉不详。见：Ducas, Podestà of Pera, p. 76.

并向苏丹献上首级，其身份得到了被俘的拜占庭大臣的确认。穆罕默德将首级置于奥古斯塔广场[192]的圆柱示众了一段时间，随后将头颅送往伊斯兰世界各王庭展示。不过君士坦丁堡战役的亲历者诉说了不同的故事，巴尔巴罗的记载中谈到有人称在一堆尸骸中见过皇帝的尸体，而其他人坚持它从未被发现。佛罗伦萨人铁达尔迪的记载同样表示，有人说皇帝被砍了首级，也有人说他死于城门附近的战斗。任何一个版本都可能是真实的，铁达尔迪进而写道，因为皇帝显然是死于乱军之中，而土耳其人斩下了大部分尸体的首级。皇帝的密友弗朗茨尽力寻找更多细节，但他仅仅得知，当苏丹派人寻找皇帝尸体时，人们清洗并献上了多具尸首或头颅以期从中验明正身。最后有一具尸体被发现袜子及护胫套上有双头鹰标志，它便被假定为君士坦丁，接着苏丹将遗骸转交给希腊人安葬。但弗朗茨本人并未目睹，对于这具尸体的真实性有些怀疑，他也无法找到坟墓的确切之处。多年以后，一座位于韦法（Vefa）区的无名冢被信徒们认定是君士坦丁的墓地，但它的可信度从未得到证实，今天已经被忽略与遗忘。①

144

无论细节如何，穆罕默德都对皇帝的死讯都感到满意。现在他不仅仅是土耳其苏丹，而且俨然已成为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了。

---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90-1; Ducas, *op. cit.* xl, p. 377;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399; *Historia Politica*, p. 23; Barbaro, *op. cit.* p. 53; Tetaldi, col. 1823; Pusculus, *op. cit.* p. 81; Montaldo, p. 338; Saad ed-Din, p.31; *Slavic Chronicle*, p. 126 (Russian version, p. 102, Roumanian version, p. 87), 书中记载头颅埋在圣索菲亚教堂祭坛下而躯体葬于佩拉。《波兰新军日记》第133页记载头颅是被一名叫做安德鲁的农民辨认出的。而传说中皇帝位于伊斯坦布尔韦法的坟墓并无史料予以支撑。

第十一章　战败者的命运

145　自第一位伟大圣战者奥马尔（Umar ibn al-Khattāb, Caliph Omar）[193] 哈里发以来，伊斯兰传统便要求善待被征服者。如果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主动向征服者投诚，它将不会遭到劫掠，但有可能需缴纳一定赔偿金，它的基督教或犹太居民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场所及信仰习惯。甚至当防守者是在走投无路之下被迫投降时，这项宽大政策依然有效，不过征服者提出的条件将更加严苛，罚金会大大提高，顽固之敌将被施加一定惩罚。但如果城市被武力攻占，其市民就毫无权利可言。征服者的军队被允许劫掠三天，宗教建筑与其他建筑一样，都会沦为征服者的战利品，而后者可凭喜好对市民任意处置。

穆罕默德苏丹早先同样给予士兵们劫掠三日的权利。于是他们便蜂拥而入。在第一批军队攻破城墙后，苏丹坚持必须恢复一定纪律。各部队在音乐及彩旗的伴随下，一个接一个有序地进城了。然而一旦他们进入城市，就变成了疯狂搜寻战利品的野兽。起初他们并不相信抵抗已经停止了，[194] 于是他们不加区别地杀死在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妇孺老幼。从佩特拉高地至金角湾一带的街道顿时血流成河。不过很快，屠杀的欲望得到了抑制。士兵们发觉，俘虏与财宝，而非尸体，对他们更有益处。①

① Barbaro, *op. cit.* p. 55; Phrantzes, *op. cit.* pp. 288-9; Critobulus, *op. cit.* pp. 71-3. 圣玛丽教

那些突破栅栏或科克波塔门的士兵们，很多转而前往布雷契耐的皇宫大肆劫掠。他们制服了此地的威尼斯守军，开始抢夺它的全部财富。他们将值钱的封面和画框剥下后，便将书籍与圣像付之一炬，并且凿下墙壁上的马赛克或大理石。其他人则前去城墙附近那些规模不大，但富丽堂皇的教堂，如查瑞休斯门附近的圣乔治教堂，佩特拉的圣约翰教堂，以及美丽的科拉教堂[195]，他们夺走了教堂的金属餐具、祭袍以及一切可劫掠之物。在科拉教堂，土耳其人放过了马赛克及壁画，但却破坏了整个拜占庭最神圣的圣母像“赫德歌利亚”（the Hodigitria）——据说它是使徒圣路加亲手所画。该圣像是围攻开始之时，临时从它原本栖身的皇宫附近教堂搬至这里的，以便鼓舞城墙守军的斗志。此时却被取出画框，并被劈作四块。士兵们继续着劫掠，一些闯入附近民居，一些则奔向巴扎（市场）及位于市区东部高地的宏伟建筑。② 146

从金角湾弃船登陆的水手们已经通过普拉蒂亚门进入市区，并将城墙一带的货栈席卷一空。他们中的一些人偶遇一群准备前往圣赛奥多西亚教堂祈求保佑的妇女（5 月 29 日正好是圣赛奥多西亚的节日），就将她们聚拢来当作战利品分配了，接着他们来到由玫瑰装扮的教堂，将它洗劫一空，连其间的信徒们，也被掠为奴隶。③另一些人越过高地，与自陆墙而来的士兵会合，前去洗劫神圣救主教堂（Church of the Pantocrator）、基督见证教堂（Church of the Pantepoptes）及邻近的一些修道院。④还有一些从赫利亚门入城的土耳其人，为了翻越朝向大竞技场及阿克罗波利斯的小山，一度暂停了对巴扎区的劫掠。与此同时，从马拉马拉海登陆的水手们，则冲向旧皇宫。虽然它的殿宇已经破败， 147

堂（蒙古的）又被土耳其人称作“血教堂”，因为从佩特拉高处流下的血液途经它。

② Ducas, *op. cit.* xxxix, p. 363.

③ Ducas, *op. cit.* xxxix, p. 369.

④ 考古结果表明神圣救主教堂的确遭到了洗劫。金纳迪乌斯也是在该地被俘。金纳迪乌斯似乎最初退隐在恰尔斯亚尼茨修道院内（参见：Beck, *Kirche und theologische Literaturt* p. 760.）但是在 1452 到 1453 年的冬天，他在圣主修道院（被俘）。(Ducas, *op. cit.* p. 315).

但在附近仍有一些精美的教堂，如瓦西里一世（Basil I）[196] 于五个世纪前兴建的"新教堂"——它们都遭到了彻底的洗劫。接下来，来自两支舰队的海员与首批入城的陆军合兵一处，开始向圣索菲亚大教堂前进。①

索菲亚教堂此刻正挤满了难民。人们匆匆终止了圣餐仪式（Holy Liturgy），唱起了晨祷（matins）。教堂铜门外人声鼎沸，门内的会众则期待着奇迹发生。但此刻的祈祷已经无济于事。不久之后，教堂的大门轰然倒下，信徒们只好束手就擒。部分老人及婴儿被认为缺乏价值，惨遭屠戮，但多数人被捆绑起来，沦为奴隶。妇女们的头巾和面纱，被土耳其人撕下当作了绳索，而俘虏中的美丽女性、少年及贵族们，则成为了土耳其士兵激烈争夺的战利品。很快，俘虏们不分男女，匆匆分类后像牲口一般被拖拽着走向奥斯曼人的营地，在那里，又少不了一场分赃的争吵。教士们继续在祭台上吟唱着赞美诗，直到他们自己也被捆绑起来。据一些信徒所称，在最后时刻，有人看见几位神父怀揣最珍贵的圣器，消失在教堂的南墙中，而当有一天索菲亚教堂再度光复时，他们才会重现于世。②

洗劫持续终日。各男女修道院，均被土耳其人闯入，其僧侣沦为了奴隶。一些年轻的修女担心被俘后遭到侮辱，便纷纷投井自杀了。但多数修士及年长的修女，都遵循着古老的东正教传统，在入侵者面前不做抵抗。私人宅邸也遭到了系统的劫掠，强盗们甚至在每一个被抢光的住宅门前插下一面小旗，以便提醒同僚。居民与财产一道被掠走，而老弱病残则往往遭到杀戮，甚至包括部分"无用"的婴儿——不过普通人的性命还是保住了。城市中仍然有许多图书馆，一部分是世俗的，但更多的已成为修道院藏书馆。大部分图书被付之一炬，不过尚有精明的土耳其人意识到图书价值，保留了其中一部分以留待日后出售。教堂里不断上演着亵渎神灵的一幕。许多镶嵌珠宝的十字架在土耳其头巾覆盖

148

① Ducas, op. cit. xxxix, p. 365; Critobulus, *op. cit.* p. 75.

② Phrantzes, *op. cit.* p. 290; Critobulus, *op. cit.* pp. 75-6; leonard of Chios, col. 941-2.

下被洋洋得意的士兵们取走，许多建筑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①

到了夜幕时分，君士坦丁堡可供劫掠之物已经所剩不多了。当苏丹提出，洗劫活动到此为止时（穆罕默德原本许诺三天时间），无人表示异议。士兵们的收获如此丰富，以至于接下来的两天，分配赃物，清点俘虏就足以占据他们大部分时间。有传言说，土耳其人获得了5万俘虏，其中仅有500战俘。基督教军队的残部除少数自海路逃生以外，大部被歼灭。据说拜占庭方面的死亡人数，包括平民在内，共计4000人左右。②[197]

苏丹本人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入城。在精锐新军卫队及大臣们的陪同下，他策马缓缓向圣索菲亚大教堂走去。在教堂大门外，苏丹下马躬身，拾起一捧泥土，从自己头巾上撒下，以示对真主谦逊之意。随后他进入教堂，并默默驻足片刻。当他开始走向祭坛时，发现一名土耳其士兵正在试图开凿大理石地板——穆罕默德不禁勃然大怒，他斥责这名士兵，告诉他城市的建筑物是苏丹专享的战利品。此刻角落里还有几名瑟瑟发抖的希腊幸存者，苏丹大度地准许他们平安返家。接着，从祭台后的密道走出几位教士，他们恳请苏丹的慈悲。他们也在苏丹的保护下得以安全离开。不过，穆罕默德坚持，索菲亚大教堂需立即改建为清真寺。他的一位回教高僧（Ulema）[198]登上祭坛，高呼唯有安拉，别无他神。苏丹本人也走上祭坛，匍匐在地，感谢为他带来胜利的真主。③

149

离开教堂后，苏丹骑马穿过奥古斯塔广场，走向旧皇宫。目睹皇宫一片凋

① Barbaro, *op. cit.* p. 57; Critobulus, *loc. cit.*; Ducas, *loc. cit.*; Franciscan report, coll. 701-2.

② Critobulus, *op. cit.* p. 76，他提到总计有约4000人被害，50000人被俘。leonard of Chios, col. 942，记载有60000俘虏。这两个被俘数字无疑都有所夸大，因为当时全城人口应该不超过50000人。Franciscan report, *loc. cit.* 则认为被害人数是3000左右。

③ The Slavic Chronicle, p. 127 (Russian version, p. 105, Roumanian version, pp. 86-7)，该书记载的细节最为丰富，虽然增添了一位虚构的大牧首形象，应该是从亲历者处获取了资料。Ducas, *op. cit.* xxxix, p. 375，书中记载了土耳其士兵企图开凿地板的事实不过错把苏丹入城时间记为30日（如果苏丹在那时才入城地板想必已被凿开了）；Phrantzes, *loc. cit.* Ashikpashazade, p. 199. 简短记载了下一个周五在教堂中进行了一场穆斯林祷告。

敝破败的景象，据说苏丹触景生情，低吟起某位波斯诗人[199]的诗句：“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枭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挽歌。”①

随着苏丹对整个城市的检阅，秩序得到了恢复。他的军队对战利品心满意足，在宪兵的注视下各自返回了军营。于是苏丹也通过平静的街道，回到自己的营帐。

第二日，苏丹下令将所有战利品陈列于其帐前，以挑选属于自己的一份，并检视其军队在此方面是否有僭越之举。他将俘虏中的贵族与高级官员挑选出来，由自己支配，并立即释放了大部分名媛贵妇，甚至还赠予她们金钱，以便其赎回家人；但对于其中美貌的少男少女，他则纳入了自己的后宫。很多其他的年轻人也被释放，甚至在改宗后，被允许进入土耳其军队担任一定职务。一些人放弃了基督教，不过更多人冒着受罚的风险，还是选择坚持信仰。在俘虏中穆罕默德还发现了位高权重的“大公”诺塔拉斯及其他 9 位拜占庭大臣。他亲自为他们支付了赎金，给予优待，甚至释放了诺塔拉斯及另两三位大臣。但还有很多拜占庭官员，包括皇帝的秘书弗朗茨，其身份未得到认定，依然过着囚徒的生活。

150 对于意大利的俘虏们而言，境遇就要凄惨得多了。米诺托及其一子，被判处死刑，一同赴难的还有另外 7 名威尼斯领导人。其中包括卡塔里诺·孔塔里尼（Catarino Contarini），他一度被从扎加诺斯帕夏的军队中赎回，但又一次被捕，并被索要额外的 7000 金币赎金——这笔天文数字，他的朋友们无人能够偿付。加泰罗尼亚领事佩雷·朱里奥与 5 至 6 位同僚也被处死。莱昂纳德总主教也被俘虏，但无人识破其身份，最后被一位来到土耳其军营营救同胞的佩拉区热那亚商人赎走。伊斯多尔主教甚至更为幸运。他将自己的主教长袍与一名乞丐的破烂衣衫交换，乔装打扮之后，他可怜的替身被抓获并处死，而他自己则被低价

① Cantemir, History of the Othman Empire, trans. Tindal, p.102，给出了诗句的波斯原文，但未注明出处。

“贱卖”给一位认出他的热那亚商人。土耳其王子奥尔汗也尝试着化装逃生，在换上一套希腊修士服后，他自忖依靠他长期在希腊生活的经验，足以蒙混过关，不料却遭到一名被俘同伴的揭发，随即被斩首示众。

负伤的朱斯提尼亚尼所乘的那艘热那亚帆船成功地自金角湾逃出生天。他于希俄斯岛上岸，一天或两天后，伤重不治。对他的部下而言，朱斯提尼亚尼仍不失为一名英雄，但对于希腊人和威尼斯人而言，尽管人们敬重他在围城期间的英勇与领导能力，但却为他的晚节不保而扼腕，甚至认为他有逃兵的嫌疑。面对伤痛与死亡，他本应表现得从容不迫，而不是临阵脱逃，以致守军有全盘崩溃之虞。甚至很多热那亚人也为此感到耻辱。莱昂纳德总主教对他不合时宜的恐慌责备尤甚。

希腊俘虏们的命运则各不相同。在传统习惯中为期三天的劫掠时间过去后，苏丹下诏告诉全体自由的希腊人（包括被赎回的）各自回家，他们的财产将得到保护。但此时的自由民，以及可供居住的宅邸，已经所剩不多了。据说，苏丹挑选了400童男童女，作为礼物，送给当时三位重要的伊斯兰统治者——埃及苏丹，突尼斯国王及格兰纳达国王。① 许多希腊家庭再也未能团圆。诗人马修·卡马里奥特（Matthew Camariotes）在他的一首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挽歌中写道，他与朋友如何绝望地寻找自己的亲人。他本人失去了儿子与兄弟，稍后他得知，其中一些被杀，而另一些则失踪了，并且他耻辱地发现，他的一位侄子为了活命，居然放弃了自己的信仰。②[200]

151

穆罕默德对拜占庭大臣的仁慈，事后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他曾经谈到，让诺塔拉斯担任君士坦丁堡市长一职。即使这番表示是发自内心的，他也很快改变了主意。苏丹的多疑常常会战胜他的宽宏，并且他的顾问警告他不可

① Barbaro, *op. cit.* pp. 57-61; Podestà of Pera, p. 77; leonard of Chios, col. 943. Franciscan report, col. 702. 关于伊斯多尔历险的参考资料，参见：上面所引的著作，p. 141, n. 5.

② Matthew Camariotes, *De Constantinopoli Capta Narratio Lamentabilis*, *M.P.G.*, clx, coll. 1068-9.

信任这位拜占庭大公。于是苏丹对诺塔拉斯的忠诚进行了一番测试。城破五日后，穆罕默德举行了一场宴会。酒酣之际，有人低声告诉他，诺塔拉斯 14 岁的儿子是一名英俊少年。于是苏丹当即派遣一名宦官前往诺塔拉斯宅第，要求后者将儿子送到宫中供苏丹享乐。诺塔拉斯两位儿子在战役中阵亡，此时仅余这唯一幼子，因此拒绝服从命令。随后他与儿子、女婿（为拜占庭陆军司令安德罗尼库斯之子）被逮捕并送到苏丹面前。当诺塔拉斯再次拒绝苏丹后，苏丹下令将大公与儿子、女婿一并处死。诺塔拉斯最后的要求仅仅是希望先杀死两位年轻人，以免他们目睹自己的惨状而发生动摇。随后大公也引颈就戮。第二天，152 其余 9 位被俘大臣也被逮捕，并送上了断头台。据说事后苏丹也产生了悔意，并惩罚了激起他疑心的顾问。但有可能这只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苏丹或许早就暗下决心，要铲除残留的拜占庭统治阶层。①

他们的女眷也再次沦为了囚徒，并同其他俘虏一道，随苏丹宫廷返回了阿德里安堡。诺塔拉斯的遗孀途中于梅希尼（Messene）附近的一个村庄病逝。她具有皇室血统，在君士坦丁皇帝母后逝世后，她事实上成为拜占庭的“第一夫人”，其仁慈与高贵甚至深得丈夫政敌的敬重。② 他们的一个女儿安娜，早先已

---

① Ducas, *op. cit.* xl, p. 381,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402-3, 达卡斯素来不喜欢诺塔拉斯，此处他的记载反而显得更为可信。Critobulus, *op. cit.* pp. 83–4, 克里托布拉斯也没有为苏丹尊者讳。leonard of Chios, col. 943，虽然主教对诺塔拉斯素无好感，但也记录了此事，并提到大公在临刑前怒斥土耳其人。唯有弗朗茨提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对大公颇有诋毁，见 Phrantzes, *op. cit.* pp. 291-3. Montaldo, op. cit p. 339. 指控诺塔拉斯变节但也提及了他儿子的故事。

② Ducas, op. cit. XLII, p.395. 诺塔拉斯妻子的身份已无从考证。根据书信记载［如金纳迪乌斯所书 (e.g. *M.P.G.* clx, col. 747)］，他被称作驸马 (*γαμβρὸς τοῦ Βασιλέω*)。如果他的妻子为曼努埃尔二世与海伦娜皇后之女，熟悉其家族并详细记载的弗朗茨不可能未作提及。由于 1453 年时她的儿子不过十余岁，她应该出生于 1400 年以后。曼努埃尔作为一位忠贞的丈夫，也不可能拥有私生子。我个人不认为拜占庭人会错用驸马一词来形容婚姻关系。她想必为曼努埃尔侄子——约翰七世之女，后者与一加提卢西王公之女婚后虽无子，但可能生有一女（无论庶出或嫡出）。Papadopoulos, *Versuch einer Geneologie der Palaiologen*, p. 90, 书中声称她为德米图斯 · 坎塔库震努斯之女，但此说

成功携带部分家族财产，逃亡意大利。[②]

弗朗茨对诺塔拉斯的敌意，甚至在后者遭受如此不幸后，也未能消解，他不但对大公之死拒绝表示同情，其相关历史记载也颇多失实之处——然而类似的悲剧也在他身上发生了。在他筹集资金赎回自己与妻子自由之前，不得不为苏丹马夫充当了 18 个月奴隶。他的两个子女（均为君士坦丁皇帝教子），被送入了苏丹后宫。女儿塔玛很快死去，儿子则因拒绝满足苏丹欲望而被杀死。[③]

6 月 21 日，苏丹及宫廷离开新征服的城市，返回阿德里安堡。身后的君士坦丁堡，死气沉沉，四处是纵火后的黑色余烬，抢劫一空，几成废墟。凡士兵所到之处，留下的只是一片荒芜。教堂遭到劫掠和亵渎，民宅也不再适合居住，店铺毁坏严重，空空如也。苏丹策马穿过大街小巷，目睹此情此景，也不禁潸然泪下。“我们竟将如此一座城市置于洗劫和破坏的境地！”他嗫嚅着。

不过苏丹目光所至，城市倒也并非完全毁灭。中央高地一带的居民区，金角湾东半部的商业区，布雷契耐皇宫及周边贵族宅邸，还有阿克罗波利斯及竞技场附近的旧皇宫与教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破坏。然而尽管同时代悲恸的基督教作家们对洗劫的恐怖大书特书，我们依然惊讶地发现，在某些城区，教堂几乎秋毫无犯，基督徒的祷告也不受干扰。按照惯例，一座被武力攻取的城市，是无权保留其圣坛的。但当我们回想起君士坦丁堡此时状况，这个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拜占庭首都内，各城区与村庄常常间隔大片空地，当人们得知城破的消息后，部分城区的长官立刻精明地开门投降了。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护卫下，亲自将城区钥匙交至苏丹营帐，苏丹对此欣然接受，并派出部队保护归顺者的教堂和住宅免遭洗劫。因此，佩崔恩（Petrion）一带的教堂及邻近的帕那

153

于弗朗茨处得不到证实。至于 Lambros, *Συνθήκη*, pp. 153, 170, 我不知道其诺塔拉斯家族族谱基于什么证据。

②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186 页。Sathas, *Monumenta Historiae Hellenicae*, ix, p. vi. 书中表示安娜一度与君士坦丁皇帝订婚，不过这证据并不充分。

③ Phrantzes, *op. cit.* pp. 309-10, 383, 385.

(Phanar)区，由于该地的渔民自发打开了城门，免遭劫难。靠近马拉马拉海的萨玛西亚与斯道迪奥斯(Stoudios, Studium)，因其守军迅速向哈姆扎贝伊的舰队水兵投降，同样得以幸免。毋庸置疑，以上居民的确曾赎回过很多其他城区不幸被俘的同胞。如果不是因为免遭洗劫的缘故，他们是不可能有资金去营救战俘的。①

更值得注意的是，城中第二大教堂，圣使徒教堂，从浩劫中幸存下来，其财富安然无恙。该教堂坐落于通向查瑞休斯门的主干道旁，想必有无数土耳其士兵经过。既然已经夺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苏丹大概早已决定为基督徒保留圣使徒教堂，因此迅速地派兵予以保护。②

154 不过在往后的岁月里，苏丹们对于基督徒的宽容，似乎有所倒退，一座又一座教堂被挪作他用。但"征服者"穆罕默德，深知不可骑于马背上治天下，而力图将希腊与土耳其臣民一视同仁。罗马帝国灭亡了，但他视自己为恺撒的继承人，并专注于作为继承人的使命。③

首当其冲的是如何保障东正教会福祉的问题。数年来对东正教会的困境，苏丹早已有所耳闻，现在便更加心知肚明了。他了解到前任大牧首，联合派代表玛玛斯于1451年已经逃离拜占庭首都，并被视为自动放弃了职位。因此，推举新任大牧首势在必行，而这里已有一位合适人选，那就是备受尊敬的拒统派领袖，学者乔吉奥斯(Georgios Kourtesios Scholarios, George Scholarius Gennadius)[201]。

城破之时，乔吉奥斯正在圣主(Pantocrator)修道院自己的房间内。修道院宏伟的建筑立即吸引了入侵者的注意，一些人洗劫了财物，另一些则集中了修

① Critobulus, *op. cit.* pp. 76-7, 85; Ducas, *op. cit.* xlii, p. 395; Franciscan report, coll. 702; Podestà of Pera, pp. 76-7, 完成于6月23日的记载声称苏丹是前一天晚间离开的。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 107

② 参见：本书附录二。

③ 参见：本书附录二。

士们，并将他们贩卖为奴。当苏丹下令召见乔吉奥斯时，人们却找不到他的下落。最终得知，他已被卖给了一位阿德里安堡的土耳其富人。乔吉奥斯的高风亮节与博学多识给他的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使得后者有些局促不安——他获得了最大程度的优待。苏丹得知他去向后，很快派出使者将他接回了君士坦丁堡。

对于如何管理希腊臣民，苏丹心中已有几条基本原则。他们将构成一个米勒特（milet）[202]，即由君士坦丁堡大牧首领导的东正教徒自治社会团体，而牧首直接向苏丹负责。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乔吉奥斯接受了大牧首的任命。随后，苏丹尽可能召集了邻近主教们组成新一届“圣会”（Holy Synod）[203]，后者在苏丹要求下正式推举乔吉奥斯（教名金纳迪乌斯 Gennadius）为大牧首。很可能这一切在苏丹于 6 月离开君士坦丁堡前，便已经筹备完毕。但乔吉奥斯正式上任的日期有些难以确认。几个月之后，加冕仪式大概于 1454 年 1 月 6 日方才举行。程序依然遵循拜占庭传统。苏丹接受乔吉奥斯的觐见，并亲自为他授勋、穿上法袍，转交法杖，并在胸前佩戴十字架。古老的牧首十字架已经难觅踪迹——或许遗失于劫掠中，或许被前任牧首玛玛斯带去了罗马，因此苏丹特意打造了一枚更加精致灿烂的新品。作为传统惯例的一部分，苏丹还对新牧首说道：“作为牧首，好运将伴随着你，你将赢得我们的友谊，并尽享历任牧首的特权。”随后，新任牧首骑上苏丹赠送的骏马，走向主教教堂——圣使徒教堂（此时原主教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已改为清真寺）。在这里，按照古老传统，他由赫拉克利亚大主教（Metropolitan of Heraclea）正式宣布登基。接下来，新牧首在市内巡游一番，最终回到在圣使徒大教堂的居所。

155

与此同时，苏丹和大牧首开始共同组建希腊人的“米勒特”。根据弗朗茨的记载（他获得这一消息时很可能仍为土耳其阶下囚），苏丹赐给金纳迪乌斯一份正式诏书，保证牧首人身神圣不受侵犯，不可被罢免，享有免税特权及自由迁徙权，并且以上权力世袭罔替；同时，大主教及“圣会”成员也享受类似特权。这份记载无疑是可信的，虽然牧首不被罢免的特权实际上并不能取消“圣

156

会”通过宣布牧首选举不合法，而剥夺其头衔的权利（拜占庭历史中不乏先例）。牧首的编年史家在随后的一个世纪进一步声称，苏丹在给金纳迪乌斯的另一份文件中，允诺教会习俗及婚嫁习惯均受法律保护，承认东正教徒庆祝复活节的权利，并在节日三天中享有自由迁徙权，并且不会有更多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稍后土耳其当局发布的授权书里，确认了主教的选举结果并明确其职责，可见由教会管理基督徒社区已成为惯例。教会法院被许可裁决宗教事务、结婚、离婚及未成年人监护等诸多案件。而由牧首成立的世俗法庭则负责东正教徒的其他民事案件。只有刑事犯罪或牵涉到穆斯林的案件，才交由土耳其法院审理。教会本身并不负责替政府从希腊人社区收税，此事一般由当地头人办理。但教会有时被要求以破门（逐出教会）或其他宗教上的惩罚，来威胁那些逃税或违背政府命令的希腊人。神父们享有免税权，但有时也会被要求“自愿”捐款。基督徒中，只有他们被允许蓄须。每一名基督徒被要求身着特定服饰，并严格禁止携带武器。征召基督教男童参加新军的传统则继续保留下来。[①]

这就是通常意义上，基督教社团从穆斯林统治者那里争取到的条件。不过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得到了一项特别优待。当年城破之时，那些派出使节，主动向苏丹投诚的城区，获得了回报。从官方角度，苏丹仅仅要求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不过实际上，除佩崔恩、帕那、萨玛西亚、斯道迪奥斯等城区（它们属于主动投降的地区）外，基督徒也失去了自己的教堂。因为这些教堂都遭到了洗劫，所在城区也毁坏严重，即使苏丹允许，重建工作也显得没有意义。不过，基督徒得以保留如此多教堂，已经超出了人们最乐观的期许。多年后，土耳其的法学家们，还对此感到困惑不已（君士坦丁堡作为被武力攻占的城市，按照伊斯兰律法，原本不能保留哪怕一座教堂）。

157

---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304-7; *Historia Politica*, pp. 27-8; *Historia Patriarchica*, *C.S.H.B.*, pp. 79-81; Critobulus, *op. cit.* pp.94-5; Cantenir, *op. cit.* p. 104. Papadopoullos, *Studies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People under Turkish Domination*, pp. 1-85.

这样的安排符合苏丹的心意，既然他决定将上述城区作为首都希腊臣民的居住区，那么为他们保留足够教堂以延续宗教活动，就是必不可少的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丹的苦心被淡忘了。一座又一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至18世纪，全城仅有三座拜占庭教堂在基督徒掌控之中。它们分别是圣玛丽教堂（因苏丹喜爱其建筑师，希腊的克里斯托杜拉斯（Christodulus），而下令加以保护），以及两座小型教堂——圣德米特里教堂与圣乔治教堂[204]。其余地区，基督徒的祷告被迫转入新建的不引人注目的建筑，以避免冒犯穆斯林的视线。①

新任牧首开始了他的工作。苏丹钦点的圣使徒教堂作为牧首驻地，已经显得破败失修了。假使当局允许维修、装饰这座宏大建筑，其花费也必然不菲。而教堂所在地已成为土耳其人聚居区，当地居民对它的存在，不禁深恶痛绝。1454年夏的一天，一具土耳其人的尸体在教堂庭院中被发现，这无疑属于陷害栽赃，但此事充分说明了土耳其人的敌意。于是大牧首明智地提出搬迁要求。在收集教堂所剩财富及圣物后，牧首启程前往帕那区的帕玛卡里思托斯（Pammacaristos）教堂。它本为一座女修道院，此时修女们迁往了附近的圣约翰教堂，让牧首及随员得以顺利入驻。此后帕玛卡里思托斯教堂作为普世牧首驻地，长达一个世纪。“征服者”苏丹常常来这里探望他十分敬重的牧首，不过由于担心其善妒的部下借机接管教堂，苏丹轻易不步入教堂正殿，而是与金纳迪乌斯在偏殿会晤——今天，该教堂精美的马赛克画终于再次呈现与众人面前。[205]他们在一起探讨政治与宗教议题，在苏丹要求下，金纳迪乌斯创作了一本简短、和平主义的专著，阐释基督教教义与伊斯兰教区别，并为之辩护。[206]然而，苏丹的良苦用心未得到坚持。1586年他的继任者穆拉德三世便收回了教堂并把它改为清真寺。②

158

与此同时，苏丹也开始着手重建君士坦丁堡。最初，城市的凋敝景象令他

---

① 参见：本书附录二。

② Phrantzes, *op. cit.* p. 307; *Historia Politica*, pp. 28-9; *Historia Patriarchica*, pp. 82-3, 给出了金纳迪乌斯开出条件的文本 (pp. 83-93).

深感震惊。他的建筑师继续在位于阿德里安堡附近马里查（Maritsa）河上一座小岛兴建规划中的皇宫，仿佛苏丹准备以此作为他的主要行宫。但很快，他改变了主意。既然此刻穆罕默德已成为恺撒的继承人，那么理应居住在“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他在城市中央高地上修建了一座小型宫殿（位于今天的大学城附近），并开始规划在古老的阿克罗波利斯修建一座宏大的皇宫。帝国各地的土耳其人被鼓励前来君士坦丁堡定居，政府将为移民们修建住房或商铺提供不少便利。城中原有希腊居民（包括一度作为奴隶后被赎回自由的）的安全得到官方保证，并且似乎也获得了政府的帮助。一些之前逃离首都的拜占庭贵族家庭也被劝说返回故土，土耳其人甚至暗示可根据他们的等级高低给予相应特权，虽然实际上他们唯一确定享有的“特权”往往是牢狱之灾甚至断头台伺候，以免这些贵族的显赫声望使他们成为叛乱领导人。当最后的希腊自由国家被征服后，其多数家庭被强制迁往君士坦丁堡。多达5000个家庭被从特拉布宗及周边地区带至首都。其中不仅包括贵族名流，还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尤其是石匠——因为需要他们帮助新建住宅、市场、宫殿及堡垒。随着君士坦丁堡日渐稳定繁荣，越来越多的希腊人作为商人或工匠，自愿地来到这座复兴的城市。接踵而至的还有意图在商业与金融方面与之一争高下的亚美尼亚人，以及犹太人。土耳其人则受到他们所征服的首都福利与舒适的吸引，源源不断地涌入这里。[1] 远在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前，苏丹便已经可以满怀骄傲地审视这样一座新生的君士坦丁堡：城市建筑日新月异，作坊与市场熙熙攘攘。自被征服以

159

① Critobulus, *op. cit.* pp. 82-3; Ashikpashazade, *op. cit.* pp. 124-6; Ducas, *op. cit.* xlii, p. 393; *Historia Politica*, p. 25. 1454年一封由瓦拉几亚主教寄出的信件声称共有30000个家庭被移民至君士坦丁堡。Jorga, *Notes et Extraits*, iv, p. 67, 记载的家庭数字则为8000个。

来，它的人口增加了四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居民数超过了50万人。[①]苏丹摧毁了拜占庭皇帝那座破败的首都，代之以一座崭新、辉煌的帝都，在他的安排下，各宗教、各民族的臣民们共居一城，并得以共享秩序、和平与繁荣。

① 西班牙旅行家克里斯托巴尔（Cristobal de Villalon）在1550年左右完成的著作中，声称自己查阅过当时君士坦丁堡人口统计，并指出城内共有60000土耳其家庭，40000希腊及亚美尼亚家庭，10000户犹太人，佩拉则有4000户人口，此外郊区还有大约10000户希腊人。Villalon, *Viaje de Turquia*, ii, pp. 255. ff. 参见：Jorga, *Byzance après Byzance*. pp. 45-52.

第十二章　欧洲与征服者

1453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克里特首府卡地亚（Candia）[207] 港口迎来了 3 艘船只。其中两艘便是由在君士坦丁堡奋战至最后时刻的克里特水手们乘坐。他们带来了拜占庭首都已于 11 天前陷落的消息。整个岛屿为此深感震惊。“再不会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一份来自阿加拉索斯（Agarathos）修道院的手稿如是写道。①

其余的逃亡者则去了威尼斯殖民地哈尔基斯（Chalcis）与莫顿（Modon）[208]，当地总督立即将沦陷消息发往威尼斯。信使们于 6 月 29 日抵达，威尼斯参议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议长向各位议员亲自宣读了这一噩耗。第二天，一位信使被派往罗马，7 月 4 日他特意在博洛尼亚做短暂停留，以便通知该地的贝萨里翁主教。4 天后，教宗尼古拉斯五世也收到了消息。另一位信使则被派往那不勒斯，以便警告阿拉贡的阿方索国王。②

不久之后，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都获悉伟大的君士坦丁堡已落入异教徒之手。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此事完全出乎西方国家的预估。人们也知晓该城

---

① Tomadakis, ‘Répercussion immédiat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Cinq-cent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Athens, 1953.

② Thiriet, *Regestes*, no. 2928, p. 187. 参见：Pastor, *History of the Popes*, trans. Antrobus, II, pp. 271-4.

处于危险之中，但因本国事务缠身，自顾不暇，从未真正认识到这种危险有多么急迫。他们素闻君士坦丁堡城防的坚固，也听说威尼斯已然派出援军，但却忽视了这支援军与异教徒兵力相比是多么虚弱，也忽视了苏丹在新式大炮的辅佐下，古老的城墙变得不再难以逾越。甚至消息灵通、经验丰富的威尼斯人，如同教皇那样，都笃信君士坦丁堡足以固守待援。① 161

实际上，受到教皇支持的威尼斯舰队直到遭遇从佩拉逃生的热那亚船只前，还在希俄斯岛下锚等待适宜风向，后者告诉他们，一切都太迟了。舰队司令罗瑞丹遂下令跨过爱琴海，撤回哈尔基斯，直至收到威尼斯方面新的指示。②

7 月中旬，他得到了命令。该月 4 日，威尼斯执政官[209]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内部枢密会议。会上君士坦丁堡舰队司令狄多作为战役亲历者（他于 7 月 3 日回到威尼斯），做了一份详细报告。威尼斯方面决定采取一种审慎的政策：一方面，命令克里特、哈尔基斯、内格罗庞特[210]等地转入战备状态以预防土耳其可能的进犯；另一方面，于 7 月 5 日要求罗瑞丹派船将随行的特使马切洛送往苏丹宫廷。一周后参议员更投票同意，向马切洛拨付 1200 达卡特，以作为给予苏丹及廷臣的礼物。7 月 17 日，特使接到了完整的指示——他被要求向苏丹阐明，威尼斯愿意维持与穆拉德二世签订的条约。他须向苏丹提议，释放所有在金角湾被扣的威尼斯船只，并强调它们皆非战舰。如若苏丹拒绝续约，则应立即回报；如果苏丹同意接受，则需进一步要求，保留威尼斯在拜占庭帝国时期获得的，于君士坦丁堡的所有特权，并争取土耳其释放威尼斯战俘。

数日后，参议院派出威尼斯驻拜占庭大使米诺托之子前往君士坦丁堡，试图赎回大使及其妻儿，然而米诺托之子仅能赎回母亲，父兄皆已被处死了。大约同时，威尼斯决定将希腊人从这场浩劫中幸存，并寄存于威尼斯船只上的财物没收充公，以抵消希腊人所欠债务。威尼斯此时需要一切她可能获得的补偿， 162

---

① Tetaldi, col. 1823，他笃信如若援军即使到达，君士坦丁堡必不至于失陷。

② Critobulus, *op. cit.* p. 81; Thiriet, *La Romanie Vènitienne*, p. 383.

因为她在君士坦丁堡损失了足足20万达卡特，她的克里特臣民另损失了10万达卡特。[①]

热那亚的恐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热那亚人受到与阿拉贡的阿方索，与法国，与米兰公国（它们均欲将热那亚变为藩属）的长期战争拖累，已无力派出军队解救他们的黎凡特殖民地。而6月17日，佩拉殖民地长官安格洛·洛梅利诺（Angelo Lomellino）发出的一份报告则无异于雪上加霜。在这份报告中他详述了该殖民地城镇的命运。君士坦丁堡城破之时，洛梅利诺向扎加诺斯帕夏打开了城门，为了取悦苏丹，他更极力劝说市民们不要乘船逃离。稍后他火速向苏丹派出两名特使卢西亚诺·斯皮诺拉（Luciano Spinola）与巴尔达萨雷·玛路弗（Baldassare Maruffo），以向征服者送上诚挚的祝贺，并请求保留当初拜占庭赋予佩拉的特权。但穆罕默德在特使面前却难掩怒火。居然有如此多的船只离开佩拉令苏丹深感不悦，他并且对热那亚的两面派做法大加奚落。大约一两天后，热那亚派出的由巴比拉诺·帕拉维奇尼（Babilano Pallavicini）和马可·德·弗兰基（Marco de' Franchi）率领的第二批使团倒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穆罕默德示意下，扎加诺斯帕夏交给他们一份诏书，它保证佩拉不会遭到摧毁，居民的各类财产将秋毫无犯，其妻儿的安全也会得到保障，并且许诺不会把佩拉的子弟召入新军。已有的教堂可以保留，但禁止鸣钟及新建教堂。未经苏丹允许，土耳其人不得到佩拉定居。热那亚人可在苏丹的领土、海域上任意贸易，在佩拉可出入自由。他们不会承担额外的赋税或义务，但男性市民需缴纳人头税。他们可保留以往商业习惯但必须遵守苏丹的法律，也有权选举头人或长老，负责与土耳其当局的交涉与商业事务。

163

如此一来，佩拉同那些主动向穆斯林投降的基督教城镇也就没什么两样了。条件甚至还略有不如。无论如何，佩拉执政官（意大利人称Podestà）没有其他选择。6月3日，苏丹亲自到访。他命令市民们交出全部武器，并坚称城墙必须

---

① Thiriet, *Regestes*, nos. 2929-2936, pp. 187-190.

拆除，包括著名的堡垒——圣十字塔。一名土耳其总督也得以进驻。洛梅利诺辞去了执政官的职务，但在同胞的请求下，作为一名元老留了下来，直到 9 月返回热那亚。①

佩拉的失去以及土耳其人对海峡的控制，已经危及到热那亚黑海北岸殖民地的生存，尤其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Caffa）。该城历来是鞑靼及中亚地区的重要港口，一旦热那亚共和国放弃它，必将令诸多热那亚公民的投资血本无归。令热那亚政府欣慰的是，圣乔治的康西里奥（Consilio）家族愿意接手对上述殖民地的管理。该家族领袖自以为这宗生意依然有利可图。但是，愿意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航行的海员，以及愿意支付苏丹所定通行费的商人，都日渐稀少。无论如何，给予这些黑海殖民地足够的军事支持已经不可能了。[211] 半个世纪内，热那亚在黑海的势力便消弭殆尽，其殖民地相继被土耳其及其鞑靼盟友所征服。②

热那亚位于黎凡特的另一重要殖民地是希俄斯岛。多年以来，该地一直由“马赫那”管理。在失去佩拉，并且注定将失去黑海殖民地后，希俄斯岛成为热那亚的主要前哨；但它的战略价值随着东方商路的衰落而大不如昔。对热那亚政府而言，它不啻一块鸡肋。于是岛上的马赫那自行与苏丹签署了协议。③ 164

那些与君士坦丁堡素有来往的，更小的西欧商业城市，反倒能灵活调整政策。与威尼斯、热那亚不同，它们更关注本地贸易而非东方商路。城破之时，安科纳人在君士坦丁堡的侨区估计损失超过两万达卡特，不过其人身安全却得到了保证，显然是由于苏丹与安科纳领袖安格洛·博尔多尼（Angelo Boldoni）

---

① Podestà of Pera, pp. 76-8; Montaldo, *op. cit.* p. 342; Ducas, *op. cit.* xlii, p. 393; Critobulus, *op. cit.* p. 76. 佩拉执政官的名字 Lomellino, 参见：Desimoni’s preface to Montaldo, pp. 306-7.

② Heyd,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ii, pp. 382-407. 将卡法交予康西里奥家族管理一事见于 *Notice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Roi*, xi, i, pp. 81-9.

③ 参见：Argenti, *The Occupation of Chios by the Genoese*, i, pp. 205-8.

私交甚笃的缘故。尽管遭到了教宗反对，他们依然与土耳其保持着贸易往来。[①]佛罗伦萨人的损失估计与安科纳人相仿，他们很快也与苏丹建立了良好关系。在所有意大利人中，佛罗伦萨人最受苏丹青睐，他尤其欣赏美第奇（Medici）家族。[②]加泰罗尼亚人在战役中表现英勇，损失惨重，也很快便重回君士坦丁堡，但他们的领事馆似乎被撤销了。[③]拉古萨人战前刚与君士坦丁皇帝谈妥了优厚条件，准备在拜占庭首都开设领馆，对他们而言幸运的是，以上筹备遭到了行政上的延宕，因此拉古萨人得以置身事外。但他们花了整整五年，才与苏丹敲定了通商协议。此后，他们在黎凡特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④]

对很多虔诚的基督徒而言，这些商业城市纷纷准备与异教徒通商，似乎有背叛信仰的嫌疑。威尼斯尤其善于操弄两面手法，既致力于组织十字军讨伐土耳其人，又派遣使节向苏丹释放善意，以维护商路。她的特使马切洛经过一年谈判，终于促使土耳其释放了剩余的威尼斯战俘与船只。他继续在君士坦丁堡工作两年，徒劳地希望能恢复威尼斯商业特权。1456 年，他却被苏丹下狱一年之久，借口是他同意释放了一些哈尔基斯的土耳其囚犯。马切洛无疑沦为了苏丹向西方诸国（尤其是威尼斯）示威的牺牲品。[⑤]

165

在罗马看来，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后果却是明了的。当务之急，是联合欧洲各国，组建一支强大、忠诚的十字军。教皇尼古拉斯虽然心力交瘁、幻想破灭，但也决心承担这一领导责任。听闻君士坦丁堡的噩耗之后，教宗立即采取了行动。1453 年 9 月 30 日，他向西方诸王颁布诏令，号召发起圣战。教宗要求各国国君及臣民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并奉献岁入的十分之一，作为经费。[⑥]

---

① Heyd, *op. cit.* ii, p. 308 and n. 4. Tetaldi, col. 1823. 估计安科纳人损失超过 20000 达卡特。

② Heyd, *op. cit.* ii, pp. 308, 336-8. Tetaldi, *loc. cit,* 他指出佛罗伦萨人损失了 20000 达卡特。

③ Heyd, *op. cit.* ii, pp. 308, 348.

④ Krekić, *Dubrovnik (Raguse) et le Levant*, p. 62 and Thiriet, *Regestes*, nos. 1279 and 1364, pp. 383, 398.

⑤ *Ibid*, nos, 2955-6, 3021, pp. 194-5, 212-3.

⑥ Raynaldi, *Annales*, x, pp. 2-3.

两位希腊主教，伊斯多尔及贝萨里翁，大力支持他的举措。贝萨里翁亲自给威尼斯人写信，半是指责半是恳求，希望后者停止在意大利的征战，集中力量对抗“敌基督[212]”。① 身在德意志的教皇特使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 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表现得更加活跃，整个1454年，他参加了无数会议，巧舌如簧，鼓动着成立一支十字军。在他的坚持下人们倒是提出了不少美妙的方案，可惜最终无一付诸实施。②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对土耳其的威胁深感不安，并且意识到后者是匈牙利的心腹之患（此时，匈牙利国王为腓特烈的堂弟拉迪斯拉斯五世）。一旦匈牙利倾覆，整个西方基督教国家都将不得安宁。腓特烈要求特使皮科洛米尼代他起草了一封致教皇的信件，信中表达了对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震惊，皮科洛米尼在信中还私自添加了一句哀悼之辞：“这是荷马与柏拉图的第二次死亡。”③ 166

但无论如何，这里并没有新的十字军。虽然欧洲各王公急于收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情报，而文人纷纷创作挽歌以表哀恸，虽然法国作曲家纪尧姆·杜菲（Guillaume Dufay）[213] 将其中一首挽歌谱曲并令它在国内广为传唱，但还是无人采取实际行动。面对德意志诸侯，腓特烈三世缺乏实力，徒有虚名。对于发动十字军，他既无力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也无法从资金上加以援助。法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忙于重建因英法百年战争饱受蹂躏的国家，也无暇他顾。在英格兰，百年战争对它的破坏甚至更加严重，[214] 而土耳其看上去似乎还十分遥远。英王亨利六世无计可施，他此刻正受精神病的困扰，并且整个王国都陷入了玫瑰战争 [215] 引起的内乱。阿拉贡的阿方索国王，虽然其意大利领土显然遭到土耳其西进政策的威胁，但在采取了几条无关痛痒的防御措施后，国王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阿方索此时已垂垂老矣，一心只想保住在意大利的霸权。至此，除了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再无其他君主表现出干预的兴趣。拜占庭的

① Jorga, *Notes et Extraits*, ii, p. 518.

② *Ibid*, iv, pp. 90-1, 101-2, 111-3.

③ Pius II, *Opera Omnia*, pp. 716-7.

遭遇固然给匈牙利国王敲响了警钟，但他与其伟大将领，摄政王匈雅提关系紧张，如果缺少匈雅提与其他盟友的支持，拉迪斯拉斯也不敢贸然采取行动。①

教皇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欧洲最富裕的王公——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因为他尚不时表达发动十字军的愿望。1454 年 1 月，菲利普在列日（Liège）举办了一场宴会。席间，一只被宝石妆点的雉鸡送上了贵族的餐桌，与此同时，一位巨人身着萨拉森人服装，携带一头玩具大象作势恐吓宾客，而年轻的奥利佛·马凯（Oliver de la Marche）则乔装为一位少女在旁边演绎着教会的哀恸。[216] 目睹此情此景，与会者均立下参与圣战的神圣誓言 [217]。然而，这一惟妙惟肖的哑剧毫无实际意义，正如人们戏称的那样，“野鸡的誓言”从未付诸实施过。②

167

于是，虽然欧洲对拜占庭的悲剧深感痛心，教皇的诏令却被束之高阁。1455 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去世，其继任者加泰罗尼亚人加里斯都三世（Callixtus III, Calixtus III）因为其血统及年事已高，并不受意大利人爱戴。他徒劳地武装了一支舰队，派往爱琴海，并夺取了纳克索斯岛（Naxos）、利姆诺斯岛与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然而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愿意接收这几份烫手山芋，于是它们很快又被土耳其人夺回。③ 前教皇特使皮科洛米尼在 1458 年接任教宗职位，世称庇护二世（Pius II），他对发动圣战依然积极，并且沉溺在过去那些空洞的许诺中，以为一支基督教远征军即将启程前往东方。1464 年，庇护二世在前往安科纳视察、赐福十字军的途中病逝，而这支军队因此也未能成行。④

西方国家依然对采取干预无动于衷。埃内亚·西尔维奥 [218] 或许发自肺腑地感到痛心疾首；而一些类似奥利佛·马凯者，也认为与君士坦丁堡共存亡的拜占

---

① Grunzweig, ‘Philippe le Bon et Constantinople’. *Byzantium*, xxiv, PP. 51-2.

② Oliver de la Marche, *Mémoires*, ed, Beaune et d’ Arbaumont, ii, pp. 381-2.

③ Critobulus, *op. cit.* pp. 119-21; Ducas, *op. cit.* xlv, p. 423. 参见：Miller,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pp. 340-3.

④ 参见：Atiya, *The 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p. 236-40.

庭皇帝，才是真正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继承人，其高贵远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的暴发户所能企及。① 但他们又能有何作为呢？教宗自身就应该为长期的冷漠受到指责。在超过 200 年的岁月中，教皇一再谴责希腊人故意分裂教会，直到最近的日子，他们还在大声抱怨拜占庭对教会共融缺乏诚意。西欧人免不了扪心自问：土耳其是如此遥远的威胁，为什么要替那些桀骜不驯的人牺牲金钱与生命，火中取栗呢？人们还受到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影响，后者常常被名誉上当作圣徒及救世主的先知——维吉尔对希腊人当年血洗特洛伊一事颇有微词，因此，人们便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视为特洛伊战争的报应。一些富有古典情怀与文学修养的作家（包括伊斯多尔主教本人），习惯性地将土耳其人称作“Teucri”（特洛伊人）。即使土耳其人不能等同于传说中的特洛伊人，但他们未必不是特洛伊人后裔。②一封据说是穆罕默德二世写给教宗的信件于数十年后在法国被发现，并广为流传，信中苏丹对意大利人的敌意十分不解，在他看来土耳其人与意大利人同宗同源——均为特洛伊人的后代。③[219] 教宗庇护二世的拉丁名恰好为埃涅阿斯（Aeneas），他不无痛苦地指出将土耳其和特洛伊联系起来纯属以讹传讹，但这样的传言的确妨碍了他组建十字军的努力。④

168

对东方的基督教国家而言，就不能那么无动于衷了。1453 年夏末，苏丹位于阿德里安堡的宫廷挤满了来自邻近基督教国家的使节。8 月初，塞尔维亚大公乔治·布兰科维奇派遣使节进贡了大量金钱，一部分作为给苏丹及大臣的礼物，一部分仁慈地用作俘虏们的赎金。很快，更多使节到来了，他们分别代表：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兄弟，摩里亚君主德米图斯与托马斯，特拉布宗皇帝约翰·科穆宁，闵格雷利亚（Mingrelia 或 Samegrelo）[220] 国王伊马雷特·达迪安（Imaret Dadian），莱斯博斯岛与萨索斯岛领主多里诺·加提卢西（Dorino Gattilusi），他

---

① Olivier de la Marche, *Mémoires*, ii, pp. 336-7.

② Jorga, *Notes et Extraits*, iv, pp. 126-7.

③ Chalcocondylas, *op. cit.* p. 403.

④ Pius II, *Opera Omnia*, p. 394.

的兄弟，伊诺斯领主帕拉梅德（Palamede），希俄斯岛马赫那及圣约翰骑士团大团长。他们发现苏丹心情甚佳，待人友善。穆罕默德仅仅要求各王公承认其宗主权并增加贡金。塞尔维亚君主被要求每年缴纳12000达卡特，摩里亚的年贡为10000达卡特，希俄斯岛6000，莱斯博斯岛3000。特拉布宗皇帝被从轻发落，仅要求年贡2000。只有圣约翰骑士团拒绝称臣纳贡，他们解释说之所以不能从命，是因为尚未得到骑士团最高领袖教皇的许可。穆罕默德自忖此时无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骑士团，于是让使节平安地返回了罗德岛。①

169

加提卢西兄弟特别幸运。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不久，苏丹便派遣军队进攻帕拉梅德位于色雷斯的城市伊诺斯，后者迅速宣布投降。与此同时，一支舰队攻占了拜占庭岛屿伊姆布罗斯（Imbros）与利姆诺斯。拜占庭官员纷纷望风而逃，唯一例外的是伊姆布罗斯的一位法官、历史学家克里托布拉斯。他与征服者的舰队司令哈姆扎贝伊建立了友谊，在他巧妙的外交手腕下，莱斯博斯岛主从苏丹处得到了利姆诺斯，代价是一笔2323达卡特的年金，伊诺斯领主则得到了伊姆布罗斯，代价是1200达卡特年金。②

东方的基督徒总算长吁一了口气。虽然君士坦丁堡被攻占，但苏丹看上去似乎愿意与各小国和平共处。不过他们要缴纳更加沉重的年贡，而它是笔不小的负担。此外，从苏丹的宫廷又传来了不祥的消息。

1453年8月，大维齐哈里尔突然被免职并逮捕，几天后便被明正典刑。穆罕默德从未忘怀哈里尔在1446年扮演的角色。[221] 作为前苏丹穆拉德的挚友及帝国首相，迄今为止哈里尔享有崇高声望并大权在握。在成功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前，苏丹无法将首相解职，以免疏远那些奉哈里尔为领袖的土耳其权贵家族。但事实证明，哈里尔的建议是错误的。他起初极力阻止围攻君士坦丁堡，随后又不得不参与其中。至于他这是因为担心军事冒险会遭到失败，或引发西方列

① Ducas, *op. cit.* pp. xlii, p. 395; Critobulus, *op. cit.* p. 85; Barbinger, *Mehmet der Eroberer*, pp. 108-9.

② Critobulus, *op. cit.* pp. 86-7; Ducas, *loc. cit.*; Miller,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pp. 334-5.

强干涉从而使土耳其陷入苦战，还是如其政敌所言，乃是收受希腊人贿赂的缘故（哈里尔素来对希腊人态度亲善），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判断。作为垮台的理由，人们控告他犯下了通敌叛国之罪。在那个时代，即使最德高望重的东方政治家，也喜欢接受礼物。很可能，哈里尔既发自肺腑地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祖国的福祉，同时也的确接受了希腊人的贿赂。但他最终错估形势，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之后除伊萨克帕夏以外，穆拉德二世留下的老臣也大多被罢黜，伊萨克本人则被贬谪至安纳托利亚。扎加诺斯帕夏成为了新一任大维齐，他的朋友也一并进入政府岗位。他们大多为富有进取精神的伊斯兰改宗者，自身没有特定嗜好，完全仰仗苏丹的青睐，并且一旦时机成熟便极力促使主公发起新一轮征服。①

170

当这一天到来时，那些基督教王公将为此尝到苦果。塞尔维亚人首先遭难。1454 年，在土耳其的武力威胁下，塞尔维亚大公不得不同意将部分领土让与苏丹。他此时的处境十分微妙。北边的匈牙利人突破了边界，与土耳其人一样对塞尔维亚虎视眈眈。此后，塞尔维亚就沦为了两国征战的舞台。1456 年 6 月，苏丹进攻匈牙利摄政匈雅提防守的贝尔格莱德失利，是个不小的挫折。[222] 然而，匈雅提于获胜次日去世；[223] 几周后，塞尔维亚君主乔治在匈牙利军营中的一场骚乱中受重伤，挣扎数月后，于圣诞节前夕辞世，享年 90 岁。他长期的外交经验及女儿玛拉（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继母）的影响力，使他得以自保。但他的继承人缺乏这份明智。乔治将塞尔维亚传给了自己的寡妇及幼子拉扎尔（Lazar）。然而拉扎尔不满足于和母亲共治，数月后，其母可疑地暴毙，这迫使玛拉与两位兄长仓促出逃（玛利亚 [224] 的两位哥哥早年被穆拉德二世下令，刺瞎了双眼），

---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93-4; Critobulus, *op. cit.* pp. 87-8;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403-4; leonard of Chios, col. 943; Ashikpashazade, *op. cit.* pp. 197-9. 参见：Inalcîk, *Fatih Devre*, pp. 134-6. 阿什克帕萨扎德的记载对哈里尔抱有敌意，但当哈里尔家族（阐达理）恢复地位后，后世的历史学家笔下便温和了许多。参见：Inalcîk, *Fatih Devri*, pp. 132-6. 诺塔拉斯受辱与死亡与哈里尔或许有着关联。阿什克帕萨扎德记载诺塔拉斯曾用一条装满金钱的鱼向哈里尔行贿，他们彼此关系也的确不错。

其中一人随她前往君士坦丁堡苏丹宫廷，另一位则避祸于罗马。穆罕默德此时正心有旁骛，无暇干预。拉扎尔则于1458年去世，留下了一份纷争不断的遗产。但当土耳其军队1459年进入塞尔维亚时，却受到了许多渴望稳定的民众欢迎。几周之内，除匈牙利掌控的贝尔格莱德以外（匈牙利占据此城直至1521年），整个塞尔维亚都落入土耳其之手。邻近的波斯尼亚王国（拉扎尔之女玛利亚此时为该国王后）四年后也被征服。国王斯蒂芬·托马舍维奇被处死，而玛利亚则被纳入苏丹后宫。[③]

171

与此同时，希腊人残存的一些自治权也被逐步剥夺。首当其冲的是半希腊化的加提卢西王公们的领地。多里诺与帕拉梅德在1455年双双去世。前者的继承人体弱多病，而后者的继任者品行恶劣，于是苏丹得到了绝好的借口去吞并他们的土地。至1459年，他们的几处领地，除伊姆布罗斯岛被交给了克里托布拉斯管理外，其余大部分被土耳其人接收。唯一例外的是莱斯博斯岛，多里诺之子尼科洛·加提卢西（Niccolo Gattilusi）在绞死自己兄长后得以管辖这块领地，他的统治如履薄冰般延续到1462年，最终不得不向土耳其人投降，自己也落得与哥哥同样的下场。[②]

雅典大公国在1456年也遭到倾覆。其佛罗伦萨裔公爵弗朗科（Franco）以年轻貌美而得到苏丹青睐，被允许前往底比斯继续自己的统治。四年后他也被处死，其领土被吞并，他的儿子们则被投入了新军。[③]

在摩里亚，专制君主德米图斯与托马斯两兄弟直到大敌当前方才中止内斗，随君士坦丁堡陷落接踵而至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巴尼亚人叛乱。许多希

③ 参见：Jireček, *Geschichte der Serben*, ii, pp. 201. ff.; Miller,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pp. 456-7; and 'The Balkan States',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v, pp. 575-582; Babinger, *Mehmed der Eroberer*, pp. 112 ff.

② Critobulus, *op. cit.* pp. 105-111, 138-9; Ducas, *op. cit.* xliv, p. 419, xlx, pp. 423, 427; leonard of Chios, *De Lesbo a Turcis Capta*, ed. Hopf, *passim*; Miller,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pp. 335-352.

③ Miller, *The Latins in the Levant*, pp. 435-441, 456-7.

腊人也加入其中，他们还得到威尼斯的暗中相助。绝望中，两兄弟只好向苏丹祈求援助。老帅图拉罕贝伊领军穿过科林斯地峡，平定了叛乱。他在撤军前告诫两人应当兄弟同心。然而很快，德米图斯与托马斯争端再起并扩散至各自部属，他们还“忘记”了向苏丹缴纳协议中的进贡。1458 年春，苏丹本人再次派兵穿过地峡。尽管科林斯坚守到了 8 月并且尚有几处要塞英勇抵抗，但这也无法阻止土耳其的战争车轮。当科林斯最终陷落后，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都遭到了破坏蹂躏。摩里亚不得不向苏丹乞和。作为惩罚条件，摩里亚丧失了半数国土，包括科林斯、帕特雷、阿尔戈利德（Argolid）以及托马斯的首都卡利提那（Karytena）；并且还要缴纳巨额赔款。在班师中途，苏丹特意前往雅典参观，他素来仰慕该城伟大的历史，便以此举昭示对雅典的敬意。

172

穆罕默德离开后不久，摩里亚的两兄弟又产生了纠纷。德米图斯深信，拯救国家及其本人的唯一途径便是向苏丹乞降称臣。而托马斯则将希望寄托在新任教皇庇护二世之上。后者承诺会在 1458 年秋的曼托瓦会议上给出援助方案。第二年夏天，教皇许诺的援助果然到来了：一共 300 名佣兵，200 名由教皇本人提供，100 名由米兰公爵夫人比安卡·玛利亚（Bianca Maria）资助。但他们迅速与托马斯产生了矛盾，并且内部不和，于是又启程返回了意大利。此刻，德米图斯则呼唤着土耳其人的到来，然而他又一次“忘记”缴纳给苏丹的贡金。穆罕默德，对摩里亚君主国的乱象大感震惊，而教皇的干预也令他不安，于是下决心征服此地。

1460 年 5 月初，穆罕默德率领一支大军出现在科林斯。稍作迟疑后，德米图斯便向苏丹投降了。而托马斯退守麦西尼亚并坚持了一段时间，随后从海路逃往科孚岛。既然被统治者抛弃，整个伯罗奔尼撒很快便屈服了。除了几个要塞，它们或许因为自尊，或许基于某种英雄主义，又徒劳地抵抗了一段时间，旋即逐一被攻陷。不论是被武力攻占，或主动投降，这些城镇的居民都遭到了屠杀。到了这年秋天，几乎整个伯罗奔尼撒都落入了土耳其手中，仅有的几个例外是：萨梅尼科（Salmenikon）城堡，它在加莱萨斯·帕列奥列格指挥下一直

坚守到次年夏天；威尼斯港口莫顿与克罗顿则因向苏丹主动示好并赠送厚礼，而得以幸免；四面环海的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225] 被其领主托马斯在逃亡途

173 中让与加泰罗尼亚海盗，旋即又送给教宗，教皇最后在 1464 年将该地交给了威尼斯。①

下一个遭难的就轮到特拉布宗帝国了。约翰四世皇帝 [226]，曾经因为穆拉德二世之死弹冠相庆而遭到弗朗茨的责备，也曾经在 1453 年向穆罕默德二世奉送厚礼以求置身事外，于 1458 年走完了人生历程，留下了两位出嫁的女儿及一名年仅 4 岁的幼子阿莱克修斯。考虑到如果让幼子即位，其漫长的摄政期实为王国的灾难，特拉布宗人便推举约翰四世之弟大卫登基。大卫估计苏丹此刻正忙于欧洲事务，无暇侵扰他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王国。他一面与威尼斯、热那亚共和国及教皇保持接触（它们均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一面与当地最杰出的土库曼酋长，白羊王朝奠基者乌宗·哈桑（Uzun Hasan）建立了深厚友谊。哈桑实力强大，被公认为东安纳托利亚抵抗土耳其的领军人物。锡诺普与卡拉曼的埃米尔、格鲁吉亚国王（大卫的女婿）、闵格雷利亚与阿布哈兹国王（格鲁吉亚血统）均为哈桑的盟友。哈桑本人有基督教徒血统，他的曾祖母是一位特拉布宗公主，而他的母亲是一位来自北塞尔维亚的名媛，并且哈桑的皇后也来自特拉布宗——约翰皇帝之女西奥多拉（Theodora），据当时威尼斯旅行者的记载："众所周知，西奥多拉便是如今的海伦。"有了乌宗·哈桑作为靠山，特拉布宗皇帝自付可以高枕无忧了。

穆罕默德苏丹的确无法忽视这样的盟友，然而大卫却主动挑起了战事。他通过哈桑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向苏丹转达了免除其兄长（即约翰四世）允诺的年贡的要求，而哈桑使节提出的动议甚至更加傲慢自负。1461 年夏，穆罕

174 默德决定派遣水路大军去惩罚那些无礼之徒。苏丹本人率陆军从布尔萨出发，

---

① Critobulus, *op. cit.* pp. 126-37, 149-53; Ducas, *op. cit.* xlv, pp. 423-5; 'Polish Janissary', pp. 155-65; Ashikpashazade, *op. cit.* pp. 210-3. 参见：Zakythinos, *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 pp. 247-84.

卡西姆（Kasim）帕夏则率舰队驶向安纳托利亚的黑海沿岸。目睹敌军的骇人声势，哈桑的联盟土崩瓦解。6月，当陆军向锡诺普进发时，海军舰队短暂停留，征服了热那亚港口城市阿玛斯特里斯（Amastris）。大约在月末，海陆两军顺利于锡诺普城前会师。锡诺普埃米尔伊斯梅尔为穆拉德二世的女婿，徒劳地派出自己儿子（也是现任苏丹外甥）前去斡旋。但穆罕默德坚持锡诺普必须投降，不过伊斯梅尔可获得菲利普珀珀利斯（Philippopolis）[227]及其周边乡村作为采邑。伊斯梅尔不情愿地接受了条件。于是苏丹的军队兵不血刃，进入了锡诺普，继续向哈桑的领土开进，并开始围攻其边境要塞克尤鲁堡（Koylu Hisar）。而卡拉曼则对此袖手旁观。乌宗·哈桑抵挡不住，一面向东撤退，一面派出母后萨拉可敦（Sara Khatun）携带重礼前往苏丹的营帐。穆罕默德亲切地接待了她，苏丹此时并不想与白羊王朝全面对抗，于是也同意停战，条件是他可继续领有克尤鲁堡。然而萨拉拯救儿媳祖国的努力失败了。她劝说苏丹道：“何必为自己徒增烦恼，我的孩子，难道没有比特拉布宗更好的目标了吗？”苏丹则回答：我手持伊斯兰之剑，为信仰而战是我的使命。

7月初，土耳其舰队抵达了特拉布宗，水兵们登陆后蹂躏了整个城郊。但他们面对牢固的城墙无计可施。8月初，陆军的前锋来到了城下，领军的是大维齐马哈茂德（Mahmud）。同许多苏丹的新进大臣一样，他也是一名改宗者，其父为一塞尔维亚王子，而母亲恰好是特拉布宗贵妇。他有一位表兄，学者乔治·阿米罗特斯（George Amiroutzes），正住在特拉布宗城。此君在昔日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是著名的统一派，深受大卫皇帝的器重——不仅因其学识渊博，更在于他和罗马的关系有利于帝国与西方的外交谈判。马哈茂德派遣他的希腊裔秘书托马斯（Thomas Katabolenou）出使特拉布宗，表面上是为了劝降皇帝大卫，暗地里却和阿米罗特斯秘密接触。大卫起初态度强硬。他和皇后，来自拜占庭名门坎塔库震努斯家族的海伦娜（Helena），此刻正在格鲁吉亚乞求其女婿（即格鲁吉亚国王）的援助。然而阿米罗特斯已被马哈茂德重金收买，告诉皇帝乌宗·哈桑已经与土耳其单方面停战（这一消息稍后被萨拉可敦的信件所证实），

175

随后阿米罗特斯进一步向皇帝报告说，马哈茂德向他保证，如果投降，苏丹会在别处补偿皇室一块封地——后者终于也动摇了。大卫遣使向正随主力行军的苏丹提出，他愿意投降，前提是苏丹在帝国境内任选一块面积与价值和特拉布宗相当的土地作为补偿，并且与他的幼女安娜联姻。可苏丹正为特拉布宗皇后的外交努力震怒不已，表示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在阿米罗特斯屡次谏言表示抵抗绝无出路，并且萨拉可敦私下保证皇室会得到礼遇之后，大卫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并非他的过错。乌宗·哈桑与其他盟友均背他而去，也没有西方的援助可以期待，格鲁吉亚势单力薄，并不愿独自干涉。特拉布宗凭借坚固城防或许能坚持数周，但缺乏外援，终不免陷落。①

1461 年 8 月 15 日，最后一座希腊人的首都被土耳其苏丹占领了。此时距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228]从拉丁人手中收复君士坦丁堡并为希腊世界带来一缕中兴曙光，正好 200 年。萨拉的许诺得到了履行。皇帝及其子女，包括侄子阿莱克修斯得到了苏丹优待，后者派专船护送他们及帝国官员、王室财产转移至君176 士坦丁堡，不过有部分珠宝被赠与萨拉可敦以感谢她居中调停。但并非所有皇室成员都获得了自由。大卫的嫂子玛利亚·加提卢西大约二十年前嫁给了他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兄长亚历山大，[229]丈夫过世后便携幼子居住在特拉布宗——此刻因其风韵犹存得到了苏丹的垂青，并被召入后宫。子以母贵，她的儿子也进入宫廷，日后成为苏丹最为宠幸但声名狼藉的侍卫之一。②

剩余的特拉布宗人就没有如此幸运了。贵族阶层被剥夺财产，罄身送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苏丹提供了住宅和足够金钱，使他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全体男性市民与部分妇女儿童沦为了奴隶并被苏丹及其大臣们瓜分。剩下的妇女

---

① Critobulus, *op. cit.* pp. 163-74; Phrantzes, *op. cit.* p. 413; Ducas, *op. cit.* xlv, pp. 429-431;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490-7; 'Polish Janissary', pp. 165-73; Ashikpashazade, *op. cit.* pp. 218-27. 特拉布宗的此段历史，参见：Miller, *Trebizond: the Last Greek Empire*, pp. 97-104.

② Critobulus, *op. cit.* pp. 175-7; *Historia Politica*, pp. 36-7; Miller, *Trebizond*, pp. 105-8.

也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另有 800 男童被强制加入了土耳其新军。①

帝国的偏远地区也很快陷落了。吉雷松城（Kerasount）坚持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希腊居民安全得到保障的条件下投降了。一些山村进行了抵抗。科蒂莱（Kordyle）城堡在一名农村女孩的领导下据守了很久，后者甚至成为了一些本都（Pontus, Pontic）希腊歌谣的主角。但在强大的土耳其军队面前，没有一座要塞可以永远抵抗下去。10 月，穆罕默德苏丹返回了君士坦丁堡，昔日“大科穆宁”（Grand Comnenus）的领土已成为他的囊中之物。②

这意味着自由希腊世界的终结。“罗马世界已成往事，罗马土地被征服了。”当时的吟游诗人如此唱道。③ 的确，还有一部分希腊人处于基督徒的统治下，如塞浦路斯、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的某些岛屿以及希腊本土威尼斯人占据的一些海港，但他们均处于异族的统治下，后者的基督教派在希腊人看来，也属于“异端”。[230] 只有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现在通行称 Mani Peninsula，中世纪也称为：Maina 或 Maïna）的一些偏僻乡村，因当地崎岖的山峦阻隔了土耳其人渗透，貌似还保留着希腊人的独立与自由。

不久，整个巴尔干的东正教地区都落入了苏丹手中。只要斯坎德培在世，阿尔巴尼亚人尚能维持脆弱的独立，但随着他于 1468 年 1 月死去，[231] 他的国家也迅速被土耳其人征服。威尼斯人在此之前，便已经丢掉了阿尔巴尼亚沿海的港口。位于北方被称作泽塔（Zeta）[232] 的地区，一些山民建立了日后被称作黑山的公国，虽然他们根据形势，时而承认土耳其，时而承认威尼斯的宗主权，却从未丧失自治地位。塞尔维亚人与波斯尼亚人也都被征服了。多瑙河畔的瓦拉几亚王公们，早在 1391 年便承认了土耳其的宗主权，不过每当匈牙利大军压

177

---

① Phrantzes, *op. cit.* p. 308; Critobulus, *loc. cit.* ; Miller, *loc. cit.*

② Miller, *loc. cit.* 关于这位巾帼英雄的歌谣，参见：Legrand,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p. 78.

③ 关于特拉布宗陷落的歌谣，参见：Legrand,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p. 76.

境，又时常收回承诺。1456 至 1462 年，瓦拉几亚大公弗拉德 [233]，以其惩罚敌人的严酷手段而得名“穿刺者”（Impaler），他公然藐视苏丹权威，甚至将苏丹的使节活活钉死，不过随着他的垮台，土耳其也旋即恢复了对瓦拉几亚的宗主权。摩尔达维亚大公彼得三世于 1456 年沦为了土耳其封臣，然而他的儿子斯蒂芬四世拒绝承认土耳其宗主权，并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1457-1504）令奥斯曼人损兵折将，无计可施。但在他去世九年后，其子波格丹（Bogdan）王子便向塞利姆一世苏丹投降了。①

然而，尚有一个东正教国家苏丹的军队无从染指。当拜占庭帝国在土耳其打击下日渐衰落，俄国人却成功驱逐了他们的鞑靼统治者，重获独立。俄国的复兴也是拜占庭教会的荣耀。但如今，俄国已经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趋势，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1390 年，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安东尼不得不去信提醒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Basil I），无论如何，拜占庭皇帝依然是上帝在人间的最高代理人。不过现今君士坦丁堡已然陷落，皇帝殉国，东正教的领袖不复存在了。在俄国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恰恰是因为拜占庭人妄图与西方教会和解，犯下了叛教之罪的缘故。俄国人强烈反对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决定，并为此放逐了希腊人委任的主教伊斯多尔。他们此时不仅在宗教上毫无污点，还拥有东正教世界唯一保持独立的政权，并且其实力还在稳定增长。难道莫斯科大公没有资格继承东正教帝国么？“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或许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统治，并自称继承了拜占庭皇帝的特权。然而，真正的基督教帝国此时已转移到莫斯科了。“君士坦丁堡已经陷落，”1458 年莫斯科大主教写道，“这是因为它放弃了真正的信仰。但在俄国，信仰依旧存在，历经七次普世大公会议，[234] 基督教信仰通过君士坦丁大帝传至了伟大的弗拉基米尔（Vladimir）[235]。如今世间仅存一个真正的教会，那就是俄罗斯教会。”弘扬基督教已成为俄罗斯的使命。1512 年菲洛修斯神父在一封致大公瓦西里三世的信中说道：“基督教帝国已

178

① Jorga, *Histoire des Roumains*, iv, pp. 131. ff.

经沦陷，取代昔日罗马皇帝的是我国统治者。西罗马与东罗马帝国均已灰飞烟灭，但第三罗马将会永存……您将会成为世界基督徒之共主，成为所有虔诚信徒的皇帝。”瓦西里三世之父曾经声称因与拜占庭帕列奥列格王室联姻而获得了罗马帝国法统。然而部分“第三罗马”的信徒认为这与联姻并无关系。如果一定要从王朝血统上寻求证据，他们宁愿回溯到5个世纪前弗拉基米尔一世（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基辅罗斯大公）与拜占庭公主安娜的那次婚姻（虽然婚后实际无子）。不过在他们看来，莫斯科的继承权并非源于世俗的外交努力，而是由于君权神授。

于是，俄国人成为东正教世界中，唯一因君士坦丁堡陷落而受益的民族。对传统拜占庭境内，在异族奴役下呻吟的东正教徒而言，若不考虑距离遥远，仍有一位强大的东正教君主屹立不倒，这足以给予他们些许安慰；他们甚至希望能从俄国获得某种保护，甚至有朝一日，后者能将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征服者”穆罕默德此时对俄国的存在不以为意。但往后数百年，他的继任者们可就无法等闲视之了。[①]

179

俄国确实距离遥远。穆罕默德有更急迫的任务需要关注。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战功，已经确保了土耳其无可争议的欧洲强国地位。他难以避免地卷入了欧洲的政治事务。他深知所有基督徒都是他的敌人，所以需要确保他们不会联合起来对抗他。

这并非遥不可及的任务。基督徒援救君士坦丁堡的失败，昭示了他们对非关眼前切身利益的事物缺乏兴趣。唯有教皇，若干学者及散布于西方的一些浪漫文人，表达了对拜占庭古都沦入异教徒之手的痛心。那些参与君士坦丁堡保卫战的意大利“志愿者”，如朱斯提尼亚尼及博基阿尔迪兄弟，或许是基于基督徒的情感倾向；但他们的政府却是精打细算的。坐视君士坦丁堡沦陷从商业上来说固然是一场灾难，但为此冒犯土耳其（既然已经与土耳其拥有了商业关系）

---

① 参见：Medlin, *Moscow and East Rome*, pp. 75-95.

也会损失惨重。西方的君主们同样无动于衷。甚至如阿拉贡国王这样的人物（长期以来，他梦想着建立一个庞大的黎凡特王国），也还没有做好将梦想付诸实施的准备。土耳其政府很快洞察了这一切。他们从不缺乏优秀的外交官。苏丹或许不得不与威尼斯、匈牙利，抑或教皇国及其个别盟友作战；但他却有机会加以各个击破。在摩哈赤致命的平原上，无人支援匈牙利的军队；[236]罗德岛骑士团被围攻期间，亦无人施加援手；更没有人关心威尼斯人丧失塞浦路斯的领地。威尼斯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确携手在勒班陀取得了伟大海战的胜利，[237]但并未从中得到足够回报。甚至哈布斯堡的国王们还需独自面对维也纳遭到的威胁。[238]在德意志与意大利，人们多年来为土耳其这个邻居感到惴惴不安，可这并不能使他们平息内争，一致对外。当多任法国国王摒弃了法兰克数百年来在十字军中扮演的角色，转而与土耳其苏丹结盟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十字军精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十三章　幸存者

181 西欧的良心虽然受到了触动但依然未被唤醒。希腊裔主教们，如伊斯多尔与贝萨里翁，或许在四处奔走，大声疾呼；教皇庇护二世，出于对希腊文化的仰慕，也竭力整合各种资源以图援救东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能给那些逃离土耳其人兵锋的难民带来些许慰藉。

这样的难民并不很多。穷苦人家只能留在东方，听天由命。而权贵们一部分自发地归顺了苏丹，其余大多被关押甚至处决。残存的则多半流亡意大利。

两大古老王朝后裔很快便也濒临消亡了。君士坦丁皇帝幸存的兄弟之一德米图斯，最初受到了苏丹的优待。他得到了原本属于加提卢西家族的封地，包括伊诺斯、利姆诺斯岛、伊姆布罗斯以及萨索斯与萨莫色雷斯的一部分。以上领地为他带来了一笔高达 60 万银币的年金（一半来自各岛屿，一半来自伊姆布罗斯）。此外，苏丹的铸币厂每年还向他提供 10 万银币。德米图斯携妻子佐伊及其兄弟马修·艾森（Matthew Asen，昔日为科林斯总督，现为德米图斯封地的盐业专卖官）在伊诺斯度过了宁静的 7 年时光。他终日以狩猎、宴席打发时间，但也不忘向教会捐赠了大量财富。然而，1467 年他的封地却突然被褫夺了。根据弗朗茨相信的说法，这是因为马修的下属擅自扣留了本应上缴苏丹的盐业税，而马修与德米图斯不得不为此担负责任。马修此后的命运已经不为人知。德米 182 图斯则被取消了全部岁入，贫困潦倒地居住在季季莫蒂霍[239]。一日途经此地的

苏丹遇见了德米图斯，为他的窘况感到些许内疚，于是下令从帝国谷物专卖收入中拿出 5 万银币，作为德米图斯的年金。不久之后，德米图斯与妻子双双遁入修道院隐居。1470 年他于一座阿德里安堡附近的修道院内逝世，几个月后，妻子也随他而去。他们唯一的子女海伦娜，虽然据官方说法被纳入了苏丹后宫，但实际上似乎保住了贞洁，独居在位于阿德里安堡的住所内。她早于父母数年去世，并将所余珠宝服饰赠给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①

另一位皇子托马斯则与家人逃往科孚岛，随身携带着宗教圣物——原本珍藏于帕特雷的使徒圣安德鲁（Saint Andrew）[240] 头骨。1460 年，他带着圣物来到意大利，1461 年 3 月 7 日，正式进入罗马。一周以后，为了对托马斯进献圣物表示嘉许，教宗给予他赠送“金玫瑰”（the Golden Rose）[241] 的殊荣。

此后他一直寓居意大利，期待有朝一日能重返摩里亚。教皇个人每月赠予他 300 达卡特津贴，教会则为他提供额外的 500 达卡特。直至晚年，他依然仪表堂堂，举止高贵，深受意大利人敬仰；在他公开皈依天主教后，这份好感便越发深厚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扎卡里亚被留在科孚岛，于 1462 年 8 月去世。1465 年 5 月，托马斯将子女们也召至罗马，数日后便与世长辞，享年 56 岁。②

托马斯膝下共有四位子女。长女海伦娜孩提时代便嫁给了拉扎尔三世，共育有三女。1459 年，在丈夫去世后不久，她将自己的长女玛利亚嫁给了波斯尼亚国王斯蒂芬。当土耳其攻占波斯尼亚时，年轻的皇后被送进了某奥斯曼将领的后宫，海伦娜与两个女儿不得不逃往莱夫卡斯（Leucas）。其中一个女儿米利卡（Militza）嫁给了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与莱夫卡斯岛领主莱昂纳多三世，但几个月后未曾生儿育女便死去了。另一个女儿伊琳（Irene）嫁给了斯坎

183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395, 412-3, 449; Critobulus, *op. cit.* pp. 58-9; *Historia Politica*, pp. 35-6. Lambros, *Παλαιολόγεια καὶ Πελοποννησιακά*, iv, pp. 221-9.

② Phrantzes, *op. cit.* pp. 410-5; Miller, *The Latins in the Levant*, pp. 453-4; Zakythinos, *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 i, pp. 287-90. 弗朗茨声称托马斯之妻享年 70 岁，这应该有误。托马斯于三年后去世时仅 56 岁，他们最小的孩子佐伊出生不可能早于 1456 年。托马斯与凯瑟琳 1430 年成婚。假设当时她 15 岁，那么去世时大约 47 岁。

德培之子约翰·卡斯特里奥特（John Castriota），当斯坎德培死后被迫与丈夫流亡意大利。海伦娜本人留在女婿位于莱夫卡斯岛的领地，成为了一名修女，并于1474年逝世。①

海伦娜的弟弟妹妹们要年幼许多。安德鲁生于1453年，曼努埃尔1455年，而佐伊大约生于1456年。这些孤儿后来被教皇收养。1466年6月，佐伊嫁给了意大利卡拉乔洛（Caracciolo）家族的某位贵族，但很快便不幸成为了年幼的寡妇。1472年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成功促成了佐伊与俄国沙皇伊凡三世的联姻，在他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婚礼在梵蒂冈举行，但沙皇仅仅派代表列席。教宗亲自送给新娘一笔6000达卡特的嫁妆，然而，当她抵达俄国后（此时已改名索菲亚），很快便放弃了天主教信仰，转而支持东正教会。她的女儿海伦娜通过与波兰国王亚历山大·雅盖隆（Alexander Jagellon）的结合重新皈依了天主教，但其儿子沙皇瓦西里三世（Basil Ⅲ）及继任者却依然拥护东正教派。[242] 波兰皇后海伦娜膝下无子。瓦西里三世的世系在一个世纪后，随着曾孙女阿纳斯塔西娅·费奥多罗芙娜（Anastasia Feodorovna）及其孙迪米特里（Dmitri）皇太子的去世，也宣告终结。

托马斯儿子们的事迹就显得有些乏善可陈了。曼努埃尔青年时期在意大利度过，教皇每月给他50达卡特的津贴。大约1477年他突然前往君士坦丁堡，自愿投靠苏丹。穆罕默德优厚地对待他，赠送了不动产与一笔款项。他于该地成婚，然而新娘姓名与他的逝世日期均已无从考证。他的长子约翰早夭，次子安德鲁后来改信伊斯兰教，以穆罕默德帕夏的称号，作为一名土耳其宫廷官员结束了一生。而他似乎没有留下后代。托马斯的长子安德鲁留在了意大利，每月同样领取50达卡特津贴。他被视作拜占庭王位继承人并自称“蒙上帝恩典虔诚的君士坦丁堡皇帝”（Deo gratia fidelis Imperator Constantinopolitanus）。然而 184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202, 413, 450. 参见：Lascaris, *Vizantiske Princeze u Srednjevekovnoj Srbiji*, pp. 97-123.

他的行为却毫无帝王风采可言。1480 年他与一名来自罗马的风尘女子卡特琳娜结婚，并因此负债累累。他鼓动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为他提供 200 万金达卡特，以便他组建一支远征军光复摩里亚。但这与他准备向外国野心家出售其高贵头衔和特权的努力一样，无法挽救财政破产的窘状。1490 年，安德鲁前往妹妹所在的俄罗斯宫廷，但事与愿违，他并不能因此获得金钱上的帮助。很快，安德鲁被视作不受欢迎之人，被迫离去。终于，在 1491 年，他从法国找到了“知己”——法王查理八世[243]，后者甚至为安德鲁偿还了部分债务。他为查理八世 1493 年对意大利的入侵击掌叫好，并亲自北上加入了国王的远征军。[244] 1494 年 9 月 16 日他与法王签署了一项协议，“慷慨”地将对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塞尔维亚等地的王位继承权让与查理，自己仅仅保留了摩里亚君主国。来年，当查理攻下那不勒斯后，在该地许诺为安德鲁提供一笔 1200 金达卡特的年金。但在查理离开意大利后（1495 年底），该年金是否曾如约给付是值得怀疑的；而当查理于 1498 年驾崩后这项资助自然也宣告结束了。安德鲁很快又陷入了拮据当中。1502 年他再度签署契约，将全部权利转让与西班牙统治者斐迪南（Ferdinand）与伊莎贝拉（Isabella）；但后者并未给他梦寐以求的大笔金钱。当他于是年 6 月去世时，其遗孀甚至不得不祈求教皇资助 104 达卡特以便她能够埋葬亡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君士坦丁。这位继承人虽相貌俊美，但无足轻重，曾经担任教皇卫队长，其卒年已不可考。①

在托马斯的两位孙子之后（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帕夏”与罗马无用的君士坦丁），帕列奥列格王室血脉至此断绝。② 一支源自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王室

---

① 托马斯儿子们的事迹，参见：Zakythinos, *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 i, pp. 290-7, and Typaldos, '*Οἱ ἀπόγονοι τῶν Παλαιολόγων μετὰ τὴν ἅλωσιν*', *Δελτίον τῆς Ἱστορικῆς καὶ Ἐθνολογικῆς Ἑταιρίας τῆς Ἑλλάδος*, viii, pp. 129-154. 关于佐伊公主的生平，参见：Medlin, *Moscow and East Rome*, pp. 76-7, 79, 86-7. 她的首次婚姻参见：Phrantzes, *op. cit.* pp. 424-5.

② 关于帕列奥列格家族 17 世纪在康沃尔的后裔及最终于巴巴多斯绝嗣的情况，参见：Leigh Fermor, *The Traveller's Tree*, pp. 144-9 and Zoras, *Περὶ τὴν ἅλωσιν τῆ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όλεως*, pp. 287-95. 该家族自称源自托马斯的一位名叫约翰的儿子。假设此人的确存在，那么作

支系从 14 世纪早期开始统治蒙费拉（Montferrat）[245]，不过在 1536 年绝嗣，其家族领地财产通过女性继承人转至曼托瓦侯爵。塞奥多利（君士坦丁十一世之兄）的后裔，塞浦路斯皇后海伦娜死于 1458 年，她唯一的孩子，夏洛特（Charlotte）女王，1487 年被放逐罗马并没有留下子嗣。② 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皇帝唯一流传至今的后代现定居于南意大利，为斯坎德培之子约翰 [246] 的后裔。③ 185

特拉布宗皇室家族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卫皇帝投降后享受了两年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在 1463 年，被他的"朋友"乔治·阿米罗特斯出卖，后者向土耳其当局告密——前皇帝收到了一份来自他侄女（也是乌宗·哈桑之妻）的信件，信中她请求将自己的兄弟阿莱克修斯或任意一位王子送往哈桑的宫廷。苏丹将此视作背叛。1463 年 3 月 26 日，大卫在阿德里安堡锒铛入狱，11 月 1 日，他与七位儿子中的六位及侄子阿莱克修斯一并于君士坦丁堡被斩首。他们的尸体被禁止下葬。当皇后海伦娜违抗禁令，亲自用双手挖掘坟墓埋葬亲人后，她被课以 15000 达卡特的罚金，并限期于三日内交付，否则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皇后的挚友与前部属为她筹集了足够款项，但她退回了剩余金钱以至于后半生在贫困潦倒中度过。她时年 3 岁的幼子乔治，被作为穆斯林收养。后来苏丹允许他拜访哈桑的宫廷，于是他趁机投奔了自己在格鲁吉亚的姐姐。乔治此后皈依了基督教并迎娶了一位格鲁吉亚公主，两人似乎育有后代，但对于其家庭详

为熟悉其家族情况的弗朗茨居然只字未提是不可想象的，何况曾任托马斯两位儿子家庭教师的贝萨里翁同样未予记载。有可能托马斯曾有一名叫约翰的私生子。更可能的情况是，该家族源自帕列奥列格家族旁系——这些旁系后裔人数众多，已算不上皇室血脉。因为正统皇室宗亲一般应为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王朝第一位皇帝）的男性后代，其宗谱是众所皆知的，很难有所遗漏。塞奥多利·帕列奥列格位于康沃尔兰道尔夫（Landulph）的坟墓上镌刻着拜占庭双头鹰，然而令人惋惜地是，它很可能是牵强附会的。

② 参见：Miller,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pp. 502-7. 我们得知海伦娜皇后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痛彻心扉，并热忱接纳了难民们。Makhairas, *Chronicle*, i, p. 682.

③ 关于斯坎德培后裔的情况，参见：Gegaj, *L'Albanie et L'Invasion Turque au xve. Siècle*, pp. 161-2.

细情况现在已无从考证。他的姐姐安娜，起初被送进了苏丹后宫，后被短暂地赠予马其顿总督扎加诺斯帕夏。她也被强制要求皈依伊斯兰教，不过后来得以重返故国，定居在特拉布宗附近乡间。在那里，她建立了一座以自己命名的村庄（Kyranna），并捐资修建了一座教堂。玛利亚·加提卢西在苏丹后宫平稳地度过了余生，她的儿子，另一位阿莱克修斯继续得到苏丹的恩宠，其最终结局已无人得知。按照传统，他获得了佩拉城墙外的封地，并被称作“贝伊之子”。今天伊斯坦布尔的贝伊奥卢（Beyoğlu, Beyoglu）区即因他而得名。[①]

186

人们对于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那些幸存下来的大臣及其家庭的命运所知不多。如果他们获得了自由，往往选择避世隐居。苏丹也曾颁布命令，允许人们赎回俘虏。根据一封来自学者费勒弗（Filefo）的信件，虽然语气近乎谄媚，但还是记载了他将岳母曼弗雷迪娜·多里亚（(Manfredina Doria, 约翰·克里索洛拉斯的遗孀）赎回并接至意大利与自己团聚的故事——过去人们常常传言她与女婿关系暧昧。[②] 君士坦丁的挚友与秘书弗朗茨花了几年工夫，终于赎回了自己与妻子，随后退隐至科孚岛。不过他依然保持着对同胞的关注以及对皇室的感情。在托马斯之女，前塞尔维亚太后的邀请下，他曾前往莱夫卡斯拜访她的女婿莱昂纳多，后者的姐姐曾经是君士坦丁皇帝的首任妻子；1466 年他还来到罗马，参加了佐伊公主的婚礼。不久之后，他与妻子进入了修道院隐居。作为一名修道士，他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书的最末，他加入了一段关于信仰的言论。尽管弗朗茨与东正教会的联合派保持着友谊，但他还是不能接受所谓的“和子说”。他的历史记载截止于 1477 年，他本人大约在一年后逝世。[③]

一些流亡者来到威尼斯，投奔弗朗茨昔日死敌（即卢卡斯·诺塔拉斯）之女。

---

① Phrantzes, *op. cit.* pp. 413-4; Chalcocondylas, *op. cit.* pp. 497-8; *Historia Politca,* p. 38; Miller, *Trebizond*, pp. 108-11.

② 费勒弗信件提供自：Legrand, *Cent-dix Lettres Grecques de Fr. Philephe*, pp. 62-8.

③ Phrantzes, *op. cit.* pp. 408, 411, 424-5, 429-46, 451-3.

安娜·诺塔拉斯在威尼斯定居多年，一直倾其所有帮助她不幸的同胞们。①

两位希腊枢机主教也定居于意大利。1459 年，前大牧首格里高利·玛玛斯去世后，教宗亲自任命伊斯多尔为他的继任者——此举完全破坏了拜占庭传统[247]。1463 年伊斯多尔去世，贝萨里翁继承了他不被公认的头衔。他此后致力于兴建一座一流的希腊图书馆（后赠与威尼斯），并尽力帮助希腊难民，直到他在 1472 年去世。莱昂纳德总主教回到了莱斯博斯岛，直至该岛 1462 年遭遇土耳其的侵占。随后他得以重返君士坦丁堡，不过此次的身份是奥斯曼人的战俘。但他很快被赎回并重返意大利，他于 1482 年逝世。②

乔治·阿米罗特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曾写信给贝萨里翁，恳请后者提供资金营救他的儿子巴希尔，但随后于特拉布宗的阴谋中逐渐倒向土耳其人。他的表弟马哈茂德帕夏将其视作坚定盟友并把他向苏丹举荐。乔治的地位在其长子亚历山大皈依伊斯兰教后，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穆罕默德对他的博学印象深刻，遂委托他制作最新版的托勒密（Ptolemy）[248]《地理学》，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此时作为一名阿拉伯学者，将该书全文翻译至阿拉伯文。1463 年，乔治爱上了末代雅典大公爵的遗孀（虽然此时他的发妻依然在世）并向她求婚。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丢尼修（Dionysius I）因其有重婚嫌疑拒绝批准他的婚姻。于是乔治便开始密谋罢黜大牧首并改信了伊斯兰教。几周后，他在与人玩骰子时突然去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罪有应得。③

作为拜占庭帝国末期最出色的学者，人们希望格弥斯托士·卜列东能够在乱

---

① Sathas, *Μνημεῖα Ἑλληνικῆς Ἱστορίας*, ix, pp. vi-xi.

② 参见：Brehier, article ‘Bessarion’ in Baudrillart, *Dictionaire d’ 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c ecclésiastique*, viii, coll. 1185-94; Miller,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pp. 348-9. Leonard of Chios, *De Lesbo a Turcis Capta*, ed. Hopf, *passim*. 据说伊斯多尔晚年变得头脑很不清醒。参见：Pastor, *History of the Popes*, trans. Antrobus, ii, p. 323.

③ Critobulus, *op. cit.* p.117; *Exthesis Chronica*, ed. Lambros, pp. 26-8, 36; *Historica Politica*, pp. 38-9; *Historia Patriarchica*, pp. 96-101. 参见：Tomadakis, ‘*Ἐτούρκευσεν ὁ Γεώργιος;*’ in *Ἐπετηρίς Ἑταιρείας Βυζαντινῶν Σπουδῶν*, xviii, pp. 99-143, 我认为他竭力替阿米罗特斯粉饰，虽然并未成功。

世中重整秩序，联合东正教人民，保留拜占庭古老的文化与礼仪，以便有朝一日帝国能够凤凰涅槃。然而，这一天始终未能到来。属于普世基督教会的拜占庭帝国已经寿终正寝了。①

188 的确，1453 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而已。拜占庭已然入土。即便没有土耳其的致命一击，随着帝国领土萎缩，人口锐减，财政枯竭——末日早晚也会到来。认为君士坦丁堡陷落促使希腊学者涌向意大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之前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大批希腊学者便已经前往意大利定居。1453 年，希腊世界最杰出的两位学者——贝萨里翁，早已移居意大利；另一位金纳迪乌斯则留在君士坦丁堡与苏丹展开某种合作。[249] 如果说意大利的海上贸易出现了某种衰退，这更多是因为新航路的发现，[250] 而不能归咎于土耳其人控制了海峡。诚然，热那亚在 1453 年之后迅速衰落，但这主要源于它在意大利本土地位不稳，而威尼斯则在此后漫长的时间中保有黎凡特地区兴盛的商路。即使此刻俄国自告奋勇地试图担任东正教派领袖，并将莫斯科称作"第三罗马"，这也并非石破天惊之举。多年以来，随着俄国军队逐步击垮了鞑靼异教徒，随着君士坦丁堡陷入衰颓并可耻地希望与西方教会达成妥协，俄罗斯人心中便已开始酝酿这样的想法。种子早已播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过令它瓜熟蒂落罢了。假使穆罕默德苏丹多几分优柔寡断而哈里尔帕夏多几分口灿莲花，假如威尼斯的增援舰队及时抵达，假如危急关头朱斯提尼亚尼并未负伤或没有科克波塔门的疏忽——长远来看，局势也不会有多少改变。拜占庭也许能额外苟延十年，土耳其对欧洲的入侵也许将放慢步伐，但西方国家并不能因此获利。换言之，不妨将君士坦丁堡的安全视作西方心理上的屏障——只要它还在基督徒手

189 中，危险似乎就是不那么迫切的。随着土耳其事务缠身无暇他顾，西方的压力随后有所减轻，不过若干年后奥斯曼人便卷土重来了。

尽管如此，1453 年 5 月 29 日依然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意味着古老拜占

---

① 参见：本书英文版，pp. 154-8.

庭文明的终结。在长达11个世纪的岁月里，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这座城市中，知识精英得到尊重，无数经典得到传承与弘扬。没有拜占庭抄写员与注释者的努力，我们今天必然无法了解如此多的古希腊著作。君士坦丁堡同样是一座艺术之都，在历届皇帝多年支持鼓励下，它形成了在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艺术流派，兼具古希腊的理性以及浓厚的宗教情怀。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市民们崇尚自由贸易，不论种族，皆以希腊罗马继承人自居，并为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自豪。但这一切都一去不返了。新的统治者并不鼓励他的基督教臣民钻研学术。没有了政府大方的赞助，拜占庭艺术也开始走向没落。新君士坦丁堡依然是座辉煌的世界大都市，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密布着华美的建筑。但它的美丽是为了表现苏丹的权威，而非基督教的上帝，它的居民因不同信仰而陷入分裂。君士坦丁堡的确获得了重生，并成为此后若干世纪旅行者们探访的目标；但它已经是“伊斯坦布尔”，不再属于拜占庭了。

拜占庭末期的英勇抵抗是否真的毫无意义呢？也不尽然。它给苏丹留下了深刻印象（其野蛮在城破后的所作所为中一览无余），使他不愿过于触犯希腊人。他素来仰慕希腊学识，此刻他发现古希腊的英雄主义也并未完全消泯。当秩序恢复后，或许正是这份钦佩促使他相对公正地对待其希腊臣民。大牧首金纳迪乌斯从苏丹处争取到的条件使希腊教会及大部分人民在自治下再次得到联合。对希腊人而言，未来必将充满艰辛。尽管他们被许诺可享有和平、公正与致富的机会，但他们毕竟沦为了二等公民。奴役必然带来堕落，希腊人也无法免俗。此外，他们过分依赖苏丹的友善——当“征服者”穆罕默德健在时，他们的待遇尚算不错；然而当他去世，其继任者往往不了解希腊文明，甚至以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皇帝，作为哈里发或圣战斗士为荣。很快，奥斯曼帝国伟大的行政机构开始走向衰落。希腊人不得不以欺骗应对腐败，以不忠应对不公，以阴谋反对阴谋。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历史令人扼腕，且颇不光彩。但是，尽管有种种错误与缺陷，教会毕竟幸存下来了，而只要教会存在，希腊精神就不会真正消亡。

西欧世界，怀着长期形成的对拜占庭文明的羡慕与嫉妒，深信教皇对东正教

派分裂基督教这一滔天大罪的指责，同时也对君士坦丁堡最终的沦陷抱有一丝愧疚——便决定将拜占庭从记忆中抹去。它无法否认自己曾从希腊获益良多，但往往认为这只发生在古典时代。参加希腊独立战争（1821–1829 年）的西方希腊同情者们谈论着塞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与伯里克利（Pericles）[251]，却无人提起君士坦丁。很多希腊知识分子深受伏尔泰与吉本的学生，鬼才克瑞斯（Korais）[252] 的误导，在后者看来，拜占庭仅仅是一段充斥着迷信的历史插曲，最好将它遗忘。于是，希腊独立战争从未真正解放希腊人民，而仅仅建立了一个不大的希腊王国。相对而言，农村地区保留了更多传统。人们还记得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谱写的悲歌——因其骄奢自满与叛教行为而遭到上帝的惩罚，不过最终英勇奋战，虽败犹荣。他们记得那可怕的星期四（君士坦丁堡陷落日期 1453 年 5 月 29 日恰好为周四），迄今真正的希腊人还把这天作为一个不祥的日子；但每当提及末代皇帝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依然不免心潮起伏：君士坦丁被西方盟友们背弃，可他屹立在城墙缺口，决不后退一步，直至被异教徒的大军所吞没——罗马最后的皇帝，连同他殉葬的帝国，永远消失了。

191

附录一　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主要参考资料

对历史学家而言，非常幸运地是，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今天留下了大量可互相参照的同时代专业历史著述、亲历者的日记和快报。在摈除基于民族、宗教因素导致的偏见后，比对上述材料找出其共通之处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我将列出主要的一些资料来源。 192

1. 希腊方面：

围攻期间，同时代希腊历史学者中，仅有一人在场，那就是乔治·弗朗茨。（他通常自称 Sphrantzes，虽然其家族一般被称作 Phrantzes）他祖籍伯罗奔尼撒，约出生于 1400 年后。年轻时弗朗茨便成为了曼努埃尔皇帝的一名秘书，并在他驾崩后继续为继任者君士坦丁服务，直至后者去世。他与一名皇室远亲结婚，并成为了皇帝的挚友与顾问。他本人虽对教会联合不感兴趣，却对皇帝的决策忠心耿耿。他也有自己的偏见——不喜欢皇帝两位兄弟塞奥多利与德米图斯，尤其长期厌恶大公卢卡斯·诺特拉斯（或许因为诺特拉斯是他在宫廷的竞争对手）。作为一名宫廷官员他显得有些自负，不过他的确在朝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以上缺陷瑕不掩瑜，他的记载总体还是真实可靠，具有说服力的。其作品存世的共有两部，其一为 *chronicum minus*，所记载内容从 1413 年至 1477 年，大体相当于弗朗茨生活的年代；另一部是 *chronicum majus*，它涵盖了整个帕列 193

奥列格王朝的历史。现代研究证明，第二部极有可能是一个世纪后某位名叫马卡里奥斯（Macarius Melissenus）的历史学家伪托之作。弗朗茨关于围攻的记录提供了亲历者的视角，虽然由于被俘他不太可能保留第一手笔记，但当他重新执笔时想必对事件依然记忆犹新。除去个别日期不太精准以外，他的记录总体是翔实、生动、可靠的。而他的写作则呈现一种含蓄从容的文风。[①]

达卡斯（Ducas，全名可能为 Michael Ducas）是一位知名度略低的历史学家，其生平我们今天知之甚少。他显然大部分时间为热那亚人效力，围攻进行时可能正定居于希俄斯岛。达卡斯是教会联合的热心拥趸，并且习惯以拉丁人的眼光看待问题。他的著作涵盖时间从 1341 至 1462 年。现代历史学家对他的作品评价甚高，我个人以为，有些言过其实。对于穆罕默德二世宫廷方面的事件他的记载缺乏价值；他很可能是通过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商人获得了资讯。毕竟他并非战役亲历者，许多记载并不准确，而且他对拒统派希腊人抱有很深偏见。[②]

雅典学者拉奥尼科斯·卡尔科孔狄利斯（Laonicus Chalcocondylas，1423–1490）于 1480 年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著作，当时他已是一个老人了。他一生大半时间在伯罗奔尼撒度过，还曾师从米斯特拉斯的学者卜列东。他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拜占庭并非其重点。他对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颇有研究，因此他的著作也带有古典主义色彩。他的年表偶尔有含混不清之处，并且对于君士坦丁堡围攻着墨不多，但他擅长把握关键史实——这么做自然各有利弊。[③]

194

---

① 关于弗朗茨的资料，我所用为《波恩文集》版本（Bonn edition），目前他的作品的相关新版也已经问世。关于 *Chronicon Majus* 的作者问题，参见：Loenertz, ‘Autour du Chronicon Maius attribué à Georgios Phrantzes’, *Miscellanea Mercati*, iii. 关于他的真名，参见：Laurent, ‘Sphrantzes et non Phrantzes’, *B.Z.*, xliv.

② 关于达卡斯的资料，我所用为 Grecu 在 1958 年于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新版，其质量好于较早的波恩版本，但我个人无法给予达卡斯一如 Grecu 那般的高评价。参见：Grecu, ‘Pour une meilleure connaissance de l’historien Ducas’, *Memorial Louis Petit*.

③ 关于卡尔科孔狄利斯，我未能找到 J. Darko 1922 年于布达佩斯出版的版本，因此选用了《波恩文集》中的参考文献。关于他的确切生平，参见：Vasiliev, *A History of the*

第四位同时期希腊历史学家是克里托布拉斯，围攻发生时为一名伊姆布罗斯岛的官员。他在政治上倾向于将苏丹的征服视作必然（尽管令人心痛），并且希望能促使同胞们顺应时势。他的著作时间涵盖 1451–1467 年，书中的英雄是苏丹穆罕默德。克里托布拉斯对希腊人的英勇抵抗也深受感动，并不否认城陷后人们遭受的痛苦，但他往往倾向于拒绝将野蛮罪行归咎于苏丹本人。由于他的写作素材同时来自交战的希腊、土耳其双方，因此显得尤为重要。除去他为苏丹粉饰的部分，整部著作还是可靠、公正的。②

莫奈姆瓦夏的多洛休斯（Dorotheus of Monemvasia）、曼努埃尔·马拉克奥斯（Manuel Malaxos）所著编年史与《艾克瑟希斯编年史》（Ecthesis Chronicon）虽然对我们了解围攻本身并无益处，当却提供了土耳其征服之后的宝贵资料。为了方便起见，我参考了《艾克瑟希斯编年史》以及两本收录于《波恩文集》[253]（Bonn Corpus）的编年史 *Historia Politica* 与 *Historia Patriarchica*。③而 *Χρονικὸν περὶ τῶν Τούρκων Σουλτάνων*（Barberini Codex Graecus Ⅲ）一书则以忠实记录希俄斯的莱昂纳德主教（他对希腊人有很深敌对情绪）关于围攻的报告而著称。④

至于大量涉及君士坦丁堡沦陷的哀歌、诗词，它们作为民谣的艺术价值远大于历史价值，不过尚能为我们提供当时民间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传统看法。⑤

195

流传至今的希腊信件，最重要部分的由金纳迪乌斯（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第一任大牧首）书写，它为我们提供了 1453 年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许多宝贵资

Byzantine Empire, p. 693.

② 关于克里托布拉斯，我选用的是 1954 年普林斯顿出版的英译版，虽然它并非直译自希腊原版，但对比 Dethier 的法译版（译自希腊版）后，我发现前者是可信的，关于他的生平，参见：Pea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pp. x-xi. 他的亲土耳其视角，使当代希腊历史学家倾向于低估他。

③ 以上编年史参见：Moravscik, *Byzantinoturcica*, i, pp. 128-9, 159, 246-8. 还有诗体的 Hierax 编年史，即 Sathas, *Μεσαιωνικὴ Βιβλιοθήκη* i, 不过其史料价值较低。

④ 注释版由 G. Zoras 出版，对莱昂纳德主教着墨甚多。

⑤ 以上各种资料参见：Zoras, *Περὶ τὴν ἅλωσιν τῆ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όλεως*, pp. 157-283.

料。特别是根据它的记述，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对卢卡斯·诺特拉斯政策相对公允的评价，而其他史料（如弗朗茨、达卡斯及很多拉丁人的记载）往往对他抱有成见。[①]

2. 斯拉夫方面：

关于这场围攻，有两份来自斯拉夫的重要资料。其中之一通常（但不够贴切地）被称作《波兰新军日记》（the Diary of the Polish Janissary）。作者是一位被称作奥斯托夫卡的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Michael Constantinovic of Ostrovica）的塞尔维亚人，他曾是塞尔维亚君主派往土耳其为苏丹作战的部队一员，退役后定居波兰。然而他从未加入新军。迈克尔的著作以波兰语、塞尔维亚语混合写成，它提供的细节并不多，但却能从苏丹麾下（并不那么情愿的）基督教盟军的角度提供一些观点。

第二部作品《斯拉夫编年史》（*Slavic Chronicle*）原以巴尔干一带古斯拉夫方言写成，版本众多，存世的包括俄罗斯、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版。[②] 它显然基于某些君士坦丁堡战役亲历者的报告而成，并保留了一些当事人日记，不过据信经过了一些改动。它记载的日期不尽准确，并添加了一位虚构的牧首及皇后。但部分细节的描述栩栩如生，颇具参考价值。俄国版署名内斯特－伊斯康德（Nester-Iskander），或许这就是原著者的真名。

3. 西欧方面：

最有价值的西方材料非尼科洛·巴尔巴罗的围攻日记莫属。他出身威尼斯名门，是一位随军医生，与威尼斯舰队一道，在围攻前夕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与

---

① 信件参见：Gill, *op. cit.* pp. 366 ff.

② 关于斯拉夫编年史的问题，参见：Unbegaun, 'Les relations vieux-russes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Revue des Etudes Slaves*, ix, and Jorga, 'Une source négligé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Académie Roumaine, Section Historique*, xiii.

威尼斯指挥官过从甚密，且颇具智慧与观察力。他每天坚持日记，在某些日子也会检查文本并添加一两处前后参照，而他显然改动了月食的准确日期（相差两天）。作为一名标准的威尼斯人，他憎恶热那亚人，乐于记录后者一切不名誉的行为，但与很多西方人不同，他对希腊人毫无成见。得益于他的日记，我们才能对整个事件的时间顺序有一个精确掌握。①

另一重要文献来自希俄斯岛的莱昂纳德（莱斯博斯岛总主教），他于君士坦丁堡沦陷约 6 周后在希俄斯完成了他的著作。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对整个事件尚记忆犹新，故其记载相对可靠，且十分生动——当然，我们要将他对希腊人的成见排除在外。他甚至认为君士坦丁皇帝与伊斯多尔主教（莱昂纳德之上司）太过“随和”，以致有些软弱。不过与此同时，他并不偏袒自己的热那亚同胞，对朱斯提尼亚尼擅离职守的行为也加以指责。他性格有些苛刻自大，但其记载依然很有价值。②

伊斯多尔主教写给教皇及全体基督徒的信件过于简略，不过能够代表某种“官方立场”。③[254]

佩拉总督安杰洛·吉奥瓦尼·洛梅利诺（Angelo Giovanni Lomellino）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几日后发往热那亚政府的报告，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描述了佩拉人的命运，更为我们了解君士坦丁堡的状况提供了独特视角。他声称有相当一部分佩拉的热那亚居民自发为君士坦丁堡守卫城墙，因为他们深谙唇

---

① 关于巴尔巴罗的详细资料参见：Pea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pp. ix-x.

② 关于莱昂纳德的报告，我所用的是来自 Migne 之 *Patrologia* 的拉丁文版本。此外还有一稍晚成书的意大利语版（来自 Sansovino, *Historia Universale*, iii），不过在一些小细节上略有出入。

③ 与莱昂纳德的情况类似，伊斯多尔的报告亦有两个版本，分别来自 Patrologia（拉丁文）及 Historia Universale, iii。很有可能，致教皇的拉丁文本是译自意大利语本，故而文字上也略有差异。伊斯多尔的著作还可参见：Mercati, ‘Scritti d’Isidoro il Cardinale Ruteno’, *Studi i Testi*, xlvi.

亡齿寒的道理。[①]

一份来自君士坦丁堡圣芳济修会的记载留下了一些关于城破后劫掠暴行的资料。

其余留下了记录的战事亲历者还包括佛罗伦萨人铁达尔迪、热那亚人蒙塔尔多（Montaldo）、克里斯托弗洛（Cristoforo）及布雷西亚学者乌贝蒂诺·普斯库鲁斯（Ubertino Pusculus）。其中铁达尔迪写给阿维尼翁主教阿兰·德·奎蒂维（Alain de Coëtivy）的著作最具价值，它提供了一些独家的资料。他能公正地评价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表现，对希腊人的作战也不无钦佩。蒙塔尔多与克里斯托弗洛的记载也包含了少量独有资料。乌贝蒂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多年，撰写了一篇相关长诗，对战役史实存在较多谬误，可能其本人并未亲身参与；并且，这首作品的重点放在了围攻开始之前。乌贝蒂诺对希腊人有很深的偏见。

197

我们从佛罗伦萨人安德里亚·坎比尼（Andrea Cambini）的著作里也能获得某些有益的资讯。他这部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专著，大约成书于15世纪末；看上去他似乎拜访过大围攻的幸存者。佐尔佐·多尔芬（Zorzo Dolfin）根据莱昂纳德主教的记载写成了自己的短篇作品，但补充了由战役幸存者提供的部分史料。希腊流亡者坎塔库济诺·斯潘达基诺（Cantacuzino Spandugino）撰写的土耳其史则提供了目击者对城市浩劫的描述。[②]

4. 土耳其方面：

土耳其关于此次围攻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史料相当令人失望。原本人们期待，伟大苏丹这一卓越成就必将被土耳其历史学家们大书特书。但实际上，他们对于鲁梅里要塞的建造反而倾注更多笔墨；而对围攻本身则只提及了通过陆路运输舰队和最后总攻。另一方面，土耳其历史学家更喜好谈论苏丹宫廷的权

---

① 佩拉总督的名字通常被称作扎卡里亚（Zaccaria），但Desimoni在为蒙塔尔多的记载所写的前言中（pp. 306-7）称当时佩拉总督的名字是洛梅利诺（Lomellino）。

② 以上资料出版及版本参见：本书“参考文献”部分（pp. 237-9）。

谋之术。穆罕默德之后，生活于巴耶济德二世时代的史家们如阿什克帕萨扎德（Ashikpashazade），图桑贝伊（Tursun Bey），内什里（Neshri）等在歌颂在任苏丹的同时，往往略倾向于通过拔高穆罕默德二世部下（如马哈茂德）的作用来贬低他。当然，他们的记载对于了解土耳其宫廷政策还是有裨益的。第一位 198 对完整记载君士坦丁堡战役产生兴趣的土耳其历史学家为萨德·艾丁（Sa' ad ed-Din），其相关著作完成于16世纪末。然而，与很多穆斯林史家一样，他习惯于借鉴，甚至抄袭前人的作品。其著作与希腊人的大同小异。[①]

17世纪初的一些著作甚至添加了几分幻想色彩。埃夫利亚·切列比（Evliya Chelebi）详细地记下了据称是来自其曾祖父的故事，其中包含颇多虚构成分，例如他谈到，一位法国公主原本是皇帝的新娘，却在城陷后沦为苏丹的俘虏。他很可能是从希腊人那里听说了这个事件，不过它发生于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时期，这位公主是艾格尼丝（Agnes）皇后，她是法王路易七世之女，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二世与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未亡人。无论如何，他的著作看上去更多是道听途说，而非有较早的资料来源。[②]

这以后的土耳其史书通常只是重复前人们的著作。

---

① 关于我提到的土耳其的历史学家，参见：Babinger, *Die Geschichtsschreiber der Osmanen und ihre Werke*, 以及 H. Inalcîk and V. L. Menage, *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ed. B. Lewis and P. M. Holt. 还可参见：Inalcîk, 'Mehmed the Conqueror', Speculum, xxxv, passim.

② 不过平心而论，埃夫利亚·切列比书中对于同时代君士坦丁堡的记载却是有价值且可信的。

附录二　征服之后的君士坦丁堡教堂

199　根据伊斯兰传统，一座基督教城市如果拒绝投降而被攻占，居民将丧失人身自由与宗教场所；并且征服者有权肆意劫掠三日。记载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所有历史学家均提到了对城市中教堂的洗劫。无疑，相当一部分教堂与修道院都未能幸免。然而，根据同时代的资料，我们只能确定四所受难教堂的名字，分别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佩特拉的圣约翰教堂，陆墙一带的科拉教堂，以及金角湾一带的赛奥多西亚教堂。[①] 考古学证据显示，神圣救主教堂也遭到了洗劫；金纳迪乌斯作为一名神父在它邻近的修道院中被俘一事，也可作为旁证。圣索菲亚大教堂很快被改为了清真寺，其余几座教堂废弃了一段时间，最终也被穆斯林征用。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堂其城破后的命运未见诸史册。我们可以推断它们也遭到了破坏掠夺并被废弃。其中包括大皇宫区附近的若干教堂，如“新教堂”及圣乔治教堂[②]。不过，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教堂毫发无损并继续由基督徒掌控。城中第二大教堂——圣使徒大教堂，由苏丹交予大牧首金纳迪乌斯使用，其中

---

① 参见：本书英文版第 146 页，佩特拉区的圣约翰教堂最终被献给了马哈茂德帕夏信奉基督教的母亲而重新开放。

② 1390 年造访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朝圣者斯摩棱斯克的依格那修（Ignatius of Smolensk）、1393 年到来的亚历山大及 1440 年抵达的佚名香客提到了以上教堂。De Khitrovo, *Itineraires Russes en Orient*, pp. 138, 162, 233-4.

圣物均安然无恙。当数月后牧首自愿放弃该教堂时，被准许带走了全部圣物。 200
牧首转移至帕那区的帕玛卡里思托斯教堂，它本为一座女修道院，此时修女们迁往了附近的圣约翰教堂（位于特鲁略）。[①] 不远处，布雷契耐区边缘的圣德米图斯教堂也安然无恙。在城市另一端，萨马蒂亚（Samatya, Psamathia）的佩里布勒布托斯（Peribleptos）教堂直至 17 世纪中叶还掌握在希腊人手中，随后被苏丹易卜拉欣为了取悦其亚美尼亚情人塞克帕斯（Şekerparçe，绰号“糖块”）而赠与了亚美尼亚社区。附近的圣乔治教堂也得到了保全。里普斯（Lips）教堂、圣约翰教堂、圣安德鲁教堂都继续被基督徒保留直至多年后方被改建为清真寺。米利莱昂（Myrelaeon）女修道院直到 15 世纪末依然存在。[②] 大约与此同时，圣约翰（传福音者）教堂因距离一座新建清真寺过于接近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③]

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将如何生存下去？以上问题也困扰着土耳其人。1490 年巴耶济德二世一度勒令大牧首交出自己的教堂（帕玛卡里思托斯教堂）。时任牧首的丢尼修一世极力证明了该教堂乃是穆罕默德二世亲允作为牧首驻地。苏丹最终让步，但他要求基督徒摘除教堂尖顶的十字架，并拒绝制止其官员侵占其他教堂的行为。[④]

大约三十年后，敌视基督徒的塞利姆一世要求大维齐将帝国全体基督徒强制皈依为穆斯林。当他被告知这一计划难以实施后，便退而求其次，希望至少将全部教堂查抄充公。大维齐及时警告了大牧首狄奥莱普特斯一世（Theoleptus Ⅰ），后者在一位机敏的律师克塞纳基斯（Xenakis）帮助下，偕同三位年近百岁的新军老兵觐见苏丹。狄奥莱普特斯承认因为火灾，他手上已经没有可保护 201

① Phrantzes, *op. cit.* p. 307; *Historica Politica*, pp. 28-9, *Historia Patriarchica*, p. 82.

② 这些教堂参见：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hurches in Constantinople*, pp. 49, 113, 128; Janin, *La Géographie Ecclésiastique de l' Empire Byzantin*, iii, i, pp. 33, 75, 95, 224, 228, 319, 365-6, 447.

③ 这看上去应该是距离大竞技场不远位于狄皮恩的圣约翰教堂，它在 16 世纪中期被改用作动物展览。Janin, *op. cit.* pp. 273-4.

④ Hypsilantes, *Τὰ μετὰ τὴν Ἅλωσιν*, pp. 62, 91.

教堂的苏丹诏书。但步履蹒跚的新军老兵们却对着《古兰经》发誓，作为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卫队一员，他们亲眼目睹了入城时相当一部分城区向苏丹交出了钥匙并被接受投诚。于是，穆罕默德允许这部分市民保留自己的教堂。塞利姆苏丹接受了这份人证，甚至允许重新开放两三座之前被没收的教堂（其名字已不可考）。①

1537 年，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争议又一次出现了。大牧首耶利米一世（Jeremias Ⅰ）向苏丹强调了先帝塞利姆的决策。于是苏丹征询伊斯兰“筛海”（Sheikh ul-Islam）[255] 的意见，后者宣称：“众所周知，这座城市被武力攻占。但基督徒历来保有部分教堂的事实证明，君士坦丁堡是有条件地投降的。”苏莱曼（本人也精通律法）认可这一裁决，教堂因而再次得以保全。②

但之后的苏丹便越来越缺少这份宽容。1586 年穆拉德三世强占了牧首宫；至 18 世纪，全城仅有三座 1453 年前便已存在的教堂掌握在基督徒手中，它们是圣乔治教堂、圣德米图斯教堂（曾先后毁于地震及火灾）、③ 圣玛丽教堂——它一度被穆罕默德二世没收，但旋即被赠予苏丹喜爱的希腊建筑师克里斯托杜拉斯从而得以归还教会。到了艾哈迈德三世时代，土耳其人试图夺取圣玛丽教堂，而大牧首的律师德米图斯·坎泰米尔（Demetrius Cantemir）向大维齐阿里（Ali Koprülü）出示了苏丹将它转交于希腊人的诏书④。于是它作为教堂沿用至今，虽然在 1955 年的反希腊暴乱 [256] 中遭到了破坏。

塞利姆时期大牧首依靠年迈新军士兵作为人证一事究竟有多可信呢？德米图斯·坎泰米尔（一位博学多识同时具有部分鞑靼血统的希腊人）在 17 世纪末

---

① *Historia Patriarchica*, pp.158 ff.; Cantemir, *History of the Othman Empire*, pp. 102-5.

② *Historia Patriarchica, loc. cit*; Cantemir, *loc. cit*; Hypsilantes, *op. cit.* pp. 50-2. *Historia Patriarchica* 一书将两段历史插曲合二为一，不过它明确记载了在狄奥莱普特斯一世的事件中几位新军士兵扮演的角色（1537 年距君士坦丁堡陷落已过去 84 年，还能找到健在的战役亲历者颇有些不可思议）。

③ Janin, *op. cit.* pp. 75, 95.

④ Cantemir, *op. cit.* p. 105.

撰写了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专著，因其大量引用土耳其方面资料而具有独特重要性（虽然他经常不注明资料出处）。在书中他进一步提出，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是准备投降的，然而当皇帝的使节们陪同苏丹使团入城时，却遭到了不明就里的守军的射击；愤怒的土耳其人于是对城墙发动了总攻。因此，城破后苏丹将它按照“部分投降”加以处置——基督徒得以保留大约一半教堂（从公牛广场至城墙一带）。但这段记载显然是虚构的。坎泰米尔声称上述说法来源于土耳其历史学家阿里的记载；但实际上早在一个世纪前，《大牧首史》（*Historia Patriarchica*）便已有类似记述，但甚至原作者也对此事的真实性感到怀疑。这个历史版本大概体现了土耳其人试图解释为何基督徒能保留如此多教堂的尝试。这段故事在略早于德米图斯·坎泰米尔时代，由某个名叫侯赛因的历史学家完成的著作中也有体现，但他究竟是虚构了此事或有所凭据已不得而知。[256]

虽然这段故事十分荒唐，但并不能因此证明老新军士兵们的传说同样经不起推敲。我们有必要了解，那个年代君士坦丁堡的特殊状况，与现代建筑密布的城市不同，即使在它最繁荣的日子里，各个城区之间也间隔着果园或花园。1453 年，由于其人口较 12 世纪萎缩了近十倍，这座城市实际上沦为了若干“村落”的集合，它们彼此间想必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且各区可能还有单独的防御工事。每个城区都有可能单独投降。如佩崔恩区便拥有自己独立的城墙。极有可能，某些居民区的领袖听闻城墙失守后，便立即向邻近的土耳其部队投诚了。一旦全城沦陷，抵抗停止，土耳其指挥官便派人护送头人们前往苏丹所在地正式宣布他们的弃暗投明。穆罕默德留下了一些值得信赖的部队充当宪兵，无疑也派遣了其中一部分用于保护那些投诚的居民区。新军士兵们后来的证词应当是可信的。

203

还有其他证据支撑上述判断。17 世纪初，埃夫利亚·切列比记载，曾有一些佩崔恩区的渔夫为苏丹打开了城门，直到现在还被免除承担各种义务及什一

税。[1]在 18 世纪，英国旅行家詹姆斯·达拉维（James Dallaway）写道：当英勇的君士坦丁皇帝在圣罗马努斯门殊死抵抗之时，其他某些市民，不论是出于怯懦还是绝望，便已经与苏丹达成协议，开启了菲那（Phenàr）区的城门以换取优待。据此，他们从苏丹手中得到了整个邻近城区，并享有某些特权。[2]如果我们标记出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所有幸存教堂，就会发现它们几乎全部（仅一处例外）坐落于佩崔恩区、菲那区或萨玛西亚区，大体处于城市西南的斜坡上。因此，推断上述城区因为及时投降而保住了它们的教堂，是合情合理的。居民们是否一并保住了自己的住宅与人身自由则不那么确定。克里托布拉斯在他的著作里暗示洗劫之后全城遭到彻底破坏，所有居民都沦为奴隶。但君士坦丁堡市区面积广阔，部分偏僻城区有可能被敌军忽略而得以幸免。至少我们确定，某些城中的居民尚有能力赎回部分沦为俘虏的同胞。

苏丹并不想继承一座沦为废墟的城市，同时他也表现出将希腊人与土耳其人一视同仁的愿望。对穆罕默德而言，为他日后的希腊臣民保留部分城区及教堂是有利无弊的。城中部分地区的主动归顺正合时宜。这或许能解释圣使徒大教堂的命运。这座伟岸的建筑恰恰位于由城墙通往大皇宫区的必经之路。凯旋入城的大量士兵不可能不注意到它，而它免遭破坏必然是受到人为保护的缘故——穆罕默德想必派遣了一支部队去守卫教堂。我们只能假设，苏丹已经决定当拜占庭国家教堂索菲亚教堂被改为清真寺时（此举以显示土耳其人才是帝国真正主宰），希腊人作为帝国的“二等公民”，有权保留第二大教堂（即圣使徒教堂）。他显然是毫不犹豫地于城破数天后，便将圣使徒教堂转交给新任大牧首。而后者自愿放弃它一事与苏丹并无关系。[3]

因此，虽然坎泰米尔记载的关于君士坦丁堡主动投降的事件纯属虚构，但

204

---

① Evliya Chelebi, *Travels*, trans. Hammer, i, p. 159.

② Dallaway, *Constantinople Ancient and Modern*, pp. 98-9.

③ 前文（本书英文版第 200 页）所提到的圣约翰教堂如果的确位于狄皮恩，也会带来新的疑问，因该地区似乎并无其他教堂幸存。

苏莱曼苏丹的顾问们认为该城既是被武力攻占，又是有条件投降的裁决，也并不是荒唐可笑的。

译　注

致谢

[1] 此处指作者斯蒂文·朗西曼唯一的哥哥第二代多克斯福德子爵沃尔特·莱斯利·朗西曼（Walter Leslie Runciman, 2nd Viscount Runciman of Doxford, 1900–1989）。与弟弟兴趣爱好不同，他更专注于航海及航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期在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服役，二战期间曾任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第一任总裁，并荣获空军十字勋章（Air Force Cross）、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战后他作为长子继承了父亲的子爵勋位及家族船运公司（其祖父沃尔特·朗西曼男爵为英国船运巨头）。莱斯利的商业生涯颇为成功，此外，他热爱游艇，曾任在世界享有盛誉的英国皇家游艇队队长（Commodore of the Royal Yacht Squadron），因为精通航海业务，还担任英国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主席达十年之久。有趣的是，虽然兄弟二人看似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莱斯利之子，第三代多克斯福德子爵加里·朗西曼（Garry Runciman，1934–）却继承了叔父的衣钵，他已成为当代英国历史社会学方面的领军人物，并且长期在剑桥三一学院任教，他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更于2001–2005年被选举为该院主席。加里和父亲一样，是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但青出于蓝，位阶为司令勋章（CBE）。自第一代朗西曼男爵以来，朗西曼家族可谓人才辈出。

前言

[2] 从10世纪时起，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开始称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这个名称来自希腊语 *στην Πόλη*，即“在城里”、“进城去”。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后，“伊斯坦布尔”逐渐成为该城的官方名称，与“君士坦丁堡”一词并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于1930年将它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朗西曼四十年代曾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而完成此书时间在1964年，书中所用“君士坦丁堡”旧称显得不够“正

式”，故而他做出以上说明。

第一章

[3] 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

[4] 阿斯克的亚当（1352−1430），他也是一名威尔士神父和历史学家。

[5] 1071 年，拜占庭罗曼努斯四世皇帝在曼奇克特会战中惨败于土耳其人，宣告了帝国丧失小亚细亚领土的开端。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 卷一》，钮先钟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年，343−357 页。

[6] 1054 年，东西方教会互相开除对方教籍，标志两大教会公开分裂。

[7] 赛奥多利 · 梅托切特，1270−1332，拜占庭政治家、作家、哲学家及艺术资助人，1305-1328 间为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重要顾问。

[8] 约翰 · 坎塔库震努斯（1292−1383），即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1347−1354 年间在位。他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统治时期，曾任帝国首相与军队总司令，被后人誉为帕列奥列格王朝最伟大政治家。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后，他与其继承人约翰五世就帝位继承爆发内战，史称“两约翰之战”。坎塔库震努斯依靠土耳其势力，于内战中一度占据优势，并成功加冕为皇帝，但最终因亲土政策招致国内广泛不满，被首都民众起义推翻，在修道院度过了余生。这场内战严重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实力。参见：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331−333 页。

[9] 斯蒂文 · 朗西曼在此用了一个术语 apophatic（源于希腊语 *ἀπόφασις*，本意为“否定”），其派生含义为“通过否定来证明”。东正教会神学有时也被称作 Apophatic theology（可理解为“反证神学”），即认为上帝不可捉摸，只能通过论述上帝不是什么来探寻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则为 Cataphatic theology（“通过肯定来证明”的神学）。由于东正教的这一特征，其观点相对倾向于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

[10] 对于圣灵如何产生，基督教东西教会有不同理解。《尼西亚信经》中对此并无明确定义。罗马天主教会秉承圣奥古斯都的观点，认为圣灵由圣父、圣子共同产生，即术语“和子说”（Filioque）。而东方教会接受的为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us）之理论，即圣灵由圣父产生，圣子、圣灵都借圣父而存在。是否接受“和子说”成为东西方教会在谋求统一过程中的重大神学分歧。

[11] 对基督教义的增添，如“和子说”。

[12] 宗主教（希腊语：*Πατριάρχης*，拉丁语：Patriarcha）是基督教会中最高等级主教的头衔（中文传统上将东正教会的宗主教称作“牧首”）。在基督教历史早期，罗马帝国境内五座重要城市（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主要教区，该地主教地位崇高，拥有最古老的宗主教头衔。上述五地合称五大宗主教区（Pentarchy），按历史荣誉，其主教排名先后如下：西方宗主教（即罗马教宗），君士坦丁

堡、新罗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亚历山大和全非洲牧首，大安条克和全东方希腊教会牧首，耶路撒冷圣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理论上，罗马教皇作为圣彼得继承人，享有“首席”地位，但依据东正教传统，西方宗主教并无逾越其他主教的特权。2006 年，“西方宗主教”这一头衔被教皇本笃十六世于官方文件中删除。

[13] 贝特朗东（1400–1459），勃艮第朝圣者，1432–1433 年间曾前往圣地，途经君士坦丁堡，后应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的要求将见闻写作游记 *Le Voyage d'Outre-Mer*。

[14] 佩德罗·塔法（1410–1484），西班牙旅行家。

[15]“新教堂”（the Nea Basilica, 或 The Nea Ekklēsia，“新教堂”为意译）是继 6 世纪索菲亚大教堂建成后，君士坦丁堡又一重要教堂（瓦西里一世 880 年建于皇宫区）。它也被称为拜占庭中期建筑艺术之集大成者。帝国灭亡后教堂被奥斯曼人改为弹药库，1490 年因雷电引爆火药而被毁。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46.

[16] 此处所指“圣母教堂”(the church of the Mother of God)，位于君士坦丁堡皇宫区灯塔附近，始建于 8 世纪，9 世纪时由米哈伊尔三世重建。参见：G. Majeska, *Russian Travelers to Constantinople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 Collection, 1984, p. 246.

[17] 革命者被称作“狂热者”（Zealots），反对贵族统治，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他们于 1342-1350 控制了塞萨洛尼基。

[18] 摩里亚理论上属于拜占庭帝国，但一般由拜占庭太子或王子统治，享有自治权。

[19] 阿拉谢希尔，绰号“小雅典”，位于小亚细亚。

[20] 曼努埃尔二世之父在位期间王室成员曾爆发内战，而曼努埃尔二世本人则相对与皇族关系和睦。不过约翰七世仅在位一年便撒手人寰，曼努埃尔二世随后登基。

[21] 布锡考特（1366–1421），法国将门之后，1391 年被查理六世封为法国元帅，曾先后参加尼科波利斯战役与阿金库尔战役。

[22] 法国军队共计 6 艘战舰约 1200 士兵。

[23] 天主教大分裂时期，持续时间 1378–1417 年。1377 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Grégoire XI）把教廷由法国阿维尼翁迁回意大利罗马，他去世后，枢机团分别选出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法国人为继承者，即乌尔班六世（Urban VI）与克雷芒七世（Clément VII）。两位教皇互不承认，甚至开除彼此教籍。于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了两个教廷。直到 1418 年德国康斯坦茨（Konstanz）召开的大公会议终于选出了各方一致认可的教宗马丁五世（Martin V）才宣告这一分裂结束。先前提到 1396 年的十字军居然是由两位敌对的教皇各自派出，当年的混乱状况可见一斑。

[24] 指英法百年战争经过此间 26 年停战后，于 1415 年又重启战端。

[25] 格弥斯托士·卜列东（约 1355–1452），拜占庭著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也是在

西方推动复兴古希腊学术的先驱。其学说在15世纪的意大利影响很大。

[26] 指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会议选举出马丁五世教皇，结束了长期两位教皇对立的时代。

[27] 即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基督教第十七次大公会议。

[28] 例如，《圣经》旧约部分，天主教承认46卷，东正教承认48卷，多出的两卷在天主教看来属于“次经”。

[29] 贝萨里翁（希腊文：*Βασίλειος Βησσαρίων*，1403–1472），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拜占庭人文主义学者。他出生于特拉布宗，青年时代远赴君士坦丁堡求学，师从卜列东。1437年被拜占庭皇帝任命为尼西亚大主教（Metropolitan of Nicaea），并随后参加了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此后长期定居意大利，著书立说，赞助学者，并于拜占庭灭亡后尽力援助逃难的希腊同胞。1455年一度被作为教皇候选人之一，1463–1472任天主教会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贝萨里翁生前收藏有大量希腊文手抄本，1468年，他将其捐赠与威尼斯议会，今收藏于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国家图书馆（The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

[30] 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又被称做：哲学家金纳迪乌斯·斯库拉里斯、学者乔吉奥斯、当选大牧首后，称金纳迪乌斯二世。

[31] 科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僭主，美第奇家族第一代政治家，被尊称为“老美第奇”、“佛罗伦萨国父”。

[32] 匈雅提·亚诺什（1407–1456），曾任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牙利王国摄政，为匈牙利对抗土耳其之名将。一生最辉煌战绩为1456年率军于贝尔格莱德围城战中大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但本人也于战后不久因感染鼠疫病逝。其次子匈雅提·马加什在1458年加冕为匈牙利国王。

[33] 瓦尔纳，今保加利亚第三大城市。

[34] 即亚历山大宗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安条克宗主教。

第二章

[35] akritai，希腊语中的原意是边境，后来引申出边防军之意。

[36] 亚美尼亚教会教义与东正教不同。

[37] 伽色尼王朝（963–1168），都城在今阿富汗Ghazni。

[38] 伽色尼的穆罕默德苏丹生卒年为：971–1030。

[39] 伊斯法罕，萨菲王朝时曾为伊朗首都，今伊朗第三大城市。

[40] 布哈拉，历史文化名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五大城市。

[41] 拉合尔，曾为莫卧儿帝国首都，今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

[42] 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

[43] 法蒂玛王朝，即绿衣大食。

[44] 放任亚美尼亚被塞尔柱人攻占是拜占庭的重大失误。从此，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防务就开始解体了。亚美尼亚人，埃德萨的马修（Matthew of Edessa）曾写道："这个国家是由无耻荒淫的'希腊'人，亲手送给土耳其人的，他们毁灭我们自己的王室，解散了我们勇敢的贵族，并取消了我们一切可供自卫的工具。"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345 页。

[45] 当时拜占庭的军事实力依然强于塞尔柱突厥人，但是罗曼努斯登基不久，立足未稳，国内权贵并不团结，战时部队的哗变是其战败的重要因素。

[46] Ghazi，来自阿拉伯语，原意为"攻击"，后来代指"勇士"。

[47] Futuwwa，这是一个苏菲派术语，大致意思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美德"，对加齐而言，更类似与西方人所谓的"侠义精神"、"骑士精神"。这一理念于 10–11 世纪开始形成，并在穆斯林世界的各个行会、社团中广泛流行。

[48] 阿莱克修斯一世，1081–1118 在位。

[49] 阿莱克修斯统治时期曾向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us II）求援，后者于 1096 年召集了第一次十字军，对帝国收复小亚细亚西部也起到了重要的援助作用，阿莱克修斯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 (Anna Komnene) 为拜占庭著名历史学家，著有《阿莱克修斯传》(*Alexiad*)，为此段历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50] 1204 年，原本计划出发征讨穆斯林的十字军在威尼斯人怂恿下，借助拜占庭内乱之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拉丁帝国。拜占庭帝国四分五裂，大伤元气，至 1261 年方由尼西亚流亡政府收复首都。十字军多信奉天主教，其背信弃义的行为在东正教徒心中留下了长久的伤痕，2001 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问希腊时，希腊大主教克里斯托杜洛还在要求教宗为 1204 年洗劫君士坦丁堡一事郑重道歉。

[51] 1307 年，罗姆苏丹国彻底败亡。

[52] 比提尼亚，为古罗马小亚细亚西北部行省。

[53] 此处存疑，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一书记载埃尔托格鲁尔去世于 1280 年左右，而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则认为他死于 1288 年。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许序雅、张忠祥译，西宁：青海出版社，2006，第 21 页。黄维民：《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49 页。

[54] 阔克·阿尔普，乌古斯第四子。

[55] 卡伊，其父为乌古斯长子昆可汗。

[56] 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奥斯曼王朝的祖先为一名叫做苏莱曼·沙赫的土库曼部落首领，他在 13 世纪初，为了躲避蒙古人的入侵而来到中东，不过在横渡幼发拉底河至叙利亚的中途，他不幸溺水而亡，其部众随即分裂。大部分回到了呼罗珊，为蒙古人服务；而他的一个儿子，即埃尔托格鲁尔，率领家族剩余成员来到了安纳托利亚。为了生存，他开始成为罗姆苏丹国的附庸，以协助苏丹对抗拜占庭人与蒙古人。据说，作为回

报，苏丹将安纳托利亚西部以及弗里吉亚（Phryga）的几块土地赠与埃尔托格鲁尔，这也是日后奥斯曼帝国的初始。但通过近来发现的13世纪史料可以推知，奥斯曼人的祖先似乎不是在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而来，相反，早在11世纪曼奇克特会战后，便已经涌入小亚细亚。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的先人仅仅是普通牧民或佣兵。奥斯曼人后来宣称的显赫祖先，很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20–21页。

[57] 此处所说奥林匹亚山（Mount Olympus）并非通常意义上希腊众神的居所及现希腊最高峰（海拔2917米），而是在今土耳其布尔萨省（安纳托利亚西北）境内，为加以区分，历史上称作比提尼亚的奥林匹亚山（Mysian Olympus），海拔2543米。其现代土耳其名为乌卢达山（Uludağ）。

[58] 阿拉艾丁帮助奥尔汗建立了一支职业常备军，这也是日后土耳其新军的雏形。

[59] 后者（塞尔维亚王国）一度占领了（拜占庭）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

[60] 内战初始阶段的胜利使坎塔库震努斯成功获得了共治皇帝身份，时称约翰六世，不过他过分依赖奥斯曼雇佣军并使土耳其人进入欧洲的行为激起了民众不满，最终被迫下野。坎塔库震努斯是拜占庭末期有为的政治家，平心而论，其才华强于年轻的约翰五世，如果他在内战中最终取胜，或许拜占庭的国运还可多延续一段时间。

[61] 贝依勒贝伊（beylerbey），意为"贝伊中的贝伊"。

[62] 一般公认穆拉德一世创建了新军军团，不过早在奥尔汗时期便已出现了雏形。

[63] 这一部分非正规步兵［皮亚德（piyade）、阿赞布（Azabs）、巴希巴祖克（bashi-bazouks）］往往军纪败坏，恶名远扬。

[64] 苏莱曼深受奥尔汗宠爱，若非英年早逝，很有希望继承大统。

[65] 尼什，今塞尔维亚第三大城市。

[66] 即科索沃战役。

[67] 这名勇敢的刺客叫Miloš Obilić，被塞尔维亚人奉为民族英雄。

[68] 一说在穆拉德被刺前胜负便已经见分晓了。

[69] 基督徒军队由塞尔维亚及波斯尼亚人组成，拜占庭皇帝并未参加此次战役。科索沃战役的失败摧毁了巴尔干及多瑙河南岸塞尔维亚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此后欧洲东南部仅剩匈牙利是苏丹需要提防的对手了。直至今日，塞尔维亚人还在纪念这场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人数规模，不同史料记载出入较大。如斯坦福·肖在《奥斯曼帝国》一书中认为基督教联军超过了10万人，而土耳其联军人数在6万左右。而约翰·考克斯于他的《塞尔维亚史》一书中，称科索沃战役时，土耳其方面兵力为30000至40000，基督教联军兵力仅有15000–25000。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第32页。John K. Cox, *The History of Serbia*, Greenwood Press, 2002, p. 30.

[70] 当然这也形成了恶劣的先例，此后苏丹即位时往往对自己的兄弟痛下毒手。

[71] 穆拉德在位时期，不再称加齐，而是称苏丹。

[72] 十字军中多国士兵并不听从西吉斯蒙德号令，尤其是法兰西骑士不听指挥擅自发动冲锋，最终导致了溃败。

[73] 帖木儿是否带有蒙古王族血统尚存争议，但他至少曾迎娶察合台汗国公主为妻，故也被人称作“驸马帖木儿”。

[74] 朗西曼先生原文中认为帖木儿享年 72 岁，似有误。帖木儿生于 1336 年，去世于 1405 年，故应为享年 69 岁。参见：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史记》，杨兆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53–155 页。大英百科全书线上版“帖木儿”词条：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596358/Timur。

[75] 安卡拉战役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陷入了长时间的“大空位时期”。

[76] 苏莱曼还取消了拜占庭帝国的上供的年金，事实上给予了拜占庭平等地位。

[77] 穆萨本与苏丹一道被俘，获得自由后投靠其兄弟穆罕默德，被后者派往欧洲与苏莱曼作战。

[78] 被镇压的穆斯塔法身份存疑，亦称“假穆斯塔法”。

[79] 布尔萨“绿清真寺”也称作 Yeşil 清真寺。

[80] 最终穆拉德在 1423 年平定了弟弟穆斯塔法的叛乱，而假穆斯塔法也在此之前被击败，于逃往瓦拉几亚途中被杀。

[81] 乔治·卡斯特里奥特（1405–1468），拜占庭贵族后裔，曾作为人质为奥斯曼宫廷效力，并被迫皈依伊斯兰教，取得战功后，获得“亚历山大贝伊”（İsskender Bey）称号，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称 Skënderbe shqiptari，这便是他的绰号“斯坎德培”的由来。1443 年，斯坎德培公开反抗土耳其统治，改宗天主教，成为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他一生坚持抵抗土耳其人，作战 25 次，获胜 24 场，成为苏丹在巴尔干的劲敌。但在他去世后，阿尔巴尼亚战局日渐不利，最终于 1501 年被奥斯曼帝国彻底征服。

[82] 塞格德，今匈牙利第三大城市。

[83] 穆罕默德二世于 1444–1446 年统治两年后，穆拉德恢复了苏丹身份，一直统治到 1451 年去世为止，穆罕默德二世于 1451 年再次继任苏丹。

[84] 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西南地中海海岸，为安塔利亚省首府，也是今天土耳其最大的海滨度假城市。

[85] 德米舍梅一词原指统治者有权占有五分之一战利品的征收程序。后来，它发展为奥斯曼土耳其官方对基督徒家庭儿童定期招募的制度，以充实帝国军队、宫廷或政府职位。新军士兵（包括整个奥斯曼中央常备军“卡皮库鲁”）一般也通过德米舍梅制度入伍。德米舍梅最早成型约始于巴耶济德一世时期，普遍实施则是在穆拉德二世及穆罕默德二世时期。该系统在其运行初期或许遭到了部分基督徒的抵制，甚或被作为苏丹迫害他们的证据，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基督徒们发现这是令自己子孙进入帝国高层的绝佳方式，于是被苏丹征集渐渐演变成了一种基督徒的福利和荣誉，甚至有部分基督徒家长采用贿赂的方式，以安排儿子被苏丹选中。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第 151–152

页。黄维民:《奥斯曼帝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年，第 172–177 页。

第三章

[86]“专制君主”（英语：despot，希腊语：*δεσπότης*），其原始含义约等于英语中“lord”、“master”等词，是拜占庭中后期一种特殊的贵族称号及宫廷头衔，有时也作为君主的称号。它首创于 12 世纪，在拜占庭贵族等级中仅次于“皇帝”（emperor，希腊化的拜占庭人更常用 Basileus 一词）与共治皇帝（co-emperor），居第三位，大约相当于西欧贵族等级中的“亲王”。曼努埃尔一世受匈牙利人影响，于 1163 年创造了这一称号，赐予其太子阿莱克修斯。进入 13 世纪后，皇帝往往将这一头衔同时赐予多人（一般为皇子或驸马），而不再为太子专享（不过特拉布宗帝国保留了加封太子为“专制君主”的传统）。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专制君主”不仅是贵族封号，也成为摩里亚、伊庇鲁斯等地领主的头衔，故摩里亚、伊庇鲁斯也称“专制君主国”（despotate）。这一传统也影响到周边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其君主一度也自称“专制君主”，如塞尔维亚在 14 世纪时，统治者约万·奥利弗（Jovan Oliver）首次采用 Despote 称号。科孚岛主（英语：Corfu，希腊语：*Κέρκυρα*）15 世纪时也自称 Despote。译者在本书中依然采用国内约定俗成的“专制君主”译名，但此称呼并无贬义（英语中 despot 还有“暴君”的意味）。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14.

[87] 拉丁帝国解体后，巴尔干依然残留了大量拉丁人、法兰克人的贵族封地，他们大多承认拜占庭宗主权，但享有实际独立。

[88] 约翰八世无子嗣。

[89] 君士坦丁自 1428 年起与塞奥多利共同执掌摩里亚，他们一起赢得了多场战役胜利，成功扩大了摩里亚版图。

[90] 莱斯博斯岛，是现今希腊第三大岛，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即出生于此。

[91] 该岛当时由热那亚人统治，其第一代领主为热那亚人弗朗西斯科·加提卢西。

[92] 君士坦丁与约翰八世属于“联合派”。

[93] 此时拜占庭已沦为土耳其藩属，故帝位的变更需要得到苏丹首肯。

[94] 帝国晚期推行的分封制度进一步削弱了拜占庭实力，当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遭到空前危机时，摩里亚的两位王子依然忙于内斗，无暇勤王。唇亡齿寒，君士坦丁堡陷落后 7 年，摩里亚君主国也被苏丹攻占，德米图斯向穆罕默德二世投降，而拜占庭帝国末代继承人托马斯不得不举家流亡并终老意大利。

[95] Megas doux（希腊语 *μέγας δούξ*）相当于英语中 grand duke 一词，即“大公”。它是拜占庭帝国晚期一高级军队职务名称，相当于“海军总司令”，大约由阿莱克修斯一世于 11 世纪晚期设立。第一个“大公”头衔获得者为约翰·道卡斯（John Doukas）。自 13

世纪开始，大公不仅可统帅海军，有时亦可指挥陆军。这一职务（或头衔）偶尔也被授予外国人。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1330.

[96] Stratopedarches（希腊语 στρατοπεδάρχη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罗马头衔，最初含义为兵营长官（Master of the Camp）。拜占庭中期以后，逐渐演变为一军队高级职务及头衔（但不能授予宦官）。13 世纪期间，这一职务约相当于“军需长官”，即负责军队后勤补给等事务。但在帝国晚期（14–15 世纪），它仅仅是一种荣誉头衔，并不一定与军需有关。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1967.

[97] Megas Logothete（希腊语 μέγας λογοθέτης，英语中亦可称 Grand Logothete），Logothete 一词本意是“精通算术、记账与推理之人”，最初为帝国财政官员的职务名称，而 Megas Logothete 由阿莱克修斯一世在 11 世纪设立，位高权重，为拜占庭帝国内政官员的总管，类似于今天的“总理”。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1247.

[98] Protostrator（希腊语 πρωτοστράτωρ），原意为“第一马夫”，该职务最初相当于宫廷马厩总管，地位并不十分高贵。从 12 世纪开始，逐步成为帝国高级军事将领头衔，科穆宁王朝时期在陆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大元帅”（megas domestikos）。13 世纪以后，它在职能上与大公（megas doux）的区别日益模糊。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p. 1748–1749. 如果读者希望进一步了解拜占庭官制，可以参考下列著作：Warren Treadgold,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ichael Angold, *The Byzantine Aristocracy: IX to XIII Centuries*,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1984. John B. Bury,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the Ninth Century-With a Revised Text of the Kletorologion of Philotheos*, Oxford University Publishing, 1911. Mark C. Bartusis, *The Late Byzantine Army: Arms and Society 1204-145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John F. Haldon, *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 565-1204*, London: UCL Press, 1999.

[99] 何况玛拉并未改宗，依然笃信东正教。

[100] 新娘尚未启程，君士坦丁堡即已沦陷，君士坦丁皇帝阵亡。

[101] 苏丹希望回到小亚细亚的马尼萨过隐修生活。

[102] 穆拉德受时事所迫，可谓退而不休，威尼斯人因此将阿德里安堡的穆罕默德二世称作“欧洲的苏丹”，将马尼萨的穆拉德二世称作“亚洲的苏丹”。

[103] 马拉蒂亚，位于安纳托利亚东部，如今是土耳其马拉蒂亚省省会。

[104] 第二维齐，相当于副首相。

[105] 虽然安纳托利亚总督地位尊贵，不过远离首都，如此安排人事，便可将伊萨克与驻留首都的政治盟友哈里尔分割开来，可见新苏丹驭人有术。

[106] 穆罕默德从此开创了奥斯曼帝国新任苏丹即位时杀害兄弟的惯例。

第四章

[107] 指前苏丹嫔妃玛拉被礼送回国一事。

[108] 阿克切，奥斯曼帝国主要银币单位。3 阿克切构成一个帕拉，120 阿克切等于一个库鲁斯，而拜占庭晚期类似银币单位被称作 Asper。

[109] 阿索斯山为东正教“圣山”，据传说，圣母玛利亚与使徒约翰曾漂流来此，将该地定为神圣区域，这也是“圣山”由来。从 9 世纪起陆续有东正教修士来此，并修建了大量修道院。阿索斯山修道院受到拜占庭皇帝特别保护，历来享有自治权利。一战后它正式划归希腊，由当地 20 座修道院组成了“阿索斯山自治修道院州”（*Αυτόνομη Μοναστική Πολιτεία Αγίου Όρους*）。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p. 223-226.

[110] 指 1446 年大维齐支持穆拉德二世复位，并导致穆罕默德事实上遭到流放，此举强烈地伤害了后者的自尊。

[111] 此时匈牙利名义上的国王，“遗腹子”拉迪斯拉斯五世年幼，匈牙利大权完全由匈雅提掌控。

[112] 亨利六世（1421−1471）为兰开斯特王朝之末代英格兰国王（1422−1461、1470−1471，两度在位）。他出生后九个月，父亲亨利五世驾崩，即位为英格兰国王，并且依据之前英法《特鲁瓦条约》，被英国人单方面宣布兼任法国国王（此举不被法国国民承认）。统治初期，由两位叔父汉弗莱与约翰分别担任英国、法国摄政，然而随着圣女贞德出现，英法战争的局面开始对英国不利。亨利 1437 年亲政后，对军事并无浓厚兴趣，反而对英国教育做出了不小贡献——设立了伊顿公学与剑桥国王学院。与父亲相比，亨利六世被认为性格懦弱，自 1453 年起，他的间歇性精神病开始发作，约克公爵理查乘机发动叛乱，引发了英格兰玫瑰战争，亨利最终战败。莎士比亚曾创作历史剧《亨利六世》。其详细生平，参见：Bertram Wolffe, *Henry VI*, London: Eyre Methuen, 1981.

[113] 感恩聚会团体，当时拜占庭反对宗教联合势力构建的团体。

[114] 小亚细亚堡，即阿那多卢要塞（Anadolu Hisar），最初由巴耶济德修建，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海岸线，与君士坦丁堡遥遥相对。

[115] 此举的实际意图为海上封锁君士坦丁堡，因该城主要粮食及物资需要经海路进口。

[116] 此时克里特岛为威尼斯领地。

[117] 佩拉亦称加拉塔，位于君士坦丁堡金角湾北岸，自公元 425 年起成为拜占庭首都的一部分（第 13 城区）。5 世纪起在该地修建了城墙。11 世纪它成为犹太人社区，拥有大约 2500 犹太人口。1204 年十字军摧毁了它。1261 年米哈伊尔八世收复君士坦丁堡

时，一并夺回了佩拉区，6 年后皇帝将它赠与热那亚人以换取后者的支持，佩拉遂成为热那亚殖民地及繁荣的商业区。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佩拉向土耳其投降。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pp. 815-816.

[118] 马赫那是希俄斯岛上一些热那亚商人、船主等组建的负责管理该地之“联合公司”。自 1347 年后，希俄斯岛被热那亚控制，热那亚共和国政府将岛屿转交给当地热那亚商人（其领导人属于朱斯提尼亚尼家族），负责开发资源、经营商业及管理居民（希腊人为主）。商人们于是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称“希俄斯的马赫那”，除每年向中央政府缴纳一定贡金外，享有很大自主权。1566 年，希俄斯岛被土耳其攻占，当地马赫那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关资料，可参见：George Finlay, *The history of Greece under Othoman and Venetian domination*, General Books LLC, 2010, pp. 85-90.

[119] 伊斯多尔原为拜占庭神父，后被任命为基辅及全俄罗斯大主教，由于在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签字赞成联合，返回国内后，激起众怒，被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下旨投入大狱。他后来成功逃出，此时正流亡罗马。其生平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p. 1015-1016.

第五章

[120] 当时的拜占庭首都定位有些类似今天的“自由港”。

[121] 穆拉德将王位传予穆罕默德之时，指定哈里尔作为年轻苏丹的老师与监护人。

[122]“土耳其已拥有制海权。”这一点上，苏丹还是有所高估了自身实力。

[123] 梅瑟姆布里亚，现称内塞伯尔（Nesebar），位于保加利亚布尔加斯州。

[124] 佩林苏斯，是马尔马拉埃雷利西（Marmara Ereğlisi）的旧称。

[125] 苏莱曼·巴尔托古鲁，作为舰队司令，他后来因海战不利被苏丹问责，几乎遭到极刑，所幸其下属极力为他开脱，并且他已然眼睛受伤—苏丹才饶他不死，不过剥夺了其全部头衔和财产。据说他晚景凄凉，甚至靠当一名普通桨手为生。

[126] 甚至很多是希腊人，为了丰厚报酬，不惜参与攻打拜占庭的战争。

[127] 乌尔班大炮长度约合 8 米。

[128] 关于乌尔班大炮，及围城期间双方火器的运用，罗杰·克劳利在《君士坦丁堡的火炮》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参见：Roger Crowley, ‘The Guns of Constantinople’, in *Military History* 9（2007）, pp. 42−49. 乌尔班大炮炮弹一说重达 1500 磅。

[129] 斯塔迪昂，古希腊长度单位，为 600 步，约合 176 米。

[130] 西方舰队从地中海进入君士坦丁堡需通过海峡由南向北航行，故 4 月达达尼尔海峡刮起北风后，对西方舰队而言相当于长期逆风天气。

[131] 威尼斯大使吉罗拉摩·米诺托同时兼君士坦丁堡城中威尼斯租界长官。

[132] 这位威尼斯船长加布里·特莱维森，后来担任威尼斯舰队指挥官。

[133] 指热那亚在战争中严守中立的行为使部分热那亚人感到耻辱。

[134] 此处与索引、图八一致，拼为博基阿尔多（Bocchiardo），后文亦有六处拼写为博基阿尔迪（Bocchiardi）。

[135] 杰奥瓦尼为热那亚名门朱斯提尼亚尼家族之后，该家族起源于威尼斯，为意大利望族，在威尼斯、热那亚、那不勒斯、科西嘉等地均颇有势力，还长期拥有希俄斯岛统治权。他增援君士坦丁堡后，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还赐予他 protostrator 头衔。其生平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851.

[136] 虽然看上去基督教联合舰队规模和土耳其相去甚远，但土耳其舰队多数船只吨位较小，大型舰只数量也仅在 30 艘左右。因此，双方大型战舰的实力相差并不大，这也为日后海战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第六章

[137] 圣周，指复活节前一周。

[138] 欧根尼乌斯（Eugenius）塔，或译犹金塔。

[139] 1 英里合 1.6 公里。苏丹最初扎营在距城墙二三公里处。

[140] 苏丹原本担忧君士坦丁堡的远程火力，因此谨慎地在较远处扎营，当发现城中并无重型火炮后，便移动到距城墙约 400 米处展开攻击阵势。

[141] 阿克罗波利斯角，即今天的萨拉基里奥角（Seraglio Point），“Seraglio Point”，土耳其语义为皇宫角。

[142] 从金角湾至马拉马拉海峡的城墙，即所谓的“海墙”。

[143] 每年 4 月后，达达尼尔海峡常刮北风，小型舰只逆风无法进入金角湾。

[144] 1453 年时，布雷契耐区为新皇宫所在地，但位于赛奥多西城墙之外，自希拉克略皇帝开始，历经利奥五世、曼努埃尔一世，拜占庭人逐步兴建、完善了布雷契耐城墙，但它仅为单层结构，防御力弱于赛奥多西城墙。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293.

[145] 安提莫斯，约去世于 414 年，在阿尔卡迪奥斯及赛奥多西二世两任皇帝期间担任帝国东方行省总督，赛奥多西二世年幼时还一度为其摄政，他是一名干练有为的政治家，摄政期间着力改善了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并监督修建了赛奥多西城墙。生平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109.

[146] 1 英尺合 0.3048 米。壕沟宽约 18 米。

[147] 外墙方形城楼共 96 座。

[148] 朗西曼先生原文中，将内外城墙间的空地拼写为 Parateichion（即内城台），而将外墙与护城河之间的空地拼写为 Peribolos（即外城台），并附有插图，此处应有误，与正确的称谓恰好相反。Peribolos 一词的希腊原文为 *περίβολος*，该词的基本含义相

当于“围墙环绕的庭院”。而 Parateichion 对应的希腊词汇为 *παρατείχιον*，该词基本含义为“向外延伸之物”。从词义看，Peribolos 作为内城台显然更加贴切。朗西曼原注中表示，他对君士坦丁堡城墙所用资料，最权威的来源是 Alexander Van Millingen 所著《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城墙及周边古迹》一书。译者仔细查阅该书后，发现作者也认同外墙外的空地是 Parateichion，外墙与内墙间的空地为 Peribolos。参见：Alexander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0. Stephan Turnbull 在他关于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专著中与 Alexander Van Millingen 观点一致，而与朗西曼提法相反。参见：Stephan Turnbull,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D 324-1453*, London: Osprey Pub, 2004, p. 13. 持同样观点的资料还可参见：John Freely, *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 and around the Marmara*, Woodbridge: Companion Guides, 2000, p. 203. J. F. C. Fuller,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attle of Lepanto*, Cambridge: Da Capo Press, 1987, p. 511. Ernle Bradford, *The Sundered Cross: The 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 Prentice-Hall, 1967, p. 75. 另外，Peribolos 一词在古希腊还常常指神庙中围墙环绕的庭院，参见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Peribolos。译者与国内拜占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陈志强先生就这两个专有名词进行了交流，陈教授也赞同内城台为 Peribolos, 外城台为 Parateichion。个人分析，朗西曼先生出现这一错误，大体是受埃德温·皮尔斯著作的影响，参见：Edwin Pea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 239.

[149] 内墙城楼同样为 96 座。

[150] 佩格门也被称作泉源之门，即 The Gate of the Spring，因该门外的 Zōodochos Pēgē 修道院得名。

[151] 圣罗马努斯之门（Gate of St. Romanus）因其附近的罗马努斯教堂而得名。现代土耳其名字为托卡比（Top Kapusi）——意为“大炮之门”，这是由于当年穆罕默德攻城时将重炮集中于此处的缘故。

[152] 圣基里亚科（St. Kyriake）门也是因其附近的同名教堂而得此名。土耳其人入城后，将它改称为“突击之门”，因 1453 年 5 月 29 日晨，奥斯曼帝国军在这里成功突破防线。关于赛奥多西城墙上诸城门的详细情况，参见：Alexander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 pp. 59-94.

[153] 查瑞休斯门所处的小丘，即“第六高地”。

[154] 阿德里安堡门，因穆罕默德二世最终由此入城得名。

[155] 希腊语拼写为 *Μεσοτείχιον*，意为“Middle Wall”，即“中城墙”。这一段城墙地势最矮，而对面地势较高，易受到敌人居高临下的攻击，同时穿墙而过的莱卡斯河一定程度也削弱了城墙强度。1453 年的围城战中，此处也是土耳其重点攻击地段。

[156] 朗西曼原文使用 Culverin 一词，根据上下文判断，应该属于 hand culverins，即

一种15世纪流行的、手持无膛线、火门式火枪，通常发射散弹，与后世“火绳枪”不同。故译者将它翻译为“手铳”。

[157] 安盖利（Angeli）王族，即后一译注中的安杰洛斯（Angelos）家族，为一拜占庭贵族世家，在1185–1204年间产生过三位拜占庭皇帝，13–15世纪家族支系一度统治着色萨利、伊庇鲁斯与塞萨洛尼基。

[158] 马哈茂德帕夏出身于拜占庭安杰洛斯（Angelos）家族。他在君士坦丁堡战役之后仕途顺利，且战功卓著，深受苏丹宠幸，后曾于1456–1468，1472–1474年间两度担任帝国大维齐（首相）。

[159] 乌尔班大炮，也被称作穆罕默德大炮。

[160] 多尔玛巴赫切宫，1856年建成，一度是奥斯曼帝国行政中心。

[161] 瑟拉比亚，今称萨勒耶尔（Sarıyer），位于伊斯坦布尔最北侧。

[162] 桅斗，即桅杆上的瞭望台。

第七章

[163] 土耳其舰队位于基督教舰队以北，而此时刮南风，故土耳其人处于逆风位置，改用划桨战船出战。

[164] 热那亚及拜占庭的4艘帆船体积更大，并且高度占优，与土耳其人对射自然处于上风。

[165] 希腊火，是一种液体燃烧武器，拜占庭人一般多称为海火（*πῦρ θαλάσσιον*）、液体火（*ὑγρὸν πῦρ*）等，“希腊火”为阿拉伯人、西欧人的通俗称谓。据说，它最初于668年由叙利亚建筑师、工程师加利尼科斯（Kallinikos）发明并将配方带到君士坦丁堡，在此后800年中成为拜占庭的秘密武器。希腊火的准确配方历来属于最高机密，甚至禁止一切文字记载。利奥皇帝在《战术学》中谈到希腊火的三种用法：近距离手抛希腊火罐，远距离则用投石机发射，此外还有虹吸管“喷火器”。他较详细地讲解了海战中希腊火的作用：海战开始时，首先，向敌人发射装有毒蛇、蜥蜴、蝎子等动物的罐子，造成敌军混乱。随后，向敌人投射生石灰，可产生烟雾，阻碍敌军视线，甚至直接令敌人致盲。接下来，投射装有铁蒺藜的罐子。最后，杀手锏希腊火登场。按利奥的说法，敌舰一旦着火，敌人必四处奔走，忙于救火，这时散布与敌舰上的铁蒺藜就能伤害敌人脚掌，使他们失去行动能力。此外安娜·科穆宁娜在《阿莱克修斯传》中亦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据日后专家考证和试验，一般认为其主要成分为蒸馏石油（俗称石脑油，或音译为“拿法”），在制作时混入一定比例的硫黄、沥青、松香、树脂等易燃物质（是否加入硝石目前还存在争论），通过加热而融为易燃液体。它具有以下特点：可在水上燃烧，甚至遇水自燃；海战中拜占庭人一般在船头使用虹吸管喷射这种液体用于点燃敌舰（类似于现代的火焰喷射器），陆战中除虹吸管外，也使用装有希腊火的罐子作为投掷武器；发射

时往往伴有巨响及浓烟。它既可以用投石机或人力投掷后再加以点燃，亦可预先点燃后用虹吸管喷出（除军舰用虹吸管外，拜占庭甚至装备了单兵使用的小型喷火筒）。希腊火的特性使它在海战及守城战中能发挥巨大威力，并多次拯救了帝国。例如，678 年及 718 年，拜占庭两度大败阿拉伯围攻君士坦丁堡的舰队。718 年的战役中，阿拉伯人共出动 2560 艘舰只，最终幸存的仅有 5 艘。941 年，拜占庭同样依靠希腊火，击败了基辅罗斯大公伊戈尔的远征舰队。不过希腊火并非火药，它必须借助氧气，仅能速燃，而不能像火药那样，在无氧环境下便可爆燃，因此在火药时代之后，便渐有落伍之虞。根据现有资料记载，1453 年君士坦丁堡战役期间希腊火虽仍有装备，但运用不多，个人估计这与帝国财政捉襟见肘，及石油原产地（主要在小亚细亚）落入敌手有关。奥斯曼人入主后，希腊火配方宣告失传。穆斯林人在与拜占庭长期交战过程中也习得了类似武器，他们一般将石脑油盛入容器中纵火抛射，专门使用该武器的部队称 naffātūn。阿拉伯人最早在 712 年印度阿洛（Alor）围城战中使用它，随后于十字军东征期间广泛用于守城作战。无独有偶，类似武器由阿拉伯人经东南亚最终传入我国，称“猛火油”，在宋代有着广泛应用（但依据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相关介绍，阿拉伯、中国的类似武器与希腊火，在配方应该存在些许不同，性能上也会有微妙差异）。关于希腊火的专著，译者首推 R. Partington, *A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相关资料亦可参见：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第 198−199 页。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7: Military Technology* 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873. Adrienne Mayor, *Greek Fire, Poison Arrows, and Scorpion Bombs: Biological &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Overlook TP, 2009. Leo VI, George T. Dennis (trans.), *The Taktika of Leo VI*,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0, p. 529. Anna Komnene, Peter Frankopan (ed.), E. R. A. Sewter (trans.), *The Alexiad*, Penguin Classics, 2009. Alfred W. Crosby, *Throwing Fire: Projectile Technology through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2010.

[166]“她”，指拜占庭舰只。

[167] 朱斯提尼亚尼当时负责指挥陆战。

[168] 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虽然同文同种，但作为地中海两个商业强权，二者长期处于激烈竞争当中，甚至不时兵戎相见，以致民间人士也往往存在敌对情绪。说两国互为世仇也不为过。1204 年十字军反戈一击攻陷君士坦丁堡，据说幕后指使便是威尼斯人。尼西亚帝国光复首都后，便有意扶持热那亚势力，以对抗威尼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 1453 年帝国末日来临时，热那亚人严守中立，反倒是昔日帝国仇敌威尼斯和教皇国给予了实质援助。

第八章

[169] 君士坦丁堡粮食长期依赖进口（主要通过水路），因此，入侵的敌人历来以围困作为夺取该城的重要武器。但在帝国漫长历史中，多数时间拜占庭尚能掌控首都附近的制海权，故而这一问题尚不算突出。不过1453年，金角湾失手后，制海权被土耳其掌握，导致后勤补给压力骤然上升。但也应该看到，君士坦丁堡城中此时仅仅数万人口，并且还拥有一些果园菜圃，对外来粮食的需求与极盛时期亦不可同日而语，也算减轻了部分供给的压力。

[170] 达卡特，一种威尼斯金币。

[171] 指舰队逆袭金角湾土耳其船只失败。

[172] 威尼斯将部分暂不投入战斗的船只的舵、帆、锚等部件拆下交给拜占庭人，以此表明自己与城市共存亡的决心。

[173] 君士坦丁皇帝死守都城的做法是明智的。15世纪中期的拜占庭国力极度衰落，与土耳其周旋的最大资本便是君士坦丁堡的地利。该城扼黑海之咽喉，地势险要，且蕴藏巨大商机；它还拥有当时欧洲最先进、最牢固的城防系统——放弃该城便等于丢失了帝国最后一丝战略上的资本。况且君士坦丁堡易守难攻，即使皇帝在摩里亚建立了稳固统治，要夺回首都也无异于天方夜谭。君士坦丁早年曾作为摩里亚君主与土耳其交战，其惨痛经历告诫他仅仰仗该地是无法与奥斯曼帝国长期对抗的。接受苏丹的条件，退居摩里亚便等于是饮鸩止渴。

[174] 诺沃布罗多，现位于科索沃境内。

[175] 据说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坚硬的岩石层。

[176] 事实与之不符，威尼斯舰队此时正在中途，如果双桅船多停留一些时日，便很可能能带回隆戈舰队的消息，从而极大地鼓舞君士坦丁堡城中士气。在此只能感叹拜占庭帝国时运不济。

[177] 圣像本是木制的。

[178] 暗示穆斯林人必然能够征服这一伟大城市。

第九章

[179] 1453年匈牙利国王已经成年，理应亲政。

[180] 恐怕也是因为巴希巴祖克这支非正规军主要靠劫掠获得军饷，如果不能攻下君士坦丁堡，其生计都成问题。

[181] 此为清真言（Shahada），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石，又称为作证词。清真言代表的是穆斯林的认主独一信念，并接受穆罕默德为真主的使者。清真言的读法如下：

“La illaha ill Allah, Muhammadur Rasul Allah”（英文翻译为：“There is no god but God, and Muhammad is the messenger of God”），中文含义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清真言又称为“凯里麦”，即“美好的语言”。念诵清真言是穆斯林的五功当中最重要的一种，每日都必须诵读。非穆斯林若要信仰伊斯兰教则须公开诵读清真言，表示归信。什叶派穆斯林不把清真言视为五功中独立的一功，而是将它并入什叶派特有的信条（阿奇达）之中。

[182] 克里托布拉斯（Michael Critobulus，希腊语为 *Μιχαήλ Κριτοβούλος*，亦可拼写为 Michael Kritoboulos，1410－约 1470），希腊政治家、历史学家。他出生于伊姆布罗斯岛一个地主家庭，1450 年左右担任该岛行政首长及法官。克里托布拉斯很早便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对拜占庭的征服难以避免，故对土耳其人采取了亲善态度。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推行与奥斯曼土耳其交好的政策，主动投诚，并促使了利姆诺斯岛与萨索斯（Thasos）岛的投降。1456 年，他被穆罕默德二世任命为伊姆布罗斯岛总督，直至十年后该岛被威尼斯夺取，他被迫流亡君士坦丁堡，并在该地去世。克里托布拉斯共留下五部历史著作，时间涵盖 1451－1467 年，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历史著作（*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虽然是希腊人，但他的著述却以土耳其人为焦点，尤其关注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及随后对城市的重建。他的作品虽然对拜占庭覆灭有所惋惜，但于苏丹却不吝溢美之词，甚至将后者称作“巴塞勒斯”（Basileus，拜占庭历史后期皇帝常用头衔），以示其对拜占庭帝国的合法继承。同期其余希腊相关史料多侧重于希腊方面的记载，而克里托布拉斯的著作从另一侧面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有益补充。今天，克里托布拉斯的手稿仍收藏于伊斯坦布尔图书馆。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1159. Kritoboulos, *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 Greenwood Press Reprint, 1970.

[183] 该祷告词为著名的 kyrie eleison，或译为慈悲经，是希腊正教与天主教做弥撒常用起始语，英文版内容为：“give thanks un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for his mercy endureth for ever”。

[184] 米蒂利尼（希腊语：*Μυτιλήνη*）位于希腊爱琴海莱斯博斯岛东南岸，为该岛屿的首府。莱斯博斯岛也是著名希腊女诗人萨福故乡。

第十章

[185] 此处斯蒂芬原文所用词语为 Arquebus，实际上，英语中该词的来源是德语词 Hakenbüchse，原意为“带钩子的管子”，这是由于早期火枪为了减缓后坐力，经常加上钩子（可抓住城墙或掩体）以增强固定性，15 世纪又逐步用挂肩托架取代了钩子。此时的火枪为火门式，并没有用到火绳（Match lock），直到 15 世纪中期，真正意义上的火绳枪才走上历史舞台，但它与其前辈共用 Arquebus 这一称呼。1440－1443 年与匈牙利作战之

后，土耳其军才开始装备火绳枪，1453 年君士坦丁堡战役期间，与早期手铳、手炮相比，它属于新式武器，装备数量并不多。参见：Jean-Denis G. G. lepage, *Medieval Armies and Weapons in Western Europe*, McFarland & Company, 2005, pp. 255-258. David Nicolle, *The Janissaries*, Osprey Publishing, 1995, pp. 21-22. Gábor Ágoston, *Guns for the Sult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Weapons Indust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6-25.

[186] 是否存在科克波塔门及这一段插曲，史学界还有争论。

[187] 朱斯提尼亚尼手下共有七百名佣兵。

[188] 圣马可雄狮是威尼斯国旗上图案。

[189] 赫利亚门（Horaia Gate），字面意思为“美丽门”，早期一度称作内奥里翁（Neorion）门，位于今天伊斯坦布尔的 Aivan Serai 区一带。

[190] 关于伊斯多尔的逃亡，据说他化装为乞丐或奴隶。

[191] 海链虽然是金属的，但上面捆有木筏，故而可在水面漂浮。

[192] 朗西曼原文将奥古斯塔广场拼为 Augustean，但译者手中历史地图、工具书及相关专著中均无该广场名。盐野七生、罗杰·克劳利、米贾托维奇等学者在其作品中相关部分只提到皇帝首级被示众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及旧皇宫附近的石柱。英国拜占庭学家唐纳德·尼科则明确指出为 Augustaion 广场的石柱。经译者进一步查询亚历山大·卡日丹《牛津拜占庭辞典》、艾弗尔·卡梅伦《八世纪早期的君士坦丁堡》、帕斯帕特斯《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及米林根《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城墙及周边古迹》等资料，发现位于君士坦丁堡索菲亚大教堂及旧皇宫附近，仅有一座广场，且广场内曾经矗立着石柱，而该广场名为 Augustaion。综上所述，译者认为此处地名正确拼写应为 Augustaion，即奥古斯塔广场（希腊语：*Αὐγουσταῖον*，拉丁语：Augustaeum）。具体考证过程，参见：马千，《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处地名错误，《理论观察》2013 年第三期，108−111 页。奥古斯塔广场是古代和中世纪君士坦丁堡一个重要的典礼广场，约相当于现代的圣索菲亚广场（土耳其语：Aya Sofya Meydanı）。它原为公众市集，6 世纪时被改造成一个由柱廊环绕的封闭庭院，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一些最重要的建筑之间的联系空间。广场一直幸存到拜占庭帝国晚期，后来成为废墟，直到 16 世纪初仍可看见其痕迹。“奥古斯塔广场”系得名于广场上的一根斑岩纪念柱，柱顶是君士坦丁大帝母亲海伦娜太后的雕像，她的称号为奥古斯塔（即奥古斯都的阴性型）。这座广场一大特色为各式纪念石柱，除海伦娜石柱外，君士坦丁、赛奥多西、查士丁尼等皇帝也纷纷为自己或亲属建立塑像石柱，不过在 16 世纪后被奥斯曼帝国拆除，今天仅余部分底座。但对于君士坦十一世之死及其头颅是否被置于该广场示众，至今史学界仍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有关君士坦丁最终结局的各种说法，译者推荐读者查阅英国拜占庭学家唐纳德·尼科（Donald Nicol）1992 年的专著《不朽的皇帝》，该书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详细论述了皇帝的死亡，记载版本多达数十种。参见：Donald Nicol, *The Immortal Emper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ger Crowley,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Hyperion, 2006, p. 229. Cedomilj Mijatovic, *Constantine,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o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London: S.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2, p. 229. Donald Nicol, *The Immortal Emper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5. 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232, p. 1330. Averil Cameron, Judith Herr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The Parastaseis Syntomoi Chronikai*, New York: Brill Academic Pub, 1984, p. 13. Alexander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 p.18. A. G. Paspates, *The Great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William Metcalfe,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p. 66-67.

第十一章

[193] 奥马尔·伊本·哈塔卜，伊斯兰教历史上第2任哈里发（634-644），亦为先知穆罕默德最著名的拥护者和战友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阿拉伯人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并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埃及、巴勒斯坦（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北非和亚美尼亚。奥马尔为人宽厚，对不同宗教、民族较为宽容，但他却于644年被一名波斯奴隶刺杀。关于他的赫赫战功，可参见：Fred McGraw Donner,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4] 土耳其人高估了守军数量，认为市区内可能还埋伏着一支大军。

[195] 全名为“科拉神圣救主教堂”（Church of Holy Saviour in Chora），通常认为始建于公元7世纪。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科拉教堂拥有大量藏书，成为帝国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并吸引了许多学者（如卜列东）慕名而来。同时，它也是拜占庭最美丽教堂之一，内部有大量精美马赛克镶嵌画和壁画。16世纪后被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改为清真寺，1948年后成为卡里耶博物馆（土耳其语 Kariye Müzesi）。参见：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p. 428-429.

[196] 瓦西里一世（Basil Ⅰ），或译为巴希尔一世。

[197] 平心而论，土耳其军入城后的举止，按那个年代的标准，尚算“文明”。君士坦丁堡军民总计4000人的死亡数字并不算大。原本按照伊斯兰传统，顽抗到底的城市，城破后是不受保护的，而苏丹并不希望将这座历史名城破坏殆尽，故对士兵们的烧杀劫掠做了一定的节制。土耳其的表现固然达不到现代标准，但对比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与蒙古军攻陷巴格达后的所作所为，拜占庭军民理应感到庆幸。朗西曼先生在著作中虽力求客观公正，但情感上难免略偏向希腊人，这一点在本章尤为明显，请读者留意。

[198] Ulema，即中文中通常所说的“阿訇”。

[199] 阿弗沙布（Afrasiab），传说中的图兰国王，图尔人（根据《阿维斯塔》记载，图兰人为古波斯民族一支）的民族英雄。这两句诗歌在朗西曼原文中为：“The spider weaves the curtains in the palace of the Caesars, the owl calls the watches in Afrasiab’s towers.”据译者考证，多部相关著作中也引用了类似诗句。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引用版本如下：“The spider has wove his web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owl hath sung her watch-song on the towers of Afrasiab.”（席代岳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处理为：“蜘蛛结网昭阳殿，枭鸟哀鸣子夜歌。”）罗杰·克劳利与伯纳德·里维斯在各自的著作中引用了同一版本：“The spider is curtain-bearer in the Palace of Chosroes, The owl sounds the relief in the castle of Afrasiyab.”其共同的来源为土耳其历史学家、君士坦丁堡战役亲历者图桑贝伊（Tursun Bey）的编年史。考虑到这是来自波斯古诗，译者以为罗杰·克劳利等人的英文版本更为贴切，在这个版本中，罗马化的“恺撒”一词被波斯化的“库斯老”(Chosroes)波斯国王常用名，其中最显赫者为萨珊王朝最伟大国王库斯老一世，531-579年间在位）一词取代。不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依然大体沿用了朗西曼原文翻译。相关文献参见：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V, New York: J&J Harper, 1826, p. 329. Roger Crowley,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p. 233. Bernard Lewis, *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2, p. 8.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六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374页。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第456-457页。

[200] 指马修·卡马里奥特的侄子为了活命，改信伊斯兰教。

[201] 乔吉奥斯当选大牧首后，称金纳迪乌斯二世（Gennadius II。）

[202] 米勒特（原书拼写作milet，但millet的拼写形式更为常见）是奥斯曼帝国根据臣民宗教信仰，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团体，并实行自治的制度。帝国内部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均属于某个米勒特，由此获得相应社会地位与身份，并通过自己所属米勒特首领与统治阶层打交道。早先阿拉伯帝国中已有米勒特雏形，奥斯曼土耳其将它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每一个米勒特都形成了自身独有机构，在诸如教育、宗教、审判、治安等多方面发挥作用。除穆斯林米勒特以外，帝国内部主要还有三种获得官方认可的米勒特，分别是东正教米勒特、犹太米勒特与亚美尼亚米勒特。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米勒特的最高领袖即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他甚至被苏丹授予带有三根马尾的帕夏头衔，拥有对其信徒实施东正教法律的权利。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第195-199页。Selcuk Aksin Somel,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carecrow Press, 2003, pp. 189-190.

[203] 圣会是东正教传统中的最高宗教会议，可选举大牧首。

[204] 圣乔治教堂是今天伊斯坦布尔的大牧首驻地。

[205] 帕玛卡里思托斯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后，土耳其人按惯例用涂料掩盖了教堂的基督教壁画、马赛克画。凯末尔革命后，土耳其政府推行国家世俗化进程，很多古老清真寺被又一次改为博物馆，政府去除了部分遮蔽的涂料，使原本的基督教绘画得以重见天日。如今，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206]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为亚伯拉罕宗教，彼此有一定亲缘关系。

第十二章

[207] 卡地亚（Candia）为克里特最大城市伊拉克利翁的威尼斯名，当时克里特岛由威尼斯共和国统治。

[208] 莫顿（Modon）为希腊城市麦西尼亚的威尼斯名。

[209] 威尼斯执政官（Doge of Venice）从 8 世纪至 18 世纪末为威尼斯最高领导人。Doge 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dux，原意是“军事领袖”。Doge 这一头衔不能简单等同于“公爵”（意大利语称 Duca），它通常经过选举产生，虽任职终生，但不能世袭，也不是贵族称号。史上第一位获得威尼斯执政官称号的人士为阿纳费斯托（Paolo Lucio Anafesto，在位时间 697–717 年），而末代执政官为卢多维科（Ludovico Manin，在位时间 1789–1797 年，后被拿破仑一世勒令退位，共和国覆亡），前后历经 120 任。威尼斯在其历史早期隶属于拜占庭帝国，故最初的 Doge 通常由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任命，权力颇大，类似于“总督”。随着威尼斯势力的增强，它渐渐摆脱了拜占庭控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Doge 开始由本地人选举产生。12 世纪以后，威尼斯的共和制度越发成熟，执政官的权力受到一定约束，最终，形成了执政官与威尼斯大议会、威尼斯元老院三足鼎立的联合政府机构。1453 年，时任威尼斯执政官的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已经 80 高龄，4 年后在“十人议会”（Council of Ten）强迫下辞职，并于一周后去世。关于威尼斯共和国历史，参见：Horatio Forbes Brown, *Venice: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epublic*, General Books LLC, 2010. John Julius Norwich, *A History of Venice*, Vintage, 1989. 关于威尼斯与拜占庭两国关系，可参见：Donald M.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0] 内格罗庞特（Negropont），威尼斯人称 Lepanto，即勒班陀。

[211] 因为热那亚黑海北岸殖民地的交通要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已完全被土耳其掌控。

[212] 贝萨里翁信中的“敌基督”，即土耳其人。

[213] 纪尧姆·杜菲（1397–1474），出生于布鲁塞尔，为法国 – 弗莱芒文艺复兴早期作曲家，勃艮第流派代表人物，在 15 世纪中叶享有盛誉。他既擅长创作弥撒曲、圣歌等宗教歌曲，也擅长世俗歌谣，其作品在当时可谓脍炙人口、雅俗共赏，对后世的作曲家亦影响颇大。

[214] 法王查理七世在圣女贞德的支持下，扭转了战争劣势，逐步收复失地，至 1453

年，基本结束了百年战争，收复了除加来外英国在法国本土全部领地，由此得名“胜利者查理”（法语：le Victorieux）。故原文所谓英格兰在 1453 年情况更不容乐观。

[215] 玫瑰战争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为了英格兰王位而发生断续的内战。两大家族都是金雀花王朝王室的分支，为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后裔。此名称源于两个家族所选的家徽，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和约克的白玫瑰。最终亨利六世战败，丢掉了王位。

[216] 布鲁日拥有著名的 Church of Our Lady，即圣母教堂，故宴会上用身着女装的演员代表基督教会。

[217] 无独有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提到了这段轶事（细节略有不同），但其态度却与朗西曼大相径庭，译者特将吉本的记载附于注释中，供读者对比参照：“在西部最遥远的一个国家，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在弗兰德的利斯勒（Lisle），接待他的贵族举行盛大的宴会，华丽的场面经过巧妙的安排能适合大家的品位与习性。在饮宴进行之中，一个体型高大的萨拉森人牵着一头装扮的大象进入大厅，象背上有一个城堡，一名穿着丧服的妇女代表宗教的象征从城堡里走出来，她为自己处处受到抑制而感叹不已，同时责怪她的捍卫斗士行动何其缓慢。金羊毛的首席使者进来，手里拿着一只活生生的雉鸡，按照骑士的礼仪献给公爵。菲利普是一位英明而年迈的诸侯，在接受这个极具特色的召唤以后，要把自己的身体和力量奉献给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参加宴会的贵族和骑士纷纷效法他的榜样，他们向着上帝、圣母、在场的女士和那只雉鸡发出誓言，响起热烈的呼声也获得普遍的赞同。采取实际行动要视未来和国外可能发生的事件，因而勃艮第公爵直到临终，有 12 年的时间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可见他不仅审慎而且可能极为认真。”来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六卷》，席代岳译，第 380 页。

[218] 埃内亚·西尔维奥，即庇护二世。

[219] 罗马人当年自称为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后裔。

[220] 闵格雷利亚（Mingrelia 或 Samegrelo），今为格鲁吉亚西部一个州。

[221] 1446 年穆罕默德被废，穆拉德再次登基，哈里尔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因此与年轻的苏丹结怨。

[222] 该战役史称“贝尔格莱德之围”（Siege of Belgrade）。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匈雅提就开始准备抵御土耳其的下一步进犯，他一面安排长子匈雅提·拉斯洛（Laszlo Hunyadi）率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驻守贝尔格莱德城堡，一面四处招兵买马，最终募集到了两至三万人的军队。不过，在他得以集结所有兵力之前，1456 年 6 月 29 日，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已经率大军重重包围了贝尔格莱德。守军苦苦支撑之际，一位宣扬圣战的方济会意大利修士吉奥瓦尼·达·卡皮斯特拉诺（Giovanni da Capistrano，当时已 70 高龄，死后被封为圣徒）却成功鼓动了数万装备简陋却士气高昂的农民参战。于是他与匈雅提共同增援贝尔格莱德。1456 年 7 月 14 日，匈雅提带领他的舰队自多瑙河上抵达被重重包围的城堡。当天他冲破了土耳其水军的阻拦，击沉了 3 艘大型土耳其军舰，俘获 4 艘大型战船和 20 艘小型战船。随着苏丹水师的失利，守军得以通过水路运输援军以及粮食补给。城

堡的防线因而得到增强。不过，穆罕默德二世并不想长时间炮火攻击后草草结束这场围攻，因为好几处城墙已经开始损坏严重。7月21日，与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战役类似，穆罕默德二世于日落时发动了一场持续整夜的总攻。土耳其部队冲破了第一层防线，并发动了对主城的攻击。关键的时刻，匈雅提命令士兵投下涂了焦油的木头，以及其他燃烧物，然后再点火进攻。一层火墙马上把已经冲进内城的土耳其士兵和尝试进入上层堡垒的士兵拦腰截断。被火墙围住的土耳其士兵与匈牙利人展开激战，并渐渐落于下风。与此同时，匈牙利人对那些想要冲向内城的部队发起突击。在内城作战的土耳其士兵因此全军覆没；而城外进攻的奥斯曼部队也受到重创。当一个土耳其士兵想要把苏丹的王旗插在碉堡上的时候，一位叫杜戈维奇·提图斯（匈牙利语为Dugovics Titusz）的士兵拉住他并一起跳下了城墙，从而避免了当年君士坦丁堡科克波塔门的悲剧。第二天黎明之后，卡皮斯特拉诺的农民十字军进入战场，他们虽然欠缺经验，却不乏勇气，居然跨过萨瓦河，主动发起了对土耳其后方阵地的进攻。城内匈雅提见状也果断出击。里应外合之下，土耳其军猝不及防，被敌军突入营寨。甚至苏丹本人也不得不亲自上阵，杀死了一名骑士，但大腿中箭并失去了知觉。于是土耳其军队不得不迅速撤离，并丢弃了几乎全部辎重和火炮。落败的穆罕默德苏醒后，连夜带着剩余的军队撤退到君士坦丁堡。这场战役保证了中欧免于土耳其进犯几乎七十年，直到1526年土耳其苏莱曼大帝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匈牙利人。而为纪念这次胜利，教皇加里斯都三世下令教堂在中午鸣钟，这个习惯在基督教世界一直持续到今天。参见：Kenneth M. Setton,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Vol.2）, Amer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6, pp.161-195.

[223] 匈雅提患鼠疫去世。

[224] 玛利亚和玛拉是同一人名字的不同写法。本书英文版第39页称为玛利亚，其他处称为玛拉。

[225] 莫奈姆瓦夏，希腊语 *Μονεμβασία*，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南端一角，沿海修建，与大陆通过一段约200米长短堤相连，地势险要，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

[226] 约翰四世皇帝，一般称 Grand Comnenus，可直译为“大科穆宁”，因特拉布宗皇帝为拜占庭科穆宁王室后裔。

[227] 菲利普珀珀利斯，即今天所称的舍赫巴（Shahba），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以南87公里处。

[228] 即拜占庭帕列奥列格王朝皇帝米哈伊尔八世，1261年8月15日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入城式，宣告帝国首都光复。

[229] 特拉布宗皇帝阿莱克修斯四世共有三子，按长幼顺序分别为约翰、亚历山大、大卫。约翰原为太子，1426年他谋杀了据称与母后有染的廷臣，并掀起了叛乱。叛乱被镇压后，他被迫流亡格鲁吉亚，期间迎娶了格鲁吉亚公主巴格拉提奥尼（Bagrationi）。而阿莱克修斯四世则立第二子亚历山大为皇储，并为他迎娶了莱斯博斯岛与萨索斯岛领主多里诺·加提卢西之女玛利亚·加提卢西。1427年约翰来到热那亚位于克里米亚的殖民

地卡法，组织了一支庞大舰队重返特拉布宗，再次掀起叛乱。父王阿莱克修斯亲自出征讨逆，但在 1429 年十月某日夜被约翰收买的贵族刺杀。约翰最终获得内战胜利，加冕登基，而亚历山大不得不携妻子流亡君士坦丁堡。

[230] 威尼斯人信奉天主教，与希腊东正教存在差异。

[231] 斯坎德培因疟疾病逝。

[232] 泽塔（Zeta），巴尔干古国名，领土大致涵盖今天的黑山及阿尔巴尼亚西北部，因当地的泽塔河而得名。

[233] 弗拉德三世（Vlad III, Prince of Wallachia），亦以其父名德拉库拉（Dracula）著称，瓦拉几亚传奇历史人物。他幼年时一度沦为土耳其人质，后回国接任大公职位，并在 1459 年扫除境内割据贵族势力，开始拒绝承认土耳其宗主权。穆罕默德二世派出使臣催问其应上缴的年贡，弗拉德却下令将使者处以穿刺刑，其“穿刺者”的绰号由此得来。此后弗拉德与土耳其正式开战，并多次击败对手。1462 年，穆罕默德二世扶持弗拉德之弟拉杜及国内不满的贵族发动政变，推翻了弗拉德统治，后者不得不长期流亡国外。1475 年拉杜去世，一年后弗拉德回国恢复统治，但仅仅两月后便遇刺身亡（一说阵亡），其头颅被作为战利品带回君士坦丁堡。弗拉德虽然作战勇猛，在战场上令土耳其人望而生畏，但生性残暴嗜血，不仅对土耳其战俘，甚至对本国贵族百姓，也常常施加穿刺之刑，并以此为乐。因其残暴恐怖，当年便有他喝人血的传言。死后数百年，弗拉德更逐渐成为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吸血鬼”的原型，最知名的为英国小说家布拉姆·斯托克的小说《吸血鬼德拉库拉》。

[234] 东正教会只承认自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公元 325 年）至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公元 787 年）间的前 7 次普世大公会议，如果按罗马天主教会的标准，则截至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共有 21 次。

[235] 弗拉基米尔，被称做：“Vladimir the Great”，基辅大公，率先受洗，带领俄国皈依了东正教，在位期间基辅罗斯国力强盛，去世后被东正教会追认为圣徒。

[236] 应指 1526 年 8 月 29 日，苏莱曼苏丹大败匈牙利的战役。

[237] 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1571 年 10 月 7 日）是欧洲基督教国家联合海军与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希腊勒班陀（*Ναύπακτος*）近海展开的一场海战。由西班牙王国、威尼斯共和国、教皇国、萨伏依公国、热那亚共和国及马耳他骑士团组成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舰队在整天的战斗中击溃了奥斯曼海军，令奥斯曼帝国从此失去在地中海的海上霸权，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耳其的向西扩张。这场战役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场以帆桨战舰为主的大型海战。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也参加了此次海战，并英勇负伤，失去左臂。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487-501 页。R. C.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Martino Pub, 2006. Roger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The Siege of Malta, the Battle of Lepanto, and the Contest for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9. Niccolo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Great Christian-Muslim Clash at*

the Battle of Lepanto, Da Capo Press, 2008. Angus Konstam, *Lepanto 1571: The Greatest Naval Battle Of The Renaissance*, Osprey Publishing, 2003.

[238] 土耳其人曾几度发起对维也纳的大围攻。

第十三章

[239] 季季莫蒂霍，希腊语 *Διδυμότειχο*，今属希腊埃夫罗斯州，位于阿德里安堡以南，亚历山德鲁波利斯以北。

[240] 圣安德鲁，耶稣的第一位门徒，也是十二使徒之一，相传在希腊传教时被钉 X 形十字架而殉道，至今为俄罗斯、罗马尼亚、苏格兰主保圣人。

[241]“金玫瑰”是一种传统上每年由教皇祝圣并进献的黄金饰物，偶尔也用于赠送、嘉奖某些杰出人物或教堂。金玫瑰原则在每年四旬期（Lent，或称大斋期，从大斋首日至复活节，共 40 日）第四个周日（亦称作“玫瑰周日”）祝圣。最初是代表宗教寓意：金玫瑰花枝象征基督的神圣性，而其香味代表基督的气息，玫瑰倒刺与红色则象征基督遭受的苦难。早年教皇既将它颁发给男性也授予女性，但 19 世纪后逐步成为一项女性荣誉。著名的金玫瑰获得者除本书提到的拜占庭皇子托马斯，还包括法国国王路易七世（1148 年）、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一世（1348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1452 年）、卡斯蒂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1493 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92 年）、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1868 年）、卢森堡女大公夏洛特（1956 年）等。

[242] 教宗本想通过联姻诱使俄国改信天主教，但这一政策显然失败了。

[243]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l'Affable，1470−1498）是法国瓦卢瓦王朝嫡系的最后一位国王（1483−1498 年间在位）。在位期间，查理八世表现出空前的野心。他企图控制意大利，结果使法国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意大利战争（又称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但他的军事冒险在取得初期胜利后就失败了。1494 年，查理八世以王位继承人资格进入意大利，1495 年即攻占那不勒斯并加冕为那不勒斯国王。但他的行动遭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威尼斯、米兰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和阿拉贡的斐迪南的联合反对。在泰罗战役中，法军战败，查理八世被迫于 1495 年底退出意大利。他后来又制订了征服意大利的计划，但因英年早逝未得成行（死因是查理在前去观看网球比赛途中头部意外撞在了门梁上，几个小时后便不治身亡）。因为其入侵意大利的作为，他在该地的评价颇为负面，如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主论》及《佛罗伦萨史》中，便把查理八世视为给意大利带来一系列烽火的灾星。

[244] 由于安德鲁自幼在意大利长大，父母去世后更经教宗抚养，故此举有忘恩负义之嫌。

[245] 蒙费拉，位于今日意大利西北皮埃蒙特区境内，是意大利重要葡萄酒产区之一。

[246] 约翰与托马斯·帕列奥列格孙女艾伦结婚。

[247] 大牧首应该由拜占庭皇帝（而非教宗）任命。

[248] 托勒密（约 90–168），相传生于埃及的一个希腊化城市赫勒热斯蒂克。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光学家。托勒密生前著作颇丰，当中的三部对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科学发展有着很大影响。第一部是《天文学大成》，也是传统地心说的核心著作。第二部《地理学》，乃是一全面探讨希腊罗马地区地理知识的典籍。第三部是有关占星学的《四书》，书中尝试改进占星术中绘制星图的方法，以便融入当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虽然托勒密的诸多学说已被现代科学证明存在谬误，但历史上他对西方天文地理学影响极大。其《地理学》一书，英文版可参见：Ptolemy, *Ptolemy's Geography*, trans. J. Lennart Berggren, Alexander Jon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9] 金纳迪乌斯是土耳其占领该城后苏丹任命的第一任大牧首。

[250] 指 15 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

[251] 塞米斯托克利斯（希腊文：*Θεμιστοκλης*，公元前 525– 前 460 年）古希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雅典人。在他极力主张下，雅典建立了一支强大海军。随后在公元前 480 年的萨拉米湾海战中，塞米斯托克利斯指挥希腊海军，将大约六百艘波斯军舰诱入雅典外的萨拉米湾，然后予以一举歼灭，赢得了自马拉松战役以来，雅典对波斯的又一次辉煌胜利，树立了以后一个世纪的雅典海上霸权。但因雅典人担心他声望过高，影响民主，将他陶片放逐，最后客死波斯。伯里克利（希腊文：*Περικλῆς*）（约公元前 495– 前 429 年）雅典黄金时期（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重要领导人。他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现存的很多古希腊建筑都是在他的时代所建。他还帮助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击败了斯巴达人。他积极培育民主力量，确保了雅典的平民政权。其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

[252] 克瑞斯（希腊文：*Αδαμάντιος Κοραής*，1748–1833）是一名人文主义学者及希腊现代文学奠基人，同时也是希腊现代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对希腊独立战争及现代希腊语言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大英百科全书》中称他对于希腊人而言，有如但丁之于意大利人，马丁·路德之于德意志人。虽然他承认东正教对保持希腊人民族认同的作用，但对拜占庭帝国及 1453 年后教会的表现持尖锐批评的态度。

附录一

[253]《波恩文集》，全名为 *1828-1897: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 tinae*，是在德国波恩出版的关于拜占庭历史材料的一部汇编合集。

[254] 因伊斯多尔本人为教皇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全权代表。

附录二

[255] 筛海（Sheikh），或译为“谢赫”，源于阿拉伯语，本意为“老者”、“长老”。伊斯兰筛海乃是对有名望的穆斯林宗教学者的尊称，他们有权对伊斯兰律法方面的问题做出裁决或澄清。

[256] 1955 年 9 月 6 日至 7 日，因有人谣传土耳其驻希腊塞萨洛尼基总领事遭到炸弹袭击，而激发了伊斯坦布尔民众的反希腊暴乱。土耳其官方一般用中性的“九月事件”形容，西方（尤其希腊）则喜欢用伊斯坦布尔暴乱甚至“屠杀”这样的称谓。暴乱主要针对希腊人聚居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了大规模洗劫。人员伤亡并不算多。官方统计共有 13 人被害，其中 12 名为希腊人，一名亚美尼亚人。但很多古老的希腊教堂及历史名胜遭到了彻底摧毁。物质损失方面，计有 4214 座住宅，1004 家商店，73 座教堂，一座修道院，一所犹太会堂及 26 家学校遭到毁坏，大部分为希腊人所有，其次为亚美尼亚人与犹太人。按照土耳其官方的数据，物质损失约 2500 万美元。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外交官报告的数字为一亿美元。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评估损失为一亿五千万美元，希腊政府的估计则高达五亿美元。一般认为此次事件与当时塞浦路斯酝酿脱离英国统治与希腊合并的背景有关（塞浦路斯一度也是奥斯曼土耳其领土），并得到了某种官方默许。此事激化了希土矛盾，也加深了两国民众感情上的裂痕。

译者后记：论书中一处地名错误

1453 年 5 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故而，这场战役数百年来受到历史学家的持续关注。在大量相关专著中，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1903–2000）1965 年由剑桥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篇幅适中，已成为此领域备受推崇的权威著作之一，自 1965 年至今，累计重印达 18 次之多。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国内尚无译介，译者在尝试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深感考据工作的繁重。盖因朗西曼先生学术渊博，书中旁征博引，所用多数资料，国内罕见，且因题材的特殊性，相当一部分内容源自希腊、土耳其、意大利等非英语文献——这更加深了翻译的难度。尤其是一部分人名、地名及术语，其具体所指及恰当译名颇需斟酌。在此过程中，译者发现朗西曼先生虽为欧洲中世纪历史研究大家，但书中某些细节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即主要探讨该书一处重要地名的错误。

一、关于君士坦丁十一世之死的地名疑点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用第十章介绍君士坦丁堡5月29日城破前后的情况。而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壮烈殉国，其死亡及遗体下落，历来是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且众说纷纭，几乎成为一桩历史疑案。朗西曼书中大致记录了三种说法：从土耳其方面流出，并盛行于意大利人黎凡特殖民地一带的版本表示，两名自称杀死了皇帝的土耳其士兵将一颗头颅带至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营帐，在场的拜占庭高官（已沦为阶下囚）确认了它的身份，苏丹于是下令将头颅置于某广场圆柱上示众，稍后更送往伊斯兰世界各王庭以显国威。第二种说法来自意大利人，他们提到，皇帝尸体一说从未被发现，另一种传言则是阵亡并被斩首了。第三种说法主要来自皇帝密友，希腊人弗朗茨——土耳其人发现一具尸体，袜子及护胫套上有双头鹰的皇家标志，并以此判断这便是皇帝本人，随后将尸首交予希腊人安葬。①

关于第一种说法，原书如此写道：

A story was circulated later round the Italian colonies in the Levant that two Turkish soldiers who claimed to have killed Constantine brought a head to the Sultan which captured courtiers who were present recognized as their master's. Mehmet set it for a while on a column in Augustean Forum, then stuffed it and sent it to be exhibited round the leading courts of the Islamic world.②

---

① Steven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43-144.

② Steven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p. 143.

此段描述中，存在疑点的为一地名“Augustean Forum”，显然，这是某个广场的名字，从上下文可以判断，首先，该广场应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其次，广场的一大特征便是竖有圆柱。但它究竟对应君士坦丁堡的哪座广场，应当如何翻译呢？译者遍寻斯蒂文·朗西曼书中附带的君士坦丁堡地图，未见其踪影。[①]当然，这也可能是原书地图过于简略的缘故。然而译者查阅词典及网络，均未见“Augustean Forum”。结合 Augustean 发音及东罗马帝国历史背景，译者首先联想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但奥古斯都约定俗成的英文拼写为 Augustus，与 Augustean 存在显著差异，并且书中地图上同样没有所谓“奥古斯都广场”。译者进而想到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但奥古斯丁的英文拼写为 Augustine，也与之不符。至此，关于“Augustean Forum”的正确理解及翻译，出现了难题。既然不能确认该词组的所指，也就不可妄加杜撰译名了。因此译者决定另换思路，考证出这个地名的精确含义。

二、从不同资料来源对比该地名所指

在原书中无法落实 Augustean Forum 具体解释，我想到利用手中不同学者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著作，经对比相似章节内容，发掘该地名更多线索。

中文资料方面，国内关于 1453 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著作，往往缺乏细节，如陈志强先生在《拜占廷帝国史》中，关于帝国灭亡时末代皇帝命运，仅提及君士坦丁英勇战死，但并未描述尸体下落。[②]所幸日本历史学家盐野七生所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已被译成中文，关于君士坦丁皇帝最后的结局，书中记载如下：

---

① 地图参见：Steven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p. 88.

② 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351 页。

“不久，两名土耳其兵被带了进来，说已斩下皇帝的首级。他俩把抱着的头颅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回答说这是皇帝的头颅。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把头颅挂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圆柱上。[①]”

盐野七生的记载与朗西曼书中第一个版本高度相似，但未明确指出头颅示众的地名。然而我们同样可获得有益的信息：既然头颅是“挂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圆柱上”，《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则记载头颅挂在 Augustean 广场的圆柱，有理由推断，后者所说广场，很可能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

仅此一条线索是远远不够的。译者又查阅了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所著《1453——君士坦丁堡圣战及伊斯兰与西方之冲突》（*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一书，其第 15 章对君士坦丁之死有以下记载：

Later in the day some janissaries, possibly Serbs, brought a head to the sultan; according to Doukas, the grand duke Lucas Notaras was present at the scene and confirm the identity of his master. The head – or a head – was then fixed on the column of Justinian opposite ST. Sophia as a proof to the Greeks that their emperor was dead.[②]

这段叙述与前文两个版本大致相仿，关于首级示众的地点，则增加了一段有趣的细节，即头颅悬挂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查士丁尼之柱（the column of Justinian）”。

塞尔维亚学者米贾托维奇（Cedomilj Mijatovic，1842–1932，塞尔维亚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曾任塞尔维亚王国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及驻奥

---

① 盐野七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杨征美译，台北：三民书局，2006 年，第 154 页。

② Roger Crowley,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Hyperion, 2006) 229.

斯曼帝国全权大使）在其著作《君士坦丁，最后的希腊皇帝；或：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Constantine,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o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一书中，也有着相似记载，原文如下：

The Sultan ordered that the emperor's head should be exposed on a column of porphyry which stood on the open space in front of the imperial palace.[①]

朗西曼版本提到了广场名及圆柱，盐野七生提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圆柱，克劳利版本指出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查士丁尼之柱，而米贾托维奇声称是皇宫前方广场上的石柱（圣索菲亚大教堂恰恰位于皇宫区，因此三种记载并不矛盾）。关于该地的大致方位，线索越来越清晰了。不过君士坦丁的头颅放置的具体地名究竟为何，我们依然未见端倪，需要进一步查证。

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诺沃（Andrew Novo）在《城市女王》（*Queen of Cities*）一书中这样记录苏丹对君士坦丁十一世首级的处理：

Take the head and place it on top of the column of the Augustaion for all to see. Let it stand there until nightfall tomorrow. Then take it and have it stuffed with straw so that we may send it throughout our kingdom to bear witness to our victory.[②]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地名拼写"top of the column of the Augustaion"，与前文三个版本相同的是，安德鲁·诺沃也认为皇帝头颅被置于石柱顶端；不同的是，他明确记载的地名并非 Augustean，而是 Augustaion，两者虽然近似，但仍存在微妙差异。至此，译者的考证出现了两个资料来源提供的同一事件，不同

① Cedomilj Mijatovic, *Constantine,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o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London: S.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2, p. 229.

② Andrew Novo, *Queen of Cities*, Washington: Coffeetown Press, 2010, p. 294.

地名，究竟孰是孰非呢？

安德鲁·诺沃虽然是地中海历史专家，但《城市女王》一书是偏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参考价值需有所保留，而了解这段历史一个重要途径是查阅关于君士坦丁十一世生平的专著或传记。英国拜占庭学家唐纳德·尼科（Donald Nicol）1992 年的专著《不朽的皇帝》是研究君士坦丁十一世方面的权威著作，该书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详细论述了皇帝的死亡，记载版本多达数十种。译者经过仔细甄别，从中筛选出与前文吻合，来自希腊历史学家达卡斯（Doukas）的记录，原文如下：

The Sultan then sent both of them with the orders to bring him the emperor's head. They rushed off to find it, cut it off and brought it to Sultan, who turned to the Grand Duke and said: 'Tell me the truth. Is this the head of your emperor?' He looked at it closely and replied: 'It is his. It is the head of my Emperor.' Others examined it and indentified it. Then they Fixed it on the column of the Augustaion and it hung there until evening. Later its skin was peeled off and stuffed with straw and [the Sultan] sent it around as a trophy and a symbol of his triumph to the ruler of Persians and the Arabs and to the other Turks.[①]

根据唐纳德·尼科的描述，该版本说法大约由达卡斯在 1462 年后记录，与罗杰·克劳利的版本几乎相同（克劳利也提及此说源自达卡斯），所提到的负责鉴别首级身份的“大公”（the Grand Duke）也就是克劳利书中的卢卡斯·诺塔拉斯（Lucas Notaras，时任拜占庭“大公”，拉丁文拼写为 megas doux，希腊文

① Donald Nicol, *The Immortal Emperor: 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5.

拼写 μέγας δούξ，约相当于海军司令[①]），微妙的差异在于，克劳利不曾直接给出地名，但给出了石柱名称，而唐纳德的版本直接表明示众地点就在 Augustaion，与安德鲁·诺沃的说法相同。

至此，又一份资料将皇帝头颅示众之处，指向 Augustaion，并且对整个事件其他方面的叙述，与上述各参考资料（包括斯蒂文·朗西曼本人的描写）大致吻合。争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究竟皇帝首级，被置于 Augustaion 广场，还是 Augustean 广场？译者无法简单给出结论，因为只能证明存在地名拼写差异，却不能排除唐纳德·尼科等学者出错，而斯蒂文·朗西曼正确的可能。因此我们需要就这两个近似地名，展开下一步考证，以达到去伪存真的效果。

三、Augustean 与 Augustaion 之考证

要在两个希腊地名中进行考证，译者首先想到的最快捷方法，便是直接查询维基百科英文版，以获得初步资料。经检索，维基百科中，并无 Augustean 词条，而 Augustaion 却赫然在列。其介绍内容大致如下：Augustaion（拉丁文拼写为 Augustaeum）是一座在古代及中世纪时期重要的拜占庭广场。其雏形由罗马皇帝塞维鲁修建，君士坦丁大帝将拜占庭作为帝国新都后，大兴土木，在此修建了石柱雕像以纪念其母后海伦娜。利奥一世皇帝于 459 年进行过重修。随后在 530-540 年间，为了弥补尼卡起义造成的破坏，查士丁尼一世再次进行大规模翻修。在它的早期历史中，一度是开放的公共市场，但在查士丁尼修缮后，逐渐变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院，被廊柱环绕并不再对公众完全开放。至 15 世纪拜占庭晚期，广场开始破败，最终在 16 世纪被入主的奥斯曼人毁坏，今天仅余残迹。该广场位于君士坦丁堡核心区域，北邻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

---

① 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30.

南接宙克西帕斯浴场（Baths of Zeuxippus）及老皇宫，东面有两座元老院建筑，西南方则是著名的君士坦丁堡竞技场（Hippodrome of Constantinople），广场内标志性建筑为多座皇帝或皇亲石柱雕像，其中最负盛名的为查士丁尼之柱（the Column of Justinian）。[①]

从地点（君士坦丁堡市内，索菲亚大教堂附近）及特征（建有石柱，包括查士丁尼之柱）来看，维基百科上的 Augustaion 与前文引用各资料大体相符。不过，维基百科作为开放、免费的网络百科，其资料严谨性往往不如传统工具书，其信息仅能作为参考，不宜作为核心证据。因此，译者转而查询更为专业的资料。

关于拜占庭历史方面的工具书，一般首推由俄裔美籍拜占庭学者亚历山大·卡日丹（Alexander Kazhdan）主编的《牛津拜占庭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简称 ODB）。在该辞典中，译者同样只查到 Augustaion，未查到 Augustean。其主条目如下：

Augustaion, enclosed open space in Constantinople, situated south of Hagia Sophia. Probably carved out of preexisting agora called the Tetrastoon, the Augustaion is ascribed to Constantine I who is said to have placed in it a statue of his mother Helena on a column. Remodeled in 459 and again by Justinian I, the Augustaion served not as a public forum but as a courtyard of restricted access. It survived as an open space until the end of the empire.[②]

《牛津拜占庭辞典》中的相关介绍虽然简略，但基本信息与维基百科内容一致，在 Augustaion 下子条目中，同样列有查士丁尼之柱（Justinian's Column）。

---

① 维基百科英文版：*Augusta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Augustaion

② Alexander P. Kazhdan,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 232.

考虑到该辞典的权威性与全面性，译者开始倾向于正确地名应为 Augustaion，不过为了稳妥起见，还需从不同角度，搜集更多资料，列为佐证。

《八世纪早期的君士坦丁堡》是一本以佚名古希腊手稿《历史简章》（*Parastaseis syntomoi chronikai*，成书约在 8–9 世纪）为基础的研究该年代拜占庭首都重要建筑与古迹的著作。书中包含若干君士坦丁堡地图，关于 8 世纪城市皇宫区（君士坦丁皇帝被枭首示众的地点在该区域内）的地图对本文颇有参考价值。而该地图上没有所谓 Augustean 广场的踪影，在索菲亚大教堂南侧确实有一座广场，广场名地图上标为 Augustaeum（即 Augustaion 的拉丁文拼写），而广场中标有查士丁尼之柱。[①]

《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城墙及周边古迹》一书是研究君士坦丁堡建筑的重要学术著作，斯蒂文·朗西曼本人也对该书赞誉有加，并视为重要参考书。[②]其中一张详尽的君士坦丁堡古城全图（其细节远远多于《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书中的城市地图）对译者的考证很有帮助。在此地图上，遍寻每一处广场，同样未见 Augustean 字样，而在君士坦丁堡东南皇宫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南同一位置，标注着Forum of Augustaion的名字。[③]其周边建筑分布也与《牛津拜占庭辞典》及维基百科如出一辙。

由于译者考证的广场大致在皇宫区一带，故特意查阅了这方面的专著《君士坦丁堡大皇宫》（*the Great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该书第三章第一节专门介绍皇宫附近的广场：“在大竞技场东墙与皇宫陆上边界之间，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南，有一片东西宽约 144 码，南北长约 550 码的广阔空地。……今天，其地域大部被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The Sultan Ahmed Mosque）占据。而在拜占庭

---

① Averil Cameron, Judith Herr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The Parastaseis Syntomoi Chronikai*，New York: Brill Academic Pub, 1984, p. 13.

② Steven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p. 218.

③ Alexander Van Millingen,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Adjoining Historical Site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

时代，人们往往称它为 Augustaion，有时也简称为‘广场’。”书中继而介绍了广场周边一些知名建筑，如宙克西帕斯浴场、元老屋等。[①] 这些记载可与前文关于 Augustaion 的不同资料来源互为印证。

至此，译者认为结论已经比较明晰了。本文考证的核心内容，是关于 1453 年 5 月 29 日，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阵亡后，其头颅示众的确切地点。就此事件本身，斯蒂文·朗西曼与译者引用其他四位作者的描述并无本质差异，他们都认同皇帝被土耳其士兵斩首，头颅被带到苏丹身前，并随后被放置在某地的石柱顶端（很可能他们均采用了 1462 年后希腊人达卡斯的原始记载）。——区别在于，朗西曼认为该地地名为 Augustean 广场，而安德鲁·诺沃与唐纳德·尼科则认为是 Augustaion，盐野七生、罗杰·克劳利和米贾托维奇虽未指明地名，但给出了有益细节：该地位于君士坦丁堡地标，圣索菲亚大教堂及大皇宫附近，甚至给出了石柱名称——查士丁尼之柱。译者根据以上线索，对 Augustean 与 Augustaion 两地名进行辨析考据。而多达五个不同资料来源均指向 Augustaion，同时，不论辞典、专著或地图，均无法找到符合条件的所谓 Augustean 广场。Augustaion 广场不仅满足位于索菲亚教堂及大皇宫附近，竖有石柱（包括查士丁尼之柱）等重要特征，且在君士坦丁堡古城大皇宫区仅有这一个大型广场。

综合以上资料可见，斯蒂文·朗西曼先生的记载仅仅为一个孤证，而大量证据直接或间接地表明，皇帝头颅示众的场所，应该为 Augustaion。译者可有把握地认定，所谓 Augustean 一词，应为 Augustaion 之误。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极可能是原作者在不同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土耳其语、英语）中来回转译所造成的疏漏，当然，也可能是简单的笔误。虽然这个错误看似微小，但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如不纠正，也会对读者延伸阅读或进一步钻研，造成困扰，更会为国内读者的理解带来难题。

---

① A. G. Paspates, *The Great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William Metcalfe,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pp. 66-67.

至于这一地名（Augustaion Forum）的中文翻译，译者认为不可望文生义，简单处理为诸如奥古斯都或奥古斯丁广场——君士坦丁大帝兴建此广场最初是为了纪念母亲海伦娜太后，这也是广场名称的来源。罗马帝国男性皇帝一般称奥古斯都，而女皇或皇后、太后，则往往用奥古斯都的阴性格式“奥古斯塔”（Augusta），因此译者认为，该地名的中文名称，译为“奥古斯塔广场”为宜。

马千

参考文献

Abbreviations

C.S.H.B.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1828–1897.
M.P.G.	Migne, *Patrologia Graeco-Latina*, Paris, 1859–1866.
Muratori, *R.I.Ss.*	Muratori,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Milan, 1723–1751.

I. Collections of Sources

Ellissen, A. *Analekten der mittel- 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 5 vols. Leipzig, 1855–62.

Giese, F. *Die altosmanischen anonymen Chroniken.* Breslau, 1922.

Jorga, N. *Notes et extra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Croisades au XVe. siècle*, 6 vols. Paris-Bucarest, 1899–1916.

Khitrowo, B. de. *Itineraires russes en Orient, Société de l'Orient latin, série géographique* 5. Geneva, 1889.

Krekic, B. *Regestes des archives de Raguse*, in *Dubrovnik* (*Raguse*) *et le Levant au moyen age.* See bibliography III.

Lambros (Lampros), S. P. *Παλαιολόγεια καὶ Πελοποννησιακά*, 4 vols. Athens, 1912–30.

Legrand, E.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Paris, 1874.

Leunclavius (Löwenklaw), J. *Annales Sultanorum Othmanidarum.* Frankfurt, 1588.

Leunclavius (Löwenklaw), J. *Historiae Musulmanae Turcorum.* Frankfurt, 1591.

Martene, E. and Durand, U. *Thesaurus novus anecdotorum*, 5 vols. Paris, 1717.

Migne, J. P.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o-Latina*, 167 vols. Paris, 1857–76.

Müller, C.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5 vols. Paris, 1878–85.

Muratori, L. A.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25 vols. Milan, 1723–51.

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Roi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877 ff.

Raynaldi, O. *Annales ecclesiastici*, continuation of Baronius, *Annales Ecclesiastici*. 15 vols. Lucca, 1747–56.

Sansovino, F. *Historia universale dell' origine et imperio de' Turchi*, 3 vols. Venice, 1646.

Sathas, K. N. *Μεσαιωνικὴ Βιβλιοθήκη*, 7 vols. Athens, 1872–94.

Thiriet, F. *Regestes des deliberations du Se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3 vols. Paris-The Hague, 1959–61.

II. Individual Sources

Abraham the Armenian. *Mélodie Elégiaque sur le prise de Stambol* (trans. M. Brosset, in Lebeau, *Histoire du Bas-Empire*, ed. Saint-Martin, xxi, 1836). See Bibliography iii below.

Adam of Usk. *Chronicon* (ed. E. M. Thompson). London, 1904.

Alexandre, scribe. *Voyage à Constantinople* (1393), in Khitrovo, *Itinéraires russes en Orient*.

Ali. *Künh-ul-Akhbar*, 4 vols. Istanbul, A. H. 1284, 1867. *Ἅλωσις τῆς Κορδύλης*, in Legrand,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no. 51.

Ἅλωσις τῆς Τραπεζοῦντος, in Legrand,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no. 49.

Anagnostes, Joannes. *De Thessalonicensi excidio narratio.* See below, Phrantzes.

'Anonymous Giese'. *Tarih Ali Osman*, in Giese, *Die altosmanischen anonymen Chroniken.*

Ashikpashazade (Derwisch Ahmed, genannt 'Asik-Pasa-Sohn). *Von Hirtenzelt zur Hohen Pforte*, extracted from *Tarih Ali Osman* (ed. and trans. R. F. Kreutel). Graz, 1959.

Barbaro, N.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nstantinopoli*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Bartholomaeus de Jano. *Epistola de Crudelitate Turcorum.* (*M.P.G.*, clviii, 1866.)

Bartholomaeus della Pugliola, *Historia miscella Bononiensis.* (Muratori, *R.I.Ss.*, xviii, 1731.)

Bessarion, Cardinal. Letter to the Doge of Venice, in Jorga, *Notes et Extraits*, ii. 1899.

Callistus, Andronicus. *Monodia de Constantinopoli Capta.* (*M.P.G.*, clxi, 1886.)

Camariotes, Matthaeus. *De Constantinopoli capta narratio lamentabilis.* (*M.P.G.*, clx, 1866.)

Cambini, A. *Della origine de' Turchi et Imperio delli Ottomanni.* Florence, 1537.

Cananus, Joannes. *De Constantinopoli Oppugnata.* See Phrantzes, below.

Cantacuzenus, Joannes. *Historia* (ed. L. Schopen, *C.S.H.B.*, 1828–1832).

Chalcocondylas, Laonicus. *De Origine ac rebus gestis Turcorum* (ed. E. Bekker, *C.S.H.B.*, 1843).

Chronica Minora (*Βραχέα Χρονικά*) (ed. S. Lambros). Athens, 1932.

Chronicon Estense. (Muratori, *R.I.Ss.*, xv, 1729.)

Χρονικὸν περὶ τῶν Τούρκων Σουλτάνων (ed. G. T. Zoras). Athens, 1958.

Clavijo, R. Gonzales de. *Diary* (trans. G. Le Strange). London, 1928.

Critobulus. *De rebus gestis Mechemetis*, Müller, *Fragmenta historicorum*, v, 1883; *also* Kritovoulos, *History of Mehmed the Conqueror* (trans. C. T. Riggs). Princeton, 1954.

Description de Constantinople (1424–53), in Khitrowo, *Itineraires russes en Orient*.

DOLFIN, ZORZI. *Assedio e presa di Constantinopoli nell' anno 1453* (ed. G. M. Thomas). Munich, 1868.

DUCAS, MICHAEL (?). *Historia Turco-Byzantina* (ed. V. Grecu). Bucarest, 1948; *also* (ed. E. Becker, *C.S.H.B.*, 1834).

Ecthesis Chronica (ed. S. Lambros). London, 1902.

EUGENICUS, JOANNES. *Varia*, in Lambros, *Παλαιολόγεια καὶ Πελοποννησιακά* I, 1912.

EVLIYA CHELEBI. *Seyahatname*, *Narrative of Travels*, trans. J. von Hammer (2 vols.). London, 1834; *also* extracts in Turkova, '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See Bibliography III, below.

FILELFO (PHILELPHUS), F. *Cent-dix lettres grecques de Francois philelfe* (ed. E. Legrand). Paris, 1892.

FILELFO (PHILELPHUS), F. Letter to the King of France, Jorga, *Notes et Extraits*.

FRANCISCANS, FATHER SUPERIOR OF THE, *Rapporto* (Muratori, *R.I.Ss.*, XVIII, 1731).

FREDERICK III, EMPEROR. Letters to the Sultan, in Jorga, *Notes et Extraits*, II. 1899.

GENNADIUS, GEORGIUS SCHOLARIUS. *Oeuvres complètes de Gennade Scholarios* (ed. L. Petit, X. A. Sidéridès and M. Jugie, 8 vols.). Paris, 1928–1936.

HIERAX. *Chronicon*, in Sathas, *Μεσαιωνικὴ Βιβλιοθήκη*, I, 1872.

Historia Politica et Patriarchica Constantinopoleos (ed. E. Bekker, *C.S.H.B.*, 1849).

IBN BATTUTA. *Voyages* (ed. C. Defrémery and B. R. Sanguinetti, 4 vols.). Paris, 1893.

ISIDORE OF RUSSIA, CARDINAL. Letter to Pope Nicholas V. (*M.P.G.*, CLIX, 1866); letter to All the Faithful, in Sansovino, *Historia Universale*, III.

LA MARCHE, OLIVIER DE. *Mémoires* (ed. H. Beaune and J. d'Arbaumont, 4 vols.). Paris, 1883–8.

LEONARD OF CHIOS, ARCHBISHOP OF MITYLENE. *Epistola ad Papam Nicolaum V*. (*M.P.G.*, CLIX, 1866.) Italian version in Sansovino, *Historie Universale*, III.

LEONARD OF CHIOS. *De Lesbo a Turcis Capta* (ed. C. Hopf). Regensberg, 1866.

MONTALDO, A. DE. *Della Conquista di Constantinopoli per Maometto II* (ed. C. Desimoni);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e Storia Patria*, X, Genoa, 1874.

NESTOR ISKANDER. *The Tale of Tsargrad* (in Old Slavonic) (ed. Archimandrite Leonid); *Memoirs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of Amateurs of Ancient Literature. St Petersburg, 1886.

NOTARAS, LUCAS. *Epistolae* (*M.P.G.*, CLX.)

Notitiae de Portis Constantinopolitanis (ed. Preger and Benescevic), *B.Z.*, XXI, XXIII. 1921, 1923.

PHRANTZES (SPHRANTZES), GEORGIUS. *Chronicon* (ed. E. Bekker, *C.S.H.B.*, 1838), also containing Anagnostes and Cananus. See above.

PIUS II, POPE. *Opera Omnia.* Basle, 1551.
PODESTÀ OF PERA. *Epistola de excidio Constantinopolitano* (ed. S. de Sacy). *Notices et Extrait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Roi*, XI. 1827.
'POLISH JANISSARY' (MICHAEL CONSTANTINOVIĆ OF OSTROVIĆA). *Memoirs* (in Old Slavonic), in A. Galezowsky, *Zbior Pisarzow Polskieh*, v, Warsaw, 1929.
PUSCULUS, UBERTINO. *Constantinopoleos libri IV*, in Ellissen, *Analekten der mittel- 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 III, 1857.
RICCHERIO, CRISTOFORO. *La presa di Constantinopoli*, in Sansovino, *Historia Universale*, III.
SA'AD ED-DI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 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 Glasgow, 1879.
SANUDO, M. *Vitae Ducum Venetorum* (Muratori, *R.I.Ss.*, XXII, 1733).
SPANDUGINO CANTACUZINO, T. *Discorso dell' origine de Principi Turchi*, in Sansovino, *Historia Universale*, II.
TACI BEYZADE (Tāğ Beg-zāde Ğa'fer Čelebi). *Fethnāme-i Istanbul, Revue Historique publiée par l'Institut d'histoire Ottomane*, IV. Istanbul, 1913.
TAFUR, PERO. *Travels* (ed. and trans. M. Letts). London, 1926.
Slavic Chronicle (in Old Slavonic). *Conquest of Tsarigrad* (ed. J. J. Sreznevsky), *Publication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St Petersburg, 2nd Division*, I, St Petersburg, 1854; Russian and Roumanian versions in Jorga, 'Une source négligé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See Bibliography III below.
'TERRE HODIERNE GRECORUM ET DOMINIA SECULARIA ET SPIRITUALIA IPSORUM' (ed. S. Lambros). *Neos Hellenomnemon*, VII. Athens, 1910.
TETALDI, JACOBO (EDALDY, JACQUES). *Informations envoyées tant par Francisco de Franc a Mgr. le Cardinal d'Avignon, que par Jehan Blanchin et Jacques Edaldy, marchant florentin,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à laquelle le dit Jacques estoit personellement*, in Martène and Durand, *Thesaurus novus anecdotorum*, I, 1717.
Θάνατος τοῦ Κωνσταντίνου Δράγαζη, in Legrand, *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 no. 48.
TURSUN BEY. *Chronicle* (ed. Mehmet Arif), *Revue Historiqué publiée par l'Institut d'Historie Ottomane*, pts. 26–38. Istanbul, 1914–16.
VILLALON, C. DE. *Viaje de Turquia* (ed. A. G. Solalinde), 2 vols. Madrid, Barcelona, 1919.

III. MODERN WORKS

AHMED MUKTAR PASHA.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ttomans in Europe.* London, 1902.
ALDERSON, A. D. *The Structure of the Ottoman Dynasty.* Oxford, 1956.
AMANTOS, C.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Le Cinq-Cent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L'Hellénisme Contemporain, fasciscule hors série.* Athens, 1953.

ANDREEVA, M. 'Zur Reise Manuels II Palaiologos nach West-Europa', *B.Z.*, xxxiv. 1934.

ARGENTI, P. *The Occupation of Chios by the Genoese*, 3 vols. Cambridge, 1958.

ATIYA, A. S. *The Crusad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ndon, 1938.

ATIYA, A. S. *The Crusade of Nicopolis*. London, 1934.

BABINGER, F. *Beitrage zur Frühgeschichte der Turkenherrschaft in Rumelien*. Brunn-Munich-Vienna, 1944.

BABINGER, F. *Die Geschichtsschreiber der Osmanen und ihre Werke*. Leipzig, 1927.

BABINGER, F. *Mehmed der Eroberer und seine Zeit*. Munich, 1953.

BABINGER, F. Article 'Orkhan',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II.

BABINGER, F. 'Von Amurath zu Amurath. Vor- und Nachspiel der Schlacht bei Varna', *Oriens*, III. Leyden, 1950.

BAKALOPULOS, A. 'Les limites de l'Empire Byzantin depuis la fin du XIVe siècle jusqu'à sa chute', *B.Z.*, LV, I. 1962.

BAUDRILLART, VOGT and ROUZIES (eds., *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ecclésiastique*, Paris, 1911) (in progress).

BECK, H. G. 'Humanismus und Palamismus', XII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Études Byzantines, *Rapports*, III. Ohrid, 1961.

BECK, H. G. *Kirche und theologische Literatur im byzantinischen Reich*. Munich, 1959.

BECK, H. G. *Theodoros Metochites*. Munich, 1952.

BECKWITH, J. *The Art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62.

BERGER DE XIVREY, M. *Mémoir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gue*. Paris, 1861.

BIRGE, J. K. *The Bektashi Order of Dervishes*. London, 1937.

BRATIANU, G. I. *Études Byzantin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1938.

BREHIER, L. Article 'Bessarion', in Baudrillart, *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ecclésiastique*. See above.

BREHIER, L. *Le Monde Byzantin, I: Vie et mort de Byzance*. Paris, 1947.

CAHEN, C. 'La campagne de Mantzikert d'après les sources mussulmanes', *Byzantion*, IX. Brussels, 1934.

CAHEN, C. 'The Mongols', in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Setton), II. (See below.)

CAHEN, C. 'The Selchukid state of Rum'. in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Setton), I. (See below.)

CAHEN, C. 'The Turkish invasion: the Selchukids', in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Setton), II. (See belo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V.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717–1453. Cambridge, 1923.

CANTEMIR, D. *History of the Othman Empire* (trans. N. Tindal). London, 1734.

CHARANIS, P. 'The strife among the Palaeologi and the Ottoman Turks'. *Byzantion*, XVI, I. Boston, 1944.

CONCASTY, M. L. 'Les "Informations" de Jacques Tedaldi', *Byzantion*, XXIV. Brussels, 1954.

CSUDAY, F. *Die Geschichten der Ungarn*, Zool. Berlin, 1899.

CUSPINIAN, J. *De Turcarum origine*. Leyden, 1634.

DALLOWAY, J. *Constantinople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1797.

DELAVILLE LE ROULX, J. *La France en Orient au XIVe Siècle*, 2 vols. Paris, 1886.

DIAMANTOPOULOS, A. N. '*Γεννάδιος ὁ Σχολάριος ὡς ἱστορικὴ πηγὴ τῶν περὶ τὴν ἅλωσιν χρόνων*', '*Ἑλληνικά*, IX. Athens, 1926.

DIEHL, C. 'De quelques croyances byzantines sur la fin de Constantinople', *B.Z.*, XXX. 1930.

Encyclopaedia of Islam (ed. Houtsma, Arnold and Basset), 4 vols. Leyden–London, 1913–34.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ed. Lewis, Pellat and Schacht). Leyden–London, 1955 (in progress).

FINLAY, G. *A history of Greece* (ed. H. F. Tozer), III. Oxford, 1877.

FUCHS, F. *Die höheren Schulen von Konstantinopel im Mittelalter*, *Byzantinische Archiv*, VIII. Leipzig–Berlin, 1926.

GEGAJ, A. *L'Albanie et l'invasion turque au XVe siècle*. Paris, 1937.

GIBBON, 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J. B. Bury), 7 vols. London, 1896–1900.

GILL, J.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Cambridge, 1959.

GRECU, V.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dans la littérature populaire roumaine', *Byzantinoslavica*, XIV. Prague, 1953.

GRECU, V. 'Pour une meilleure connaissance de l'historien Doukas', *Memorial Louis Petit*. Bucarest, 1948.

GRUNZWEIG, A. 'Philippe le Bon et Constantinople', *Byzantion*, XXIV. Brussels, 1954.

GUILLAND, R. 'Les appels de Constantin XI Paléologue à Rome et à Venise pour sauver Constantinople', *Byzantinoslavica*, XIV. Prague, 1953.

GYLLIUS, P. *De topographia Constantinopoleos*. Lyons, 1561.

HALEČKI, O. 'Rome et Byzance au temps du grand schisme d'Occident', *Collectio Theologica*, XVIII. Lwow, 1937.

HALEČKI, O. *The Crusade of Varna*. New York, 1943.

HALEČKI, O. *Un Empereur de Byzance à Rome*. Warsaw, 1930.

HAMMER-PURGSTALL, J. VO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10 vols. Pest, 1827–1835.

HASLUCK, F. W. *Athos and its Monasteries*. London, 1924.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âge* (new edition), 2 vols. Leipzig, 1936.

HILL, G. *A History of Cyprus*, 3 vols. Cambridge, 1940–8.

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ed. B. Lewis and R. M. Holt). London, 1962.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ed. K. M. Setton). Philadelphia, 1955 (in progress).

HOPF, C. *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von Beginn des Mittelaltes bis auf unserer Zeit*, 2 vols. Leipzig, 1870–1.

HOUTSMA, M. T. Article 'Tughrilbeg',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V.

HUART, C. Article 'Janissarie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I.

HUBER, A.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5 vols. Gotha, 1885–96.

HYPSILANTIS, A. C. *Τὰ μετὰ τὴν ἅλωσιν* (ed. A. Germanos). Constantinople, 1870.

INALCIK, H. Article 'Bāyāzed I',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I.

INALCIK, H. *Fatih Devri üzerinde tetikler ve vesikalar*, I. Ankara, 1954.

INALCIK, H. 'Mehmed the Conqueror (1432–1481) and his time', *Speculum*, XXXV. Cambridge, Mass., 1960.

INALCIK, H. 'Ottoman methods of conquest', *Studia Islamica*, II. Paris, 1954.

JANIN, R. *Constantinople Byzantine. La géographie ecclésiastique de l'empire byzantin*, Pt. I, iii, *Les églises et les monastères*. Paris, 1953.

JIREČEK, K. *Geschichte der Serben*, 2 vols. Gotha, 1911–15.

JORGA, N. *Byzance après Byzance*. Bucarest, 1935.

JORGA, 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2 vols. Gotha, 1908–9.

JORGA, N. *Histoire des Roumains*, 4 vols. Bucarest, 1937.

JORGA, N. 'Une source négligé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Académie Roumaine, 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XIII. Bucarest, 1927.

KHAIRULLAH EFFENDI. *Ta'rikh*. Istanbul, 1851.

KOLIAS, G. 'Constantin Paléologue, le dernier defenseur de Constantinople,' *Le Cinq-Cent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L'Hellénisme Contemporain*, fasciscule hors série. Athens, 1953.

KÖPRÜLÜ, M. F. *Les origines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935.

KRAMERS, J. H. Article 'Othman I',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

KRAMERS, J. H. Article, 'Muhammad I',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II.

KRAUSE, J. H. *Die Eroberung von Konstantinopel im 13 und 15 Jahrhunderts durch die Kreuzfahren, durch die nicaeischen Griechen und durch die Turken*. Halle, 1870.

KREKIC, B. *Dubrovnik (Raguse) et le Levant au moyen âge*. Paris–The Hague, 1961.

KYROU, A. *Βησσαρίων ὁ Ἕλλην*, 2 vols. Athens, 1947.

LAMBROS, S. '*Ὁ Κωνσταντῖνος Παλαιολόγος ὡς σύζυγος*', *Neos Hellenomnemon*, IV. Athens, 1907.

LAMBROS, S. '*Αἱ εἰκόνες Κωνσταντίνου τοῦ Παλαιολόγου*', *Neos Hellenomnemon*, III and IV. Athens, 1906–7.

LAMBROS, S. *Συνθήκη μεταξὺ Ἰωάννου τοῦ Παλαιολόγου καὶ τοῦ δουκὸς τῆς Βενετίας Φραγκίσκου Φόσκαρη*, in *Neos Hellenomnemon*, I, Athens, 1904.

LASCARIS, M. *Vizantiske princeze u srednjevekovnoj Srbiji*. Belgrade, 1926.

LAURENT, J. *Byzance et les Turcs Seldjoucides jusqu'en 1081*. Nancy, 1913.

LAURENT, V. 'Sphrantzes et non Phrantzes', *B.Z.*, XLIV. 1951.

LEBEAU, C. *Histoire du Bas-Empire* (ed. J. Saint-Martin), 21 vols. Paris, 1824–1836.

LEIGH FERMOR, P. *The Traveller's Tree*. London, 1950.

LEMERLE, P. *L'Emirat d'Aydin: Byzance et l'Occident*. Paris, 1937.

LOENERTZ, R. J. 'Autour du Chronicon Maius attribué à Georgios Phrantzes', *Miscellanea Mercati*, III, *Studi i Testi Vaticani*, CXXIII. Rome, 1946.

LEONERTZ, R. J. 'Pour la biographie du Cardinal Bessarion', *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X. Rome, 1944.

MARINESCU, C. 'Le Pape Callixte III, Alphonse V d'Aragon, roi de Naples, et l'offensive contre les Turcs', *Académie Roumaine, 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XIX. Bucarest, 1935.

MARINESCU, C. 'Le Pape Nicolas V et son attitude envers l'empire byzantin' *Bulletin de l'Institut archéologique Bulgare*, X. Sofia, 1935.

MARINESCU, C. 'Notes sur quelques ambassadeurs byzantins en Occident à la veille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Turcs',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Philologie et de l'Histoire Orientales et Slaves*, X. Brussels, 1950.

MASAI, F. *Plethon et le Platonisme de Mistra*. Paris, 1956.

MASSO TORRENTS, J. '40 Octaves à la porte de Constantinople', *Εἰς μνήμην Σ. Λάμπρου*. Athens, 1938.

MEDLIN, W. K. *Moscow and East Rome*. Geneva, 1952.

MERCATI, G. 'Scritti d'Isidoro il Cardinale Ruteno', *Studi i Testi*, XLVI. Rome, 1926.

MEYENDORFF, J.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Grégoire Palamas*. Paris, 1959.

MIJATOVICH, C. *Constantin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London, 1892.

MILLER, W. *Essays on the Latin Orient*. Cambridge, 1921.

MILLER, W. 'The Balkan States',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V.

MILLER, W. *The Latins in the Levant*. London, 1908.

MILLER, W. *Trebizond, the last Christian Empire*. London, 1926.

MORAVCSIK, G. *Byzantino-Turcica*, 2 vols. Budapest, 1942–3.

MORDTMANN, A. Article 'Dewshirm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I.

MORDTMANN, A. 'Die letzten Tage von Byzanz', *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Exkursions-Klub*. Istanbul, 1893 and 1895.

MORDTMANN, A. *Esquisse topographique de Constantinople*. Lille, 1892.

MORDTMANN, A. D. *Die Belagerung und Eroberung Constantinopels durch die Türken im Jahre 1453*. Stuttgart–Augsburg, 1858.

MOSCHOPOULOS, N.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selon les sources turques', *Le Cinq-Cent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L'Hellénisme Contemporain*, fasciscule hors série. Athens, 1953.

NORDEN, W. *Das Papsttum und Byzanz*. Berlin, 1903.

OMAN, C. W. C.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 2nd edition, 2 vols. London, 1924.

OSTROGORSKY, G.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 J. Hussey). Oxford, 1955.

PALL, F. 'Autour de la Croisade de Varna', *Académie Roumaine, 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orique*, XXII. Bucarest, 1941.

PAPADOPOULOS, A. T. *Versuch einer Genealogie der Palaiologen*, Amsterdam, 1962.

PAPADOPOULLOS, T. H. *Studies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Greek church and people under Turkish domination*. Brussels, 1952.

PASPATES, A. G. *Πολιορκία καὶ ἅλωσις τῆ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όλεως*. Athens, 1890.

PASTOR, L. *History of the Popes 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F. I. Antrobus), 5 vols. London, 1891–8.

PAULOVÁ, M. 'L'Empire byzantin et les Tcheques avant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 *Byzantinoslavica*, XIV. Prague, 1953.

PEARS, 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London, 1903.

PEARS, E. 'The Ottoman Turks to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V.

RADONIC, J. *Djuradj Kastriot Skenderbeg i Albanija*. Belgrade, 1942.

RUNCIMAN, S. 'Byzantine and Hellen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Τόμος Κωνσταντίνου Ἀρμενοπούλου*. Thessaloniki, 1952.

RUNCIMAN, S. 'The schism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XLIV, 4. Evanston, 1962.

SCHLUMBERGER, G. *Le siège, la prise et le sac de Constantinople en 1453*. Paris, 1926.

SCHNEIDER, A. M. 'Die Bevölkerung Konstantinopels im XV Jahrhundert',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Hist. Klasse*. Göttingen, 1949.

SOTTAS, J. *L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de Venise au XIVe et XVe siecles*. Paris, 1938.

STASIULEVICH, M. M. 'The siege and capture of Byzantium by the Turks' (in Russian). *Memorie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 2nd division*, I St. Petersburg, 1854.

TAFRALI, O. '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ns les fresques des églises de Bukovine', *Mélanges G. Schlumberger*, II. Paris, 1924.

TAFRALI, O. *Thessalonique au quatorzième siècle*. Paris, 1913.

THIRIET, F. *La Romanie Vénitienne au moyen âge*. Paris, 1959.

TOMADAKIS, N. B. '*Ἐτούρκευσεν ὁ Γεώργιος Ἀμιρούτζης;*' in *Ἐπετηρὶς Ἑταιρείας Βυζαντινῶν Σπουδῶν*, XVIII. Athens, 1948.

TOMADAKIS, N. B. 'Répercussion immédiat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Le Cinq-Cent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L'Hellénisme Contemporain*, fasciscule hors série. Athens, 1953.

TYPALDOS, T. E. *'Οἱ ἀπόγονοι τῶν Παλαιολόγων μετὰ τὴν ἅλωσιν'*, *Δελτίον τῆς Ἱστορικῆς καὶ Ἐθνολογικῆς Ἑταιρείας τῆς Ἑλλάδος* VIII. Athens, 1922.

ULGEN, ALI SAIM.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era of Mohammed the Conqueror.* Ankara, 1939.

UNBEGAUN, B. 'Les relations vieux-russes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Revue des Etudes Slaves*, IX. Paris, 1929.

ÜZÜNÇARSILI, I. H. *Osmanlî Tarîhî*, 3 vols. Ankara, 1947–51.

VAN MILLINGEN, A. *Byzantine Churches in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10.

VAN MILLINGEN, A.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 the walls of the City.* London, 1899.

VASILIEV, A. A.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Madison, 1952.

VASILIEV, A. A. 'Medieval idea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Byzantion*, XVI, 2. Boston, 1944.

VASILIEV, A. A. '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ern Europe' (in Russian), *Journal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N.S.* XXXIX. St. Petersburg, 1912.

VAST, H. *Le Cardinal Bessarion* (1403–72). Paris, 1878.

VOIGT, G.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als Papst Pius II und sein Zeitalter*, 3 vols. Berlin, 1856–63.

VOYATZIDIS, J. *'Τὸ ζήτημα τῆς στέψεως Κωνσταντίνου τοῦ Παλαιολόγου'*, *Λαογραφία* VII. Athens, 1923.

WALTER, G. *La Ruine de Byzance.* Paris, 1958.

WITTEK, P. *Das Fürstentum Mente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Westkleinasiens im 13–15 Jahrhundert.* Istanbul, 1934.

WITTEK, P.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 1938.

YULE, H.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ed. H. Cordier), 3 vols. London, 1902–20.

ZAKYTHINOS, D.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et la fin du Moyen Age' and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tournant dans la politique et l'économie européennes', *Cinq-Cent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L'Hellénisme Contemporain*, fasciscule hors série. Athens, 1953.

ZAKYTHINOS, D. *Le Despotat grec de Morée*, 2 vols. Paris, 1932–55.

ZIEGLER, A. 'Isidore de Kiev, apôtre de l'Union florentine', *Irenikon*, XIII. Chevetogne, 1936.

ZORAS, G. *Περὶ τὴν ἅλωσιν τῆ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όλεως.* Athens, 1959.

索 引

（汉语拼音排序，数字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所引用的205-235页，是原著中作者注释，现为正文脚注。

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名字，诸如君士坦丁堡、希腊、拜占庭、土耳其、奥斯曼、意大利等，不再一一列出。）

B

C

D

E

F

G

H

K

L

R

M

N

P

Q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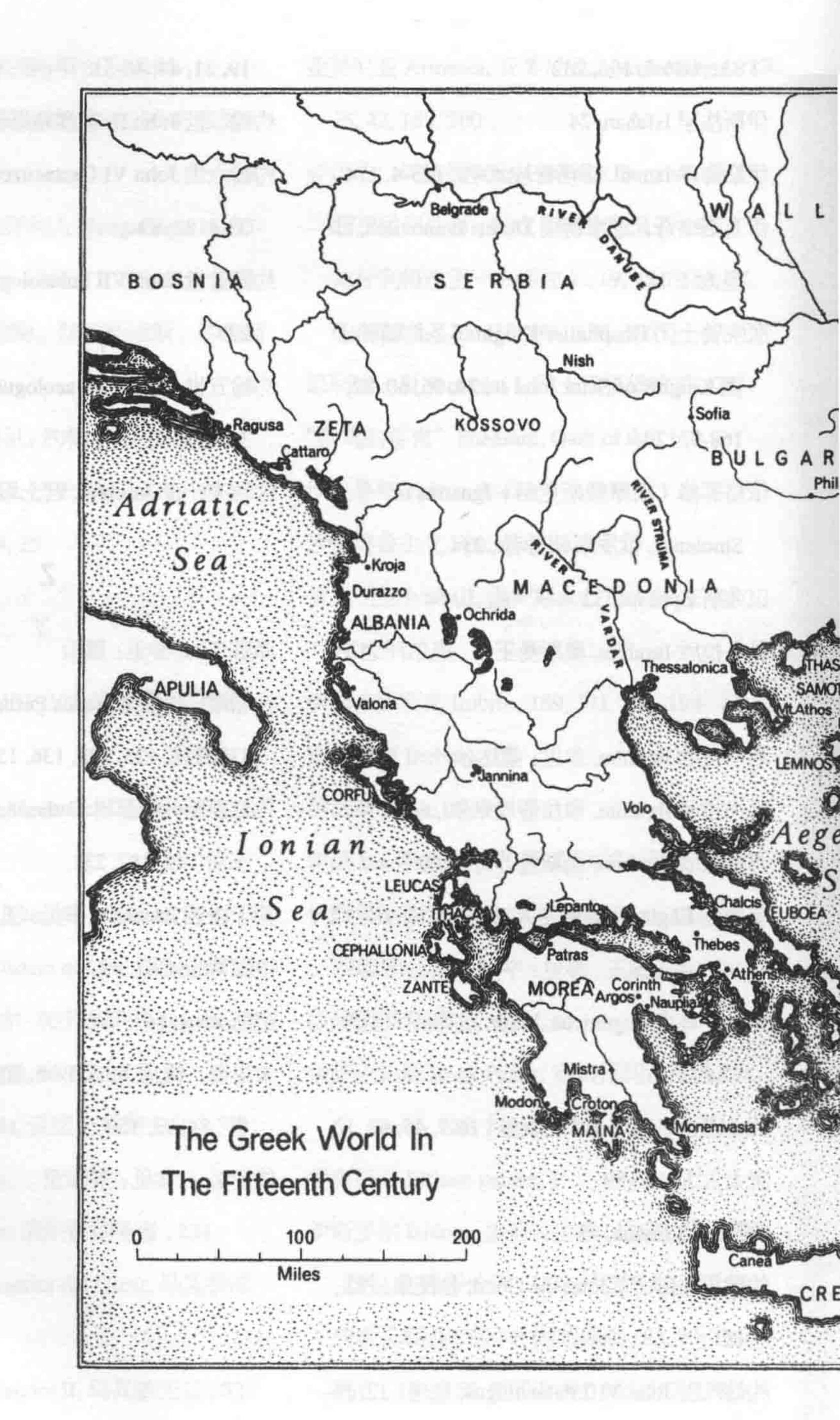
T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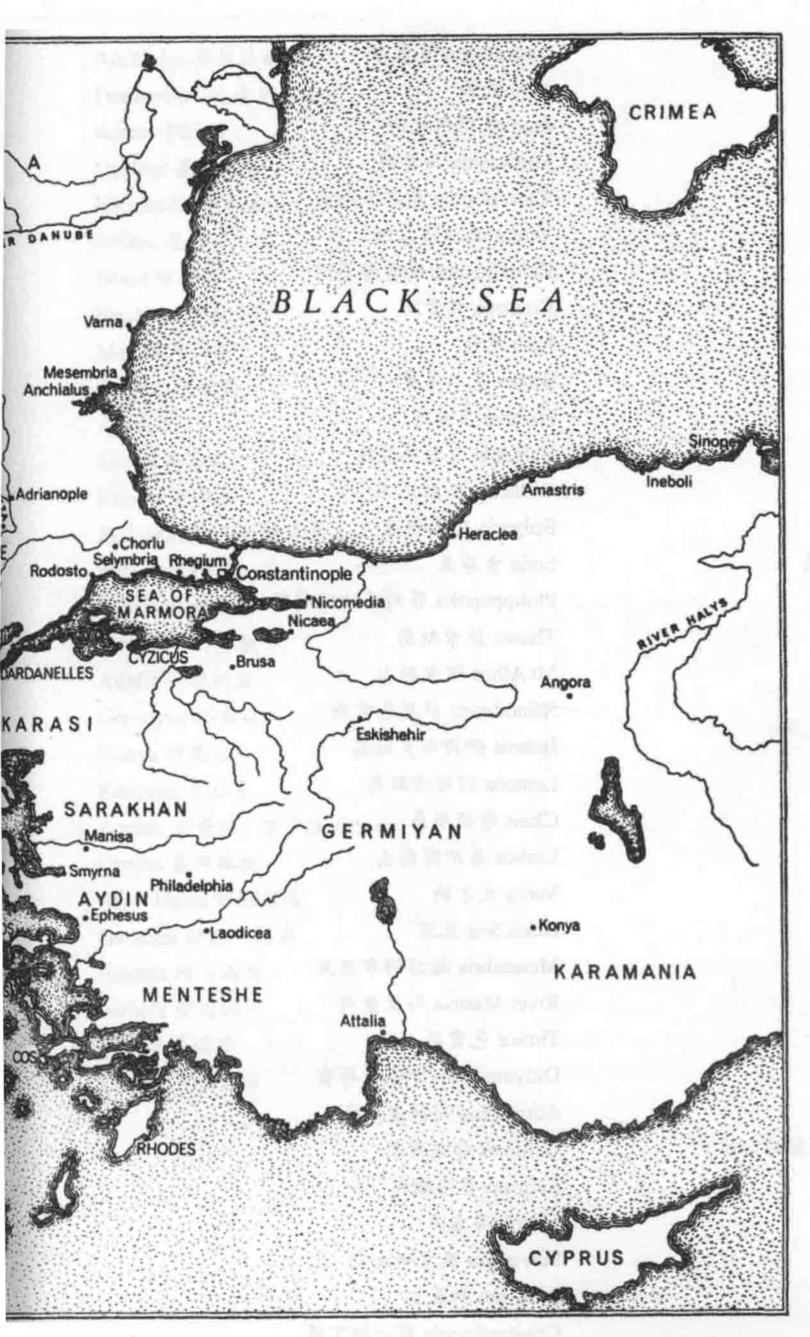
X

Y

Z



The Greek Worl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0
100
200
Miles
BOSNIA
SERBIA
Belgrade
RIVER DANUBE
WALL
Nish
Sofia
BULGAR
Phil
ZETA
KOSSOVO
Ragusa
Cattaro
Adriatic
Sea
RIVER STRUMA
RIVER VARDAR
Kroja
Durazzo
ALBANIA
Ochrida
MACEDONIA
Thessalonica
THAS
SAMOT
Mt Athos
LEMNOS
APULIA
Valona
Jannina
CORFU
Volo
Aege
S
Ionian
Sea
LEUCAS
ITHACA
Lepanto
Chalcis
EUBOEA
CEPHALLONIA
Patras
Thebes
Athens
ZANTE
MOREA
Corinth
Argos
Nauplia
Mistra
Modon
Croton
MAINA
Monemvasia
Canea
CRE



图十三　15世纪的希腊世界

Bosnia 波斯尼亚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Ragusa 拉古萨
Zeta 泽塔
Apulia 阿普利亚
Ionian Sea 爱奥尼亚海
Cattaro 科托尔
Kroja 克鲁亚
Durazzo 都拉斯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Orchrida 奥奇瑞达
Valona 发罗拉
Corfu 科孚岛
Leucas 莱夫卡斯
Cephallonia 凯法利尼亚岛
Zante 赞特
Lepanto 勒班陀
Ithaca 伊萨卡岛
Morea 摩里亚
Patras 帕特雷
Corinth 科林斯
Argos 阿尔戈斯
Nauplia 纳夫普利亚
Mistra 米斯特拉斯
Modon 莫顿
Croton 克罗顿
Maina 麦那半岛
Monemvasia 莫奈姆瓦夏
Crete 克里特岛
canea 干尼亚
Candia 干地亚（伊拉克利翁的旧称）
Naxos 纳克索斯
Athens 雅典
Thebes 底比斯
Chaicis 哈尔基斯
Euboea 埃维亚
Aegean Sea 爱琴海
Volo 沃洛
Jannina 约阿尼纳
Makedonia 马其顿
Thessalonica 塞萨洛尼基
Vardar 瓦尔达尔河
River Struma 斯特鲁马河
Kossovo 科索沃
Nish 尼什
Serbia 塞尔维亚
Danube 多瑙河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Walachia 瓦拉几亚
Bulgaria 保加利亚
Sofia 索菲亚
Philippopolis 菲利普珀珀利斯
Thasos 萨索斯岛
Mt Athos 阿索斯山
Samothrace 萨莫色雷斯
Imbros 伊姆布罗斯岛
Lemnos 利姆诺斯岛
Chios 希俄斯岛
Lesbos 莱斯博斯岛
Varna 瓦尔纳
Black Sea 黑海
Mesembria 梅瑟姆布里亚
River Maritsa 马里查河
Thrace 色雷斯
Didymoticum 季季莫蒂霍
Adrianople 阿德里安堡
Gallipoli 加里波利
Rodosto 罗多斯托
Chorlu 乔尔卢
Selymbria 赛里姆比亚
Rhegium 利基翁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Anchialus 安契拉斯
Dardanelles 达达尼尔海峡
Karasi 卡拉西
Cyzicus 基齐库斯
Nicomedia 科米底亚
Nicaea 尼西亚
Brusa 布尔萨
Sarakhan 萨拉克汗
Manisa 马尼萨
Smyrna 士麦那
Aydin 艾丁
Samos 萨莫斯
Rhodes 罗德岛
Philadelphia 阿拉谢希尔
Ephesus 以弗所
Laodicea 老底嘉
Menteshe 门特瑟
Attalia 安塔利亚
Germiyan 格米延
Konya 科尼亚
Karaman 卡拉曼
Angora 安哥拉（安卡拉的旧称）
Cyprus 塞浦路斯
River Halys 哈利斯河
Heraclea 赫拉克利亚
Amasia 阿马西亚
Inebolu 伊内博卢
Sinope 锡诺普
Crimea 克里米亚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在长达7周的战役中，双方不论民族、信仰，均表现出惊人的英雄气节与坚韧，荡气回肠，令人动容。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196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一书，在大量西方同类专著中，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篇幅适中，已成为此领域备受推崇的权威著作之一，累计重印达18次之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阅读过这本书，作为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初学者，当时便深有感悟。

作品具有的浪漫情调，远非学院派著作可比，不仅读起来平实无华朗朗上口，毫无学究气，而且内容易懂贯通性强，凸显学养之厚重。他的作品在国际拜占庭学界浩繁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不是独树一帜的话，那也称得上是特立独行。

——**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拜占庭史专家）**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又一次向我们展现了他过人的历史叙事功底，这段精彩的传奇在他雍容高雅的文笔下，显得跌宕起伏、令人唏嘘。

——《历史》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一位以其权威著作改变了我们对拜占庭、中世纪教会及十字军认知的历史学家。

——《卫报》


上架建议◎历史·中世纪史·拜占庭史

ISBN 978-7-80769-683-4



www.cambridge.org

定价：58.00元